恽代英文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恽代英文集

下卷

陆定一题



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原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相信共产主义，而且愿意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做青年运动的一种青年团体，他是要随时随地领导中国一般被压迫阶级，特别是要领导无产阶级的青年群众，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他与各国的共产主义青年团都是少年共产国际的支部，他们都是各所在国共产党下面专门做青年运动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于一九二二年在广州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决定他的纲领与章程。三年以来，他的组织扩展到各重要的省会都市与工业区域，他的团员多是各地纯洁勇敢而为一切社会活动的中心分子。他与共产党一样，是采取民主集中制，每个团员必须严格遵守团体的纪律，照章出席各种会议，缴纳团费，执行上级委员会所指导分配的工作。在政治上，他完全是遵守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而与之取一致行动的；在青年的文化、教育以及经济利益的争斗，那便是他所要独立负责的工作。

他是在中国唯一的以拥护青年本身利益为目的的团体。中国青年一方受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一方受宗法社会的束缚，他们饱受各种穷困不自由的痛苦；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广大的群众

的团结，尤其是因为他们没有忠实而强健的领导机关，所以他们零碎没有组织的争斗，每不能摇撼他们的厂主、工头、师傅、教职员，乃至于他们的父兄尊长的威权，不能有益于他们本身的解放。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便是要在被压迫的无产阶级青年以及一切被压迫阶级青年中间，提选那些最有阶级觉悟而愿意为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奋斗的分子，将他们组织起来，给与他们为经济争斗所必要的各种教育与训练，而且使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接近各方面的青年群众，在一切争斗中间领导青年群众争取他们本身的利益；所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拥护青年群众利益的卫士与前锋的战斗者。

自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今天还是在幼稚的时期，而且他的组织与人数的发展，还远未能到他在工作上所需要的那种程度。但是他的前途可以相信是很远大的；他到现在，曾经开过三次的全国大会，在每一次大会中间，都可以看出他的显明的进步。他的大会，与一切共产主义者的大会一样，没有一切繁文缛节，亦没有一点虚伪敷衍；在大会中，他的中央委员会应当把他们在任期中的全国的工作，详细报告给到会的各地的代表，接受他们的赤裸裸的批评，以为下届中央委员会执行工作的标准。他在每次大会中，常有关于种种方面实际运动的决议案，这些决议案都是根据全团以前工作的经验，或者是根据各国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的经验而规定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学校，他除了在原理上要与团员以关于共产主义的教育以外，最要是领导这些团员在行动上训练他们成为忠实强健的共产主义者，那便是说，训练他们成为肯为被压迫的青年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忠实强健的战斗者。

最近他举行了第三次全国大会，在这一次大会的中间，重新估量了他全团的工作。这次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最新规定的民族运动决议案，指明中国的军阀与买办阶级是完全在帝国主义卵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必然是反革命的；幼稚的工业资产阶级，与摇动不定的小资产阶级，亦决不能为革命的领导者；只有无产阶级有力量领导中国的民族革命，丝毫不摇动的与帝国主义为彻底的战斗。这个决议案使中国共产党直接把民族革命认做自身的责任，并且认定了只有越是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越有把握完成中国的民族革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亦完全同意了共产党的这种指导。

在这次大会中，很注重领导青年工人学徒进行经济争斗。从前他的团员还未能充分的注意于此项工作，所以亦还未能得着各地的无产阶级青年群众。这次大会决定要为青年工人争与成年工人同等的待遇；禁止使用十八岁以下童工作夜工及其他有损健康的工作；禁止使用十三岁以下之童工，由国家或厂主供给其教养费用；取消包工制、工头制、个人契约制；取消学徒制，至少要减少学徒年限，改良待遇，禁止使用为私人服务；举办工人义务教育与娱乐部；改良卫生条件；规定不扣工资的休假日期，规定因工伤死的医药抚恤费用；规定最低工资、失业费用、劳动保险。他们规定对于青年工人调查与宣传煽动的方法，并在与共产党合作的工会与罢工运动中间，特别拥护青年工人的利益。他们说明部分的经济要求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是要由经济争斗以引导青年工人到政治争斗，一直做到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这，才能达到无产阶级青年解放的最后目的。

在一般被压迫青年运动的决议案中，他们指明这种运动的

目的，一是要接近一般青年，便于为主义的宣传；二是要领导他们为自己求解放而拥护青年工人、农民的利益；三是要领导他们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以增加左派的势力。他们详细审核了从前所规定的做青年工人、农民、学生、妇女运动的各项具体方法，决定以后切实进行的方针。他们很注意使每个团员接近一般被压迫的青年群众，并指定以后应特别发展青年工人、农民运动的各地方；学生运动则说明要帮助组织或整顿各地的学生会及其他学生团体，使其成为代表学生群众本身利益的职业机关。他们亦决定在相当时期，应当促成一个全国联合的青年团体。

关于宣传及煽动的工作，他们指出无产阶级的立脚点，宣传民族革命与作文化运动的必要。对于帝国主义软化中国人民的基督教，军阀官僚迷惑民众的佛学会、同善社，宗法社会压制青年的旧道德，狭隘的知识阶级反映资产阶级意识，以抵制阶级争斗与离间国际革命势力联合的国家主义，帝国主义与资本阶级的走狗蒙蔽无产阶级，以和缓民族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改良主义自由主义，他们都预备尽力加以攻击；同时他们亦决定防止那妨害布尔塞维克化革命组织发展的个人主义、浪漫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思想倾向。他们对于宣传方法，亦提出了应当注意的六点，他们要利用演说、辩论、口号、标语、图画、刊物、纪念集会、平民学校的教材之类，扩大他们宣传煽动的功效；他们要利用各种具体的材料宣传到各方面青年群众中去，而且他们切实规定每个团员都要进行此项工作。

他们特别提出反对基督教与反对战争的运动。在反对基督教决议案中，他们要帮助非基督教同盟使发展于全国各地，而且预备宣布一切基督教徒、教会、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的罪恶，

但他们说明不应当因此而憎恶一般教民与教会学生，因为他们不过是被压迫欺骗的一部分群众，应当引导他们一同努力作反基督教运动。在反对战争决议案中，他们指出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为互争扩张市场，自然引起他们之间的战争，他们又为各欲造成特殊的地位，各利用殖民地中一派封建势力，自然又会指使各派封建势力使他们之间发生战争，这便是所以使中国一面在太平洋战争恐怖之下，一面又困于军阀战争的原故。他们批评以前对于战争只取旁观态度的错误，决定以后要在军士、农民中作反对战争的宣传，而且亦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虚伪的和平口号，鼓吹只有革命可以消灭这种战争。

他们决议要更严格整顿他们的组织与纪律，要努力发展他们的组织于各种有青年群众的地方，并详细解释他们活动的基本单位——支部的作用与组织法。他们亦特别规定各级机关对于团员教育训练的注意事项，并规定了训练的四种口号："学习列宁主义"，"严守团体纪律"，"参加实际工作"，"获得青年群众"。

在这一次会议中间，改正了他的名字，与各国一致的命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欧洲本是第二国际以下黄色的少年组织，是一种不名誉的名称；中国所以以前用此名字，本只是因为防着许多人对于共产主义有很多误会的原故。但是这在现在已经是不成问题。现在他们虽不称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然而人人都知道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而且共产主义成了一切反动派攻击毁谤人的口头禅了。现在必须勇敢的改正共产主义的名字，而且努力宣传使一切被压迫青年都知道共产主义者是为他们利益而争斗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是特别拥护他们利益的

一种组织。共产主义果然是可怕的么？马克思说："我们共产党受非难的，是希望废止个人的财产权……你们所说是小职工财产，小农夫财产，资本家时代以前财产底制度么？那就不消废止了。自从大工业发达以来，已将他们破坏了，并且日日还正在破坏中。"读者诸君，大工业发达到中国来的时候，外国资本家和本国的军阀与买办阶级已经破坏了你们的财产权，"你们恐怕我们废止私有财产，你们现在的社会里，十个人当中便有九人丧失了私有财产"，你们还怕共产主义么？共产党与共产主义青年团正是要废止外国资本家、军阀与买办阶级的财产权，这种共产主义运动，只有他们或他们的走狗才会觉得恐怖。

载《中国青年》第63、64期合刊
署名：F. M.

中国劳动阶级斗争第一幕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

现在离"二七"流血惨剧发生的时候，已经是两年了！"二七"是中国空前未有的劳动阶级的斗争，他是为抗拒军阀的压迫，争取工人阶级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而引起来的一个中国从来不曾看见过的大罢工——京汉铁路北方从北京附近的长辛店，南方到汉口附近江岸，二千四百余里之间，总共铁路工人二万余人，全体一致的在他们的京汉铁路总工会命令之下，所引起来的大罢工！这一回的大罢工，被军阀所压迫摧残而失败了。在长辛店，杀了四人，重伤三十余人，捕去十一人，开除许多列名在工会办事的；在郑州捕去六人，开除三百余人；在江岸杀了三十二人（林祥谦、施洋还在外），重伤二百余人，捕去六十余人；在保定、高碑店、彰德、信阳、新乡等处，都有被杀伤逮捕的。此外正太路为同情罢工，开除四十余人；道清路为同情罢工，被捕四人；粤汉路工人，汉阳钢铁厂工人，汉冶萍轮驳工人，丹水池工人，扬子机器工人，均举行同情罢工，不幸均为军阀压服，开除工人二千余人。

不错，"二七"的斗争是失败了；然而除了"二七"以外，谁曾对于军阀的压迫有过这样大而有力的反抗运动呢？若是没有"二七"的例证，谁曾梦想过工人阶级会有这样伟大的组织、良好

的纪律！与夫这样坚决的决心，能够使军阀至今都还是对于他们不敢正视呢？今年的二月七日，全国铁路总工会又已经在郑州召集全国代表大会了！他们究竟并不曾因为“二七”惨杀而退后一步！他们又来了，他们更进一步而完成他们全国的联合与组织了！

伟大的工人阶级啊！你们真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

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长辛店设立了劳动补习学校，这便是京汉铁路工会运动的开始。长辛店的工人俱乐部是经过多少周折，才于这年下期成立的；从此以后，京汉路各站相继成立此种组织。一九二二年四月，长辛店便发起组织全路总工会，开了一个十四处代表的筹备会，八月又在郑州开会，举行第一次全路罢工，要求改良待遇，支持二日，路局便屈服了。一九二三年一月又在郑州开会，草定总工会章程，统一全路纪律，决定二月一日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他们的章程，凡京汉铁路工人，不分司机、升火、机匠、学徒、小工等名目；不分车务、工务、机务等职务，也不分老少、地域、国籍的差别，只要能守章程，缴费，服从命令，都一样为会员，下级员司之表同情的，则须得两工人介绍及所在地执行委员会通过。他们的执行委员会，由每年的代表大会举出，除执行对内对外各事外，规定必须帮助全国铁路工人和全国工人组织工会，以加强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对于罢工事件是很审慎的，规定这种事件必须执行委员会议决，全体会员过半数的通过，才能举行。他们的会费，每人每月须缴一天所得工资之一半，会费各分会用百分之四十，总工会用百分之十五，其余存作基本金，非因罢工或特别重大事件，经执行委员会的通过不得支用。

这样工会的组织不是很完善的么？然而，工会组织越是完善，对于压迫工人的统治阶级越是不利，于是吴佩孚等决定在二月一日便要给他们一个惩创。二月一日总工会的成立会仍旧在郑州举行，各分会代表共到六十五人，各地工会与各铁路工会派代表前往观礼的将二百人。开会以前，吴佩孚即设法阻碍，并派军警阻止代表赴会，代表等在街心与之理论约二小时不得允许，愤激冲开军警阵线，涌入会场，仍宣布总工会正式成立。这时会场被军警包围，散会时代表冲出后，所驻旅馆又被派兵监守，断绝饮食，干涉自由，并毁弃各团体所赠匾额礼物，捣毁总工会一切文件什物，当晚即封闭郑州会所。

这激怒了到会各处代表，于是全体决议从四日午刻起，宣布京汉路全路总同盟大罢工，要求撤革破坏总工会的局长及军官，赔偿损失。罢工以后，吴佩孚等大调军队，极力威胁压迫，然各地均严格听从总工会的命令，不稍摇动。于是长辛店于六日晚间，军队劫掠工会，逮捕工人领袖与工会学校教员；七日黎明，有三四千工人到旅部要求释放被逮捕者，旅部下令全副武装大队兵士自内冲出，一时枪弹纷飞，刀剑并举，人马践踏，全市秩序荡然。郑州于五六日均逮捕工人领袖，强迫其劝告工人上工，八日又召集无赖冒充国民大会，恐吓工人限于十二小时以内上工，均无功效，至九日得汉口惨杀之讯，知大事已去，乃行屈服。汉口于六日各工团举行慰问京汉铁路工人大会，并号召三千余人的大游行；七日下午军阀佯约工会代表会议，派军队开枪环击，同时逮捕多人，分会委员长林祥谦亦在内，军阀强林君下令使工人上工，林君坚不允许，遂被惨杀；二月十五日又杀援助罢工之律师施洋。

林祥谦之死是很值得纪念的，下面是某外报叙他临死时的情形：

“（上略）林君被捕后，也捆在江岸车站，与先捆在电杆上受毒打的工友们在一起。此时张厚生召集警察分所长、车站站长、段长于车站内，并亲自提灯，于七八十人中找出林君，回顾吴段长说：‘此人是否工会长？’吴答说：‘是。’张乃立命刽子手割去绳索，迫令林君下‘上工’命，林君不允。张命刽子手先砍一刀，然后再问道：‘上不上工？’

“林君抗声回答：‘不上！’

“张又命砍一刀，怒声喝道：‘到底下不下命令上工？’

“林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下令的！但今天既是这样，我们的头可断，工不可上的！’

“张复命砍一刀。此时鲜血溅地，林君遂晕，移时醒来，张狞笑道：‘现在怎样？’

“林君切齿骂道：‘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帐王八蛋的军阀走狗手里！’

“张等听了大怒，未待林君说完，立命枭首示众，一个轰轰烈烈的京汉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君就此慷慨成仁了！”

“我们平常在社会上，并不是没有听到些不平的议论，也有人主张革命，也有人主张牺牲，也有人主张用鲜红的血去洗尽社会罪恶的迹；只是谈的多，做的少，听到的多，看见的少。（甚至于全无！）如此你谈我论，熏习成风，就成了一种变相的清谈了。这样的风气一成，几多庄严神圣的好名词，尽变作无聊无赖的机

锋[1]，互相标榜的幌子；怯懦无耻的人生，便在这幌子底下游来游去！这是人类多可悲哀的事呵！所以二月七日的事，一方面证明无产阶级有担当今后革命事业的伟大资质，破除资产阶级的傲慢和成见；他方面更给予旧社会中怯懦无耻的人们一个深刻的暗示，仿佛告诉人们说：‘革命是要求壮烈的牺牲，无论谈怎样高妙的调子，都不过滑稽罢了。’”——这是《京汉工人流血记》中的几句话，我们正可以借来转告为“二七”斗争所感动振奋起来的诸君！

载《中国青年》第65期

署名：F.M.

---

① 机锋：机警锋利　此处指无从捉摸的空谈。

预备一九二五年上期的工作计划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

春天——万物滋生繁荣的时候，我们全中国的学生青年，又要开始他们一九二五年上期的新工作！我想：第一件新工作，怕便是要预备一个一九二五年上期的工作计划罢！

让我们有计划的开始我们的新工作！让我们的新工作可以计日而程功！我们的青年时代是一过去便不会再来的，我们还过不了几年的学校生活，我们要很珍贵的用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象过去的每一学期，漫无计划的耗费我们许多的光阴于无用之地！

我们要读书。那便我们必须预备做一番改良学校图书馆的运动，我们须要对同学宣传，集合起来向学校提出条件，要使图书馆归于学生会的监督之下，使学校预算中的图书费，征收学费时附带征收的图书费，每个钱都切切实实的用做购买图书的经费，而且购买同学所正需要而应阅览的图书，这些图书应由学生会提出请学校购买。我们亦须预备组织读书会，规定分别担负购买图书的办法，集合每个同学所购买的图书，编印出一个目录，规定出借阅规则，以便于同学互相借阅；同时我们要有一个

共同遵守的读书规约，每天在一定的时候，应当大家有一二小时的自己读书期间，读了一种书必须有他的笔记，而且在定期的集会时，必须有一个关于他的内容的简单报告。读甚么书呢？最好是读切实而具体的社会科学的材料，或者是读那些有益于了解现代中国或世界政治经济情形的材料。

我们要娱乐。那便我们必须进行组织音乐会、球术团、旅行队、新剧社，而且在可能时，发起全班或全校的同乐会、恳亲会。我们应当使我们的生活象春天一样的丰富而有趣味，所以我们必须打破已往的枯燥沉寂，加入各种音乐、体育、游戏的场合中。我们应当加入技击团、体育会、童子军，让我们可以有很多方面的活动。自然我们不应当象那般醉生梦死的被迷惑的青年一样，忘记了我们还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呻吟苦痛的人民；但我们先要强壮、健全，而且先要有种种可以接近民众的技艺，我们才更能领导他们去努力奋斗！

我们要练习做事的能力。那便我们必须参加或者发起各种为社会活动的团体，办理平民学校或者是校外儿童体育团，最要紧的我们必须发起或整顿于我们自身利益有密切关系的学生会。我们靠做事以学做事，靠与人一同做事以学与人一同做事。我们从做事中间，训练自己的品性，增进自己的经验，修养自己的才干。我们不但要成为有知识的人，要成为能运用知识的人；我们不但要成为好人，要成为好而能与人一同做正当有益于社会的事的人。

我们要在今天、此时，为我们自己的一九二五年上期预备一个精密的工作计划，我们要在这半年之内，做一切我们所能做的，使我们在半年之后可以有一个大的进步。我们的工作计划

是测量我们这半年工作成绩的标准。我们不可以放松了我们自己的这半年，我们的青年时代是一过去便不再来的。

载《中国青年》第65期

署名：代英

妇女运动

（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

我们可以不注意妇女运动么？就以往我们所有的妇女运动的成绩言，他不过造就了几个出风头的新女子，几对享乐主义的恋爱婚姻。这于全人类有甚么关系呢？实在令人不能不发生疑问。

以前妇女运动之有此等弊病，是不必讳言的；然而以前妇女运动的此等弊病，我们亦不好过于张大其辞，因此遂认为妇女运动根本便没有意义。以前又何曾只于妇女运动有此等弊病呢？一般在新文化运动中间著名的男子，又有几个不是以出风头过享乐生活为他们的归宿地呢？根本考究起来，这般男子或妇女，本便是由于他们个人主义的精神，以要求他们自身的解放。他们所要求的，既然只是他们个人的解放；个人已经得着解放了，因而把其他一切社会问题都抛之脑后，这是很自然无足奇异的一件事。

诚然在这种恶劣社会制度之下，比较有血性的青年妇女，便是仅仅为他们个人的解放，而能起来做一番奋斗的工夫，亦是值得我们钦佩的。我们所不满意的，只是这些青年妇女，同一般新文化运动中投机派的男子一样，他们一天因为他们的口才或者是狡猾的伎俩，或者因为好的运气，得着做了一个统治阶级的高

等奴隶，或者可以卖身子给那些教授学者，或者可以嬲着一个不知人事的风头男子大家过猪的生活，便一切满足了，他们认这便是他们个人的所谓解放。妇女解放是闹得很久了的！然而究竟有几个妇女可以不仍然要靠着娇痴或忍让以得着他们的新式的“夫主”之怜惜呢？有几个妇女可以不仍然要靠着挟制或暗算以维持他们在家庭社会上面的相当地位呢？少数所谓“解放”的妇女，究竟不过如此；而那些未曾解放或尚完全不知道要求解放的妇女，却还不知比他们有几千倍几万倍的多。然而说妇女解放运动已经有相当的成绩了，这是如何可耻而可怜的事啊！

谁亦不敢反对妇女解放运动，但我们所希望的是全妇女的解放，是妇女的真正解放，我们反对那些妇女解放运动中间的个人主义者与投机主义者，正如我们反对一切个人主义者投机主义者一样。我们知道妇女是比男子要更多受一层压迫的人，因为遗传的谬误的风习与心理，每个男子都不免有意无意的有些压迫侮辱妇女的地方；我们说一切被压迫者都应当起来，自然妇女的解放运动是比一切都要更合理而急要的事了。不过若是误认妇女解放运动是要求一个更好的卖身的方式，是希望用自己的口才、狡猾与运气，为自己造一个较好的生活，以骄傲其余一切被压迫的妇女，这便是糟糕至极的事了。我们要晓得只有全体的解放，没有个人的解放。不打破现在的家庭，妇女永远是不能免于为家事奴隶的；他们仰赖男子的经济供给，那是为了养育看护，总有一天会完全被束缚住。不打破现在社会的经济制度，妇女永远是不能到独立自由的地位的；私有资本主义已经使许多男子陷于工钱奴隶的地位，甚至于求为工钱奴隶而不可得，他虽然亦可有助于打破家庭，但他如何会有为妇女谋独立自由生

活的余地呢？只有打倒私有资本主义，一方面发达产业，使一切家事，无论是洗濯、烹饪、抚育、看护，都变成社会化的事业，使妇女脱离家事奴隶的运命；一方面又保证一切男女都可以有平等的工作生活的权利，使他们不至于陷为工钱奴隶，或甚至于为工钱奴隶而不可得。只有到那时候，才说得上真正的妇女解放运动。所以真正要求解放的妇女，一定不是要造就几个女政客、女学者，或者甚至于造就几个政客、学者的洋太太，他们必须要努力赞成改造社会的运动。

我们很感觉中国的社会运动有一种大的困难，便是，虽然说中国有很多的女工、女学生，他们普通的觉悟程度，比男工、男学生还不如；对于不觉悟的男工、男学生，有时还容易使觉悟的男子接近而宣传他们；对于不觉悟的女工、女学生，却找不着几多觉悟的女子去做这种宣传的工作，而觉悟的男子又困于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男女界限，不能去接近宣传他们。普通学生的政治运动，女学生常常是很淡漠置之于度外的；劳工的经济争斗，一大部分的女工甚至于还要抱一种不合作的态度。我们知道中国的民族革命，只有新式产业下的无产阶级有领导他的力量；然而在纱厂、丝厂、烟草厂等处，他们厂中以女工人数占多数，这些女工每每是已觉悟而又无法接近宣传的。这是一件如何令人困心衡虑的事呢？我们惟一的希望，便是要有些真能为求自己解放而献身为社会的妇女，来担负这一种工作，我们希望他们为女学生谋一种团结组织，引导女学生参加民族运动；特别是希望他们为女工办平民学校，使女工认清他们经济上与资本家的冲突，使他们知道女工与男工是同一阶级的战斗伴侣。这是只有真正觉悟的妇女才能做的工作，亦只有使妇女运动能引导妇女去做

这样的工作，才可以说是有意义。我希望一切谈妇女运动的人注意。

我们很恳切的需要真正的妇女运动家，我们很恳切的需要能引导女学生、女工参加民族运动与改造社会运动的人，只有这可以使全妇女得着解放，而且亦只有这，可以使全人类得着解放。我们为全人类解放而赞助全妇女解放，为全妇女解放而赞助一般妇女的解放运动。

载《中国青年》第69期

署名：代英

上海日纱厂罢工中所得的教训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四万余中国工人，以前没有工会的组织，没有罢工的预备，为了反抗日人虐待，竟能一蹶而起，坚持奋斗至于两星期之久，逼到日本资本家不能不开对等的会议，签字允诺工人的条件。这是一个壮烈的战斗啊！我们眼见这种战斗的经过，可以得着下列的教训：

第一，工人若没有联合，不能与资本家对抗，则他们的地位只有一天天的低落，社会上没有人肯注意到他们。上海的生活程度在这几年中间，至少高了三倍，然而工人的工钱不曾增加；不但工钱不曾增加，他们的工作倒反加了三倍了（五年以前，每个工人管六部车，工钱三角八分，现每人管二十部，工钱仍旧。以前棉条车每人每天一部，工钱三角四分，现每人每天三部，工钱三角七分。以前摇纱间开倒车每人二十部，现每人六十部，工钱仍旧）。社会上不少自命为讲人道的仁人君子，谁曾注意了这一件事？中国人受英美帝国主义之唆弄，向来是以仇日著名的，然而在上海日本纱厂监工殴打工人，厂中借故扣除拖欠工资，严格限定工人吃饭与入厕的时间等等，这种加于中国四万余工人的虐待，甚至于连“以仇日为业”的人亦会不加过问。然则工人的痛苦，除了工人自己起来奋斗，可以有甚么方法呢？我亦知道有

不少热诚而愿帮助工人的青年，究竟只有使工人自己联合自己奋斗，是最有效力的帮助他们的法子。一切的人民应当都使他们联合起来，他们自然会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若不是他们自己起来，有时甚至于我们不能知道他们的痛苦，还说甚么为他们而奋斗呢？

第二，产业工人确实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只有他能做民族革命的主要军队。产业工人之所以最革命，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知道要求革命的原故，只是因为他们聚集而利害一致，故易于相互煽动。长辛店设立劳动学校，是铁路工人运动之开始；然而不到一年便引起全京汉路的大罢工。上海最近的工人运动，更不过只是半年的事，居然便引起四万余人大罢工。我因此想：产业工人简直是一个火药库啊！资本阶级制成了这样的火药库，安放在可以致他自己的死命的地方；只须点一根火柴进去，便会轰然的爆烈起来。这样的革命势力，是如何值得注意呢？盲目的人轻看这种无产阶级，不知客观的事实，都证明只有无产阶级能有这种伟大的革命的力量。中国有一百六十万产业无产阶级（据《中国工人》第二期中夏君估计），他们掌管海陆交通运输、市政及各种重要工业。他们的联合，是中国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唯一可靠的力量。我不是说智识阶级、农人、游民、兵匪等人便不能革命，但这种人比较散漫而富于机会主义色彩（不勇敢而易于妥协），若不是有产业无产阶级做他们的中心与领导人，他们永远是徘徊摇动，不能很勇敢的、很坚决的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真正热心革命的青年，必要多注意产业工人运动，把全国的铁路、矿山、工厂及其他市政、运输工人一齐都联络起来，这才可以保证革命之进展与成功。

第三，资产阶级与一切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只想利用人民，谈甚么全民利益的鬼话；但对于真正有关系工人、农民利益的事情，他们是很顾忌而不肯帮助的。这一次罢工中间，固然还得着一部分人的同情，中国纱业资本家因利用日纱厂的停工以渔取利益，甚至亦暗中有相助之意；然而一谈到实际援助工人，却大家踟躇不前，生怕惹了煽动罢工的嫌疑。此次工人宣布日本纱厂的弊端，只有是非心的人都应当可以有一个判别；然而这些平日向来装个伪善面孔的"士大夫"，偏能够把这一切是非都置之不论不议，漠然坐视这四万余工人坚苦支持，绝不为之援助。只消日本资本家说，这是赤化，这是有人鼓动，那便无论日本资本家待工人是如何的狠毒无人心，大家亦不敢有愤恨而出来赞助工人。这种人平日尽管谈爱国，谈国家主义，谈全民政治，甚至于谈工人利益，一到了这个关头，他们竟可以一声不响，或甚至于象《时事新报》，所谓"工团联合会"，所谓"国民党护党党员会"，与日本资本家索性一鼻孔出气，亦想把过激、赤化等名目来摧残这种工人运动。我们的民族革命，主要是为的占国民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利益，他们所谓"全民"，却可以把这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利益抛之脑后。他们完全是要欺骗工人、农民，一天看见工人、农民自己起来争求利益，便把他们的马脚露出来了！中国要靠他们革命，简直是笑话。

第四，罢工是给与工人的一种革命的功课。他们可以看出资本家之本何理论，帝国主义之用外交军备压制殖民地工人，各帝国主义间为压迫殖民地工人之互相勾结，殖民地之官吏之完全为帝国主义所利用。然而虽然这样，只要工人比较有组织，便可以使罢工不易于失败；只要罢工不完全失败，便可以长工人的

自信心，而加强他们的团结。这一次纱厂工人与资本家的契约，本不能说是甚么胜利，然而便是这种结果，已唤起了上海许多工人的阶级意识。最有味的，在上工后数日，有一日厂之童工在粗纱间忽然约齐罢工了，他们打毁了一些玻璃什物，待到巡捕来时，他们都坐在地上一声不响，再三询问才说出要求照契约发还储蓄金的意思，厂中只得屈服允可。这不是谁能教唆的。这些童工已经从大罢工中间学得了许多实际经验与方法，他们自然会运用。最近听说日本纱厂三万八千人的工会已经成立了，若是他们再加一番宣传训练的功夫，一定可以成为更有力的战斗军队，而且一定还可以引起别方面产业工人，与他们一样的，团结组织起来。

载《中国青年》第70期
署名：但一

《一个小学教师对于农民运动的意见》的按语*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对于卓如君的两个意见，我都是表同情的。我们为想编集充满革命精神的浅显读物或歌调，曾与朋友发起平民书局，编印《平民之友》周刊及平民丛书，近来又编印种种劳动青年周刊。不过这究竟是不够用的。我还觉得最大的缺点，是现在大家所知道的民间痛苦太少，所以说出一些话，总不免隔靴搔痒的弊病。农民固然受许多定命说所迷惑，然而人在知道自己的痛苦，而且知道确实有救济痛苦方法的时候，他可以不顾一切定命说而一往直前的为自己奋斗。迷信报应的人可以去劫货杀人，安分守己的人可以去引起民变。所以真能确实了解农民的痛苦，并能说出切实的救济痛苦的方法的人，编读物亦好，演说亦好，唱大鼓亦好，都可以使农民声入心通，引他们发生革命的要求。我很希望大家多留心从客观方面考察农民的实际生活情形，究竟他

---

* 《中国青年》收到读者王卓如来信，对农民运动提出两点意见：(一)农民受命定说所迷惑，应编印充满革命精神的浅显读物"清醒他们的思想"；(二)"投合农民艺术上的要求，练习一种歌调，把革命纳入其中，去满足他们艺术上的要求，顺便输入革命的思想"。

这是恽代英为发表王卓如来信所作的按语。

们苦到甚么田地？这些苦处是从何而来的？是不是可以有办法救济？我们所提倡的许多办法，究竟是不是真能救济他们？真了解农民生活的人，才会真表同情于农民；只有这种人说出话来能打中农民的心坎，他亦自然会唱出为农民要求革命的歌调。因此，我以为卓如君所说都是我们所要办的；但在这以前，我们要先考察农民生活，做一番研究的功夫。（不久，我将做一篇我所观察的农民生活，以便大家讨论。）

载《中国青年》第70期

署名：代英

孙中山先生逝世与中国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孙中山先生死了，对于他的批评，有的说他好，有的说他不好；但是我们要注意没有人说中山先生的革命是不对的，没有人说中国的内乱是由中山先生的革命造成的。人人都承认中山先生的事业，是引中国四万万人向较好地方走的，没有人说他是引大家向坏地方走的。

现在尽我们的能力来看中山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归纳起来，可以分八项来讲：

（一）始终为民族独立奋斗　中山先生自中法战后，看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满清无力抵抗帝国主义，于是发生革命思想；到中日战后更觉得非即刻起来革命不可。他这种思想，是由帝国主义者进迫而发生的。以前人家不注意民族革命的必要，到庚子以后，才有些人知道中国要革命，跟着中山先生向革命路上走去。辛亥革命军把满清推翻，建立中华民国；那时大家忘记帝国主义者还在那里进攻。中山先生却说，我们还受制于外国帝国主义者，我们必须要中华民族独立，和外国民族一律平等。中山先生和英美是早已不相容的。他在陈炯明叛乱前二三年就想和德俄联合，使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和英美帝国主义者相抵拒，所以英美帮助着陈炯明来攻打中山先生。我们全国的海关

权操在外人的手里，在民国八九年时，有人做收回海关权运动，可是他们不过几个人讲讲，他们的方略不过向外国帝国主义者请求发些慈悲心而送还海关主权；中山先生却不然，他不去请求，他要毅然收回海关；虽是帝国主义者派了许多兵舰到广州威吓，中山先生竟宣言倘开战时，虽败亦荣，这才使全国人对于关税主权之收回大起注意。去年沙面中国工人为反抗外人苛例，全体罢工，英领事要广东政府干涉，假使是别处的官吏，早已奉命唯谨出而干涉了。这次上海纱厂罢工，日人到中国官厅里去一说，马上中国官厅出来捉工人、枪击工人，他们忘了自己是中国的官吏。可是广东政府不然，广东政府回答他们说："罢工是普通的事情，没有要我们去干涉的必要；而且沙面租界是在你们管理之下的，要是要我们去干涉，那沙面就先要取消租界。"帝国主义者恨极了，又想运动广州商团来打倒中山先生。当时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做商团团长，他私地向外国订购枪械，被广州政府发觉，英领事却在风潮中通告广州政府说，你们要打商团，我们便要炮轰广州城，然而中山先生不怕，反向他们的政府提出抗议。中山先生到北京时，路过上海、日本、天津，一路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在上海时他对新闻记者说："我们不用守条约，因为此种不平等条约，是我们中国人的卖身契。"他明知在租界上是要受他们压迫的，但他不怕；他知道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和干涉，将使宣传更有效力。

（二）注重人民生计问题　中山先生特别注意人民生计问题，以为人民生计问题解决了，国家便可有救，革命不过为人民解决生计问题而已。中山先生常常帮助工人运动。以前国民党的工人运动每每是失败的，这只是方法不好，他们每每找几个领

袖工人，不肯切实谋一般工人的幸福。所以一般工人亦不了解中山先生是为他们自己的生活而奋斗的，致使革命不能成功。中山先生不但是为国牺牲，他是为我们自己而革命，为了要使我们不受外人的压迫，以求得较好的生活而革命，为了要改良工人、农人们的生活而革命。惟可惜未成功而死了！现在，我们要努力，使国民党继续为改良国民的生活而革命，使国民党继续为改良工人、农人的生活而革命。

（三）有建设中国计划　中山先生《建国方略》第二部，是伟大的建设中国的计划。一般人以为中山先生只会破坏，不知中山先生却是中国伟大的建设家。还有一般人说革命就是破坏，中山先生则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建设，破坏便是为的建设，我们的革命便是建设中华民国，所以中山先生发表了建设中国计划。中山先生始终认为要建设新国家而革命，革命并非单为破坏现状。

（四）主张造党治国　中山先生始终认中国非有政党不可，他主张以党治国。人民是一盘散沙，要把这散沙似的人民团结起来，共谋政治的改革，非有政党不可。无论什么地方，少数人团结成为一党，他们便可以操纵全体，就是坏的主张，也能使多数散漫的人无法得胜。中国北洋系有党，交通系有党，安福系有党，……① 沈恩孚等也有党，所以他们便都多少有些操纵国事的力量；然而这些都是私党，是害中国的党。要是好人不组织政党，中国将永远在私党之手，永远不能得到政治优良、民族独立的地位。中山先生知道要政治清明，民族独立，不能不先组织一个坚固的好人的政党，以打倒这班私党。所以他很早就有兴中会的组织，而且他屡次把他所组织的政党内容改组——由兴中

① 略有删节。

会而中华革命党而中国国民党。一般人说中国不要政党，或者说国民党怎么坏怎么腐败；他们不知道没有政党，中国便永远在一般狐群狗党手里；至于国民党分子还不十分纯粹，这是因为勇敢有毅力的纯洁分子不加入的缘故。我们要革命成功，必须先要有好的政党，要纯洁的分子入党。

（五）努力于宣传工作　中山先生觉得宣传是革命的最重要工作，他随处演讲，编著书籍，希望中国国民个个人懂得他的革命目的。他说，我们在满清时代，一个兵也没有，革命居然成功；现在有了上万的兵，而一个陈炯明却打不了，这是宣传功夫下得太少了。我们要努力宣传，使人民知道革命是为我们自己，我们现在的生活不好，革命是改善我们的生活；那末，不但自己的兵士能为主义而战，至死不变；便是别人的兵，亦可变为我们的，以供我们指挥。有些人以为军事运动很重要，果然，这是必要的；但我们更宜注重宣传，有了宣传，有时用不到打仗呢！这次东江之战，有个陈炯明的军官说："他们的兵在战斗时到我们队前讲演；于是我们的兵不战而退……"这很可见宣传的功效了。我们应当学着中山先生的宣传精神，使全体国民了解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

（六）主张革命政府独裁　革命政府独裁好似太专制了，人民的自由权也被剥削了，但在事实上非此不可。现在俄国的革命政府就是独裁的。在辛亥年中山先生主张革命后不可放任反动派自由行动，一般不懂革命方略的人反对他，去年中山先生的打倒商团，更有些人痛恨他。其实辛亥年与反革命派妥协，造成十四年反动之政局，去年中山先生对反革命派不加以压迫，那便中山先生只好离去广州，这不都是很显然的事么？旧势力是不

容易一刻就消灭的，不把他切实打倒，他们便会死灰复燃，以破坏革命政府。所以中山先生对于这种种旧势力都要去打灭它，认为非革命政府独裁不可，革命政府是为人民而取独裁制，这有甚么疑虑呢。反革命者既是要反抗破坏革命政府，革命政府下的权利，自然没得他们的份；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革命政府不能不这样待遇他们。

（七）联合国内外革命势力　中山先生觉得要革命成功，一定要有有力量的革命团体，所以他一方联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势力，一方更联合苏俄的革命势力，以谋打倒帝国主义，因此，有许多人以为中山先生赤化了。但我们要问：帝国主义者已联合进攻弱小民族，我们革命的势力怎样不可以联合？我们要反抗压迫我们的仇敌，对于同是要反抗这仇敌的人当然要联合。国民党既要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与苏俄等革命势力亦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我们怕什么而不竭力相互联合呢？要是革命势力不联合起来，反革命者很容易打倒我们，我们的革命工作将永不能完成。所以我们不要再受离间者的间言了，我们要联合起来，继续中山先生的事业。

（八）富于不妥协的革命精神　中山先生在一生中无论谁骂他谁恨他，他是不怕的，他是不管的。他受了四十年的唾骂，受了四十年的反对，但他一切不问的向前进行。黄兴是他很好的同志，但为要改组一个有纪律的党，宁与他分裂亦所不顾。去年亦为改组党的原故，开除了好几个反对此举的老党员。于此，可见中山先生的不妥协的精神了。

中山先生是中国的伟大的革命导师，他的逝世当然于中国革命势力有极大的损失。不但中国，就在全世界也受极大影响。

当他生存时，他攻击国际帝国主义，于世界革命有裨益，全世界弱小民族都蒙其利，所以他死了，世界革命也将受帝国主义者更重的压迫。

在今天，我们要团结坚固呀！危险是一天天要来的，许多人在那里想法子破坏国民党，想借此破坏中国的民族革命。我们要知道国民党是我们的，是我们人民的。已加入国民党的，要团结着；没有加入的，亦要一念中山先生为我们四十年的奋斗，即刻决定加入国民党以谋竟革命的全功。民族革命的导师去了，我们怎能再如散沙般过去呢？中山先生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中山先生的事业，已成为我们的责任了。

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员必须要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现在虽有许多怪话，说什么推某某为总理；然而我们知道国民党内最高是总理，次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现在总理逝世了，当然要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员要团结起来，团结于第一次大会宣言之下，团结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有血性毅力的青年国民党员！若能这样团结起来，中山先生之死，决不至损及国民党的前途！

对于国民党的压迫是一定要来的。然而法国未尝不压迫！这无害于大革命的成功；俄国更为世界上最压迫的国家，革命也成功了。"愈是压迫，愈可使那些谋升官发财的假革命党走开"，愈可使真革命的党员团结起来。所以压迫是不足怕的，他将使革命快些成功！而且他们的压迫是不久长的，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地位，一年一变，或是几月一变，今天当权的不几天后就要下台，他们都是常常摇动的。我们怕他们甚么呢？他们多一次摇动，我们的革命势力将更进步一些！

能永久团结的只有"主义"；自然，"权利"也能联合，但权利关系一变，那种联合便解散了。没有主义的党，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呢？然而这种党，总是不久便归于消灭。要是中国国民党也不联合在大会宣言之下、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不到几月便亦会归于消灭的。中国国民党在民国很多很多政党之中，只有它能继续存在，这全是由于它有一定的主义的原故。所以，我们要认清主义；在这主义之下，竭力去革命，这才可称为能守中山先生的遗训，而继续他的事业的革命青年。

载《中国青年》第71期

恽代英讲　高尔柏记

孙中山先生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人人都知道纪念孙中山先生，人人都知道哀悼孙中山先生；无论是平素反对他的，平素有许多地方不满意于他的，但是到了他死了的时候——他为中国民众的幸福与利益经过四十年的奋斗而死了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中国民族的一个重大损失，大家都崇拜而纪念他。这是孙中山先生应有的酬报啊！这亦可以见得中国人民要求革命的潜意识，所以大家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革命的领袖之死，不期而然的表示出来他们的悲哀。

我愿意全中国青年，在这个全国追悼孙中山先生的时候，要更了解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与志愿，要格外珍重他的经验与教训，而且为他的原故，为全中国人民的原故，乃至于为我们自己的原故，要即刻决定志向去加入国民党，去参加国民党所倡导的民族革命，以打倒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工具。孙中山先生因为中法战争的时候，看见帝国主义的压迫一天天的加甚，知道非打倒专制腐败的满清，将无以救民族的沦亡，所以他决计投身于革命运动，决计把中国全民族的责任放在他自己的肩上。他在广州博济医学校的时候，还不过二十岁的年纪，他不过象有些读者一般大的年纪，甚至于他还不到有些读者那样大的年纪，然而他已经决意革命，已经在学校内鼓吹宣传革命；到了第二年，他为要

能比较自由的鼓吹革命的原故，转学到香港英文医学校，学课余暇，常奔走于香港、澳门之间，尽力于革命的工作。读者诸君，我愿意你们将要有孙中山先生一样的成就，将要象他一样的致力于革命运动，不要菲薄自己，以为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孙中山先生象我们这样大的年纪，他在学生时代，已经开始了他的伟大的，将要永远被中国人民所崇拜所纪念的革命工作了！

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了解孙中山先生，没有人知道革命是可能的事情，在香港只有三个人是他的同志，与他常常研究革命的问题。在香港、澳门的他的戚友交游，称他与他的三个朋友为四大寇，大家不愿接近他们。他在毕业以后，在澳门、广州借行医之名，开始进行革命运动，并且自己游历京、津、武汉，考察各地情形。甲午以后，因为满清之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更为彰明较著的事，他又到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想纠合华侨以为革命之助；然而那时除少数人以外，没有甚么人赞成。甲午败后，他与同志想袭取广州，事机泄露，杀三人，捕七十余人，他自身十余日后始得出险。出险以后，他到日本、檀香山、美洲，仍进行兴中会事，然而华侨仍旧不甚赞成；甚至于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洪门”的人，他们的祖先虽是因为要排满而组织这种会社，因为年代久远，大家亦不甚同情于他的排满主义。他到英国的时候，为中国使馆所捕，几遭不测，幸被营救脱险。回到日本，那时的人仍闻革命而生畏，赞成革命主义的人数不及华侨百分之一，还有保皇党的邪说淆乱其间。读者诸君，请注意孙中山先生初期所受的挫折；他是经过一些如何艰难困苦，才能成就中国一段落的革命历史？然而他所受的挫折与困苦，还不止此。

庚子年的时候，孙中山先生看见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加严重，

又谋在惠州起事，然而又失败了。在这次失败以后，人民已渐了解革命的意义，不再如以前之诅咒谩骂了。庚子赔款九万八千万两，使满清的威信扫地，国内外革命思想渐占势力；孙中山先生再作环球漫游，到处受华侨欢迎，于是在比、法、普、日都成立了同盟会。乙巳年在日成立革命同盟会，派人到各省宣传，不一年间，加入的一万余人，徐锡麟、熊成基、秋瑾之辈，都受影响而献身于革命运动。孙中山先生从甲午以后到此时，不过经过十年，其影响之大便已经使满清发抖。然而虽是如此，革命究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乙巳到辛亥，六年之间，同盟会的革命运动失败了八次，牺牲了许多同志的热血与头颅，最著名的便是辛亥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殉难，是辛亥革命以前最后一次之失败。在那时候，全国对于革命党的勇敢壮烈的行为是谈虎色变的，然而一切庸碌怯弱的那些“稳健派”与梁启超等保皇党，仍然鄙薄诋毁革命党，以为是利用青年做一些不可能的事，象今天那些分子鄙薄诋毁我们的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革命运动一样。然在黄花岗一役五个月之后，便成就了辛亥革命，一切反革命的分子都只好哑口无言。要是孙中山先生是怕毁谤与失败的人，他不能成就他的伟大的革命工作，反令那些庸碌怯懦的稳健派、反动派得意了。

从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未尝稍懈弛他的奋斗精神。在民国二年湖口之役以前，因为党的纪律过于松懈，尤其是黄兴、宋教仁等右倾思想，妨碍了他一切主张计划。他初任南京大总统时，要实行革命政府独裁政治，以扫荡一切旧的瑕秽，这被袁世凯与一切反动派所反对，甚至于党内重要人物亦一样反对他，他们都急于要与袁世凯妥协，以求一个苟安的方法。到袁世凯

就职以后，孙中山先生主张率同志为在野党，从事教育事业，以宣传训练民众，这个意思又不为党员赞成，宋教仁等却急于要改同盟会为国民党，把一切比较有实力的官僚腐败分子都收罗进来，想借以增进政治上的势力，这促起袁世凯的嫉忌，于是发生暗杀宋教仁的事情。宋教仁被杀以后，人心甚为愤激，不久袁世凯又私自签定善后大借款的条约，把全国盐税抵押给外国，全国亦都纷纷责其卖国；孙中山先生在这时候，令党员在各省起兵讨袁，然而他们几次都是犹豫不决；等到后来袁氏得外人借款，发饷买械，运兵南下，收买海军，那些都督才因被逼而起兵，这已经太迟缓，自然而归于失败了。我们注意：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不能于民国初年整顿中国，并不是没有什么建设计划，但是因为党的松懈，党员的右倾，遂致一误再误而造成民国二年以后大反动的局面，我们这可以看见一个革命党的纪律与防止右倾，是如何重要的事！

孙中山先生从此以后，很注意于党的改进。讨袁军失败以后，他舍弃了以前内容复杂的国民党，改为中华革命党。到民国十二年，又因为中华革命党所专注重的军事政策屡次失败了，而且中间发现了象陈炯明一类的叛党的人，所以决意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发布宣言。十三年一月，因为还要改进党务，又召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与政纲，博得了很多人的同情。孙中山先生久已知道要打倒军阀官僚的私党，必须有代表人民利益的伟大而有纪律的党，领导全国人民而奋斗；但是因为党中分子总不免有复杂之弊，而党外觉悟分子又因为受反革命派谣言所煽惑，不肯投身到国民党内面，所以孙中山先生个人改进党的努力，屡次都归于失败。去年改组，因为吸收了许多革命青

年，党务日渐进步，孙中山先生为要完成改组之功，开除了持异议的冯自由，而且屡次很严厉的对于右倾思想加以斥责。读者诸君应当知道，中国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国民党自身之尚待改进，实为其一种重要原因。孙中山先生屡次为此改造国民党，屡次用这来淘汰刷洗一切不革命的分子，但可惜因为以前总只有他一个人的努力，所以不能成功。现在，在国民党比较有希望的时候，他突然而死了，我们倘若纪念他，要完成他所未完成的工作，那便以后应当把改造国民党的责任，放在我们自己的肩上。我们若要不满于现在的国民党，便应当即刻决定志向，为改造国民党的原故而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死后，或者不免有些右倾分子，或者甚至于久已被改组而淘汰的“老党员”、“同盟会老同志”，会出来为要压迫国民党的帝国主义与军阀做工具，以根本破坏国民党；为了这，我们更希望一般热心的青年，认定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参加国民党，国民党中间一切革命的分子，亦应当坚固的团结起来，以抵御一切压迫与破坏的恶劣手段。

孙中山先生代表全民族而奋斗的精神，是永远不磨灭的。他在最近收回粤海关事件上面，帮助沙面罢工事件上面，抗议英领干涉对付商团事件上面，都表示出来他的反帝国主义的精神与十余年以前反对满清是一样的激烈。他因为北京政变，毅然代表全国人民利益，亲赴京、津，谋召集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他北上的时候，沿途鼓吹他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说那种条约是中国人民的卖身契约，要号召全国人民来反对撤废他。孙中山先生为要打倒帝国主义，他便联合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国家，与苏俄特别亲善。他不顾虑人家指说他有共产化的嫌疑——他知道这是帝国主义的离间，要使一切谋自己解放的民族国家，因为彼

此互相猜忌而不能联合起来，所以真正革命的分子，对于这应当没有甚么怀疑。他在临死遗嘱的上面，还谆谆嘱大家继续革命，联合一切以平等待我们的国家，以完成他的工作；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召集国民会议，尤希望早期可以实现。这样一个至死不忘国事的孙中山先生已经过去了！他的责任已经分卸到每个真诚热烈的革命青年身上！所以我希望读者诸君，根据他所指示以继续奋斗，我们纪念他，我们要使他的事业在短期间可以成功。

载《中国青年》第71期
署名：但一

与李璜卿君论新国家主义

（一九二五年四月四日）

中国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么？为什么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主张阶级争斗？

读来函及所寄《四明日报》副刊各文，我相信你的见解比“醒狮”诸君要进步。你承认社会主义、世界主义，说明你所谓新国家主义是准备演化准备变迁的。你赞成各国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主张不妨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同时进行世界革命，千方百计和各强国的无产阶级相联合，以谋打倒帝国主义。你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确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凡是受他压迫吃他苦楚的都应结成联合战线。各强国无产阶级固应联成一线，弱小民族是全个民族都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苦痛，所以应该全个民族加入战线。”你亦明白承认苏俄现在曾经以全国力量暗助各国无产阶级，以达到世界革命之目的。这些进步的意见，决非“醒狮”诸君眼光不出中国“士大夫”范围的所可及；他们对于无产阶级的问题，若非很客气的存而不论，便亦许学那些“反共产大同盟”的先生们的态度，暗骂有你这种思想的人是亲俄卖国。你说“醒狮”所提倡的有时未免带“旧国家主义”色彩，与你所谓“新国家主义”不同，这句话我亦相信。

然而我究竟相信你所谓“新国家主义”，仍旧与“醒狮”诸君

的"旧国家主义"不免有同样的错误。

第一点，我很奇怪的，便是你们同那些无知的"反共产大同盟"诸先生一样，总要假定中国在今天有甚么人主张"即刻"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因而根据你们自己的假定，唠唠叨叨的反驳了一大篇理由。其实这不是大笑话吗？我们在无论甚么地方都说明今日当前最要的事务，只有国民革命；我们常常用各种方法引导全国各阶级从事于国民革命，而且尽力于改进与扩大国民党的工作；我们正是因为如你所说的：要从列强势力压迫之下，谋"全个中国"的解放，不论贫富都应当联合起来，以打倒列强压迫的意思。假令因为世界革命的结果，帝国主义不待我们打倒而自己崩坏下来，国外无产阶级势力澎涨，因而使我们的无产阶级得着援助，能压倒我们的新兴资产阶级；这样，中国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一阶段，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假令帝国主义自己并未崩坏，中国并未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先打倒帝国主义而欲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只有不知人事的人才会有这种想法。中国机器工人与全国人口之比，较俄国少几倍，这并不能断定中国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俄国机器工人与全国人口之比，不较英美少二三十倍吗？俄国既可以比英美先成就无产阶级革命，却断言中国一定不能成就这种革命，这是如何无理由的事。我们所以主张今日最要的事是国民革命，并不是说中国在无论如何情形之下均无无产阶级专政之可能；我们只是因为不能坐待世界革命，坐待帝国主义的自己崩坏，所以要先努力于打倒帝国主义的工作。打倒帝国主义的工作，无产阶级单独的力量是还不够的，而且各阶级为自己的利益亦可以参加这种运动；所以我们为无产阶级的利益，亦希望为谋"全个中国"的

解放，不论贫富都联合起来。

一个真正注重无产阶级利益的人，不应因为国民革命而否认中国有无产阶级专政之可能，更不应因为国民革命而反对阶级争斗。你说：中国机器尚未发达，劳资两阶级对峙的形势尚未形成，从极富与极贫中间还有许多中产阶级，中国的贫人和富人尚未到你死我活的地位；为抵抗帝国主义，中国应该全个民族加入战线，不必自相携贰，生把贫富分成两橛，减少战斗的力量，甚至抵消战斗的力量。你这些话，完全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见(虽然是不自觉的)。我们丝毫不让步的反对国家主义，正因为一切国家主义者都是要拿国家的观念来压倒阶级的观念；他们都是想用"全个民族"的好听名词，欺骗无产阶级，一方要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之利用，帮着反对妨害他们发展的外国资本主义，一方又想使无产阶级眼光注意到对外，因而自甘忍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努力于谋自己阶级利益的争斗。我们为打倒帝国主义，固然要联合各阶级的革命势力，但我们并不因此便放松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而且我们相信革命的实力究竟在更多的无产阶级之参加，我们为要使更多的无产阶级之参加，尤其要注重无产阶级自己利益的争斗。你说"生之欲望"决定人类的行为，这是不错的。无产阶级必须为"生之欲望"才能踊跃参加革命；换一句话说，便是无产阶级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解除自己的经济压迫)而参加革命。既然如此，我们要无产阶级牺牲了眼前很明显的自己的利益，不进行阶级争斗，而希望他们热心于为那抽象的"国家"，这不与那些唯心派的空想家一样荒唐吗？无论唯心派怎样嘴硬，两千年的历史，许多读书明理的"士大夫"的实例，都证明经济(便等于你说的生之欲望)是决定人类行为的

最重要的原因(注意,我们并未说他是唯一的原因),所以我们便是为国民革命,亦必须由经济争斗以引导一般人到政治争斗上面,对于无产阶级尤须由阶级争斗以引导之到民族解放运动。

再就你所谓“生之欲望”来观察中国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大商买办阶级的“生之欲望”,在倚赖外国资本主义而享其余沥,所以他对于打倒外国资本主义的国民革命,一定是反革命的。粤海关事件各地银行公会通电劝阻孙中山动用关款,广州商团事件陈廉伯企图打倒广州政府,这都是显明的事例。幼稚工业资本家与地主“生之欲望”,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与买办阶级)相勾结,以共同剥削中国的农工平民。摇动不定的小资产阶级(智识阶级在内)的“生之欲望”,在不犯革命的危险,而能在外国资本主义及其走狗之下,觅取比较安定的职业生活。你虽证明了因法律失效、军阀捣乱、外人横行等原因,全国各阶级都有参加国民革命的必要;然而在一般除了危险的国民革命以外,还有比较容易满足他们的“生之欲望”的人们,究竟是不肯参加国民革命的。我们便就国民革命说,对于那些另有他法满足“生之欲望”的各阶级,究竟是希望不多的;我们最注意是顺着无产阶级的“生之欲望”努力参加他们的阶级争斗,以博得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对于国民革命的同情。我们相信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强大,有时还可以减少那些上层阶级怕革命危险的心理,使他们比较易于参加国民革命;但是我们因为认定了革命的主力是无产阶级,便令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阶级争斗,象曾琦所说的失了部分士商阶级的同情,我们亦决不懊悔。为甚么我们要牺牲革命主力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去博取那些反革命或怕革命危险的士商阶级的同情呢?

中国有一百万以上的产业工人，他们都是在中外公私资本家的压迫之下，他们的报酬待遇还不如欧美工人。这样的情形，如何说劳资两阶级对峙的形势尚未形成，工人与资本家并未到你死我活的地位呢？你生怕中国有了阶级争斗，要减少或抵消战斗的力量，其实没在阶级争斗，有些上层阶级始终并不曾用他们的战斗力，他们甚至为自己的利益，反助外国资本主义为虐，对本国无产阶级倒戈相向呢？即如你举宁波海员受欧美海员排斥，令人站在宁波东门街把他们身受苦楚普告宁波人，并且希望宁波商家能够自办商船，免得他们再在外国商船吃苦，你以这为阶级本位说不如国家本位说合乎实际之证据；然而我请问你，宁波商人若非有力自办商船而且自办商船可以得利，他曾因为你们国家主义者所谓一个"同胞"的受苦楚，便发生自办商船的事么？上海日本纱厂四万余工人的挣扎，曾不能动中国资产阶级乃至"醒狮"诸君之一念，他们本来便怕革命，更不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发生同仇敌忾的心理，他们本没有战斗力，如何会因阶级争斗而减少或抵消甚么战斗力呢？我们要引导无产阶级为自己的利益同一切压迫他们的人争斗（争斗的对象，还有一部分是在中国设厂的外国资产阶级），用这来号召无产阶级，用这来得着一般无产阶级的同情，使他们都来参加我们的革命运动，用这来随时打倒资产阶级一部分的压迫，以求无产阶级革命势力之发展。一个真正热心国民革命的人，为甚么一定要无产阶级屈服于不革命的上层阶级压迫之下，使他们不了解革命的真意义，而且使他们革命的势力不能自由发展呢？

论到国民革命成功以后的事，我虽不疑你是有意代表资产阶级，发表这样天花乱坠的空想，来欺骗无产阶级；然而我终不

能不好笑你这种唯心的乌托邦式的幻梦。你说：国民革命成功以后，脑满肠肥的中国式的资本家，决不象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资本家一样，他们决不能结成联合战线，形成一个阶级；你以为那时我们主张产业国营、征收遗产税，他们必无力反抗。你真太看轻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了！你要知道假定照你所说的在世界革命的机缘未熟时，中国先成就了国民革命，那时国外资本主义的祸根并未铲除，那些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资本家为保全自己的利益，自然会利用中国的资本家做工具，以压迫中国无产阶级的彻底的打倒帝国主义运动。假定照你所说，我们在革命以前及以后，都应尽量防止阶级争斗，那便无产阶级只有在人家愚弄欺骗之中，他们自己阶级的力量不得发展；在外国资本家与中国资本家互相勾结以压迫他们的时候，他们必无法反抗。至于说到这些脑满肠肥的中国式的资本家呢，他们在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并不见得便不觊觎政权，在外国资本家来勾结他们的时候，尤未必不心花撩乱。你只消看前一两年美国舒尔曼等吊中国买办阶级的膀子，便居然会发生商人政府之说；去年英国帝国主义利用买办陈廉伯等，便居然发生广州商团谋叛之事；可知这些脑满肠肥之辈并不见得便不象今日军阀官僚一样的可怕。我们相信倘若世界革命成功，根本铲除了这些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资本家，那时这些脑满肠肥之辈或真无所凭借而不能逞其恶毒；要是不然，纵然这些脑满肠肥之辈本不过是一般行尸走肉，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资本家亦会唆使他们结成联合战线，以为妨害中国革命发展的一种阶级力量。你说什么产业国营，征收遗产税，亦许你真个有这种“节制资本”的好意思；不过若是那时无产阶级并不曾强大起来，

并不能为你作有力的后盾，以防遏资产阶级的反动，那便我相信资产阶级的反动是一定要来的，无论你有什么良法美意，终只有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反动之下。每个相信“节制资本”的人，而反对阶级争斗恐怖无产阶级势力的强大，那不是存心欺骗无产阶级，便一定他是昧于事理的空想家。

你说中国的无产阶级既曾努力于国民革命，至少可以争得普通选举权，这更是笑话。你以为世界上的革命，曾经有不靠无产阶级的努力，专门由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便是“醒狮”诸君所谓士商阶级）的努力做成功的么？便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性的法国大革命，实际仍是靠的无产阶级的参加，不过那时无产阶级自身没有阶级的觉悟，完全受了资产阶级的利用，所以自己并不因为革命的成功而得着一点甚么。倘若照你们的意思，在今天亦不要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不要他们有阶级争斗的事情，教他们只是闭着眼睛跟着所谓“士商阶级”走；这样，他们在革命以后，必然没有一点实力为自己利益而奋斗。无产阶级若没有一点实力为自己利益而奋斗，资产阶级为甚么一定要给普通选举权给他们？资产阶级不好意思不这样做吗？他们已经做了无数量的不好意思的事，一直到今天，那个主张德谟克拉西的胡适之先生都还有脸皮提出以解说文字为选举标准的意见，轻轻的想剥夺至少百分之十的人民的选举权。你敢担保国民革命成功以后，纵然无产阶级中无为自己利益奋斗的实力，胡适之先生以及还有许多不如他的“士商阶级”，都会进步到不好意思不给无产阶级以普通选举权吗？

更有味的，你说中国智识阶级向来对贫者弱者表同情，不作兴恭维富人，却只有攻击富人，你甚至于说这是中国的文化关

系、民族性关系，这真叫我为中国的智识阶级惭愧。我总不明白你们国家主义者所谓中国文化与民族性的特点究竟是些甚么东西，原来你认承中国智识阶级有这样优美的品性，便假定这是中国的文化关系与民族性关系！不过我问你，几千年来的文人词客，在皇帝脚下做奴才，在达官门前做清客，专门靠为富贵人家做寿序、墓志铭"打秋风"过日子的，这都不是"中国"的智识阶级么？或者他们虽然是"中国"的智识阶级，然而他们这种肉麻的行为，却不是"中国"的文化关系与民族性关系么？康有为、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张謇、胡适、黄炎培、郭秉文，都是中国智识阶级的模型，我不知他们看了你所谓"向来对贫者弱者表同情，不作兴恭维富人，却只有攻击富人"数语，是不是会愧死！你说现在国内思想界无不以社会主义为归宿，这有甚么可以自豪的地方？两千年中国读书人无不以仁义道德为归宿，结果无改于他们的卑鄙龌龊的行为；现在段祺瑞、吴佩孚、卢永祥、唐继尧，无不以废督裁兵为归宿，结果无改于他们的割据扰乱的事实。这般智识阶级纵然把社会主义当"南无阿弥陀佛"一样每天念一千遍，若他们不愿见阶级争斗，不愿见无产阶级这势力的强大，他们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变做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有机会的时候，还会直接变做外国资本主义的走狗呢！你说中国智识阶级未曾受资产阶级的豢养，这更不成问题。只要中国资产阶级长大起来，他们自然要豢养智识阶级，智识阶级自然亦要受他们的豢养。中国的智识阶级向来是奉承统治阶级，而且是曲学阿世以为统治阶级作爪牙的。远之则秦散千金而天下之士斗，近之则陈炯明的一千一百元买得张东荪发许多丧心病狂的论调，你还怕这般"有奶便是娘"的先生们，因为甚么文化关系民族性关系，

而不受资产阶级的豢养么？你说为智识阶级本身，无宁赞成产业国营，因为这个“国”天然是智识阶级发展才能的地方；你这说话，站在智识阶级方面看自然是不错的，而且亦许“醒狮”诸君同你都正在作这个迷梦，心想拿智识阶级来同时驾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谋实现“天下之事舍我其谁”的野心呢！（“醒狮”诸君的主张虽比你更反动，我料想总还在这种迷梦之中，总还不至于“已经”死心塌地专为资产阶级效劳役罢！）不过智识阶级是没有经济地位的，他若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使无产阶级势力强大，他决不能有力量抵抗资产阶级的反动。智识阶级亦许能撑握政权，然而这决不是智识阶级自身的力量，一定是因为他们能忠心为资产阶级作工具，所以资产阶级给以经济上的助力。那种梦想“天下之事舍我其谁”的先生，亦许做了资产阶级的工具而至死不悟呢！

你的文中间还有许多应当批评的地方，但因为篇幅限制，而且最重要的几点已经在此篇中讨论过了，所以不再一一缕述。总而言之，我并不相信凡今日言国家主义的都是有意为资产阶级作走狗，来欺骗蹂躏无产阶级；不过我相信国家主义在客观上所生的结果，一定是于无产阶级大不利的，而且他妨害国民革命势力的发展，他使我们无法抵抗国民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的反动。我愿你将我所说的仔细考虑一番，毅然取下你的国家主义的招牌，象你从前毅然取下你的改良主义的招牌一样；我亦是希望醒狮派中进步的分子仔细考虑我所说的话，毅然取下国家主义的招牌，与我们一同努力于有阶级性世界性的国民革命运动。我们只要不是被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所障蔽，决不会说劳苦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比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还不值得注意。我们今

天应当决定志向，假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发生冲突时，是帮助无产阶级呢？还是帮助资产阶级呢？我以为不但为将来的社会革命，我们应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我们相信为了国民革命而防止阶级争斗，是一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祝你打破你的迷梦与空想，不摇动的站在我们的方面！

载《中国青年》第73期

署名：代英

广东军官学校与国民党问题*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刘英：

如果真是一种牺牲精神去到广东军官学校的人，是无所谓可惜的。我们虽不相信军事运动是今日革命的重要方略，但到军队中去宣传，至少与到农民、工人中去宣传，是一样的重要。广州军官学生是领率教导团的。至于你要国民党分裂以求痛快，我却不以为然。国民党中自然有些假革命分子，但亦有不少比较可以共同革命的党员群众；我们要在不痛快的环境中，努力宣传奋斗，使真革命的分子态度越明显，假革命分子自然受淘汰。这样，才不至于因要排斥少数腐败分子，而令多数可以共同革命的国民党员因误会而都站在我们的外面去了。

代　英

载《中国青年》第 74 期

---

* 此信是恽代英写给《中国青年》读者刘英的。刘英认为青年学生投考军校“这种牺牲是很可惜的”。他并且“亟希望国民党分裂”，可以使那些“惹人呕吐的东西”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中山先生的理想才可实现。

评醒狮派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我对于醒狮派诸君，前后有三种不同的感想：

在余家菊、李璜二君《国家主义的教育》初次出版的时候，我只感觉他们有“唯心”的弊病；他们说到要拔救中国民族，不从打倒中国的经济压迫上着手，专门说些提倡教育、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这都是二三十年来经许多人鼓吹而没有功效的话。在那时候，我是尊重他们谋中国独立的意见的，但是我只可惜他们因为偏于“唯心”，所以找不着合当而有效力的途径。

自从《醒狮周报》出版以后，我又加了一种不赞成他们的理由：便是他们的“士大夫救国论”。他们是把士商阶级看得很重要，而很忽略农工平民的力量。他们反对黄炎培、郭秉文，亦与我们一样，但我们是要引起民众的觉悟，使民众自己组织起来；他们的意思，却只是说这一派士大夫是太糟了，须得另外换一批好的士大夫来——或者便是换他们自己。士大夫之不能救国，是有他们的客观原因的，他们的生活并不十分痛苦，而且时时有机会“出卖”救国事业以自求荣利，所以他们在没有为自己利益而奋斗的民众站在背后，结果总不能担任革命的责任。二三十年来，康有为、梁启超、章行严、……① 胡适之辈，皆曾为一时士大

① 略有删节。

夫救国者之领袖，然一一都堕落，成为过去之人物。所以我虽不疑醒狮派诸君今日已是彼等一流，然而我对于他们不注意下层阶级群众，但欲继续彼等之覆辙，把自身供试验，终于不敢放心。

不过我那时还以为救中国民族，他们纵与我们不能一致，并非便不能同力合作。我们假定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的，然而中国革命既有各阶级合作的必要，则使他们能努力革命，至少亦是我们在向帝国主义作战时的伴侣，所以我以为我们在理论上互相争辩是可以的，但不应因此便以为不能合作了。

然而到近来从他们的言论，令我怀疑我自己这种意见。他们名为讲国家主义，其实对于帝国主义的罪恶，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实况，似乎还没有多少精力顾到；他们最大的努力，处处看出只是一个反对共产主义。我们本不希望一般小资产阶级的人，都能信仰共产主义，不过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只是帝国主义或资本阶级的仇人，总还不至于受那些名为反抗强权、讲求民生政策的醒狮派这样深恶痛绝。我们不必问苏俄是否强权，共产党是否卖国派；今日有眼睛的人都看见苏俄是最以平等待中国的国家，共产党人最坚苦奋勇在帝国主义军阀压迫之下过他们的革命生活。我们便令承认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是对的，请问今日不努力攻击现在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及卖国军阀，却专来无理取闹的设想出苏俄怎样侵略中国，共产党怎样卖国的话，攻击苏俄与共产党，究竟有何道理？我们愿意与一切革命的党派合作，但我们希望他们革命，不愿看见他们把革命的事业放下，反转只顾和比较革命的人为难，象那些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一样。中国的共产党人被一般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们诬赖造谣是已经很多的；不过稍知事理的人，只要看一看他们的牺牲奋勇

的精神，他们的刻苦努力，为中国农工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亦应知道自己愧勉。他们在现在统治阶级之下，决不能到法庭去与那般走狗们起诉，要求恢复名誉，他们的出版物，亦且受段祺瑞以及上海工部局的严重防止传播，决不如《醒狮周报》在被帝国主义、军阀压迫之下的中国之能通行无阻，便在这一点，醒狮派诸君亦当反躬自省，不好随着流俗悠悠之口，被识者所耻笑！我勉励醒狮诸君节省些有用的时间精力，多向帝国主义、军阀下攻击，让我们看看你们革命的真面目；倘若只是象今日，因为不高兴那比较革命的共产党，却把革命正当的工作放轻，专门帮着无聊的流氓，来做这种反共产运动；诸君纵在本心并不欲帮助帝国主义与军阀，客观上却正合他们的需要——这怕便是《醒狮周报》之所以能不被邮局查禁的原故罢？《现代评论》都被查禁了，《醒狮周报》要象今天这样下去，我想还有一天被段祺瑞所嘉许而助其推销呢！

载《中国青年》第76期
署名：代英

讨论丁子昂君《学生与政党》一文*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绶孙：

作《学生与政党》的丁子昂君说："各政党之为国，乃异旨同归，并不相背；学生之为国与政党之为国亦然，尽可各做各的工作，不必强同。"这几句话，已极其浅薄荒谬了。我们说，在中国今天必须有打倒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党，凡姑容帝国主义便是通敌养奸，岂有异旨同归并不相背之理？我们要人为打倒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加入有组织的党，譬如要攻敌军而要编制军队一样，学生不入党，专学些英文、国文，将来为洋资本家、军阀作买办、文牍，如何说"与政党之为国亦然"？我们并不说不入政党的人便不爱国，只是虽爱国而以孤立而散漫，无法打倒一般狐群狗党，所以爱国亦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至于说学生主要职务是读书，不错；但学生不忍于读了书专供洋资本家、军阀作买办、文牍，起而加入政治活动，初无可议之

---

* 苏州第一师范袁绶孙给恽代英的信中提出，《时事新报》中所载《学生与政党》一文，散布了"混乱的反动思想"，比如叫学生不要参与政治，即使要救国，也不必参加任何政党等，"很可以影响一般的纯洁的青年的思想"，望恽代英予以批驳并告知一些宣传的方法。这是恽代英的复信。

处；学生加入政治活动，便要读关于政治活动的书，使理论明了，见解确定。入政党正要多读这一类书。以为入政党便可不读书，这只怪他根本不知政党是甚么；大概他以为政党党员便是不学无术的政客，入政党便是化为那种政客，所以他便反对起来了。这或者亦怪有些党员只顾活动太不读书（我不是说读那些混分数文凭的书，只是指的有关革命理论的书），一半亦怪他无识。

代英

载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中国所要的文学家》一文的按语*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许多朋友都在要求中国要产生革命的文学家，而且许多朋友亦已经以革命的文学家自命，不过我总觉得他们的成绩是不能满意的。象中国今天这样受重重压迫的社会生活，无论无产阶级应当有呻吟的声音，他是智识分子物质与精神方面之不能满足，亦应当有悲苦的愿望，他们若能因此发生联合自决以反抗压迫的精神，自然便会成为革命的情感，因而产生出革命的文学来。但是现在呢？感觉压迫的人不了解受压迫的原因，更没有联合反抗的意识，所以他们至多发为委靡失望的诗歌，因为他们自己找不着一条出路，到不胜烦闷的时候，索性借一种侥幸的幻想，浮薄的嗜欲，以麻醉自己之苦痛，于是成为风花雪月、醇酒美人之"文学"。即所谓赞成革命的青年，他亦只是从理论上得着一种觉悟，或甚至只是凑热闹出风头，他们不明了自己的生活之有需于革命，他们瞒却自己生活的卑污与苦恼，专门矫揉虚伪的以为革命是牺牲、为社会做好事。在这样不知道革命或不从自己真正情感为出发点以从事革命的人当中，怎样会产生革命的

---

* 《中国所要的文学家》一文是保定育德中学张刃光所写，载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六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80期。这是恽代英为发表此文所写的按语。

文学呢？这种现象实在是不足为奇的。中国在外资压迫之下，旧社会逐渐崩坏了下来，智识分子的地位日益堕落，他们的命运日益穷困；然而因为无产阶级势力未能强大，近视的智识分子不能看清挽救自己的途径，他们始终还梦想从前的光荣，好象买了一张彩票总希望有一天得头彩的光景；便是那些自命赞成革命的人，亦始终不肯赤裸裸承认他自己已经堕落的生活，还要利用一时比较好的机运，隐藏自己一切为经济压迫所不能不过的卑污与苦恼的生活，而假装自己是舍身救世的利他主义者，好象古代与中世慈善的贵人侠士们一样。要革命的文学吗？我以为第一要使大家认清自己的出路，要他相信中国的革命是“为他自己”的必要而且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要使大家赤裸裸的承认自己的地位，要明白剖析自己一切奴婢、娼妓、盗贼式的生活，使自己认定革命是“为自己”刻不容缓的事情。文学是情感生活的“真实”的表现！若先有几分不真实的地方，若并没有要求革命的真实情感，再作一百篇文要求革命文学的产生，亦不过如祷祝鸡生蛋，未免太苦人所难了呢！

载《中国青年》第80期
署名：代英

学生的背水阵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这一回因为激于义愤，有许多向来在教职员积威压迫之下的学生，都能够不顾一切，冲破学校的束缚与压制，出来与各校学生相结合，以取一致行动了！学生能够跑到这些苟且怕事的教职员前面去，这总是可喜的事情；象这样的事，在清末革命运动是第一次，在五四运动是第二次，今天是第三次。

就表面情形看来，教职员亦组织了联合会，追随学生之后，来做爱国运动了，我们不能说教职员中间便没有勇敢急进的人可以指导学生的运动；不过我要警告学生们，至少有些教职员的爱国运动是不可靠的。教职员们最大的弊病，是总要维持自己的威严，他们总不愿意学生冲破了他们的束缚与压制，所以他们时时刻刻想把学生重新纳于他们的规范之中。我们若骂这种教职员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不免太过分的；然而他们这种“复辟”的阴谋，结果自然要减杀学生的反抗精神，破坏学生的团体，使学生变成软弱无力，于是他们为帝国主义压灭了这一次的运动。

教职员“复辟”的阴谋，有下列的几种：

第一，提前放假或鼓励学生请假离校，因为这样，便可以使那些庸弱而思家的学生散去，留着少数热心的人使他们做不出甚么事情。他们最怕学生多开会，渐渐组织成了强固的团体。所

以他们利于学生分散。学生都分散了，他们便要压迫这少数热心的人亦很容易。

第二，利用捣乱的学生，在学生会中间惹是生非，他们便随处宣传学生会内容怎样不好，使学生大家厌弃学生会。学生没有做事的经验，而且为才识所限制，自然不能事事满人意的；他们见了不满人意的事，便张大其辞，加以鄙夷丑诋，于是劝本校学生会脱离学生会，劝各班脱离全校学生会，等到大家分散了，他们一个个压迫下来，没有人有力量能反抗他们。

第三，等到群众热度稍低的时候，他们又拚命传播那些似是而非的稳健论调，甚么还是要勤学救国啊，敦品救国啊！他们全不想象他们几位的勤学敦品，丝毫无补于国家之危亡，却只想利用这些话儿，以软化学生们的革命精神，而使自愿的投入他们所设的网罗中间。

第四，他们在此时联络取媚那些最热心活动的学生，等到风潮稍衰了，他们翻转面孔，首先勒令这种学生退学，亦许便在暑假中间，写信令他们再不要来校，以除去祸根；同时用强力解散学生会，重新逼令学生读死书，再亦不许过问社会上乃至于学生自己的事情。做到这步田地，于是乎他们可以高枕而卧，而一般帝国主义者亦便可以高枕而卧了！

我要警告参与这一次运动的学生们，你们要小心这些教职员的“复辟”的阴谋。你们要是没有很好的对付他们的方法，不但学生的团结会被他们破坏，便是你们自己，亦许不免于被他们勒令退学或重新要忍受他们的专制的压迫。

有些学生是已经预备牺牲一切的了，他们因为激于义愤，所以拚着退学、开除的危险，挺身出来领导同学们奋斗！他们这样

的坚决勇敢，是值得钦佩的。不过为学生运动的前途，我还希望他们要更加前进一步：那便是说，不要只是持预备被学校开除的消极态度，因为你们这一次被开除了，下一次你们的同学更不敢轻易违抗学校，出来尽力于社会运动了。你们应当努力团结同学，而且团结到各学校中间去，使学校因为看见你们的团结，永远不敢开除你们。

所以我以为这一次是有些学生的背水阵。你们能团结，能使各校间的团结坚固，你们便不怕教职员的反动。你们应当把一切有觉悟的学生用各种方法联合起来，反对提前放假或自由请假，反对捣乱的同学离间你们的阴谋，反对传播似是而非的论调之传播，反对假期中间及其以后之勒令退学的乱命。你们切不可退后，切不可中于他们的浅薄的邪说，自相携贰，使他们的诡计可以施逞得出来。

我告诉大家要防备教职员的反动，或者有些做贼心虚的教职员又要以为我在挑唆学生对他们闹风潮，我又在进行甚么"党化教育"的计划。我应当借此警告学生们一句，我只是要你们自己有一个好的团结，使教职员不敢有甚么破坏你们的阴谋，苟非必要，我并不赞成你们有甚么排斥教职员的举动。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是很不满意于你们的教职员的；但一则只要他们不能妨害你们的进行，用不着去排斥他们，一则你们若排去了他们，亦不一定即可以找着比他们更好的人。……①其实倘若真正有甚么"党化教育"的事，亦不是几个落伍的党人想借口办教育与人家抢几只饭碗而已。关于这种饭碗的竞争，学生们自然还应当

---

① 略有删节。

是慎重，莫受他们利用。但学生应当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奋斗，这却不是可以随意诬赖他们为“党化教育”运动的。

载《中国青年》第81期
署名：但一

致杨立生*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立生先生：

楚女来沪得知襄樊有如先生之学识而热心的人，且捐赠二十元以表赞助我辈活动之至意，令代英无任欣慰。代英久信中国不乏无心人，惟以大家对国事无诚意无方法，遂致互相疏远隔阂，颓唐沮丧，意若国事已无可为，吾辈只可束手待毙，影响所及后起青年遂置存亡理乱于度外。在校至多做到洁身自好，一入社会便相率从风而靡，绝少以力挽颓流自任之人。幸近数年来思想激变，先进之士既揭破中国扰乱之病源，而认定国际压迫使经济窘乏，人民失业，实为一切兵匪发生的原因，一般天性尚厚之青年亦渐认定真正的仇敌，而革命之方略乃渐有日趋于确定一致之好现象，此始中国时局将变化之佳兆耶。先生若能继此以往，多研究此等关系且常以示商学界比较进步的人，使大家不但知起而干涉国事，且能为合当步骤的干涉国事，则必于中国之将来大有影响也。附寄《中国青年》一本，愿以纳交且赐批评指示，想不至以为鄙陋而不进教之也。 恽代英上

五月二十五日

据手稿影印件排印

---

* 杨立生，襄阳湖北省立第二师范教师，原肖楚女同事，思想进步，同情革命，1944年病逝。据信封上邮戳，恽代英此信写于1925年。

辟三种洋奴的论调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这几天很发现许多洋奴的论调，他们完全站在外国人的利益方面说话，极力要缓和这一次的风潮。只须一翻阅六月十一日的《中国晚报》，便发现了三种荒谬绝伦的主张。

第一是厚脸皮的江亢虎所发表的“缩小范围”、“就事论事”说。怎样叫缩小范围就事论事呢？自然江先生的意思是说，印捕杀了人便只要问印捕，外国人杀死了中国人便只要照租界向例每人抚邮五十元，只有这样，才可以达到江先生的“期于速了”的目的。告诉江先生，除了象你这般帝国主义的走狗会有这种思想以外，我们的想法却正与你相反。我们要扩大范围，绝对反对只就事论事，而且我们是预备一个长期的奋斗，并不存“期于速了”的心。我们对于印捕杀人，一定要追问到捕头并英领事，而且追问到租界上外人所有的特权，我们为要防止以后再有同类事件之发生，必须收回会审公堂，取消领事裁判权，便在惩凶赔偿两项，亦须与当事国以严重的惩罚，使他们以后不敢肆无忌惮。所谓就事论事，便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寻个最省事的办法敷衍面子的鬼话。我们必须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必须要趁这一次全中国人创巨痛深之余，努力唤醒大家，为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而谋为长期的奋斗。一切要缩小范围期于速了的论

调，都是一般洋奴帮帝国主义者减轻责任的说法，切不可让民众受他们的蒙蔽。江先生若听了这话，又以为这是鼓吹赤化，酿成国内与国际的纷争，最好自己多研究一点共产主义学理与国际实况，自然可以少些无谓的恐怖，而且对于这种无识的谮谈以后亦可以免开尊口。

第二是梁启超、范源濂等的和缓上海空气说，梁启超等那种超然置身事外，提出什么"希望两方面应该注意"的一类话，这已经十足的表示出他们的没有人心。他们说了许多"友谊的磋商"、"同情的谅解"、"双方的和衷"等鬼话，想拿这乞哀于外人么？外人决不会把他们的话放在眼里；想拿这灭杀中国人的热态么？这种生心外向的汉奸真人人得而诛之了。他们居然说得出"中国的情形与几十年前已经不同了，……外人二十年前可以自由处分的事件，在现在不能不问本地有关系的中国的意见和中国全国的舆论。"真正肉麻极了！要在二十年前，对于外人自由处分的事件，中国人不知反抗的时候，想必梁启超等连这种缓和空气的宣言都用不着发表了！我们绝对反对一切缓和上海空气的宣言都用不着发表了！我们绝对反对一切缓和上海空气的企谋，我们希望上海以至于全国的空气更紧张，因为在平日大家不注意不平等条约的必须废除，只有在这一次事变以后上海与全国的空气一天天更紧张，才可以使人人真正觉悟不平等条约的必须废除，而且只有这样大家才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心。不要听这种洋奴汉奸梁启超等的话，为不平等条约又延长几十年的命运。

第三是最荒谬的陈霆锐的法律问题的研究。我听了人家在这种案件中间讲什么法律问题，便觉肉麻，而陈君的一篇谈话尤

其令人要作呕三日。陈君教我们对于惩凶赔偿二事，必须在英国驻华法庭与领事起诉，所以他主张筹备相当款项，敦聘"英美"律师"在号称文明国之法庭上，一试验其公平之有无"。这种洋奴的脑筋与声口，居然还有上海学生会与东吴法科学生会这样重视他，真令我发生无穷的怪诧。文明国法庭公平之有无，一定还用得着这一次去试验他么？我们并不曾做亡国奴，便令已经做了亡国奴，我们还应当努力打破我们这个奴隶的命运；对于这种惨杀的事件，为什么不诉之于人民的实力与世界的公论，还必须请求仇敌国的律师，申诉于仇敌国的法庭，以求不可知的胜负呢？法律家总是帮助统治阶级强盗的，他们本心便不赞成那个"犯法"的五卅事件，他们本心还要科五卅事件中流血诸烈士以违警律，（许多报馆记者说，学生之罪不至死，都是要根据法律，肯定学生罪名，不过觉得死罪太重耳！唉，流血诸烈士死而有知当褫此辈之魂魄！）这种人如何亦能令他对五卅的革命事件发表意见呢？自然我知道这种人是反对一切革命行动的。但是我请问，便假定照他的主张，试验的结果，仍旧证明"文明国"的法庭无公平之可言，他们这些法律家又有什么高见呢？唉！文明国么？大马路的屠杀，上海大学等处劫掠侵占，曹家渡等处的掳捕放枪，土匪强盗的面孔已经完全暴露在一切有眼睛的人面前了！独有你们这些法律家没有长眼睛，还说得出这种无识的话！

载《民族日报》第4号

署名：代英

告愤激的国民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

大马路的流血，十余日来罢市、罢工、罢课的大牺牲，亦许因为外交官、商董的妥协，使交涉的结果仍然是归于失败。

这是有血气的人所能忍受的么？

有些人说，这只怪我们没有武力的后盾，所以外交官、商董自然不能不趋于妥协。不错的！假如一般兵士都有为国杀贼的决心，假如全国同仇敌忾的工、商、学界都已经武装了起来，我亦相信外交官、商董都可以大胆一点，或者我们竟是以武力收回租界，或者我们竟是对外国强盗宣战。不过在今日军阀政治之下，宣传下层兵士与武装人民，都是有许多障碍的，倘若因为一时的愤激，甚至于要求军阀派兵作武力的后盾，我相信结果或只是便利了军阀侵占地盘的野心，他们决没有胆量与帝国主义相抗战，所以他们决不能挽救外交官、商董的妥协态度。

有些人说，这只怪我们没有严厉的监督，所以外交官、商董可以肆无忌惮的妥协下来。不错的！假如下层人民的组织广大而坚固，他们能够有独立的见解与战斗能力，他们一定要达到满足自己的要求才开工、开市、开课，那便他们尽可以不依赖这些妥协的外交官与商董，若交涉不得他们的同意，便根本不生功效。不过下层人民若没有很好的组织，他们若还很富于依赖外

交官、商董的心理，有些人专想用手枪炸弹威吓外交官、商董，以为这便可以严厉的监督他们，这都是太空想了！满清末年的炸弹，不能挽救亲贵之腐败，俄国虚无党的暗杀，不能灭杀俄皇之横暴。倘若我们采取这种方法，只是一方使这些外交官、商董因恐怖而更托庇于外人（蔡廷干、曾宗鉴的住公共租界便是此种恐怖心理之表现），以加增他们反动的程度；一方吓跑了一般比较怯弱的群众，而那些本心不愿只因迫于大义不敢反对这种运动的人（如贾丰臻、……①江亢虎、梁启超等），更乐得利用机会助帝国主义防止一切所谓“轨外”的行动，以灭绝群众的革命感情，而恢复他们自己统治地位的尊严。所以在群众组织与宣传未尽善的时候，一切暴动暗杀的行为，于革命运动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然则我们应当坐看交涉的归于失败吗？

决不的。我们应当尽力所能宣传下层兵士，运动武装人民，而且要尽力促进各种民众的组织，使他们比较更有力量监督外外官与商董，但我相信一定有许多我们力量所不能到的地方。我们有力量所不能到的地方，不要灰心，不要只是一味愤激，要知道这是我们组织宣传群众功夫还未尽善的原故，我们要更努力去组织宣传群众，以便于下一次的卷土重来。

我们应当就这一次交涉的经过，把人民依赖外交官与商董的心理，痛快的加以打击。我们应当使一切人民知道团结的必要，应当极力维持而且改良眼前各种临时的人民团结（如工会、学生会等），使成为永久的而且内容完全的组织。我们应当知道五月卅日勇敢的租界讲演，完全是近年来组织宣传群众之功，趁

① 略有删节。

现在使我们的组织宣传更扩大，那便我们要有更大的反抗帝国主义的力量。

不论交涉的成功与失败，我们最重要是使一切眼前人民的团结都能够继续存留下去，而且还许有更多更大的团结。不过有一个问题来了！眼前人民的团结又很不易维持下去呢！每个团体都有爱出风头爱捣乱的人，在紧急关头这种人有时虽不敢活动，然而风潮一缓弛下来，他们即刻便会作怪，即刻便会来破坏人民的团结，这要怎样对付他呢？其实这并不难对付。我们应当在每个人民的团结中间，找出一切真诚而热烈的分子，把他们联合起来，使他们成为这个团结中间的核心，代表这个团结中多数人的意见与那少数出风头捣乱的人奋斗！出风头捣乱的总是少数人，而且他们是多数人所厌恶的。我们要赶快把真诚热烈的分子组织起来，使他们无从破坏人民的团结。

载《民族日报》第6号

署名：代英

答《醒狮周报》三十二期的质难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十分对不住读者与《醒狮周报》诸君，这篇文搁置了这样久的日子，到现在才发表出来。现在正中国多事之秋，虽好象不是我们从容辩难之时，但革命的行动，必须有革命的理论去引导，现在醒狮诸君正在那里诬指这次运动是国家主义的运动呢，我们却不可不在理论上面矫正他们的误解。

《醒狮周报》三十二期，舜生、李璜、愚公、余家菊君等，对于我们纷纷设许多反诘。这些反诘，自然有许多误会之处，而且有时不顾我们已经解释了的话，只就很肤浅的几个观念，胡子头发一把抓的发出一些问题；不过我为大家能更明了我们的主张，与我们所以必须反对醒狮派国家主义的理由，亦很愿意就他们的反诘来加一番解释。我的解释，可分为下列四项：

一　民族解放运动决不是甚么“国家主义”

舜生君引萧楚女君在重庆作文，“承认在目前的世界，仍然应有国家和政府存在，仍然应当在一种相当的国家主义上从事于救国运动”；又引我为少年中国学会起草纲领，有“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等语；他因此认定我们没有反对国家主义的道理。谈论一个问题，果真这样容易么？我亦赞成目前应有国家政府存在，而且仍旧愿意全民族自爱自

保，但却绝对的反对他们的所谓国家主义。为甚么呢？我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为抵御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而存在的；我们心目中的政府，是为保障无产阶级平民的利益而存在的；我们要全民族自爱自保，是为要使全民族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要求全民族解放，我们自然更要注意力求那些最受压迫而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工阶级的解放。我们反对拿一国的历史文化的偏见，去提倡那种空洞与实际生活无关的爱国精神，更反对想拿这种爱国的空话欺骗无产阶级，防害无产阶级解放的争斗。我们这种主张，亦许萧楚女君要说是“一种相当的国家主义”，但问醒狮派诸君，你们敢于承认这是国家主义么？我相信我们与你们不同，是因为你们是为的一个抽象的“中国”，你们因为要为光荣的“中国”而奋斗，所以顾不了农工平民的冻馁；我们是为的一般“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我们要求全民族解放，自然没有反转让人民中大多数工人、农民受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求解放的道理。国家主义者总想拿国家观念来压倒阶级观念，《醒狮》自出版以来，处处表现这种见解，这与我们为中国人实际生活而奋斗，自然凿枘不能相容。李璜君说两年前在欧洲提倡“神圣联合”，想联合全国有志青年，先打倒军阀官僚，再谈甚么别的主义，被有些同志骂他们是绅士想利用群众，他至今忿忿不平。照李璜君等的意思，一定要大家联合起来打倒军阀官僚以后，再谈别的主义；在未打倒军阀官僚以前，李璜君等一定不愿有人使工人、农民知道为自己的利益而组织起来，不愿意他们有阶级争斗的事，发展了他们自身的力量，既然如此，将来打倒军阀官僚，工人、农民自然无力为自己创造一个合宜的政制，而只有受绅士们的统治，这不是绅士想利用群众是甚么呢？李璜君说，我们一

面说民族独立，全中国的解放，一面又说就是自卫的国家主义亦不应该有，这是莫明其妙的事情；愚公说，岂有爱国而不讲国家主义者耶？其实他们不自己反省一下，他们所谓自卫的国家主义，总含有反对阶级争斗的意思在内，我们主张民族独立，全中国的解放，与他们那样主张反对阶级争斗的国家主义！如何能混为一谈呢？

李璜君不了解我们既鼓吹阶级争斗，既认定资产阶级怕革命而没有战斗力，为甚么又要主张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加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我很奇怪李璜君何以认国民党为"资产阶级的"呢？我们相信国民党至少包含有各阶级分子，我们加入国民党，主张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本刊① 七十三期已经说过，是因为无产阶级单独的力量，还不够去打倒帝国主义的原故。我在七十三期，说到中国各阶级对于革命运动的关系，曾经说幼稚的工业资本家与地主，要与外国资本主义及其走狗相勾结，以共同剥削中国的农、工、平民；小资产阶级要在不犯革命的危险，而能在外国资本主义之下，觅取比较安定的职业生活；我用这证明中国的革命是不能希望他们太多的。但是自然不是说他们中间便绝对没有要革命的分子。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强大时，都可以减少怕革命危险的心理，而参加国民革命（七十三期已说过这话，可惜李璜君不曾注意）。而且工业资本家与地主固然可以要求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相勾结，以共同剥削农、工、平民，但在他们勾结不上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时候，他们会要革命；在他们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谋单独剥削农、工、平

① 即《中国青年》杂志。本文所引《中国青年》杂志73期内容，指《与李璜卿君论新国家主义》一文。

民的时候，他们亦会要求革命。小资产阶级固然可以要求不犯革命之危险而觅取比较安定的生活，但在他们的生活已经象今日之陷于贫乏摇动，非革命不能觅取比较安定的生活时，他们亦会要求革命。我们所以要与各阶级合作，乃因为各阶级中可以有革命分子的原故，但我们虽然与各阶级合作，究竟不能不防他们的畏怯妥协的心理；对于他们畏怯妥协的地方，究竟不能不加以攻击；对于这种易于畏怯妥协的各阶级，究竟不能把革命的主要责任放在他们的身上。这果然是甚么矛盾不好懂的道理么？我们很热诚的与各阶级中革命的分子相联合，与国民党中革命的左派共同努力国民革命运动，但我们相信只要是一个真正要求革命的人，一定不至于反对我们为革命而注意发展下层阶级势力。至于那些反革命的上层阶级与国民党右派，我们为甚么不应当骂？他们既然不肯同我们一路进行革命，而且专谋在内部妨害无产阶级的发展，这种人为甚么亦要与他们联合敷衍呢？我说上层阶级没有战斗力，便是指的这般人；我说不应牺牲无产阶级利益，去博那些反革命或怕革命危险的士商阶级的同情，亦是指的这般人；我们不应与这般人合作，这是很明显的事。但我们并不曾一笔抹煞上层阶级中间可以有参加革命运动的人，我们为甚么为了这便不应加入国民党，便不应主张联合各阶级的国民革命呢？

我奉劝醒狮派诸君，倘若没有理由与我们辩论，尽可以从此闭口不谈国家主义，不要胡缠歪扯，甚至于专凭你们的主观胡乱为我们造些主张。请问舜生君，你在甚么地方看见我们主张以阶级观念，消灭国家观念的呢？请问愚公，谁曾主张在今天打破国界，谁曾主张国民革命仅限于共产党所领率的工人革命呢？

李璜君要讲综合法，我劝你们，先要加一番分析功夫才好。反对国家主义果然便是不爱国家、不保种族么？与世界革命势力联合果然硬是打破国界么？与反革命或怕革命危险的上层阶级争斗，果然便是否认一切上层阶级的革命性么？认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便是主张国民革命只限于共产党所领率的工人革命么？"矛盾！""百思不得其解！"象你们这样胡缠歪扯，如何会不感觉矛盾，而且便"千思""万思"，如何又会"得其解"呢？

二　谁能担保革命者不"出卖"救国事业

舜生君没有法子反驳我所说的士大夫时时有机会出卖救国事业，他于是说，现在利用"农工阶级为攘夺政权的武器的士大夫"，将来亦要有许多变化；而现在为金佛郎案"奔走而后分肥的"，即有我所引为打倒帝国主义的同志；他要我担保我的同志永远"不卖"。舜生君错了！我能担保谁不"出卖"救国事业呢？果真有些士大夫是"利用"农工阶级攘夺政权，农工阶级自己并不觉悟而无组织，以至于受人利用，自然没有人能担保这些士大夫究竟将来要做些甚么事情。至于金佛郎案，报传邹鲁、李石曾等都奔走其间，甚至于说汪精卫、吴稚晖、于右任等均与闻其事，倘若不是"帝国主义走狗"所造的谣言，自然人人都可以公开的攻击他们。我告诉舜生君，谁亦不能担保他的同志"不卖"，而且不能担保他自己"不卖"；然则怎样呢？只有把党的纪律严整起来，把下层阶级宣传组织起来，使他们知道革命的真正意义，使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利益监督领袖的行动，打倒一切"出卖"救国事业的机会主义家。我们说发展无产阶级的势力，我们所以特别着重下层的宣传与下层的组织工作，提倡下层阶级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便是为这个原故。自然你们可以说我及我的一部分同

志亦只是小资产阶级分子，不过我们却做梦不敢自命为“士大夫”，更不敢自命靠“士大夫救国”；我们的言论及行动，都可以证明我们注意下层阶级的运动，我们要下层阶级自觉的联合起来，以防止其受人利用，而且要他们能监督一切上层阶级分子。譬如要问我亦会有时“出卖”救国事业么？我决不昧着良心嘴硬，我每到没有监督裁制力的地方，便总有些自己把握不住，所以我为要保证自己“不卖”，亦只有努力求党的纪律加严，下层阶级监督力量的发展。舜生君想想罢！在没有监督裁制力的地方，舜生君便那样把握得住么？舜生君要想做一个“不卖”的人，还是丢了那个迷信士商阶级的空想，来与我们注意下层阶级发展他们的监督力量罢！

三　联俄便是倚赖外力么？

舜生君说我们联俄便是倚赖外力，便是与张作霖、吴佩孚等勾结外力作国内私斗一样的事情，这种笼统不问是非黑白的思想，真令人诧叹！倘若舜生君眼看国民党左派在广东的努力，学生军的精神与行动，竟是与军阀土匪一般，我相信舜生君把他们的联俄比做军阀勾结外力，亦是无足怪的。倘若舜生君还稍稍认得清楚国民党左派与学生军的奋斗，究竟有甚么与张作霖、吴佩孚不同的地方，我便不了解舜生君何以说得出这样的话？舜生君等的意思，有些人以为有苏俄人员参加我们的革命运动，总是不对的事情，请问舜生君，你知道美国独立之时，亦曾有法兰西、意大利的人从中参助么？欧战的时候，英国的军队甚至于开到法国境内作战，倘若照舜生君的意思，法国便是倚赖外力解决国是么。现在的问题，应当先问帝国主义及他们所勾结的军阀是不是应当打倒，再问是不是中国已经有许多投身要打倒帝国

主义与军阀的革命党人，倘若我们自己有了革命的决心与力量，为甚么我们定要不许别国的同志援助？舜生君深知军阀都受有帝国主义的暗助，但舜生君以为中国一部分革命的分子只应当用他自己的力量，去与国内以及国外压迫我们的人奋斗，别国的同志若是对于我们有甚么援助，是应当无条件拒绝的。舜生君究竟是否希望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何以自己既只自居于“提倡”国家主义，对于政治经济的改造，丝毫说不出办法，却对于人家主张联合国际革命势力，以进行革命，却这样一笔抹煞，甚至于将广东有几个俄国军官观战或帮助教练，便指为与张宗昌编俄白党为军队是一样的事情？俄国倘若为了帮助广州革命，要求广州方面给他什么交换的利益，在广州要求租界、领事裁判权乃至于划定势力范围，那便醒狮派诸君的愤慨，还有可说，现在俄国同志只有为中国革命努力，却从未闻他有一点需求要索，醒狮派诸君却帮着帝国主义、军阀来咀咒我们的联俄主张，这真只有国家主义者有这种希奇的见解。舜生君说，若因我们联俄，万一再有各派外国势力立于各个军阀之后从而指挥之，使内乱愈延长而范围愈扩大，到那时不但资产阶级无以自存，即农工阶级又何能幸免？谢谢舜生君！居然亦关念到农工阶级！农工阶级何必要“到那时”才不能“幸免”，现在又何曾能够“幸免”呢？一天不设法把帝国主义与军阀根本打倒，便令有一百个舜生君“提倡”国家主义，他们永远仍旧不能“幸免”的！我们现在的努力，是要注重人民的组织宣传，使他们起来担负打倒一切军阀、帝国主义的责任，但是我们决不拒绝外国同志对于我们革命运动的援助。若舜生君分辨不出援助与倚赖的不同，舜生君若看得国民党左派宣传革命，学生军打倒林虎、陈炯明，只是为俄国作走

狗，东江农民要求“俸免”来帮助学生军，亦是为俄国作走狗，那便真令我惊讶人的见解是这样悬绝不同了。

四　答余家菊君的五个问题

余君问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广东党军之勇猛直前，以及我个人之努力宣传，刻苦自励，这都是出于物质的动机，为经济势力所支配么？我不知余君所谓物质与经济势力是指的甚么？倘若象一般无识的人指以为这都是由于莫斯科的洋钱使然呢，自然这些问题是无法解释的。莫斯科的洋钱总没有伦敦、纽约多，而且真正努力革命的人是洋钱所不能买的。照我的解释，共产党人之信仰共产主义，以及广东党军之猛勇直前，一则是由于这些分子多半是破败下来的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工人，他们的摇动而苦痛的生活，使他们易于接受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于是或委身于共产主义运动，或自甘为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效死，这如何会不是物质与经济势力的影响呢？即以我自己而论，我的比较刻苦，一大半是因为贫穷、有失业的恐怖使然，我现在的比较努力于革命事业，更是受了许多次职业界摇动而不安定的暗示，所以才决心投身到这中间。我记得前三年中夏同志再三劝我丢了教育界的生活，与他们尽力于革命运动，我为教育生活比较宽裕而安定的原故，始终犹豫不决，后来又经一年备尝生活不安定的痛苦，才感觉此种鸡肋生活无足冀恋，而渐坚定我的志向。请余君看罢！这不仍旧是物质与经济势力的影响么？余君问我轻视教育，何以又作宣传运动(我到处宣传国民革命则有之，余君谓我到处宣传共产主义，不知何所见而云然，岂余君并国民革命与共产主义亦不能分清楚吗?)；余君不知道我所轻视的，乃与宣传革命无关系的所谓教育

事业，轻视这种教育与注重宣传运动，是绝对不可以并行而不悖的事么？至于余君问何以共产党人有党化一切文化机关的雄心，而不专用金钱去收买民众，就我所知，共产党人注重宣传是有的，领导学生与民众，使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反对一切党化文化机关的人（例如黄炎培、胡敦复等）是有的；共产党人决没有党化一切文化机关，与一般教育界流氓抢这种饭碗的心理。共产党人多半是一般穷光蛋，而且是洋奴资本化的社会所摒弃的，他们既没有象谣传所云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莫斯科的金钱，如何能专用金钱去买民众？但他们相信中国的革命是一般民众所需要的，只要有机会到任何群众中去宣传，自然可以引起他们自觉心。或者国民党右派有党化教育的心理（变相的升官发财的心理），但这种党化教育，不但无益于革命，结果反转妨害了革命，他们根本没有革命的信心，不知道宣传的力量，所以有这种堕落的行为。然而我却奇怪，余君等是相信教育救国的，余君等当不至于有党化一切文化机关的堕落心理罢！

载《中国青年》第82期

署名：代英

马克思主义者与恋爱问题*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永德：

你的朋友当真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一定知道在经济制度未完全改造以前，是没有美满的恋爱生活可言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恋爱，他们愿意牺牲一切以谋改造经济制度，使人人得着美满的恋爱。但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要改造经济制度有时要牺牲一切（包括恋爱在内），若在工作上所必要牺牲的不能牺牲掉，甚至于因为贪恋任何事物，反牺牲了他的正当工作，这只是愚昧的鄙夫，决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你的朋友能工作很热心，然而只看他为了恋爱便厌倦工作，可知他一定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你们自然应当劝诱他，但他若自甘堕落，谁亦不能为他想甚么救济的法子。不要可惜堕落了一个青年，在这种社会里，因愚昧、贪鄙而堕落的不知凡几，只有希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倍努力，从速改造这种经济制度，才根本可以救拔这些可怜的糊涂虫。我希望你的朋友不要便是一个糊涂虫，倘若他竟然是一个糊涂虫，我只有请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倍努力去救济他及与他同类的人。

代　英

载《中国青年》第82期

---

* 本文是恽代英对《中国青年》读者、南方大学王永德所提恋爱问题的答复。

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甚么是革命的势力，甚么是反革命的势力，在五卅运动中间，都显然呈露出来到每一个有眼睛的人的面前了。

反革命的人总不愿意听见强力反抗的话头，他们希望帝国主义者自动的让步，希望一个帝国主义者帮助我们打倒另一个帝国主义者，希望军阀帮助我们打倒帝国主义。他们不信任人民自己会有打倒帝国主义的能力，而且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厌憎恐怖人民自己组织团体的进步，常根本要破坏人民自己的组织团结，与人民信赖自己组织团结力量的观念。在上述的标准之下，我们可以看见有五种人：第一是大商买办阶级，他们忽略代表上海大多数市民的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十七条要求，自己与北京特派员勾结，摆出垄断此次交涉的面孔，而他们的交涉又充分的表示出来他们上层阶级的妥协自私的态度；第二是一般“高等华人”，如梁启超、丁文江、胡适、余日章之类，他们根本不懂民众的组织与其自救自决之觉悟的重要，他们不懂开会游行的真正意思，他们把自己看做命定的奴隶一般，以为除了要求帝国主义者发慈悲讲公道，组织一个他们理想中的公平无私的中外调查委员会，没有方法解决这个案子；第三是那些希望缩小范围专对英日或专门对英的学者名流，他们虽然比较进步，然而他们

亦是不肯相信民众自己的力量，希望不靠民众自己的力量而靠那一个强大的邻国出来说公道话帮助我们，所以他们急于要把美法丢开，甚至于要把日本丢开，他们常常喊着要开市以维持罢工，要使日人工厂工人上工以维持英厂工人罢工，然而他们这种敷衍妥协的心理，恰足以灭杀民众革命的精神，便宜了美、法、日本，美、法、日本既不因感吾人之好意而助我抗英，维持罢工或仅仅维持日厂工人上工，亦究竟是丝毫没有把握的事情；第四是那些信赖政府、军阀或者是仍旧信赖法律解决的庸俗论者，他们反对罢课罢工，主张应当静候政府解决，或者自由法律手续谋正当解决，有时他们主张谓罢市罢工为消极不能持久的抵抗，不如请张作霖、孙传芳派兵来收回租界，或要求他们对英宣战，这是有些准官僚的绅士、教职员、律师或法政学生等常有的见解，他们虽然明知这都是一些不通的死路，但他不相信除了这些"求神拜佛"式的方法，有甚么更有把握能打倒帝国主义的法子；第五是那些反对甚至于破坏工人、学生组织的资本家、教职员，例如穆藕初、闻兰亭帮助日纱厂资本家教唆其不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利，曹慕管、贾丰臻怕学生势力扩大不受教职员无理的箝制约束，以及近来在各处散布总工会、学生会的谣言，利用工贼或流氓作种种破坏总工会言论与行动，想引起大家的疑惑非议，以便于引军阀出面压迫，而根本破坏爱国运动的一般人，他们都是根本妨害国民革命势力之进步的。

所以大商人、资本家、名流、学者、律师、教职员，一切在社会上所谓比较有地位或者自以为有地位的人，常常是反革命的。我并不是说在上述各种人中间便不可以有纯洁努力的革命分子，但这总是少数，而这种少数的分子仍是不免于深中"缩小范

围”等说之毒的。

甚么是革命的势力呢？第一是工人，他们是因为困苦无所挂念的，所以比较有决心；他们的聚居而占经济上重要地位，便使他们加增战斗的勇气。第二是学生，他们虽然没有经济上的地位，而且比较浪漫软弱不能持久，然而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高，由知识而唤起的同情心比较丰富，他们比较容易感动而感情比较热烈。第三是小商人，他们虽然在生活上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能无多少关系，但他们因为既未曾自己经营工厂，与工人的组织不发生利害的冲突，对于帝国主义又没有买办阶级相倚为命之关系，而且买办阶级包办一切的态度是他们所不甘愿的，所以他们比较富于爱国心，而在爱国运动中容易与工人、学生相结合。第四是农人，他们虽然没有工人的团结与自信力，但他们在生活上之要求革命与可以无系念的从事于革命，与工人没有两样。第五是兵士，他们本只是经济上落伍的农民，平日虽似为反动势力作爪牙，但在全国一致的空气中间，他们每易于倒戈为全国人民利益而奋斗。工人、学生、小商人、农民、兵士，他们都是在社会上比较没有地位的，但他们常是革命的力量。自然在他们中间亦一定有反革命分子的；然这种反革命分子若不是自己有意去为那些所谓有地位者作走狗爪牙，一定是受了所谓有地位者的欺骗蒙蔽而不自觉悟。

革命的青年，认清楚谁是你的革命的伴侣，谁是你的革命的仇敌罢！不要丢了你的革命的伴侣，却只是等候那些反革命的“士商阶级”出来领导革命！

载《中国青年》第83期

署名：但一

怎样做一个宣传家？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我们不靠用手枪炸弹，打死一个阿猫阿狗，以改造世界；我们不靠象买彩票一样的送几个人到军队中间去，以便逐渐变成督军、师旅长的所谓实力派，以改造世界；我们不靠练几队精兵去打天下，学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以改造世界。我们怎样改造世界呢？我们靠宣传的工作；靠一张嘴、一枝笔，宣传那些应当要求改造世界的人起来学我们一同改造世界。我们要宣传到使勇敢的人起来帮着我们宣传，我们要宣传到使怯弱的人都了解而赞助我们的主张，我们要宣传到一切被压迫的人们都联合起来，大多数向来为统治阶级作爪牙效奔走的人们都对于统治阶级倒戈相向，于是统治阶级便土崩瓦解的倒下来了！

怎样做一个宣传家呢？

第一，你要有一个坚强的信念——要相信只要你能说明理由，解释疑惑，群众一定能够接受你的宣传。为甚么你能这样相信呢？因为你要改造世界，不是你爱捣乱，亦不是你放弃要提出这些高远不必要的理想；你们因为群众受压迫痛苦太利害了，所以为群众求解放而作此种主张。为甚么自己亲受压迫痛苦的群众反会不赞成你的主张呢？他们所以不赞成，总不出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自己的地位，一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你主张

的真象。这是很难怪他们的。统治阶级为要保障他自己的地位，设种种方法障蔽群众，使他们看不清自己的地位，更看不清自己地位的堕落与统治阶级之关系，他又为要使群众隔离你，对于你的主张，造出种种曲解的谣言，或消极破坏目为不可能的空论。这只要你能去同群众接近，把真的东西赤裸裸的指给他们看，他们自然易于恍悟。有时你不耐烦这样做，你看见这些被欺骗的群众说了几句不入耳的扫兴话，便以为这些人是天生的蠢牛，不愿意再去接近宣传，这却正中了统治阶级要使他们隔离你的诡计了。

第二，你要去宣传，须对于所要宣传的理论，自己先有充分的明了，而且对于一切反对理由要都能够答辩。倘若你自己都有些闹不清楚的地方，你怎样好去宣传人家呢？你在宣传的时候，不要避掉那些反对的理由，要自己提了出来，把那些反对理由自己充分的叙述出来，而且亦很诚恳的欢迎人家提出这种反对理由，然后加以指摘驳正，这最能使人加增注意力，而且为他们把疑团打破，最易使宣传生功效。你要避去人家怀疑的地方不加解释，任便你在别方面说得如何的天花乱坠，人家总要为了这一点疑团不肯接受你的话，所以你的宣传便收不了功效了。

第三，你对人家宣传的时候，要表示出来你自己很有把握的态度，但不可骄傲夸大，惹起被宣传人的反感。你既担负了宣传的责任，不要怯惧，无论你说得好与不好，胆子放大些，脸面放厚些，要表示从容不迫的样子。但你必须要谦和，对于被宣传人要有充分的好感，不要有一丝一毫藐视被宣传人，或自己刚愎武断的态度。你要象是一个来为他们的利益，告诉他们真的消息的人，你不是为你自己出风头，标榜你自己的学问见解，你只是

很诚恳的将你所知道的告诉他们，而且答复他们的疑问，那便他们自然心悦诚服了。你宣传得有不合宜的地方，在工作中你可以自己研究改进，不要在宣传的时候预先胆怯；丑媳妇想要见公婆，只要大着胆子去，在去的时间想些最好的应付的方法，反比那样张皇狼狈要少闹许多笑话。

第四，你要注意在说话的时候，每一句清楚，每一个字清楚；不要说得太快，不要在一句话要说完的时候，把尾音吞在肚子里去了。你说话要注意少用任何听众不容易找的名词，不要因为要表示你的学问，引用许多“主观”、“客观”、“积极”、“消极”等要人思索推敲的话；须知道听的人若要去思索推敲这些名词，便要少听你的几句话，他便不能把你的话上下文接了下去，便感觉无味了。你要极力避去一切专门名词，用极普通易懂的话传述你的意思。在应注意的一句或几个字，你要特别着力的引起大家注意；但不要乱着力，亦不要一开口便太着力了，使以后在要引人注意的地方没有法子引人注意。

第五，你要知道被宣传人的生活，从他的生活中找你说话的材料，找那些可以证明你所说理由的例子，而且利用他生活中常要听见的土话或其他流行的术语说明你的意思。人都希望听些新奇的道理，最不喜欢人云亦云的话；然而这个新奇的道理，若不用眼前的语句与例证来解释，却不能使他声入心通，不能使他听了全身爽快，丝毫不怀疑的相信你。

第六，不要问是不是有人反对你，或者是不是有人不怀好意的提出了反对你的理由，你仍旧要很和平的然而很有把握的从他们所疑惑反对的地方加以解释。若是疑惑反对你的人所说的话有一部分理由，你应当先把那一部分理由摘出来表示你的同

意，若是还有些他自己没有说到的可以使他的话更有力的理由，你应当一并站在他的地位为他补充了出来；然后再很从容的指正他的错误的地方。我们用不着狡辞强辩或一切诡诈的方术，我们只要自己有一番研究，尽可应付一切反对的理论。反对的理论所以会为人所相信，或者在群众中间有时亦能迷惑群众的，总有他的若干理由；不要一笔抹煞，令说的人与群众都疑惑这只是你的偏见，你尽管把他的理由完全提出来，然后就他的破绽或他的前提的错误，加一番批驳。在群众还不曾相信你的时候，你的态度要和平一些，把你的理由很委婉然而很有力的说出来，滑稽的指出反对理由的错误；待到群众相信你的时候，你要完全打倒反对的理由，应当指出这种反对理由的错误，是无意的、有时甚至是有意的帮助统治阶级欺骗群众的，对于那些显然的邪说，应当要求大家排斥拒绝他。在答复反对理由的时候，自然有时能用和平的态度，连反对者都可以使他接受你的宣传是最好的；但若遇见那种有意帮统治阶级说话，或遇见顽固偏见的人，在群众相信之后，还要严厉的驳斥他，这不是为要侮辱他，是因为要群众的观念更确定而清楚的原故。

载《中国青年》第84期

署名：代英

致柳亚子*

（一九二五年七月）

亚子先生：

函悉。近日外间工作较少，正拟从事编纂废约运动① 小册子，以各种统计材料证实条约妨害民生之事实，惜限于学力，且文献不足征耳。

少年中国学会开会时②，醒狮派诸君用种种方法贯彻彼等之目的。彼等利在于一切地方均用含糊语气，以爱国运动四字忽略一切民族自决、阶级斗争等理论，且以“反国家之言论及行动”指一般为蒙藏民族、劳动阶级主张权利的人，且禁制一切超国家的学理宣传。虽经我提出对于现在交涉应规定之各种态度，在讨论中则欲以笼统之“各界的爱国运动”代“学生工人之爱国运动”，删去“上海总商会”、穆藕初、闻兰亭、贾丰臻、曹慕管、梁启超、胡适等一切指名斥责，而仅留一笼统不着边际之辞，此亦见其怯弱而预留妥协地步之态也。少年中国学会诸君，因生活地位关系，决不敢轻易加上革命党的头衔，所以结果必群趋于

---

* 这封信没有注明日期，根据内容判断，是在一九二五年七月中旬，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第六届年会以后不久写的。

① 废约运动，是五卅运动后在全国掀起的争取废除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

② 指少年中国学会第六届年会。

可以取巧欺世之国家主义。我辈不过姑与相持，能拉若干分子过来，便拉若干过来也。

代英

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

此书系戴季陶先生所著，他自信这是相从孙先生十余年的成绩，他以为在今日国民党员中同时有老衰病和幼稚病两种，“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和衷共济之实不举，革命势力之统一无望。”所以他大发宏愿，著了这本小书，想统一国民党员的思想。

在这书中我相信戴先生注重建设人民的权力，尤其注重建设在政治上、经济地位上立于被压迫地位的农工阶级的权力；说明不为三万万七千万最困苦的人民的生活，便没有救国的意义，便没有革命的意义。有智识能力不为大多数受苦的人民效力，就完全与过去二千年一切堕落了的儒者丝毫没有两样，这种侧重农工阶级利益与权力的态度，是很值得钦佩的。但谈到中国固有文化问题与发展阶级势力问题，我却疑惑戴先生引申孙先生的学说，未免有过当之处。

孙先生有时亦讲到中国固有文化，这是不错的；但若因此便说不相信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便没有民族的自信力，便不能创造文化，那便中国人只好束手待毙，没有存在于世界的权利，甚至于说便在全世界社会革命成功之后，中国民族亦只有化为真正的弱小民族，以至于灭亡，这些话未免太过火而不近情理了。戴先生痛心于一般人认中国的文化都是反科学的而加以排斥，

他说，象这样下去，在思想上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几乎变成中国的与非中国的区别，如果中国的一切真是毫无价值，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毫无存在的意义，还要做甚么革命呢？我觉得戴先生的思想很奇怪！为甚么不象戴先生一样赞美中国文化，便是认中国“一切”是毫无价值，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毫无”存在的意义呢？为什么那样便一定会没有民族的自信力，不能创造文化呢？固然我们要排斥“反科学的”中国文化，这亦犹如要排斥“反科学的”别国文化一样，我们认“中国的一切”亦不过与任何国的“一切”一样的有价值，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亦犹如犹太文化、埃及文化一样，当然有存在的意义，但这与民族革命的自信力没有什么必要的关系。

革命的能力，发源于主义的信仰与群众的党的组织，若说必须先承认自己文化的价值才配谈革命，请问非洲里乎人中间并不曾产生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圣人，亦有革命的可能否呢？我们不应拿一国的文化来决定他的命运，这样才不至于因赞羡人家的文化而自甘屈服（如一般美国化的留学生），亦不至于因鄙夷人家的文化而公然自认有任意蹂躏宰割的权利（如一般人对蒙、藏、苗的观念），更用不着因不愿屈服于人家而虚骄恃气将自己的文化高举起来。而且戴先生所谓中国的文化，如知仁的知，博爱力行的仁，行仁不怕的勇，择善固执贯彻始终的诚，如戴先生所说，不过是中国少数圣哲的伦理思想，这种思想既不是全中国人所共有的，亦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我们决不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德国的文化，列宁的学说是俄国的文化，然而戴先生却要咬定二千年来无人理会的所谓“正统”思想是中国的文化，我真不懂这有什么意思。

戴先生以为阶级斗争的思想有纠正的必要，以为我们要促起全国国民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我颇觉他不能自圆其说。戴先生说，中国现在并不是对资本主义宣战，只是把一个刚受孕的资本主义堕了胎罢了，堕胎何曾是容易的事呢？中国虽不能有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然而一则外国资本家移殖资本于中国境内，财政资本有汇丰、花旗等银行，工业资本有内外棉纱厂、英美烟公司等工厂，津、汉、青、沪的工钱奴隶已数十万人，对此等资本主义不应宣战吗？再则中国资本家资力虽然薄弱，然心不在小，将来决不能很爽快的屈服于国民党节制资本的政策之下，对这种人不应当“预备”宣战吗？戴先生以为资产阶级反对三民主义，真正站在利害敌对地位的不过百分之一，最没良心和知识的占百分之九十九，其实站在利害敌对地位和没良心知识有何分别。即欧美资产阶级之反动，其酷待劳工又何尝不可说是没良心？其违背进化潮流何尝不可说是没知识？不过他们站在与劳工利害敌对的地位，使他们不易有良心有知识耳。戴先生知道要解决民生问题必定要人民自身来解决，才是切实，才是正确。但戴先生却又要阻止阶级势力的扩大，要各阶级的人抛弃他的阶级性，似乎无产阶级的势力与阶级性的发展亦是不好的。戴先生要治者阶级“为”被治者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支配阶级的人抛弃他自己特殊的阶级地位，这若不是一个空想，自然是没有人反对的事情；但戴先生亦承认要农工阶级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那便可知无产阶级不应抛弃他自己的阶级性；而阻止无产阶级势力之扩大，绝对不是相信民生主义的人所应有的态度了。戴先生又以为只有生活优裕的人才能得着革命的智识与觉悟，去“为”不觉悟的人革命。其实，倘若靠生活优

裕的人去“为”人家革命，十余年的经验已证明是靠不住的了。孙先生说要多数不知不觉的人实行革命，其实这些人决不是完全不知不觉，乃因受了革命的宣传从生活上得着觉悟；这种从生活上得着觉悟的人比那些从知识上得着觉悟的人要勇敢坚决得多。若真是愚民政策，想靠少数治者阶级的“士大夫”，来包办革命的事，而有意无意中似乎反对农工阶级势力的扩大与他们的阶级性的发展，这与戴先生自己所说要靠人民自身来解决才是切实正确之说根本矛盾，亦决不是孙先生的意思。

载《中国青年》第87期
署名：代英

学生军与军事运动问题

（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

现在大家激于义愤，天天希望我们能够有与帝国主义者作战的实力，所以学生军与军事运动问题，大家都很热心讨论。自然我们不赞成只知重视武力，把民众的宣传与组织置之脑后的态度，我们相信只有民众已经有了相当的宣传组织之后，才谈得上武装暴动；一切漠视这种宣传组织的工作，迷信武力万能的人，都是中了封建时代传统的英雄思想之毒，只须拿民国十数年国民党军事运动与欧战以前教育界军国民教育运动的成绩来看，便可知这是劳而无功的。但是在有了相当的宣传组织的工作以后，或者便在学生军运动中间我们可利用以进行我们的宣传组织的工作，我们亦赞成进行学生军之组织与军事运动，所以我们亦愿意讨论这些问题。

学生军应当怎样办法呢？兹就我与一位受过完全军事教育的革命军人郭敬君所讨论的结果介绍如左，希望可以供谈这个问题者的讨论资料：

一、学生军若仍以各校全体学生笼统编练，结果一定仍旧只是一个敷衍的兵式体操，于学生练习军队生活纪律与作战技术一定是没有好效果的。我们尽可主张在学校以内实行普及体育，使每个学生的身体健全强壮，但不赞成以

各校全体学生笼统编成学生军，以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东西。我们应当主张学生军由各地学生联合会主持，各校学生自由报名，由学生联合会聘请军事专家，与以短期的真正的军事训练。

二、学生军若照以前兵式体操办法，每星期只有二三小时的兵操，便操上十年，亦是不会有真正功效的。我们当主张由各地学生联合会和借能容百余人之大屋为教练处，凡入学生军的在受训练时应搬到此中居住，完全过军队的生活，继续操练三个星期乃至一月。作战技术有三星期以上之继续操练，一定是可以够用的，在此时期亦可备尝军队生活及纪律。有三星期以上之操练以后，便可以退伍回校，以后每半年会操演习一二次，便可备战事之用。学生之入学生军操练者，在非假期中，应向学校告假三星期至一月，或由各地学生联合会商之各校，使学生于此时期可以搬行李到教练处共同居住。

三、学生军最好每次以一连一百二十六人为训练的单位，一连学生军至少须聘用受过完全军事教育的训练员二人，另于本地学生中觅助手十八人。在训练第二连学生军时，即可以第一连受毕训练之人为助手；在训练第一连学生军以前，须先于短期内特别挑选十八人为短期训练，以便可供助手之用。

四、学生军最好能得真枪以供使用，因为这样才可以练习拆开机件、擦摩、保存及其他用枪诸方法，若不能每人得一支真枪，至少亦应谋十余支真枪以供轮流练习。学生军应练习数次打靶，打靶时每人须得子弹数颗。若学生军

仅备枪十余支至一百支左右，每人有子弹数颗，在比较开明之军阀亦不致遽然疑忌。至每半年会操一二次，即用假枪与爆竹亦可，即军队野操亦不用子弹。

五、学生军之火食开支，可由学生联合会向应募者征收，训练员由学生联合会捐款给与薪金。

六、学生军内部仍宜守军队中服从制度，但关于学生军中一切章程由训练员得学生联合会之同意规定之；如训练员之行为或学生军内部有应讨论者，学员得向学生联合会提出，由学生联合会公议加以裁制，如此则免训练员专横之弊。

郭君说，果然全国如此做去，每三星期至一月即练学生军一连，一年中所练能战斗之士，可望到数十万。自然有些地方的训练员亦许是反动的军官，但只要能这样做去，学生之加入学生军的，必不至于思想被他们转移，犹学校反动教职员不能转移学生思想一样。

对于军事运动问题，郭君以为革命同志加入军队中去当兵士，是很要紧的。他不赞成一个同志要去当军官，因为军官与兵士总是有一层隔阂，只有自己混在兵士中间，先用感情结纳兵士，然后告以他们自身痛苦之由来，引导他们加入革命的组织，是有效的法子。到军队里去的人最要除去一切可以惹人注意的色彩，不可轻发激烈言论或有许多特异的行为，所以现在一般好做表面功夫的革命青年是不够做这种工作的。军队中文字的宣传，如杂志、传单等，最好不要用，因为军士识字者很少，文字宣传无多功效，而一被发现则遭危险，至少可以引起长官注意而加压迫，使我们以后不好在他军队中间活动。

郭君的话是很有见地的。现在我们看见许多兵士为五卅运动跃跃欲试的情形，与他们背地对于军阀不打外国人而打自己人的抱怨，可知中国的兵士已经大有卷入革命潮流之可能；不过成问题的，现在兵士中加入一种革命组织的人太少了，若因他们上述排外的感情，鼓动他们为一时之变乱，诚恐事变一生，慎重的人因为无把握而趑趄不前，勇躁的人又因为事后畏罪而逃溃四散，如此则于革命无益，反使以后兵士不敢轻易赞助革命。为要防免这种弊病，只有速谋发生军队中的革命组织。我以为加入军队中为兵士，自然是结纳兵士发生组织最好之一法，即在军队以外，能善于接近兵士且能常时与之接近的人，亦正可一样用感情结纳以便在军队内发生革命组织。文字宣传对于反动军阀下之兵士是无甚裨益的，但我以为在我们熟悉之下级军官中，尚宜介绍之使多订阅关于革命之书报，始知宣传组织之重要及其各种方法，以此等宣传与兵士中之联络组织并行，功效必甚伟大。

载《中国青年》第87期
署名：F.M.

我们的战略

（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

让那些妥协派去鼓吹和平了结的论调，让那些空想派去鼓吹暴动开战的主张，我们真诚为反抗帝国主义而作战的人们，应当认清客观的事实与我们主观的力量，决定我们切实可行的战斗方针。

为甚么要和平了结呢？全国至少有几百万人都激怒起来了，而且在现在全世界劳动阶级与弱小民族革命势力渐次抬头的时期，帝国主义自身亦开始摇动而不能自己支持，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用敷衍苟且的方法欺骗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反懈弛了即刻可以成功的反帝国主义的工作。

但是现在如何说得到即刻便要暴动开战呢？我们民众还有多数不了解帝国主义的罪恶，还有多数误认反帝国主义便是义和团的排外复仇运动，还有多数不知道为反帝国主义先须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这种乌合之众，而且很多易致失败的弱点，如何能即刻引导他们上战场去呢？自然在这运动之中，有少数冒失激烈的人，要以为非暴动开战不为快；然而若象今天这样，是不是多数民众可以跟着他们起来！而且起来以后是不是能为持久的战斗，不至于一哄而散，反失了以后号召他们行动的可能，都是丝毫没有把握的事情。

然则现在应当怎样办呢？

第一，倘若不是世界或中国有了急激的变化，不是我们现在应当暴动开战，我们应当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宣传组织工作，以预备这个暴动开战。

第二，我们反对重查沪案与国际会议等帝国主义的阴谋，反对减低现在的交涉条件以牵就帝国主义；我们与其要不满意解决，宁可不要任何解决，让他成为悬案，永远悬在四万万人的心中，象二十一条交涉一样。因为这样，我们还可以长久用为宣传民众的资料，使他们永远不忘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残忍，以激起他们常时为反抗帝国主义而战斗。

第三，每一个帝国主义的惨杀，每一个军阀的压迫爱国运动，都应当即刻用为宣传材料，广为宣传此种事实，使人人都发生打倒帝国主义的决心。

第四，注意宣传的结果，不是要被宣传者浪漫的暴动，更不是要他们悲愤而自杀，是要使他们知道只有组织群众才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实力，而且果能组织群众，亦一定可以打倒帝国主义。

第五，注意利用各种机会，宣传组织学生、工人、农民、小商人乃至于兵士。我们要组织学生会、工会等职业团体，尤其要组织可以指导此等职业团体之同志结合。只有有了好的这种结合与职业团体，才是我们暴动开战的日子。

载《中国青年》第88期

署名：F. M.

民族革命中的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人们对于一种秘密的革命党，每每不免发生许多猜疑与误会，何况有帝国主义者散布的毁议？何况有帝国主义的走狗编造的谣言？何况有浅见而狭隘的人帮助他们，发出许多似是而非的言论，以紊淆大家的耳目呢？不过我们脑筋更冷静清醒些，我相信这般猜疑与误会，没有甚么不容易清楚明白的事情。

在这几年中间，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已经令全中国有知识的人都承认他们的勇敢与劳瘁了。但还有许多比较流行的怀疑之点，我可以列述解答如下：

（一）有人说，无论共产党怎样努力，中国现在总是不能够实行共产主义的。然而谁看见共产党在“现在”要实行共产主义？在“现在”，共产党又有甚么神奇的法子，能在这种大部分仍陷于封建的农业社会中间，来实行共产主义呢？苏俄在今天亦只能采用“向共产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中国共产党在“现在”，甚至于连新经济政策都还不敢希望一定能够实现，他们只希望先实现联合各阶级的打倒帝国主义运动，——将时局向前推进一步，然后再以无产阶级的实力谋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权，以渐进于共产主义。只有老顽固到“将来”亦不要实现共产主义，只有大空想家在“现在”便居然要实现共产主义。

（二）有人说，共产党将来要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是于“民治主义”有妨害的。然而一个真诚坦白的分子，为甚么要怕“将来”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天呢？我假定你们提倡发达民权与保障民生等口号，都是真心为全民的利益说话的；你们敢断言在所谓全民之中，将来不会有阶级利益的冲突，使无产阶级必须靠自己的实力才能争夺自己的利益么？只要有大的或小的资产阶级，只要这些资产阶级有人不能真心接受你们的“民治主义”，他们的所谓发达民权，决不许农民、工人与缙绅之士有一样的选举或被选举权，以破坏了他们的体统；他们的所谓保障民生，决不许有人去节制他们的资本，或是平均他们的地权，以侵犯了他们的自由权利。所以这种“民治主义”，结果至多能给予农民、工人以投票权，使他们好为缙绅之士“抬轿子”、凑票数；或是给予农民、工人些微的恩惠，使他们能享受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所得利益万分之一的余沥，如是而已。谁应当禁止不满意于这种“民治主义”的人要求无产阶级专政，以无产阶级的实力根本压倒资产阶级的这种反民治的行为呢？我再退一万步，假定真有把握能在那时不至于有资产阶级反民治的行为发生，假定你们真能发达民权、保障民生至少象你们口中所说的那样好，那便无产阶级都会心满意足，不感觉有自己专政的必要，纵然共产党一天到黑喊叫无产阶级专政，亦没有甚么关系。只有甚么人怕共产党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呢？只有在革命以前本无真心为全民利益说话的人，与革命以后甘愿纵容甚至帮助资产阶级反民治行动的人。

（三）有人说，共产党在今天主张阶级争斗，有妨害于各阶级联合的民族革命。各阶级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而联合起来以从事革命，只须他们认识为自己的利益非联合起来从事革命不可，为

甚么怕他们因为阶级争斗而不肯联合起来呢？任何时的阶级争斗，都是为的工人反抗剥削的资本家，或是为的农民反抗剥削的地主；为甚么因为要联合起来从事革命，便应当宽纵这种资本家或地主，便应当使农民、工人牺牲他们的反抗的正当权利呢？阶级之间的有争斗，是从古已然的，只要一天还有资本家、地主剥削工人、农民的事，这种争斗亦是无法避免的。只有为这种资本家、地主做走狗的人应当反对这种争斗。你们只知反对这种争斗，为甚么不肯负责纠正这种剥削工人、农民的地主、资本家？对于你们自己无法纠正的地主、资本家，怎样不能说出一个对付他们的切实办法呢？

(四)有人说，共产党既是有自己的主张，不应当都加到国民党里面，用国民党的名义作各种活动；倘若一定要用国民党的名义活动，这便证明共产党的不光明磊落，或是共产党的运动不适合于中国的需要，所以不好把他们的名义拿出来。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是连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亦不了解，或者根本不懂革命党是甚么东西，否则至少亦是挟有客气偏见，所以才说出这种可笑的话来。共产党因为见到要渐进于共产主义，必须先联合各阶级打倒帝国主义，为打倒帝国主义而加入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国民党，这是他们自己的主张，亦便是国民党的主张，为甚么他们不可以用国民党的名义作各种活动呢？不错，共产党现在只希望国民党能忠于为民族主义奋斗，对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不一定希望国民党能够切实做得到；然这只是因为共产党相信非有无产阶级的实力，压倒资产阶级，不能保证农民、工人政治经济上的安全，他们并不要根本反对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国民党若真有把握不要无产阶级的实力而能全实现三民主义，尽可

以努力做出来给共产党看，用不着反对共产党这种更进一步为农民、工人利益而奋斗的主张，便是在国民党内部亦没有理由不许有抱着共产党这种信念的党员。至于共产党的光明磊落、在于他的服从党的纪律，尽其全力钻到农民、工人乃至一般青年群众的深处，以扩大革命的宣传与组织；他们是帝国主义、军阀、绅士们所嫉恶的，他们是统治阶级舆论所污蔑的，他们决不能一天只顾到大庭广众中间拍拍胸膛，说明他们自己是共产党，好让侦探警察来拘捕，以博取这个光明磊落的美名。凡是比较秘密的革命党都是如此的，例如辛亥以前的同盟会员决不能到处公开的活动，亦决不能说他既是不能公开的活动，便一定是不合于中国的需要。有人说，共产党员今天是借国民党的屋躲雨，自然共产党是在风雨中间过日子的，便在国民党的屋下面，并不敢稍存苟且偷安的心理，不天天预备去同风雨奋斗。我便很奇怪国民党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为甚么可以不到风雨中间去奋斗？为甚么会有躲雨的屋？一般国民党员倘若不愿意将这个屋借给共产党躲雨，请问国民党员躲在屋里做甚么？我们很希望统治阶级有一天要恐怖国民党象今天恐怖共产党一样，我们很希望国民党员都能够很勇敢的到风雨中过真正的革命生活，那时候国民党决没有屋子供人家躲雨，便自然知道革命党是甚么东西，革命党能够光明磊落到甚么地步了。

（五）有人说，共产党员既加入国民党，不应当在国民党中为共产党吸收党员，更不应在国民党中有挑拨的事情。这更是奇怪了！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吸收党员，犹如他们在任何地方吸收党员一样；假令共产党的理论与主张，敌不过国民党，为甚么国民党员会被他们吸收去？假令共产党的理论与主张，确实比国民

党要好些，有甚么力量能够禁止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吸收党员呢？一般军阀、绅董与腐败教育家，生怕国民党到他们地方的中间去活动吸收党员，这种恐怖只令我们看成笑话。然而国民党员对于共产党，亦居然会有这一样的恐怖，这不更是一场大笑话吗？至于说到挑拨，请问指的甚么事体？倘若指的共产党人有些攻击国民党右派与夫督促国民党中派，请问右派是否应该攻击，中派是否需要督促，经过这种攻击与督促之后，国民党究竟得着甚么坏处或好处？国民党包含许多敷衍妥协的原素，这是十余年他所以不能完成民族革命之使命的原因。为甚么不应当对于这种敷衍妥协的原素痛痛快快的加以打击，使国民党全部的精神都振刷起来？为甚么要打击这些原素，还要负挑拨的罪名呢？从前国民党被宋教仁等污损了，被糊涂的右派——一般政客官僚——败坏了，所谓好的（？）老党员只知道消极，只知道袖手悲叹，甚至只知道置之不闻不问，以醇酒妇人消磨自己的日子；等到人家把这些黑幕揭开了，国民党群众的判断力比较进步了，这些人又钻出头来一面承认宋教仁等右派确实是不好，然而一面又说人家是挑拨，想在这中间游移取巧，以取自己的地位。为甚么不应当“挑拨”呢？我们还应当挑拨国民党员起来反对那种卖淫妇样的杨庶堪，我们还应当继续挑拨国民党员起来反对在广东妨害军政统一、财政统一的各军阀，我们还应当继续挑拨国民党员常时纠正中派领袖怯懦游移的态度！是真诚要求革命的人，应当嫌恶这种挑拨么？

载《中国青年》第89期
署名：F.M.

悼廖仲恺先生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我们诅咒的无情的手枪炸弹啊！你们是浪漫的青年所认为唯一的革命的工具，然而你们竟被反革命派利用，结果了一个忠诚勇敢的民族革命的前驱者——廖仲恺先生！

廖仲恺先生恐怕要称为国民党诸领袖中间最急进最不妥协的了罢！他是帮助孙中山先生，主张国民党改组，主张吸收一切革命分子加入国民党；在改组以后，是他惟日孜孜的尽力于农工运动，反对一切压迫贫农的地主，反对一切压迫苦工的资本家，反对一切冒名革命蹂躏人民的军阀！他因为这受了许多疑怨毁谤，却只是埋着头做上去，一直做到他被杀于反革命派的手中！

我们注意罢！反革命派只有三种伎俩：第一，是散布意图损害革命家的谣言；第二，是勾结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以破坏革命运动；第三，是雇用流氓打手用手枪炸弹结果革命家的性命。廖仲恺先生为了革命事业，对于他们的三种伎俩都领教过了！

哪有一个真正革命家不为反革命派所忌恨的呢？哪有一个真正革命家能够免于为反革命派所污蔑诬陷暗算的呢？革命的青年！勇敢些罢！他们有他们的鬼鬼祟祟的计谋，我们有我们的堂堂正正的战斗！让我们更勇敢的继承着廖仲恺先生的革命精神，宣传组织农工群众，自然我们有力量压倒这些鬼鬼祟祟的

反革命派，以完成廖仲恺先生未了的志愿！

不要把“妇人之仁”误了我们的事体！我们应当严压一切反革命派，毫无顾惜的扫除一切反革命派！我们在一切反革命势力之下奋斗的革命同志们，性命都悬在这些反革命派手里，只要不肯舍弃革命的工作，便没有我们妥协回翔的余地啊！

在廖仲恺先生为中国民族的壮烈的牺牲之前，我们希望全国民党革命的党员，乃至于全国革命的青年群众，都能够深切的有这种觉悟！

载《中国青年》第90期

署名：代英

国民党与阶级争斗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国家主义者亦敢赞成国民党对于阶级争斗的态度么?

向来在国民党中讨论阶级争斗,是容易引起误会,而且很难得十分恰如其分的。现在好了! 这一次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全体会议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议决案,规定浙江党员宣传工作上对于阶级斗争应取之态度,上海国民党执行部认其议决为完全正确,并望所属党部切实负责将此义晓示各党员,俾宣传及行动有所遵循,我们从这里可以使天下人都了然于国民党对于阶级争斗的真正态度了。

浙江省党部指出国民党中一切错误的倾向,是十分确实的。他说:"右倾的倾向,即一触阶级争斗而避之若浼[1],并阶级二字而不敢纳诸见闻,甚至深恶痛绝;左倾之错误,即在专力于阶级争斗,而忽略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之工作。"这一方指出隐讳阶级冲突的事实,妄欲逃避阶级争斗的错误;一方亦抉破不顾及无产阶级之实力,妄欲以无产阶级单独担负国民革命工作的空想。一个人真正懂得这种道理,对于国民党中为甚么可以容纳共产党(因为并不反对阶级争斗),共产党人为甚么一定要加入国民党

---

① 浼:污染、玷污。

(因为并不能专从事于阶级争斗),自然不至于发生任何疑问。

原文又说:“吾党惟尽最善之努力,唤醒各阶级成员之觉悟,以革命的方法,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组织,以防止争斗之害,消弭阶级之别,而非欲奖励阶级争斗。”国民党为各阶级有革命觉悟之分子组成,其责任便在唤醒而且指导各阶级成员,为三民主义而奋斗;既是国民党为三民主义而奋斗,所以一切妨害民族革命的急进的空想是应当防止的,同时一切妨害农工势力发展的妥协的俗论亦是应当反对的。有人要说,既说要防止争斗,消弭阶级,而非奖励阶级争斗,这不是妥协的态度么?我敢说这决不是妥协。要证明我的话,最好看浙江省党部议决的四条宣传标准。

我现在将这四条标准列述而加以解释如下:

第一条的要旨,在说明国民党对于为帝国主义基础之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须从政治上经济上努力防止其势力之膨胀,这便是防止争斗、消弭阶级之最初条件。这一条将国民党之反对个人资本主义,说得再明显没有了;一切还不肯反对个人资本主义,甚至于还要帮助他发展的,决不是忠实的国民党员。这一条并说明所谓防止争斗、消弭阶级,最要是防止个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国民党应当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防止个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这是国民党最重要的责任;这一件事若无功效,个人资本主义仍旧会发展起来,那便争斗无法防止,阶级无法消弭,三民主义都只好徒托空谈了。怎样去防止个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呢?浙江省党部的方法,是要对资本家与地主,诱发其仁爱的性能,使接受三民主义,这自然是很好的。不过我可以加一句,假定资本家、地主的仁爱性能竟诱发不起来,他们竟不接受三民主

义，或虽名为接受三民主义而不肯切实照三民主义的精义做事呢；国民党自然应当用农民、工人以及各阶级表同情于农人、工人之分子的力量去遏制他们，甚至于打倒他们，褫夺他们的政权。对于这，你亦可以说是阶级争斗，或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但国民党若非这样做便不能防止个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忠实的党员决不应畏怯不前；因为国民党所以要这样做，并不是要奖励阶级争斗，但非如此便不能达到防止争斗、消弭阶级的目的。

第二条的主旨是在说明对国际帝国主义已完全发展之国家，应促其国民之阶级觉悟，使与被压迫民族联合作战。这是对于世界革命运动之相互关系确有所见的话。我在这里亦应当补充一句，便是既然在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受其本国资本家之害的，应当对于其本国资本家励行阶级争斗，自然在我们被帝国主义压迫蹂躏的中国，直接受国内、外国资本家之害的，亦应当对于外国资本家励行阶级争斗。现在国内、外国资本家所经营的事业很多，煤矿有抚顺、本溪湖、开滦、福中等处（民国九年外资及中外合资之矿产，煤占全额百分之四十六），铁矿有本溪湖、鞍山站等处，纱业有内外棉、日华、怡和等厂（民国十一年英日厂锭数占全额百分之五十八），面粉有满洲、青岛等处，此外外厂或中外合资的尚多，其由中国资本家出面办理而有外人股款或借款的更不胜数。国民党是认定要对于已完全发展之帝国主义作战的，所以决不应当防止中国无产阶级对于此等外国资本家的阶级争斗，并且应当毫不畏怯的去促成此等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而且毫无疑惑的应当奖励此等阶级争斗。

第三条的主旨，说国民党员是要负责使农人、工人结成有组

织有训练之团体，以促进地主、资本家的觉悟，完成三民主义之革命工作。这是极正确的指导。但假如地主、资本家阻碍此等组织与训练呢？国民党应当诱发地主、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假令地主、资本家的仁爱性能无从诱发呢？自然这种事是可以有的；孔子遇着了齐景公、卫灵公，亦将他无可如何（而且实际在孔子周游列国时，所遇的君相，无非是一般昏蛋，所以孔子都无从诱发其仁爱的性能），国民党自然亦不能有十分把握，可以诱发每个地主、资本家的仁爱性能。但国民党决不能等候地主、资本家的仁爱性能被诱发以后，再去组织训练农人、工人；国民党在此时应当预备与阻碍农人、工人以组织训练的地主、资本家相奋斗，遇必要时，为发展农人、工人之组织与训练，便遏制乃至于打倒这种反动的地主、资本家，亦是没有不可以的。这种遏制或打倒地主资本家的行为，乃为防止争斗、消弭阶级所必需的，这决不可以说是奖励阶级争斗。

第四条是说，在已发现阶级争斗时，国民党员应即刻站在农人、工人方面，并且纠正地主、资本家，使他们不对农人、工人取争斗之态度与手段，这是每个国民党员应当记得的。我们若是要得着农人、工人的同情，使他们都站在国民党旗帜之下来进行革命的工作，那便不但不应当对于已发现之阶级争斗，借口“农人工人胡闹”，或者说“有共产党在中间煽动”，而每一种反对厌恶的心理；对于这种阶级争斗，我们应当毫无疑惑的立刻去做农人、工人的友军，尽力解除地主、资本家的武装，使他们不取争斗的态度与手段。

有人要说，照我上面所说的，国民党不真要赤化了么？我敢断言是不会有这事的，浙江省党部不已经明白指出国民党的色

彩是青白两色，不已经明说要造成全国之青白化么？我上面所说的，是每个革命党自然应当那样做的，要那样做，才配得上说是一个三民主义的党员。若是不去防止个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去鼓励国内、外国工厂的无产阶级励行阶级争斗，若是不去负责发展农人、工人的组织训练，若是在已发现之阶级争斗中不敢站在农人、工人上面，便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应当在国民党中撵出去。国民党对于地主、资本家要诱发其仁爱的性能，但决不能只顾去诱发他们仁爱的性能，把上述即刻要做的事都停着去等候这种诱发性能的功效；更决不能于这种诱发性能的工作不能生效的时候，便束手无策，不去防止个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或不去负责发展农人、工人的组织训练。所以到那时候，若不肯用农人、工人以及各阶级表同情于农人、工人之分子的力量，去遏制这种不觉悟的地主、资本家，甚至于打倒他们，褫夺他们的政权，便是一个虚伪怯懦的假革命党员，国民党亦不应当存留这种分子。国民党要这样做，自然是不免于使一切反动势力畏惧而嫉忌的，他们自然要为国民党造出许多谣言，纵然国民党员自己说一万声我是青白化，他们亦是要胡乱加以赤化头衔的；但若因为怕赤化两个字，便想借浙江省党部青白化之名，与所谓防止争斗、消弭阶级、诱发地主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并非奖励阶级争斗等语，以掩饰自己怯弱妥协的丑态，这决不是浙江省党部之所期望的，更不是上海执行部所期望的。一个忠实的国民党，一定要预备着恒久不倦的与各种反动的（或者说是不觉悟的）势力相战斗，因为怕赤化的嫌疑，便要借种种说法来回避战斗，根本便不配做一个国民党员。

我重新说，倘若有人不知联合各阶级以从事国民革命，而只

知专力于阶级争斗，这是左派的幼稚病，无论你是属于甚么主义甚么党，这种态度都是根本错误的。但是，“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倘若因此使怯弱妥协的人可以借一种话来回避战斗，这更是一个严重值得注意的危险。浙江省党部的训令只是明确说国民党对于阶级争斗应取的态度，这个训令要更使国民党一般右派分子无法隐讳他们怯弱妥协的罪恶，决不容反被他们利用了拿去做隐讳他们罪恶，反对一切阶级争斗的工具。

载《中国青年》第90期
署名：代英

辛丑条约对于中国的影响

（一九二五年九月七日）

中国怎样完完全全陷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掌握中的呢？辛丑条约可以说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加于中国的一下致命打击，使中国四万万人不但在物质方面成为无抵抗的政治经济上的亡国奴隶，并且在精神方面二十余年不敢对帝国主义国家要求独立平等的权利。

在辛丑条约以前，已经有虎门条约加我以裁判权及关税的约束，已经有天津条约规定外人在内地传教与内河航行的权利，已经有马关条约规定外人在中国设厂制造的权利，此外割地赔款、开租界、租军港、干涉各项税务的事，更不胜指数。但为这一切条约作有力的保证，而且进一步给中国人民以空前的无理负担，剥夺中国的一切自卫权的，还要算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原文十二款，附件十九项，这是帝国主义者的八国联军盘据着北京城的时候，勒逼满清的孤儿寡妇所缔定的。从辛丑条约签字到现在整整的二十五年，在这二十五年中间，我们中国人民所受的祸害，已经言之痛心；然而一天让这个条约存在，我们中国人民还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哩！

辛丑条约对于中国的影响，最使人不能不注意的，是规定所谓庚子赔款。该约规定“付诸国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即

四万五千万两；此宗赔款，据美国人自述，当时索赔之数有百分之八十是属于惩戒性质的，各国所索赔款，平均计算约七倍于他们实在损失的数目。庚子年为反抗帝国主义而起的义和团运动，虽然在许多地方曾经杀洋人烧教堂；这种仇杀排外的错误行为，在各国都是常有的。不但欧洲人常有屠杀犹太人的惨剧，一八八一年美国有排西班牙人的暴动，一九一四年英国有排德意志人的暴动，他国侨民都因此所受损失不少，一九二三年日本地震之后，更有屠杀华侨二百余人的事。谁能都象辛丑条约规定这种惩戒性质的赔款呢？赔款数目商定以后，帝国主义者又照会中国，说中国国家摊还之总数，不过仅足赔款之本而已，并未算及利息，应请再行酌核示覆。中国于是于赔款正额以外，又承认此项赔款按年息四厘，由中国分三十九年清还。预计三十九年须支付的利息，共为关平银五万三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超过赔款正额之数。中国为支付此项赔款，由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至一九一四年（宣统二年），每年已付一千八百余万两；由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至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每年已付一千九百余万两；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付二千三百余万两；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付二千四百余万两；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因对德奥宣战取消该两国赔款减去总数约全数百分之二十二，付一千九百余万两；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协约国因中国对德宣战，允许缓付赔款五年，至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十一月止。以上仅截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中国已经支付赔款本利三万余万两。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以后加以可以不付俄国赔款（合前德奥赔款约减总数百分之五十），然而从彼时一直至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每年尚须付一千二百余万两；一九三七年（民

国二十六年)至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每年尚须付一千七百余万两。以上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起，于前付三万余万两以外,尚须付二万余万两。合计已付未付之款,虽幸而取消俄、德、奥三国应得之数,中国的损失仍在五万万两以上,每年为此支付之数,总须银一二千万两。中国民穷财尽,国家所用教育费每年不过六百余万元,全国公私立小学校仅十四万余所,全国无受教育机会约三万余万人;国家所用实业费每年不过三百余万元,全国公私有荒地至八万余万亩，全国农户耕田不满十亩的占农户总数中百分之四十二(一千七百余万家)。我们每年有银一二千万两,为甚么不用以为扩张教育发达实业的费用,却只任帝国主义者勒索讹诈去满足他们贪鄙的私欲呢？全国的青年记着罢!帝国主义者每年掠夺三四倍于全国教育费数目的赔款，这所以使你们没有学校读书，使你们的学校都苦于穷窘而不能维持。全国的贫民记着罢！帝国主义者每年掠夺六七倍于全国实业费数目的赔款,这所以使你们没有田种,没有工做,使你们种田、做工的人得不着一点国家的补助。起来！为我们的利益，撕毁辛丑条约,取消庚子赔款!

庚子赔款为中国之祸害，还不止此。帝国主义者与中国商定了要赔的数目，为他们自己的方便，又在辛丑条约中规定，此项赔款系照海关银两市价易为金款，并附述按诸国各金钱之价易金的比例,如海关银一两易德国三马克零五五,奥国三克郎五九五等。在最初三年银价下落,汇市有变更,帝国主义者不允照约中比例，责令中国照当时市价补足，于是发生镑亏问题，为弥补镑亏又须支付八百余万两，中国政府因此向汇丰银行另借一百万镑,年利五厘。到近来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诸国,

因纸币低落，不顾在他们本国金币纸币本无区别，而且他们本国每每并无所谓真正的金币，勉强附会辛丑条约，向中国提出所谓金佛郎案，勾结市侩卖国之徒私自解决，仅法国金佛郎案一事，损失即达于七八千万元，意、比、西等国尚继续提出此同样交涉，将来的损失还不知几倍于此。帝国主义者又强迫中国于辛丑条约中规定，此项赔款由中国以海关进款及海关增税所得款项，常关进款，盐政进款，为担保之财源，此等财源各进款应每月给诸国所派银行董事收存；这是帝国主义攘夺中国关税、盐税保管权的开始，后虽因关税收入加多，仅关税一项即可支付赔款，盐税另指为善后借款的担保财源，然关税保管权始终在帝国主义手中。民国以后，总税务司英人更将支付赔款以外的关余，亦用他的名义存放于外国银行中，于是占全国收入约四分之一的关税全部，中国政府不得他的允许，完全无动用之权了。辛丑条约又规定在各通商口岸五十里内之常关，均归海关管理，于是全国四十六个海关，而且还有十九个常关，均落于洋员之手。此外，帝国主义者为要中国有支付庚子赔款的能力，允许入口货增至切实值百抽五，然他们所谓切实值百抽五的估算货价之基，规定应以一八九七至一八九九三年卸货时各货率算，开除进口税及杂费总数之市价；所以在他们修改税则之初，切实值百抽五云云便只是一句空话，以后物价增涨而税率不改，有时平均计算，实际不到值百抽三。因为有这个前例，一九一六年第二次修改税则之时，又以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关册所载历年物价平均计算，一九一二至一三两年在大战前，物价远低于战后，关册所载又远低于同时市价，以此平均扯算谓为切实值百抽五；此即以值百抽五为标准论之，中国税收上的损失，每年亦有千余万两之

数。为此等可怜的"切实值百抽五"之加税，帝国主义者更借以要挟取得天津北河与上海黄浦两水道之会同修治权，要求中国每年付银六万两养北河之工，每年付银二十三万两为黄浦河道局各工及经管各费。

综合上文所述，可知辛丑条约对于中国的影响，一为总数五万余万两赔款本利之损失，每年须付赔款一千二百余万两至二千四百余万两；二为使中国因"赔款用金"之含糊规定，每每发生意外的担负；三为使帝国主义者攘得保管将近四分之一的关税之权；四为使帝国主义者攘得海关附近常关的管理权；五为开不忠实的修改税则之恶例，税收方面于值百抽五之标准下尚每年有巨数的损失；六为北河、黄浦两水道之修治，堕于国际势力支配之下。

这便算中国所受最大的恶影响了么？不是的！还有更大的恶影响，便是帝国主义者加于中国精神上的打击。他们指令中国那时的满清君主派亲王大臣到外国谢罪；斩戮许多帮助义和团的宗室王公与内外重要官吏；停止有排外运动各城镇文武各等考试五年；在外人被害地点及坟茔被污渎挑挖之处建碑；并且以上谕永禁设立或参与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以后再有伤害诸国人民或再有违约之行，各省督抚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官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别列奖叙。以上各事，他们都强迫中国作成谕旨，在中国各府厅州县张贴两年之久。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还成一个独立国家么？中国不但要作种种屈服谢罪的表示，而且无论是贵族、官吏、人民都要接受帝国主义的惩罚，以后并须大家在帝国主义所规定的严刑峻法之下兢兢业业的过日子，这种强迫中国缔定的卑怯柔顺

的条文，却偏偏在中国全境张贴两年，使深深印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这是加于中国民族如何痛楚的鞭挞啊！

帝国主义恶毒的伎俩还不止此！他们又于辛丑条约中规定，停止中国军火及专为制造军火器料进口二年，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由诸国会同指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这完全为剥夺中国的自卫权，使北京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又于辛丑条约规定东交民巷由使馆管理，使馆可以自行防守；同时强迫中国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他们用这提高他们自己的地位，使他们自己的势力确立于北京政治界，逐渐遂养成东交民巷俨然为北京太上政府的局面，中国的外交官吏仰承帝国主义的意旨，居然亦有左右北京政局的力量。

可怜的中国人民，经过这些从来未有的重大打击，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不承认帝国主义的虎威了！北京政府既然完全落在帝国主义者的巴掌心中，完全没有抵抗能力，他与他所任命的大小官吏第一个重要任务，便是为帝国主义保障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权力，禁止中国有任何排外的行为。这样的结果，岂但有两年之久遍贴于全中国的谕旨，即至今二十五年，政府人物虽然更易了多少，人民亦由少而壮，由壮而老，经过了多少思想上与生活上的变化，然而没有一个人敢不对于帝国主义表示虔畏恐怖，没有一个人不对于他的周围的人宣传帝国主义之不可以反抗的各种道理。二十余年来，全中国真个是父诏其子，兄诏其弟，互相勗勉永世为帝国主义的不侵不叛之臣！丑啊！痛啊！

自从有了辛丑条约，中国人几乎完全失了民族独立的意识，没有人做梦还想到要申诉庚子赔款的残酷与其他一切约束限制

蛮横无理，没有人做梦还想到可以撕毁辛丑条约与一切不平等条约。我们有了这，还要问辛丑条约对于中国的影响么？最近数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震荡，帝国主义在世界上的权威发生了根本的动摇，中国的民族精神才渐渐苏醒起来，知道辛丑条约是比中日二十一条条约更大的国耻，发生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大运动。伟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潮流啊！只有你能解放我们全中国民族！只有你能唤醒我们被辛丑条约打击到十八层地狱下的亡国奴隶，使他们觉悟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起来与一切帝国主义作战！

载《向导》128 期

署名：子毅

“应该怎样开步走?”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广西下冻的何威君写信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他不愿作学者诗人，尤不愿作奸商痞棍，所愿是靠革命救中国；但他所处的环境，虽外力侵入比别处更甚，要联合几十个青年亦不容易，因而力量十分薄弱，他所以有了这个疑问，要我给他一个解答。

关于这个问题，我讲一讲我自己的经验罢！

在五四运动以前，我在武昌做学生：武昌在那时是格外比别处更死气沉沉的地方，教职员多半是前清遗留下来的老朽，与浅薄而不好学的东洋留学生；学生多半是凡庸懒惰的个人主义者，不知道什么叫做团体活动。有很少的人可以说是与众不同的，然而这少数人亦是只忙于课外自己的读书或作述，决没有彼此联合作各种实际社会运动的思想；而且这少数人鄙夷多数同学，他们自己之间亦互相鄙夷，彼此都有一种“除了自己便天下无人”之叹。有这种发昏的想法的，我那时便是其中的一个人。那时候全国一般的思想界都可怜极了，只有《新青年》与其他一二刊物，稍稍鼓吹一点“离经叛道”的思想。这一种鼓吹，对于我便发生了影响；我可以说我本是一个富于怀疑批评精神的人，我向来又只爱看课外书报而不爱正经功课，所以我的思想便首先被摇动了。然而那时候一般同学仍旧沉沦于旧习惯当中，他们

第一便看不惯白话文的文章,第二便不赞成那些"离先王之道太远了"的主张;我若对他们宣传辩论,他们不过看我是故意要做翻案的文章以出出风头,至多恭维我是一个"理想家"罢了!

"应该怎样开步走?"这个问题,我亦常常愿意去想他;然而在想不出一个头绪来的时候,亦便将他放下来了。有一次,我发了一个决心:我因为看见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要想将他们的一些好法子(除了宗教臭味)移殖到中国学校里来,我便拟了一个发起"学生会"——意思不过等于一个学校青年会,并不希望包括全体同学在内——的大纲,在同学中征求发起人。第一件事出于我意料以外的,便是有许多我平素不愿引为同调的人居然都热心赞成这个大纲,丝毫不费力的便得着了发起人几十个,于是开始召集发起人的会议。天下事果真便这样容易么?决不会的。我在发起人会议的中间受了许多挫折,他们有人疑惑我发起这个会是因为要当会长,多数人对于这个会根本并不感觉需要,所以亦不高兴到这个发起人会议,以后这个会议亦召集不起来了。

那时候,我实在想不出我应该怎样开步走,我只是怀疑武昌的学生——或者竟说中国人——总不应当象这样没有办法,所以我常常提出来和比较亲密的朋友们讨论,虽然这种讨论亦每每只有大家付之一叹的结果。后来一个浪漫而向上的朋友提醒我了!他说,"我们既不能组织一个多人的团体,何妨先将可以组织的少数人即刻便组织起来?"他这个意思,我十二分表同意,当时我与他即刻开始活动,两天之内便成立了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连我在内,一共四个人。我们组织这个团体,还不过是一方督促自己学业品性上的进步,一方帮助朋友,有时亦做

一点为社会国家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主义的信仰，更不知道甚么叫国民革命。然而便是这样的团体，在武昌已经是很少看见的了，我们不敢在同学面前开会，有人知道我们开会，便笑我们是吃基督教了！

组织这个团体的最初四个人，除了一个已经死了以外，另外两个到现在虽与我表一相当的同情，在行动上他们亦并不能与我取一致的行动。然而这个团体便是我开步走的第一步了！自从这个团体组织了以后，我们大家聚精会神的谋这个团体的进步，在这中间我自己与全团体的人都很得些益处，我便常常象疯狂一般的向有些比较可宣传的人宣传；为了这种宣传，我有时被人家嗤之以鼻，因为人家以为我是夸炫自己，而且在他们眼中看得这种一个人的小把戏是不值得一谈的事情。我虽然因为经验的缺乏，与态度的不合当，为了这亦遭过许多侮辱；但是我们的工作究竟有了相当的结果。在组织这个团体以后不到一个月间，同学校别班素不相识的朋友听见了，他们要求于我们开会时来参观，参观以后很诚意的要求加入，不过几日，他又将他本班接近的同学介绍加入；不久，这个团体便扩大到十余人了。别的学校比较向上的人，亦开始组织同性质的团体。别的学校素不相识的人亦渐渐有来结交，而且在某种活动中愿与我们合作。武昌的空气到此似乎稍有一点活动。

我们的团体开始向同学公开，而且我们的会员每天互相督促的向同学们作各种实际工作，我们开始组织了一个小图书馆，而且帮助同学，很努力的做了一次调查国货的运动，平常对于同学作各种有益的谈话，所以一般同学对于我们还有相当的好感。在最初，同学中那些比较刻薄的人，对于我们是有各种讥消与侮

辱的；不过我们相互约定不要计较这些事情，我们总是用一种和平好意对待人家；后来时间久了，讥诮与侮辱我们的人亦厌倦了。我们的工作便没有妨碍的进行上去。

我们那时最大的缺点，是只知靠很小的团体，做些零碎的小事，而不知道怎样联合群众，做什么普遍的运动，所以我们在武昌并不曾做出甚么大的事来。我们仍可以说，在那种不易联合群众的地方，“先将可以组织的少数人即刻便组织起来”，这总是我们开步走的第一步；组织了多少人，能勤奋而忍耐的做上去，而且注意时常扩大团体，扩大运动的范围，自然可以有相当的成功。我们那时的会员，到现在消极或与我们不能求思想行动一致的人亦不少，不过我以为这是不要紧的。我们组织小团体，是为的大联合、大运动，我们可以用小团体将能够引进的人尽量的引进几步，我们至少在最初几步工作中可以得着若干合作的伴侣。但是，我们有了大联合、大运动，本用不着还需要保留这种力量比较薄弱的小团体，那些落伍的会员，在无可引进的时候，亦尽可以让他们退去，象我们让有些无可救药的落伍分子去走他自己的路一样。我们组织小团体，做一些切近的活动，这便是我们开步走的第一步；但是，注意！我们走了第一步，还应当有第二第三步呀！

载《中国青年》第 96 期

署名：代英

五卅运动与阶级争斗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重良：

你若仔细观察五卅以来各阶级的态度，当不至有这些疑问①。五卅运动若认为是全民族的解放运动，我们应当说资产阶级的捐款是对国家的义务，而不是对工人的恩惠，他们纵然出了钱，没有理由禁止工人向他们提出改良自身生活的要求。然而就事实说呢！他们出钱便已经太不能令人满意了！他们怕牺牲所以第一步不肯坚持罢市，第二步又不许华厂工人有停工的爱国表示，第三步更千方百计逼日厂工人上工，以减少工人救济费用。全国资产阶级不能救济二十万爱国的工人，甚至于不能救济数万英厂工人，还有甚么脸面要求工人对他们停止阶级斗争呢？对于阶级斗争我们只应问工人的要求是否正当，工人决没有因为爱国，因为希望资产阶级靠不住的救济费，而舍弃要求改良生活的正当权利之理，有人心的人亦决不肯帮资产阶级拿爱国的大帽子使工人饿死不敢开腔，我想这是公理人道所关，不仅系一党一派之主张而已。至于你虑得罪资产阶级，将来资产

① 《中国青年》读者重良的疑问是："我觉得当对外战争时，国内各阶级似应联络一致。……若照贵党的主张，对外与对内的阶级斗争，不妨同时进行，设当对外正急紧时，资产阶级以挟嫌故实行其不拔一毛主义，无论劝捐者如何勉励，他宁肯得不爱国之名，决不捐一钱给罢工者，试问当此情状，仍是继续对外战争呢？还是停止对外先清内奸呢？"重良来信刊于《中国青年》103期。

阶级不捐助罢工者，你不知这次资产阶级所以比较尚肯捐助，本只是为他们自身利益的缘故，若罢工于资产阶级有利，你便得罪了他们，他们亦要捐助，否则纵不得罪他们亦无人肯捐助。五卅运动起时，正上海商人苦于印刷附律①、码头捐② 等案而无力反抗，所以六月一日他们利用时机宣告罢市，然而罢市时各种表示，只提印刷附律、码头捐等案，决不提日人凶杀顾正红一语，他们想借工人罢工以要挟外人，争取会审公堂与工部局加增华董，他们帮助罢工，何曾有一点为国家之诚意，不过完全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打算盘而已。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商会曾因修改条件大受民众叱责；照你的想法，他们一定不肯帮助罢工了，然而他们为要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仍旧降尊与工人、学生相周旋。及十一国商会协商略有成议了，总工会的局面亦一天天危险了，于是有流氓捣毁、官厅封闭，商界中人袖手旁观，正遂他们借刀杀人之私意。资产阶级做事，只问于自己利益有何关系，他一方挟无产阶级以与帝国主义争自己的利益，一方挟帝国主义以制无产阶级使不敢摇动自己的权利；此在无产阶级善于应付则可以合作而不牺牲自己的利益；苟不善应付，纵拚命牺牲自己利益，在资产阶级得达到他们自己的利益之时，仍旧不会与无产阶级合作以反抗帝国主义的。

代　英

载《中国青年》第 103 期

---

① 印刷附律规定，一切印刷品均须经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审查，才准付印。否则，得处以三百元以下之罚金，或三个月以下之监禁。

② 码头捐系于一八九八年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呈请领事团向上海道商定，照货值抽千分之一。一九二五年四月工部局改为按该货关税（当时关税为值百抽五）的百分之三计算，即按货价抽收千分之一点五，比原数增加百分之五十。

学潮与革命运动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最近有长沙、武昌、重庆三处的学潮以及他处的学潮，为甚么发生这些学潮呢？

重庆的军阀王陵基说，这是过激党从中鼓动；长沙的军阀赵恒惕说，这是受人运动，闹一次风潮每人即可得洋二元。

过激党有甚么三头六臂，稍稍费一点吹嘘之力，便可以使那些向来受统治阶级与学校教职员栽培教育的青年都起来反对他们呢？甚么人有这多金钱，能收买许多地方数千数万的学生，发生这大的学潮呢？

反动的军阀以及与他们一鼻孔出气的人，永远不愿研究每件事情发生的真正原因，他们抹煞铁板一样的事实，只知胡乱造两句谣言，便作为他们解释一切的根据。

显然的事实，是由于五卅运动以后，为民族革命运动所觉醒的青年精神，使他们感觉要联合，要起来争求自身的利益。学生的这种觉醒，犹如紧接着五卅运动中外工厂工人所起的经济斗争一样，亦犹如从前五四运动以后自然发生全国青年男女思想上生活上的解放运动一样。没有一个大的革命运动不跟着发生许多方面的解放奋斗的。不知道的，便以为这完全是由于有甚么三头六臂的人在黑幕中指挥，甚至于又以为这完全是莫斯科

金钱的力量。

我们平心静气批评这些学潮,果然可以说是学生的罪过么?长沙的学潮,一由于长郡中学校长禁止举行学生会成立会,一由于兑泽中学校刊中学生写了一"驱逐这一般饭桶式的教员"一语,一由于长沙师范被官厅核减经费以致校长辞职停课。武昌的学潮,一由于文科大学要求撤换校长,一由于第二中学校监与学生冲突,一由于中和学校主任与学生冲突。重庆的学潮,则第二女子师范与联合中学均由于开除参与九七游行之学生。此外广州则有广州中学为禁止学生入党而发生风潮,浙江建德则有第九中学为要求撤换主任而发生风潮,江苏常州则有第五中学为校长人选问题而发生风潮,苏州工专则因校长禁止学生请名人讲演,发生风潮。总而言之,这些学潮有的是由于学生要求正当利益(为自己的,或是为国家的),有的是教职员完全不能得着学生的了解信仰,所以在学生被革命潮流震荡的时候,学潮便自然很普遍的发生了。

无论如何,这些学潮,都应当由统治阶级与学校教职员负责任。他们的失职与他们的不顾国家以及青年自身的利益,已经激怒全校学生群众,甚至于象长沙激怒了全城学生群众。其实统治阶级与学校教职员遍中国都是差不多的,长沙、武昌、重庆的学潮,遍中国都可以发生起来。因为这样,所以统治阶级与学校教职员都恐怖革命潮流的高涨,他们极力谋降低革命潮流,极力使学生不至于受着革命潮流的影响,他们只有用这样的法子可以避免学潮的发生。

但是,我们不但为学生的利益着想,而且为中国民族的利益着想,我们能够容许统治阶级与学校教职员这般失职而贻误国

家与青年么？我们能够容许他们降低革命潮流使学生与这种潮流相隔离么？我们应当提高革命潮流，使学生与革命潮流发生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并不怕因此使全国学生都觉醒过来，并不怕他们都起来与这些统治阶级与反动的学校教职员算账。

据最近的报告，长沙的总罢课已经被赵恒惕的武力压倒了，重庆女师、联中的学潮亦似乎不免于失败了！这表明甚么呢？这表明学生虽然觉醒了，然而还没有很充分的战斗力，所以还敌不过反动的势力。但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是不会衰竭下去的，学生群众的觉醒是会要一天天更进步的，只要全国学生都觉醒过来，而且我们能够使这些已经觉醒的学生有一种坚固切实的结合，我们将要有一个全国学生一致的斗争，而且因为革命潮流的高涨，将要有一个全国学生、农民、工人一致的奋斗，那便是中国的大革命，一切被压迫者的问题到那时自然会有一个总解决。

所以我们可以说，学潮是为革命运动所推进的，只有再推进革命运动，可以扩大学潮的影响，而获得胜利。青年们，我们不要只知把眼光注射到某一地某一校学潮的胜败，我们应当在每一个学潮中间，使学生群众更觉醒，使他们更认识革命运动之重要。无论学潮的结果是胜利或是失败，我们应当更注意于推进革命运动，我们要使革命的潮流更高，更可以使一切被压迫的人都觉醒过来，以完成中国的大革命。

载《中国青年》第103期

署名：但一

什么地方有较好的学校呢？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一般青年学生，受了若干革命宣传，觉悟了他们自己的地位，马上便会因为不甘受反动教职员的压迫蹂躏，不愿意再留在他自己的黑暗的学校里。所以他们便要发问说，甚么地方有较好的学校呢？

诚然！青年要有较好的学校，这是很正当的要求；现在使一般青年在黑暗学校里受压迫蹂躏，这是社会所应当负责的。不过，甚么地方有较好的学校呢？除了根本改造这个社会，甚么人可供给较好的学校给这般青年？

青年不满意于自己的学校，每以为他校较本校好，别地的学校较本地的学校好，许多人因此费了许多气力，要想转学到较好的学校去。但，这种努力，结果总是徒劳而无功的，他们走遍了天下，才晓得学校的内容都是差不多的。然而他们仍旧想：甚么地方有较好的学校呢？

我大胆说一句，现在是不会有所谓较好的学校的。现在，最进步的分子要忙于实际革命事业，不会有许多精力时间用到办学校上面；学校又因为受社会各方面的压迫牵制，决不能给学生预备很多的好教师与好课程。青年要有较好的学校么？不是今天从此校跳到彼校，明天从彼校跳到此校，所能达到目的的；最要是自己能够到群众中宣传，而且尽力促进革命，以根本改造这

种社会，只有在较好的社会中间才会有较好的学校。

我根本反对所谓觉悟的青年一种怕黑暗学校压迫蹂躏的心理。姑无论这种青年在社会改造以前，没有方法逃脱这种黑暗学校的压迫蹂躏，而且便令他一个人能够逃脱，请问他的尚未觉悟的同学，是应当永远住在黑暗学校中间，无条件的受人压迫蹂躏的吗？我要尽力责备这些所谓觉悟的青年；你们接受了革命的宣传，不注意使这种革命的宣传转输深入于你们的同学群众中间，却自己怀带着这种思想脱离了你们的学校，你们是永远隔离你们的同学使他们不能见着光明的罪人！

革命是要靠群众的力量的。除了使群众都接受革命的宣传，没有法子扩大革命的力量而促其成功。既然如此，一个真正觉悟了的青年，为甚么应当离开了他周围的群众呢？为甚么应当离开了黑暗学校的同学，明明知道他们正是急需接受革命宣传的群众，而弃置不顾呢？真正觉悟的青年，应当舍身到最黑暗的地方；只有最黑暗的地方，需要你们的觉悟的光明，为昏迷的群众照耀出他们所应当走的途径。你们觉悟了，你们接受了光明，不拿去照耀你们周围的群众；你们将光明携带起走了，将你们的同学永远留在黑暗的中间。你们自己想想，这成功一个甚么办法呢？

自然你们有许多掩饰你们罪恶的借口：你们说，你们的同学太糊涂了，他们是蠢得象木石鹿豕一样，所以他们是不能够接受革命的宣传的。再不然，你们亦可以说，虽然你们的同学是可以接受革命的宣传的，但你们的力量太弱了，光明太小了，所以你们必须还要沐浴更大的光明，以长养你们自己的力量，然后才可以到最黑暗的地方进行你们的工作。

假如照第一说，我便很奇怪：是不是你们的同学完全不是在政治、经济上受压迫的中国人呢？是不是他们亦受学校的压迫蹂躏，亦有求学、结婚、谋职业等种种不能完全如意的事情呢？假如他们不是中国人，或者他们完全不受压迫蹂躏，没有不能如意的事情，我相信他们是很不容易接受革命的宣传的。倘若不是这样，为甚么他们不能接受革命的宣传。何以见得你们的同学便是蠢顽得象木石鹿豕的？倘若你们认定了他们是这样的蠢顽，我请问你们何以见得别校的同学乃至别地的青年，又会不是象他们一样的蠢顽呢？大多数人类的知识与觉悟程度，都是与你们的同学相差不远的，你们若说他们是木石鹿豕，那吗，现在即是木石鹿豕的世界，我们不能等候万能的上帝与我们另造一批更高的人类，再来进行我们的革命的宣传工作。我们若能了解革命是要为大多数人类解决痛苦的，在凡是身受痛苦的人都会感觉着革命的需要；只要我们能够努力于宣传工作，他们纵然没有甚么高的知识与理想，亦很容易接受我们的宣传的。我们自己不努力，却怪人家是木石鹿豕，这是如何荒谬的事情！

假如照第二说，我亦很奇怪：你们到甚么时候会相信你们自己的力量强了、光明大了呢？一个人不发神经病，或者不是已经养成了刚愎骄妄的性质，我想不会有一天自信他自己的力量与光明已经是如何强大了的！假如你们永久是一个谦谦的君子，你们永久不相信你们自己的力量与光明可以到黑暗中间去，于是你们永久便躲避在你们所认为更大的光明中间；那吗，你们这些理由，不将成为你们永久不做革命宣传工作的口实了么？一个健全的人，谁亦不敢相信他自己的力量与光明是如何强大，但无论力量如何弱，用一分的力量总要比不用好；无论光明如何

小，照耀得“一个人”走得“一步路”，总要比不照耀好。而且你们要沐浴更大的光明，你们可以买关于主义的书，订阅指导行动的定期刊物，听进步的同志演讲谈话，你们便住在极黑暗中间，仍旧可以常常接受光明，而且你们在实际工作中间，亦会使你们接受光明的力量更大。为甚么一定要离开你们的黑暗的学校，以求满足你们的浅薄的慰安呢？

所谓觉悟的青年，倘若你们真正是觉悟了么，我愿意你们认清你们自己的责任。你们不应当再问甚么地方有较好的学校。第一，你们应当知道现在是无所谓较好的学校的；第二，你们应当知道你们在黑暗的学校中宣传革命的重要，你们不应当只顾想望较好的学校跑。我们现在急切盼望中国革命的成功，所以急切盼望全中国无论甚么黑暗地方的群众都能接受革命的宣传，我们恨不能化身千万到一切黑暗地方中间去，设法使全中国都革命化！觉悟的青年，你们能够常时接受我们的宣传么？你们能够常时转输我们的宣传使之深入一切黑暗地方的群众中去么？无论你们的力量如何弱，光明如何小，你们的努力总可以大有助于促成中国的革命。

要更大的光明么？大家努力，唤醒全中国被压迫的民众，使他们组织起来，以合力一致的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倚附于他们的黑暗势力，那时候大家便都在光明中间了！

觉悟的青年，你们虽是受了许多压迫蹂躏，但要求你们忍耐一些，在黑暗中间尽你们的力量转输光明于你们周围的群众，而且为这一个更大的光明奋斗！我们不至于为这个光明的奋斗而牺牲，我们总有一日在这一个更大的光明中间相见的。

载《中国青年》第103期　　署名：代英

孙中山主义与戴季陶主义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这个题目是不容易讲的，现在不过就我自信的意见，分别中山主义与戴季陶主义的异同，供大家作一研究的参考材料罢了！

一、中山主义是甚么？

中山主义重要的当然是三民主义，然而不仅是三民主义。现在所说的是从孙先生一生的言行中，归纳出几点，拿这几点代表中山主义，比仅说三民主义似乎还赅括些。孙先生一生的思想行为有两句话可以赅括的：

（一）绝对平等的思想　孙中山先生的确是希望世界上绝对平等的，我可以拿绝对平等的思想来解说三民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A）民族主义，简单的说是要使中国民族与世界各民族平等，不受别的民族的压迫。但是在孙先生的民族主义里，亦没有要中国民族将来压迫别人的意思。虽然孙先生曾在留声机片里说什么“千邦进贡，万国来朝”的话，以及在《民族主义》中有些以汉族为主的思想，可是要汉族驾凌别的民族，压迫别的民族的思想是没有的。《民族主义》中曾经提到“这回我们国民党在广州开大会，蒙古派得有代表来，是看我们南方政府对外的主张，是

否仍旧用帝国主义。他们代表到了之后，看见我们大会中所定的政纲，是扶持弱小民族，毫无帝国主义的意思，他们很赞成，主张大家联络起来……”(见《民族主义》第二讲三三页)这很明显的可见孙先生是不主张以帝国主义待国内的弱小民族的。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上更明显的说：“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革命获得胜利以后，与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孙先生绝对不是说，对外则应该平等，对内就不要平等，是要完全平等的！(B)民权主义，是要使人民在政治上平等，甚么人在政治上都平等。政治是全体人民的，是不许资产阶级垄断私有的。孙先生的民权主义要采取直接民权，他要人民可以有直接选举、创罢官制与复决等权，要政治不被资产阶级一阶级拿去，要人人平等。(C)民生主义，是要使人民在经济上平等。他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不使地主、资本家自由的发展，以至于做到消灭阶级，成功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里没有资本家，没有地主，没有经济上地位高的人，也没有给别人剥削的人。三民主义完全是要平等。平等也就是孙先生所谓王道，孙先生曾说，俄国所行的王道公理，帝国主义者所行的是霸道。所谓王道公理是要平等，要没有一个民族压迫别个民族，要没有一个人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压迫别一个人。在《民权主义》演讲里，孙先生曾大发挥平等的理论，充分表现反对任何人压迫任何人的思想。

(二)革命的精神 孙先生的革命精神是很容易的看出。(A)他勇于为主义而造党，不顾一切。孙先生要一个党——一个为他的主义而奋斗的党来救中国。但是孙先生造一个党是十分费力的，没有人能够了解他。他的党始终没有造好，他的主义

被人漠视，他外面受种种的压迫，种种的谣言，种种的危险，党内又散漫而没有团结，虽说有几十万党员，但是不信主义，不守纪律，真正的主义者还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然而他无论怎样，还是设法要达到他的理想，实行他的理想。所以他勇于淘汰不明主义的党员。民国二年改组中华国民党，在前去两年又把党改组了两次，都是因为他的党员不明了他的主义的原故。他很勇敢的当面骂那些不明了主义的党员。有一次演说，骂他的党员为升官发财而跟他的，不是为要实行主义而跟的。他又在许多反动军阀包围之中，办黄埔军官学校，他在校演说："你们是革命的军人，和别的军队是不同的。"这时候他丝毫不怕刘震寰、杨希闵等听了要叛变。去年改组的时候，他决定要老党员接受宣言重新登记，他把一切老党员反对的意见置之不问。这样的勇敢是难得的。但可惜因党内旧同志不免妥协，所以改来改去终没有把党改好。他亦是勇于和反对党义的黑暗势力奋斗的。他排满、反袁等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排满一事大家知道是孙中山先生做首领。反袁呢，孙先生在宋教仁被刺时就首先主张的。孙先生对于妨害实现他的主义的人是要打的。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呢，孙先生确是仁慈。一个人肯改悔、他总可以宽容他。但是妨碍主义，他就要打，不怕任何危险的。再则他亦勇于联合符合于党义的友邦和友军。如苏俄和共产党，现在都有些人怕，在一两年前更是大家所怕的，但孙先生见到要中国革命非与他们联合不可，便主张要他们联合。他明知这样下去要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他明知要给别人造谣言。但是他不管这些！孙先生在陈炯明打他以前就想联俄的。那时便派廖仲恺先生出国进行中、俄、德联盟。他只要以为应当做的便做，他不怕联俄容纳共

产党，反而还说他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统是表现他的革命精神，不是别人所能及到的。（B）反对与违反主义者妥协。孙先生是不赞成和反动势力妥协的，他反对袁世凯，反对一切军阀官僚；虽然别人说他和陆荣廷、杨希闵以及段祺瑞、张作霖等有时有些妥协意味，不过他的意思实在是想利用机会，扩张人民势力。如去年他北上提倡国民会议去和军阀奋斗一样，他并没有与军阀妥协的意思。我们尽管听见什么孙、段、张三个联合等话，但是段、张决不要孙到北京当执政！便是因为他到军阀队伍中去是为要用人民的力量去和军阀奋斗。所以军阀决不放心与他一同做事。不过可惜以前人民太不觉悟，不知拥护着他以与军阀抗斗，只让他一个人孤军深入，所以不免失败了。但这两层，（A）为主义而造党不顾一切的奋斗，（B）反对与违反主义者妥协，都是孙先生革命精神的表现。

孙先生的主义，可包括在“绝对的平等的思想”与“革命的精神”之中。但有平等的思想一定要有革命的精神，不然那平等的思想会变成功空想。孙先生是要用革命的手段去达到三民主义的。虽然他是仁慈大量，同时他又很富于革命精神，并且他勇于为主义而奋斗。

二、中山主义的背景

孙先生何以有这样的主义呢？孙先生的为人，思想是很高尚的（平等思想是孔子及释氏的最高思想），感情是很浓厚的（他确乎很爱人，时常喜写“博爱”、“天下为公”等句子）。但是孙先生不仅仅如此，若仅是思想高尚、感情浓厚，那他更变成了孔子

或者释迦，变了一个教主，而不是一个革命领袖了。他同时是富于革命的进取的态度的人。他是用主义用各种方法为人类奋斗，他的方法是由于他自己时时刻刻接受世界上最新的潮流而制定的。我们可以说他的学识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学识的集合。他是革命的，进取的，他是不怕一切困难，不丝毫犹豫疑虑，他用革命手段来达到他的理想的。他用各种最进步的方法来实现他的平等的理想。这些方法无论是普通的人所不懂或害怕的，他都是一样可以采用。因此我们看孙先生应从两方面看：一是他的革命进取的精神，一是他的仁爱平等的思想。只从一方面看，是不会能了解孙先生真正的人格与思想的。

孙先生生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所以他实在是有些封建社会的思想。他不忘东方道德，他叫人注意东方道德，他讲王道、讲公理，这都是东方人的思想。孙先生在封建社会学说教义之中，把其中最好的部分便是仁爱、平等的理想接收了，我们说孙先生恭维东方文化，这是不错的。不过我们要知道孙先生绝对不是和那些腐儒一样。他是要将封建社会中仁爱、平等的空谈，用近代的各种方法实现出来。孙先生东方思想是有的，但不仅是东方思想。他在三十岁左右，便受到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当他到欧美的时候，正是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时候，同时也是社会主义运动发生的时候。所以孙先生赞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同时他反对资产阶级的垄断把持政权。他接受了直接民权、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学说。在那时，确是很进步的了。孙先生在晚年又接受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便是列宁主义的影响，相信世界革命势力的联合，工人和小农的联合，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的联合。所以主张联俄及容纳共产党。孙先生

一生都能在各种环境里，接受各种进步的思想。所以他有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各种思想。他主张用欧美民主革命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来实现他的中国的（自然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的）仁爱平等的理想。孙先生的思想不完全同于马克思或列宁，因为他有他的复杂背景。所以他的思想是不能完全合于根据马克思列宁学说的共产党的。不过他虽不说无产阶级革命，他却是要消灭阶级。他要世界上没有资本家压迫工人，没有地主压迫农民，换句话说，他仍旧是要达到共产主义的社会。我们说孙先生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有许多人——尤其是不信共产主义的人，一定很怀疑的，但这只由于他们不懂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阶级，所以孙先生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孙先生的学说虽然不能纯粹的同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但是一样要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不过孙先生对于资产阶级不一定认他是革命的仇敌，孙先生以为只要他不妨碍三民主义的实现，就不是仇人。这点是和马克斯主义者似乎不同的。马克斯主义者从经济的观点上认定资本家、地主一定是剥削工农，所以他一定反对消灭阶级的各种企图，因而肯定他一定是工人的仇敌。然而这与孙先生的话是不冲突的么？孙先生以为在不妨碍三民主义实现之时，他不是仇敌，在妨碍时才是仇敌。马克斯主义者说他一定妨害消灭阶级的企图，那便是说他一定要妨害三民主义实现的。若使马克斯主义者的话证明是对的，那么孙先生也会当资产阶级是仇人。这中间有甚么冲突可言呢？

孙先生到临死时，他的学说大概是这样，假设孙先生不死或者迟五年十年以后才死，他的学说是不是还有重要进步的地方，

我们不敢断言;但是总有若干变动的余地,这是可以断言的。他是时时接受各种进步思想的。他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不会便止于现在所成就的。但是就以孙先生现在的学说而论,我们仍可以说是引导各阶级联合进行革命运动的很合宜的工作。现在我们不问资产阶级是否一定要反动的,我们应该联合他们反抗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所以资产阶级只要在不压迫农工的时候,在国民革命的运动上总是友军。这一点,共产党也是看得很清楚的。有人说共产党不要联络资产阶级来实行国民革命,然而过去的事实证明最努力联合资产阶级的,还是共产党。不过共产党是认定了资产阶级是反动的,国民党则在平日不把他们看做仇人,只要在反对或妨碍三民主义实现的时候方才当他们是仇人;所以国民党比较容易号召他们。孙先生的学说一面是便于去联络各阶级以实行国民革命的;一面又因为不许资产阶级妨害三民主义的实现,所以又是不妨碍被压迫阶级的解放。(这里国家主义就万万不能和三民主义相比拟,因为他们要把农工解放事业完全听之于资产阶级自由处置的。)列宁和孙先生可以并称:因为列宁以为工农应该联合,而且以为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被压迫民族;孙先生以为中国要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平等,所以要联络世界无产阶级。这两个要求互相联合的思想,就是促进革命成功。若世界上各国都有列宁和孙先生,世界革命就很容易成功了。中山主义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但是他一方面联合世界无产阶级来革命,一方面若是在中国国内必须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他依旧不妨碍无产阶级的革命。

我并不说孙先生是一个神圣,一个菩萨。他一生也有吃亏

的地方，所以他几十年革命不能成功。他吃亏的地方便是因为他太好了，太仁慈。他实在是大量、仁慈，无论什么人他都容易相信，所以有许多人把他当招牌用，去图谋自己的利益，而他自己上了人家的当。譬如他本来是反对临时约法的（主张军政、训政），后来被人利用着去闹了几年护法，便是一例。再则，他以前不很注意宣传，也是失败原因之一。他完全是一个东方伟人的模型。不过这些小事不足为他的大毛病，他仍旧不失是一个革命领袖，因为他勇于改革，见到应做的，马上便做，见到应改的，马上便改。因为他能用革命手段改正他自己的错误，他要用革命手段达到他自己的理想，所以他不失为一个革命领袖。

三、戴季陶主义

要说戴季陶主义，亦须说到他的生活情形。他是一个爱读书而且读书很多的人，他无论什么书都读过一点，同时他是富于情感的。但是他缺少革命进取的精神，他胆小懦弱，有了一点纠纷麻烦，他便跑回湖州去。他很容易受刺激，他一时热心，过一下便灰了心，在他热心的时候，听得几句冷言冷语，他又灰心跑回去了。他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里，把右派的糊涂说得很明白，但是他没有和左派奋斗的决心，把右派赶出去。他说在民国二三年他就想叫国民党起来提倡白话文，若国民党听了他的话，那里有陈独秀、胡适之出风头的机会？但是他却不能在民国三年的时候象胡适之、陈独秀努力的一样促他的主张实现。我们恭维他一点，可以说他是一个道理很明白的人，然而因为胆子小了，有时感情作用太强，所以便有些道理也有不能很明白的时

候。他对孙先生很佩服的，而且他很想做孙先生学说的传布者，可是他有许多地方因为胆子小了，所以便不能彻底明了孙先生的主义。中山主义有两面：(一)是平等的思想；(二)是革命的精神。戴季陶先生因为革命的精神差一些，所以连平等的思想也不能看得完全正确了。他的坏处，他的受人反对完全在此。丢了革命的精神，平等的思想，就是空想；所以我们不能不反对他。戴先生的学说，本来大半是本于孙先生的，不过有四点可以说是他独创：

第一点是限制党员以最高原则。所谓最高原则，就不许别人再比孙先生进一步。他的意思：退一步固然不可，进一步也是不能够。这种办法，把孙先生的书看成了宗教经典；就是孙先生活着他自己也不会这样呆滞限定自己不许前进。假若孙先生书上所没有的话就不能做，这不是从前定孔子为一尊一样的么？我们亦可以说最高原则是承认的，但是所谓最高原则只能指孙先生的平等思想、革命精神，不能很具体的列举出来。孙先生没有叫人划定了一个地方不许再前进。而且我们因为孙中山先生的话是救中国的，我们要救中国，所以信孙先生主义，我们不是信宗教。所以象戴先生这样要限制党员以最高原则的办法是不好的，这是违反孙先生的进取精神。

第二点是专发挥仁慈感化之说。孙先生虽有时也说几句仁爱的话，但是不象戴先生那样专门发挥仁爱感化之说。他这样的做，是抛了革命精神而把孙先生弄成菩萨一样。人家问戴先生：“若地主资本家不受感化，不讲仁爱，则怎样呢？”他便被人家问倒。因为他不预备用革命手段打倒那个压迫人的阶级，所以若是有一阶级压迫别一阶级，他就没有办法了。国民党若只知

发挥仁爱感化的话而反对罢工及农民的减租暴动，将失却农工的同情。这是与革命的意义完全悖谬的。

第三点是借人口问题为侵略主义的基础。他以为世界上经济问题解决了，还不能算安稳，因为人口问题没有解决。因而他说马克思不对，只有孙先生的主义可以解决人口问题。但是孙先生虽说了许多人口发展不发展的话，没有一句提到人口问题的方法。戴季陶却说帝国主义的发达，是由于人口问题不能解决，而不是由于经济问题不能解决。他这种理论，就太可笑了。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很少是为的人口问题，试看外国人在中国的很少，然而他们要陷中国于次殖民地；这不明明可以知道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由于经济问题而不是由于人口问题么？他既认帝国主义的产生一半是由于人口问题，而他所谓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却是要使中国人的血统普及世界，这不是解决人口问题，只是要中国将来强盛之时借这句蕃殖人口的话而变成帝国主义。他只说怎样发达中国的人口，他没有说怎样解决人口问题，使中国不成功一个帝国主义。这明明是给中国将来侵略压迫其他民族的一个借口。这借人口问题而为帝国主义的起点是违反民族平等道理的，所以亦就是不仁的。

第四点是不愿与中国及世界的共产党及苏俄联合。他虽然因为政策的关系不敢明目张胆的反对联俄，但是他对于中外的共产党都是有些怕的。在他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上，实在看不出是为什么要怕共产党的理由。他一面说共产党是高尚勇敢的，一面又说共产党弄坏了国民党，挑拨党里的恶感。试问商团事件及刘杨事件是不是共产党挑出来的呢？广州那一件事是共产党弄坏或挑拨出来的呢？就令他书上所举的例，

有二三个例是真实的，国民党内共产党有少数人做了不对的事；是不是非共产党便没有这一类的事情呢？孙先生曾说，个人的不好，不好便说这共产党的不好的，我们应该看在革命运动中应该不应该联合共产党，不能说共产党中某一个人不好就不去联合他。他以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使国民党内部常常的闹；假如去年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冯自由、马素及同志俱乐部的人物都在党里，这样好不好呢？假令今天共产派退了出去，邹鲁和汪精卫先生是不是便不大闹了呢？共产党出去了，国民党太平了，但是若因为太平又还了从前的原形，那都是大失了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本意了。右派糊涂，戴先生早便应当将他们闹出去，自己不闹，要等到共产党员来闹，已经很不应该了；现在反怪共产党员闹得不好，难道一定要叫汪精卫、戴季陶诸先生和冯自由、邹鲁等反革命党永远和和气气过几十年才好么？全国的青年希望国民党成功一个革命的党，广州成功革命的中心，但国民党自己怕改良，说右派糊涂自己亦不去打，别人去打了，倒说打的人应该出去，有这样的道理么？共产党加入了，每一件事他们都上前，结果国民党信用大大的进步，然而国民党的人偏要将一切好事归给共产党，反因为这样不愿与共产党合作。这是违反孙先生政策的，而且亦是不勇。

这四点都是戴先生所独创的，他何以会有这样四点呢？完全因为他的胆小，怕奋斗，心里虽明白，而怕去干，因之他常在消极的方面说话。而且总要避免革命。为了这样，他这四点所以差不多完全是反革命的。

四、戴季陶主义的必然结果

戴季陶主义的结果，第一是使中山主义改良化宗教化。他常说平等、王道、公理及消灭阶级，然而没有革命精神，这一切都是徒托空言，永远不会成功的。孔子感化别人，到现在二三千年，还没有成效；戴先生怕革命，把孙先生比做孔子，所以亦便把孙先生平等思想化为空想，同孔子的学说一样了。而且戴先生学说的弊病还会使中山主义完全被反动派利用。反动派有时可以引用他几句话来抵制革命的人。现在所谓戴季陶派，讲反共产以及一切反革命的话，都欺骗人家说是根据戴先生的意思，他们亦说几句好的话，然这不过是一种敷衍手段而已。反动派这样利用他，他也没有勇气出来否认，因此他只有两条路：(一)是因感情作用投入反动派；(二)是不问不闻的躲回湖州去。现在的事实就是这样的。他先为了呕气不管合法与否和他们(反动派)去开西山会议，后来一看事情不对就跑回湖州去了。但他对北京一切的事情，终究不敢表示意见。他的话一定还有很多时间给反动派所利用，而妨碍革命！

现在我们可以做一结论：

没有平等思想的，不配称中山主义的信徒；所以一切资本主义者国家主义者走开！

没有革命精神的，不配称中山主义的信徒；所以一切戴季陶主义者走开！

载《中山主义》周刊第2期　上海大学中山主义研究会出版恽代英讲　秦邦宪记

怎样可以加入C.Y.

——答复一个表示愿加入C.Y.的国民党员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C.Y.事，《中国青年》中屡述及，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之缩称也。他的分子因为比较勇敢，他内部比较纪律严而有训练，所以在各地颇能切实做些领导革命运动的工作。C.Y.的分子，在今天都极努力于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但他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特别注意宣传组织工人、农民（自然他们并不是不过问其他阶级的分子，他们在其他阶级分子中，比较多努力于学生运动），而且他们决定为工人、农民的利益奋斗到底。他们认定在革命运动中，必须同时努力于阶级斗争的工作，非发达农工阶级的势力，决不能在革命以后保障农工阶级的权利。他们认定国民革命以后，必须做到农工专政，非农工阶级自己握取政权，决不能禁止资本家的产生与跋扈。所以只有确然愿为农工阶级奋斗到底，完全站在农工阶级方面，愿献身在他们中间做宣传组织工作，或其他可以促成农工专政的革命工作，且服从团体的纪律与接受其训练的，方是真正的 C.Y.分子。所以你必须认清 C.Y.不仅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分子，他还是一个布尔塞维

克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你若不过只愿做一个国民革命的斗士，你尽可以不加入 C.Y.；你若只希望做一个真正的国民革命分子，国民党员每个人都应当是这种分子（不然，便只是冒牌的国民党员，便应当从国民党中间赶出去）。你若不仅愿做真正的国民革命分子，而且很坚决愿做无产阶级革命的斗士，你便可以加入 C.Y.；国民党因为并不一定主张阶级斗争与农工专政，所以有这种主张的党员，有加入 C.Y.的理由。同时，国民党并不反对他的党员相信阶级斗争与农工专政（醒狮派与那些冒牌的所谓右派才是反对阶级斗争与农工专政的）。所以国民党中可以容纳 C.Y.分子，国民党亦不能把有这种主张的而加入C.Y.的党员，当做违反纪律或叛党看待。

载《中国青年》第 106 期

署名：F.M.

农民中的宣传组织工作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又要到寒假的期间了！在这个时候，又要有无数热心的青年分散到各县各乡村中间去，这是我们进行农民运动的好机会。但是农民运动实在是一个困难的事情，怎样去进行这个运动，是很多人都没有甚么把握的。

我现在贡献出来我对于农民中宣传组织工作的意见，我以为或者可以供大家一个比较切实的参考。

关于农民的宣传工作，我以为应分三方面说，第一是政治方面，第二是经济方面，第三是文化方面；这三方面的宣传，是不应当以同一的态度，同一的方法去进行的。

政治方面的宣传，若是用描述故事的态度为农民解说各种世界以及中国的大事，他们是很愿意听的。自然最好是对他们说本省的事，本县的事；但是你若在世界以及中国各种事变中间能择其最精采动人的说与他们，例如五卅运动之起原及各地发生之影响，孙传芳起兵一直到郭松龄倒戈以后之一切事实与其内幕，这些一定是农民喜听的材料。我们能有人将时事预先编成比较长篇的小说，以为宣传之根据最好，此等小说宜注意除捉住每件事的主要部分以外，要多搜集有味的琐事，以鼓励听众的兴趣。如能将政治上各种事实编成歌曲、弹词、剧本自然更好。

总之，政治方面的宣传，除了过于枯燥无味的材料以外，农民是易于接受的；在叙述一件事情的中间，剖述帝国主义残暴压迫，官商绅董名流学者之不足恃，与人民团结活动之有力量，亦很容易使农民知道怎样才可以救中国与救他们自己。而且农民能多受政治的宣传，他自然比较能了解世界及中国的大势，政治觉悟的程度自然提高了，这又使他们将来容易接受我们其他的宣传。

经济方面的宣传，是要熟悉农村生活的实际情形，并能洞晰各种农民生活上疾苦之来源及其救济方法，就各个实际问题剖析指示一般农民；这种宣传，是比政治的宣传，更容易打动农民的心坎，而引起他们的实际行动的；亦正因为如此，这种宣传比政治宣传易于遭官府、地主、劣绅、痞棍等所嫉恶。这种宣传要想做得合当，须注意调查农民生活，农村地方状况，并须注意有关于财政经济上的各种常识。例如我们要从农民每年收入方面说起，便要指出水、旱、虫灾如何使他们收入减少，告诉他们只有讲求农田水利可以避免水旱虫灾；同时亦要指出农民资本、土地之缺乏如何使他们不能尽力耕耘，告诉他们只有设立贫农借贷或补助制度可以解决此等困难；同时亦要指出行商之剥削如何使他们的农产物不能得着合当的市价，告诉他们只有办理合作社可以抵制这种行商。我们要从农民每年支出方面说起，便要指出税捐及其他非法勒索如何使他们负担加重，告诉他们只有改良政治与租税制度可以救济这种弊病；同时亦要指出厘金、盐税与奸商抬高物价，军阀紊乱币制，如何使生活程度增高，告诉他们只有废除苛税，改良币制，取缔奸商，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以上所述，我们还应告诉农民，一县或一村租税之收入与公家产业之收入若干，学田、积谷仓、善社等公共机关之收入若干，由

山林川泽之经营与富农租税之切实增收，可以加增收入若干，取销赔款外债与打倒军阀裁兵之后，可以不解省与中央之款若干，严格取缔官吏劣绅把持私饱或浪费，可以节省之款若干，如此则有一篇清清楚楚账簿摆在农民面前，都可以知道讲水利，设农民银行，办合作社，乃至其他一切公益事项，均系确有的款可能的事情。我们能从农民本身生活说起，而又能与以切实解决的方法，便可以引导他们为此加入革命的战线。在这种宣传之先，最好多与农民谈话，就他们谈论中所说出的痛苦综述之而指示其解决之方法。用与农民谈话中间所搜集的为宣传的材料，农民才感觉亲切有趣。若有合当的材料，用以为公开之讲演，效果一定是很大的。即或为事实关系，须采用比较秘密宣传之方法，亦会有很显著的功效。

文化方面的宣传，如反对旧风俗习惯礼教迷信等，这差不多都是农民逆耳之言，是不象政治、经济的宣传易于受他们的欢迎的。只有反对基督教运动在乡村中易于进行，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事情。但我们若能够指明其他风俗习惯礼教迷信中各种不合理或可笑的地方，或者能够指明社会上各种受此等风俗习惯礼教迷信的弊害的地方，亦还是可以动农民之观听的。此等宣传，言辞态度须不至惹起农民重大的反感，最好是用新剧表演，形容其滑稽荒谬。直接破除旧风俗习惯礼教迷信之行动，最易惹乡村中农民之误会，我们须斟酌情势不可孟浪为之。不过我们应当预备这种行动，我们应当在乡村中多作此种宣传，结合此等同志，若能因一种实际行动而更扩大我们的宣传，获得更多的同志，我们自然可以采取一种行动。我们应当知道，这是与自己毫无准备，而孟浪采取一种行动，结果自己失败被逐出乡村，以后

乡村中永被黑暗势力笼罩着的，绝不相同的。

农民的组织，自然是要组织可以为农民群众作经济争斗的农民协会，农民协会是被压迫的中农、小农、佃农、雇农的组织，地主是不得参预的。农民协会以村为单位，会员能开大会或分组开会，宜尽力使多开会，每次开会即可预备合当的宣传材料，使多受训练。农民协会在最初是不能希望全村被压迫农民全体加入的，但有少数农民加入即当进行组织，在不能公开组织之地方应秘密组织之。全体农民群众大会是不好轻易召集的，若能召集群众大会，须即刻注意组织，使有多数比较明瞭而能受指挥之进步的农民能负领导的责任；不然，便容易发生无意义之暴动。农民的暴动是不应当避免的，惟每个暴动应当多少有准备的在我们指导之下发展，然后才可以相机领导群众前进或后退，以战胜一切压迫农民的人，这与乌合之众盲目的暴动不同。为要预备农民的暴动，发展革命的组织于农村中间，这是必要的。革命的组织，应当吸收一般富于革命性的农民，与以比较严格的训练教育，使成为农民运动之骨干；只有这种骨干有力量，农民群众才成了有节制的革命军队。

载《中国青年》第106期

署名：代英

致柳亚子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亚子先生：

现季陶、楚伧① 等以怯懦褊狭的心理，竟至不惜与一般失意无聊之政客为缘，在北京聚会，对广州中央机关为非常之处置。沪上一部分青年同志惑于叶、戴虚名及《民国日报》之态度，且间因私嫌与忌妒附和其所为，党中骎骎有破裂之势。广州近来之所措施：军令严明，政局澄清，苛税虐政一举而扫除净尽。农工民众之觉悟与组织能力均显非中国他处所能。睹此真三民主义之政府，而为中国前途唯一有希望之地也。乃一般悍将贪官及依附彼等之政客既不能安于其位，不自反省以前借中山先生之名在广州所造种种罪孽，反不满于汪、蒋之“操切排挤”，甚至谓此完全为俄人或共党之谋。吾人但能诚意遵行三民主义，对于一切为革命障碍、为人民蠹害者，当然去恶唯恐不尽，无所谓“操切排挤”。但观广州已往情形与现今情形，吾人无论如何不能不钦敬汪、蒋诸先生之努力。彼至今只认此等行为为个人恩怨者，徒见其始终不知主义为何物耳。至云俄人或共党所为，尤系不自重之语。岂无俄人与共党，广州即应永远如以前一塌糊涂，国

① 即戴季陶、叶楚伧。

民党即决不至有自动革新之事耶！今广东国民党统治各地，党中最要之工作在宣传一切民众，使知为自己利益奋斗；组织一切民众，使能为自己利益奋斗。俄人与共党无非助我辈作此工作。若民众既知且能为自己利益奋斗，岂虑彼等能欺罔压迫民众？国民党若不愿自己欺罔压迫民众，又何至以俄人与共党所为介介于心耶！总之，吾人今日为中国，为四万万人利益，相信广州政府确能代表三民主义而奋斗，确符合全国革命同志之愿望。季陶等自己不在革命的前线上奋斗，反躬亲导率反革命势力掀起党内大波，诚所不解者也。预料此辈政客各有所利，与季陶等亦决难合作。北京之会至多能对广州中央发数通捣乱之电文，结果终当如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烟消云散。惟际此时，群情摇动，受惑者愈多，则革命之前途愈受损失。迩来，代英等尽力与彼等为思想上之奋斗，惟以色彩较浓，而与党关系较浅，故效力尚有限。因思先生素与党中各种进步趋势极表赞同，而先生声名不但为同志所钦仰且可影响于一般舆论，故甚望在此时机能发公正之谠论，以壮我声势。能从速撰成意见书见寄，当印发诸同志。此事关系党国甚重，故敢以不情之请相冒渎也。顺颂

大安

恽代英

据手稿影印件排印

真正三民主义

（一九二五年）

我们站在总理一边呢？
还是站在违叛总理的人们一边呢？

国民党自从改组以来，经过了几次的分化，现在似乎又到了一个分化的时期了。

每一次分化的时期，总有许多人自称为“真正的国民党员”，他们提出“反共产”一个空洞的口号，排斥一切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同志。然而这些“真正的国民党员”现在做甚么去了呢？被段祺瑞收买了（如彭养光、冯自由等），甚至于被齐燮元收买了（如凌钺），与广东国民政府完全站在反对地位了（如杨希闵、刘震寰、邹鲁等）！这种“真正的国民党员”，与陈炯明、洪兆麟等之“真正的国民党员”有甚么两样？

现在又有一句口号，是说他们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他们说这句话，便表示要请那些在他们认为不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的人（共产党，或者是与他们意见不相合的国民党员）滚出去的意思。当真他们配得上“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吗？哼！我敢说他们中间许多人连一民主义亦还配不上，自己不研究“真正的”三民主义，而且怕人家宣传“真正的”三民主义，却偏要诬蔑总理的三民主义，拿来做他们排斥异己的武器，若此辈同志得

逞，总理真要死不瞑目啊！

甚么人才配得上称为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呢？一定要无论如何艰难危险敢与帝国主义相奋斗（民族主义）；同时，一定要打倒军阀为全体人民争回政权，不许政权落于资产阶级少数人之手（民权主义）；同时，一定要有很切实有效的方法，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不许在中国有资本家地主压迫工人农民的事（民生主义）。现在，谈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工作，这些自命为“真正三民主义”的党员已经不免惭愧了。谈到“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他们怕说出这八个字来了，教资本家、地主不高兴，于是总要随便的混过去，再不然，亦决不肯切实想点办法，来谋如何实现这个主张，对于眼前中国已经有了的资本家地主压迫工人农民的事，闭着眼睛置之不问不议之列。这种人配得上称为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吗？他们只是有意作践三民主义，有意作践我们的总理与我们的国民党罢了！

他们很巧妙的诬赖一切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都是共产党人，他们说这些人都不是纯粹的国民党人，国民党人不应当超出三民主义以外，不应当不专心一意的做国民革命的工作，在中国今天便打算怎样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些甚么话呢？他们一定要每个国民党员象他们一样。究竟他们亦知道我们的总理与他们相差好远呢？他们究竟懂不懂三民主义？究竟要不要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如何说出这些根本与总理的主张矛盾冲突的话来？

甚么人才配得上称为纯粹的国民党人呢？一定要真正能相信革命的三民主义，一定要不是口是心非的党员，而且亦一定不是甚么二民主义、一民主义的党员。甚么主义超出了三民主义

以外呢？共产主义么？他们不曾听见总理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可以包括共产主义么？为甚么国民党员便一定只许专心一意的做国民革命的工作？所谓国民革命是指的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是指的破坏一方面，这不过是三民主义的一部分罢了！国民党人的责任，是要用国民革命的手段，来实现三民主义——便是要国内一切民族平等自由，贫苦农工都得一律享受政权，而且用国家的权力使资本家、地主不得发生，以引导中国到共产主义的路上去。不能相信象这样做的人，如何配得上称为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如何配得上称为一个国民党员？中国今天自然不能实行共产主义，为甚么今天便不应当“打算”使中国将来如何以实现共产主义呢？总理明明说了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总理提倡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无非是要引中国进于共产主义的社会，为甚么说在今天不专心一意的做国民革命的工作，打算怎样实现共产主义，便是超出了三民主义范围以外，便不是纯粹的国民党员呢？我们总理的主张，亦超出了三民主义范围以外了么？我们总理亦不是纯粹的国民党员么？

他们还有一句巧话，便是他们自称为正统派。甚么叫正统派呢？甚么人比我们总理还要正统些呢？甚么人比跟着总理数十年的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诸先生还要正统些呢？（报载胡先生密函劝北京老党员私自组织，此函定系捏造，胡先生去粤，以部下有刺廖嫌疑，且与许崇智先生部下之冲突为最大原因，与汪先生、蒋先生并无芥蒂也。）总理的书犹在，汪先生指斥这种所谓“正统派”不遗余力，廖先生甚至被这种“真正国民党员”所刺死，胡先生在党部亦素为这般“真正国民党员”所唧根。究竟从甚么地方来的一个“正统派”，是一个真正的甚么国民党员呢？

不错！每个国民党员要做一个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信徒，一定为实现完完全全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决不应怕说民生主义，决不应怕说国民革命是为要做到国内民族平等自由，穷苦农工享受政权，资本家、地主不得发生；决不应怕说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是为要中国成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倘若不能这样，那便只能证明他们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他们违叛了总理，违叛了国民党，象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违叛了总理，违叛了国民党一样。

同志们！总理所以改组国民党的原因，便是要党员切实遵行三民主义——公道、切实而能救中国的三民主义，要不肯遵行三民主义的人站开。但许多人既不遵行三民主义，偏偏又要糟蹋这一块三民主义的招牌，与一般真正要遵行三民主义的党员捣乱，活活把总理气死。现在！又来了！他们自己又要自称为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来与真正要遵行三民主义的党员捣乱了！同志们！我们站在总理一边呢？还是站在违叛总理的人们一边呢？

载《三民主义之研究》 1927年1月出版

署名：代英

秀才造反论

（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为甚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呢？

因为他们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性的智识分子，他们怯懦、狡猾，或富于领袖欲、忌妒心。若专靠他们去进行革命事业，革命事业每每是被他们的互相猜疑、倾轧、好奇立异所牺牲破坏的。所以我们主张革命的主要力量应属于农工阶级；智识分子参加革命事业，应当极力抛弃其小资产阶级性，极力求自身的无产阶级化。

若是专靠秀才们去进行革命事业，一定会发生下列的弊病！

（一）他们空话多而实际行动少。读书的先生们都是会说大话的超等名角，他们平常在文字语言之间，甚么"肝脑涂地"、"热血无处洒"等象煞有介事的话头，是最说得响亮的。不过到了甚么实际行动，到了要与反动势力直接搏斗，亦许要中流弹，挨拳头，或别样丧失面子的事情，他们便退缩不前了。他们最巧妙脱卸责任的话，便是"我们认为我们这种（宣传教育）工作还未十分做到，所以不可操切，不可妄动，以徒苦我国民。"（见《醒狮》六十二号）这种话便是一般腐败校长、教职员禁止学生做爱国运动时说的，亦便是一

般腐败官僚禁止人民做爱国运动时说的，亦便是一般虚伪的国家主义者自己不实际参加爱国运动时说的。因为他们都是秀才，所以都是这样一鼻孔出气。

（二）他们有时能有一点浪漫的行动，然而很不容易有纪律的行动。秀才还是有些富于感情作用的，他们有时看见坏事就会暴躁如雷，要用手枪炸弹对付敌人（《学生杂志》中幼稚的作者与李璜博士都有这种论调，虽然没有那个有胆量自己去干）；但是，这完全是五分钟的冲动，想到甚么便说到甚么做得甚么的。倘若我们指出他们这种办法于事没有实益，劝他们要加入有纪律的革命党，象军队一样的努力革命事业，他们便要拱手说："你们诸位的热心与你们贵党的宗旨，是我很佩服的，不过我吃不来你们那样严格的纪律，而且还有我的'个性'以及我的甚么甚么的关系，我只好站在党外同你们一块儿做事。"自然这是最诚朴无欺的秀才才说话这样老实；若是狡猾一点的，他还不肯说他自己吃不来纪律，他要想出许多别的花头，做他不入党的借口，例如说："你们是很好的，但是你们党里还有些分子（亦许一万人中只有一个）品行很不好"；或者说，"我很赞成你们的主张，不过人家说你们拿了俄国的金卢布，而且俄国人占据了外蒙与广州（自然这位先生只生了两只耳朵听谣言，他的眼睛生来便是不管事的）。"他们说了这些话，于是便自觉很有理由的不加入一个革命党，一点亦不觉有甚么惭愧了。

（三）他们有时也做一点不大得罪人的事情，若是要得罪许多人来干甚么革命事业，他们便不愿干，因此他们便造作许多理由，而努力造成革命运动中右派的思想。前几年过

激派提倡打倒帝国主义的思想，他们除了在洋行、外国工厂、官署做事的人以外，本来乐得赞成的；然而他们还是不敢公然表示态度，生怕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要为难他们，所以只是站在旁边看这些不知死活的过激派为中国撞一条出路。那时候"风起云涌的国家主义团体"还不曾听见一点声响，"醒狮"亦还不曾睁开乳眼，那时"醒狮"纵然真正醒了过来都要假马儿闭上眼睛，装作还在睡的样子，所以左舜生君在《前锋》上做了一篇骂留美学生的文都要署个 TSO 的假名。等到打倒帝国主义的声浪唱高了，于是"醒狮"亦醒了，国家主义团体亦"风起云涌"起来了，懿欤休哉，据说共产党一向还是跟着"醒狮"跑的；若不是"醒狮"在民国十三年双十节出了世，共产党在民国十一二年还没有人引他走路呢！但是虽然这样"懿欤休哉"，他们的胆小怕得罪人的天性，仍然与从前一样的。他们现在虽然亦讲甚么"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然而离帝国主义军阀远远的站着，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为帝国主义、军阀们"小骂大帮忙"。至是国内学者名流造了甚么罪恶，本国地主、资本家有甚么压迫人家的事，他们以为最好是不要提起。他们本来不敢反抗帝国主义，然而有一天拿着了反抗帝国主义这一句话，居然又用以为掩饰他们不敢反抗国内特权阶级的借口。他们说，要反对学者名流是减轻对外力量，要反对地主、资本家是挑拨阶级恶感——无论有何正当而且必要的理由。他们明明看见上海总商会不肯与工、商、学界合作，但他们相信工、商、学界应与总商会取一致的态度；他们明明看见上海资本家用各种方法欺骗压迫工人（如不履行罢工条约及其他虐待），但他

们相信工人应当与资本家协调。有了一句反抗帝国主义的话，于是本国特权阶级大可以无恶不作，横竖有《现代评论》、《醒狮》等爱国之士为他们保镖，替他们骂那些反抗他们的人。本来这些秀才亦有他们的苦衷，他们都是穿长衫的，而且是体面的世家的子弟，一般学者名流、资本家、地主或是他们的亲戚长辈，或多少与他们有些关系，有时他们自己的生活还要倚靠这一般人。他们如何敢惹到这一般人身上来呢？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一般人造了许多罪恶，而且甚至于明明知道这一般人是不革命而且妨害革命运动的，但他们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做些眼泪鼻涕满纸的劝世文，希望这一般人讲一点"仁慈"，受一点"感化"，让他们好借此有一点理由禁止人家反抗这一般人（如戴季陶、陈畏垒、李璜卿等）；还有一个办法，是不问三七二十一把那反抗这些一般人的人，硬咬他们是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或者还想些甚么可以吓糊涂人的罪名加在他们的头上，以免他们的思想传播得滋蔓难图（如"醒狮"诸君）。他们这种做法，在我们看起来，明明是为了要保障一般不革命而且妨害革命运动的人的利益，损害一般需要反抗帝国主义的农工的组织力与觉悟程度，但他们可以完全不问这些事。因为他们本不象共产党一样不知死活的一定要反抗帝国主义，他们本可以不反抗帝国主义的。要是他们能压倒农工阶级的兴起，或者甚至能打倒这些努力得使他们于相形之下很难堪的共产党，那时帮着帝国主义恢复巩固了在中国的势力，"醒狮"还是可以再去睡一觉的，风起云涌的国家主义团体还是可以不"风起云涌"的，至于戴季陶先生更可以发表一篇脱卸

一切责任的宣言，躲在湖州去养病著书。梁启超等象这样帮助了袁世凯、段祺瑞几多次，他们每次于国民党势力强盛时，便去帮北洋军阀“即位”；以后，梁启超等便又登启事去著书讲学了。秀才们口里说革命，实际是帮助反动势力，研究系等秀才是这样的；戴季陶派、好人政府派、国家主义派等秀才，亦是这样的。

（四）他们在革命运动高潮之下，既不敢象革命的左派那样猛进，又不愿受左派之指导，他们为要妨害左派势力的发展，而且为自己要做领袖“不受人家利用”，便曾用种种方法做成与左派相争的右派势力。所以现在醒狮派啊！独立青年党啊！社会民主党啊！新社会民主党啊！西山会议所“本店制造”的中国国民党啊！一定还有的，还要“风起云涌”的，无论有党员没有党员，这些党是要一天天多起来的。但是造得成一个甚么革命的右派吗？不可能的。他们不但不愿受左派指导怕受左派“利用”，他们彼此之间，亦不愿受指导而怕他人“利用”，所以他们是很不容易统一的。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便是讨厌忌妒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但这不能使他们归于一致。他们各人都相信只有自己配领导别人，或者更说爽快些，只有自己配“利用”别人，所以他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与权利关系。他们可以因为忌妒共产党而来想个甚么花头，自己组织一个党派，但是他们这个党派很不容易组织起来。有的人做出高不可攀的样子，希望组织党派的时候，他一定可以做一总理；但有些人采取了他的主义的名目，却标出许多小小不同的意见，先自己创一小派，去尝尝中央执行委员的滋味去了。有的人做出鞠躬尽瘁的

样子，希望组织党派的时候，他一定可以得一个月薪若干元的位置；但一天只要位置分赃不匀，便去借一句甚么理由，登报脱离关系了。而且这些秀才先生们不但自己要得位置地位，他们各人还要扶植各人的党羽，便在同一党内，都要使自己有一派势力，可以压倒别派。所以他们在组党以后，还是要大家钩心斗角的在党部以内安置自己的人，扩张自己的势力，于是引起彼此间的互相猜忌，又拿出甚么理由，发生出党的分化。秀才先生们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性格本来天生便是这样，还要以为这些互相猜忌是甚么人在中间挑拨离间所使然，真是笑话极了。这种党的分化，不一定不是好事，有时亦可以分出一派左倾的人，能够注意接近取得农民、工人的力量，以建筑革命势力的真实基础。不过又另有一派可怜的秀才，象戴季陶先生等，既不敢自居右派，又无力打击右派，而同时又不愿到左派中间去，于是造出不左不右的学说来。结果呢！左派是反对这种话的，右派却拿这来用为攻击左派的材料，尽量利用以求达他们自己的目的。若是这个秀才想要出来申明他的本意呢，右派却不象左派对他们文明，他们赳赳武夫，最出色的行头是打架绑票，真是“秀才遇了兵，有理讲不清”啊！戴季陶派！咳！可怜！不过是反革命派的玩具罢了，被人家强奸了还不敢哼一声呢！这样的一些秀才先生们，造起反来便三十年亦不会成功的，岂但三年不成？

秀才先生是会说的，尤其是会“造”理论的，若是把革命事业专靠他们，越说得多便越做得少，理论越多派别越纷歧（实际还是派别越纷歧，所以理论越多，因为理论是因为要分派别才造出

来的)；这样下去是永远不能成功革命的。所以我们反对“士大夫救国论”，相信只有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各阶级从事国民革命。

载《中国青年》第109期
署名：代英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今天是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的日子，我本无话可讲，因为所有的好话，都给各位同志说完了。但是由今天的情形回想到第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时候，我想不但我们同志承认，而且凡中国国民也都承认，我们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永远纪念价值的一个大会。因为现在中国国民党的发达，已比前不同了，全国革命的运动，比前进步得多了，这都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绩，都是因为第一次大会以后同志们受总理的指导，决定了种种方策而能够努力工作的成绩。现在在这里的同志，应该想到要这回第二次大会象第一次大会一样的有价值，一样的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永远纪念的价值。

要想使第二次大会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纪念的价值，我们就要怎么样呢？要说的话很多，现在单说两件事：

（一）第二次大会以后，我们的党要变成一个更有力量的党。我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要变成一个更有力量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也要变成一个更有力量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虽然是好，但仍有许多缺点。最易见的还是缺乏森严的纪律。两年以来党中发现不少明白违背党的纪律的分

子，中央执行委员会毫无办法去制裁他们。这就表明我们第一届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实在太没有力量，表明我们第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也太没有力量。大家都知道我们议决了很多的议案，不是要说空话，是要实行的。怎么样才能够实行呢？就要靠大家同志回到各地以后，把这种议案，告诉给一切党员知道，训练他们，使他们每人都能够为这种决议案去奋斗。现在本党的内面、外面，都有许多人想妨害我们的决议案，我们同志应当加倍努力，要使第二次大会以后，本党比以往的两年更有力量，把应该做的事情，一一实现出来，不许甚么人能妨害我们。已往的我们不谈了，因为虽不很好也不很坏。我们只是要本党以后更好。因为中国革命是很需要一个更有力量的党，很需要一个真实能够有严整的纪律、而能实践各种决议案为民众利益奋斗的革命党。

（二）第二次大会以后，我们同志要更加认清楚本党的主义。两年以来最妨害本党的进展的就是什么主义之争。比方有些人常说那班人是共产党员，那班人是纯粹国民党员。这种分门别户的办法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只有使党员之间生出很大的隔阂。有那些存心破坏的人，说什么我们只要三民主义，我们要反共产。但究竟三民主义是什么东西，他们那里懂得。很简单的说，讲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一定是反对帝国主义，一定是反对军阀，一定是要为平民——尤其是大多数的农工的利益奋斗，必如此乃可以言国民党，不如此者决不配称做国民党。也有许多人见我说这话，又说我这是宣传共产主义了。不错，共产主义者或者亦要宣传这种道理，但我要反问三民主义者就要反对这种道理吗？

在这几天开会之时，最高兴的就是我们的党，不特不因孙先

生的死而涣散，反转而更加团结；不特不因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反对而分散，反转更有精神更有力量。从此以后，我们一定会见着本党一天一天的更加进步，三民主义也一天一天的更加明白，为一切被压迫的人们所了解所信仰。最可怜也可笑的，是许多现在或者已经脱党的人，他们不知自己的主义是什么，天天说这个是共产党那个是共产党。稍有一点意见和他不同，他马上就要说你共产党。一般老同志，常常说国民党如此下去，快就要亡党了，党给人家夺去了，如西山会议这班人，就是此种思想之代表。他们对于这回第二次大会的心理，就是说："在广东开会的党员通通都是赤化的。国民党在这一回一定给共产党拿去了。"但我问问各位同志，你们都是已经赤化了么？究竟党有给共产党拿去了没有？实实在在的说，本党虽创立十多年，一直到现在才真实能为三民主义而奋斗，才真实是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党。他们说亡党，不错。冯自由、谢持、邹鲁的党确实是已经亡了！至于孙总理的党，不但未亡，而且到现在为全国人民所了解所信仰。什么是孙总理之党，就是信仰而且实行三民主义的党。这个党是没有亡的。亡了冯自由之党，这有甚么可惜呢？我们正在剧烈反对冯自由、谢持、邹鲁的党。我们要每个同志都能够明了要真正为总理的主义来奋斗，那才是真正的国民党。至于有相信冯自由、谢持、邹鲁的主义的人，我们请他走开，我们希望第二次大会以后再没有这等人。各位请看，冯自由跑了，广东便好了，我们要冯自由这等人做甚么呢？他们不是真正忠心于总理、忠心于三民主义、忠心于本党的。今天上午我们把这些人开除了许多，亦只是为这个原因。那末，或者在第三次大会时亦许要把我开除掉。如果我到那时是反对打倒帝国主义、反对打倒军阀、反对为

被压迫的农工奋斗的，我承认我是应当被开除的。不过这一次我在上海是已给他们(西山会议派)开除过了的，他们这种伪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开除，我却不能承认。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开除我的理由，只说我是共产派。但姑无论我是不是共产派，我要请问共产派是违背了民族主义或民权主义或民生主义吗？如果没有违背三民主义，便是一个共产派亦没有被开除的理由。我相信我始终是站在总理的三民主义这一边的（不过绝对不是站在冯自由的甚么主义一边)。如果各位同志发现我真正有违背三民主义的行为，当然可以马上开除我象开除冯自由等一样。

那末我当真是永远忠心于本党的事吗？也不一定。如果本党丢了三民主义，我便要反叛起来，这是没有什么客气的。我的入党是因为想做官吗？想认识某要人吗？我完全是因为国民党能反对帝国主义、军阀，为被压迫农工利益而奋斗所以来的。如果国民党会有一天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军阀勾结，和大多数的农工反对，这是冯自由的国民党，已经不是总理的国民党了；到那时，我一定起来反对，和现在反对上海的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样。

总而言之，各位同志不要管我是不是共产派，只要问我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如果有违背三民主义去做反革命的事情，便马上可以拿去枪毙。如果没有，便不能开除。我的理由在这里说得很明白了，如果你说我是共产派，我这个共产派便是这样主张的。

载《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4月印行

署名：恽代英

为什么产业无产阶级最富于革命性？

（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

我从前听见人家说：产业无产阶级是比任何阶级都富于革命性的，我怀疑这不过是为一种宣传作用的话，实际是不会有这一回事的。产业无产阶级不是一般穷苦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么？他们对于政治经济的学理与各种革命的主义，都不会比别的人容易懂得，他们的道德品行亦不见得比别的人好些，如何能够相信他们比别的阶级的人更富于革命性呢？我有时很怀疑，他们便未必能够比我更富于革命性。

但是我现在懂了！产业无产阶级并不是比我们有更高的学问道德，但他们确实是比任何阶级都富于革命性。有许多比他们有很多很多学问与很好很好品行的人，不都能够有他们这样的革命性。

何以见得呢？

请看"二七"时期京汉全路工人是有如何的一致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有甚么地方、那一种的人可以比得上他们呢？在那一个时候，在汉口、广水、信阳、郑州、卫辉、彰德、石家庄、保定、长辛店等地方，都同时有许多工人与军阀的血战，虽然是失败了，有许多领袖被杀戮拘禁了，这一种革命的精神，永远要被纪念于全

中国人的脑中。甚么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可以比得上他们呢？

我听见在那时努力于工人运动的同志说，京汉路工人运动不过是前一年做起来的，这种运动由长辛店一个平民学校开始，仅仅八个月便唤醒了全路工人，发生了一次全路大罢工的经济斗争，再经过了半年，便筹备成立全路总工会，为与军阀争集会、结社之自由，遂造成"二七"的大流血。我们要唤醒别的人去进行革命的工作，有这样容易发生效力的么？学生亦许是更有知识更预备为国家兴自由与恶势力奋斗的，然而你便教育了几多年，恐怕还没有这样的成效，更无论是手工人、农民，更无论是商人了。

我因此懂得：所以产业无产阶级特别富于革命性的原故，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有学问，或者有道德，只是因为：（第一）他们是一般穷光蛋，因为是穷光蛋所以没有甚么挂念，对于革命事业特别勇敢。（第二）他们是直接受军阀（或中外资本家）压迫，因为是直接受压迫，所以仇人相见分外眼明，敌对的态度很明显。（第三）他们全路工人都是在一个管理机关之下，所受政治、经济的压迫是一致的，因为所受压迫是一致的，所以容易发生同仇敌忾的观念，一致的与压迫势力相反抗。（第四）他们的工作与居处是集中的，每一个地方，或一段地方，常常有几百几千工人，因为许多工人集中于一个地方，再为他们传递消息极其便利，所以容易互相宣传煽动，亦容易互相督促约束，没有散漫的民众比得上他们。（第五）他们在铁路（或工厂、矿山）上做工，占交通（或生产）事业的重要地位，因为所居地位重要，他们容易觉悟自己一种武器有一部分实力，可以与压迫阶级相抵抗。有了这五种原因，产业无产阶级遂成为最容易觉悟的革命势力，遂成为最富于

革命性的阶级力量。

我们革命的同志，请想一想这种道理，再看一看“二七”与“五卅”以前以后各种工人运动的事实，我们要注意这一支埋伏的革命军产业无产阶级，我们一定要与产业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联合，我们的革命势力才伟大，能够必然的获得胜利。工农兵大联合万岁！

载《黄埔潮》半周刊第34期

署名：代英

记与萧淑宇君的谈话*

（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

在一月四日晚上，我接到萧淑宇君元旦日所发一信，他说将近一个月不见我了，论私交不免有些系念，我们之间虽意见有些不同，但在打倒帝国主义的一点上面，还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所以很希望有一个谈话的机会。

这是我喜出望外的事情。萧君原来是在同德医学（现改崇德大学）方面很努力的一个国民党员，他的思想本来亦很左倾，但到五卅以后，可惜因为办事上每不为同志之所满意，于是使他怀疑这是CP的人排斥他，又加以他喜欢结交戴季陶、杨杏佛、孙哲生等“名人”，遂最先接受了戴季陶的“排拒性”的学说，与他的同志发行《国民导报》，大唱其反共产的论调。但是他们这种办法，在戴季陶看起来又太右了，于是戴季陶授意于人家做了一篇痛驳《国民导报》的文字，叶楚伧亦令他们不要再发行这种刊物。自从《国民导报》停止以后，萧君仍能够不懈倦的活动，他虽然有

---

* 《中国青年》记者为刊登此文写了一段按语，全文如下：“记者按：这是代英从广州寄来的一文，代英作此文时，想必没有看见萧淑宇君的启事，萧君的启事中有一句话最妙，他说：‘最后我反问他（代英），你们何以常在《向导》和《中国青年》上替我造谣？恽答这是我们必持的手段。’凡是知道代英或看过代英文章的人，会相信这是代英说的话么？右派的造谣手段真是太笨了。”

时有不满意于戴季陶的地方，但仍根据戴季陶的有些意思在国民党中宣传，他们说他们才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反对他们的都是“反国民革命”的共产党分子，或至少是被共产党利用去了的人。他与他的同志发起孙文主义学会，但报纸上发现的孙文主义学会的宣言，都是一般著名的反动分子孙镜亚、何世桢、周颂西、喻育之等所发起的。在西山会议开会之时，我预料必致闹起党内重大纠纷，他大不以我为然，亲口说这个会议是得了汪精卫的同意的，似乎他的消息格外灵通，西山会议是全体国民党反对CP的样子。在西山会议开会以后，演了一剧戴季陶挨打的喜剧，他们并没有什么表示，不过那时他们还说，CP是要反对的，对于汪精卫先生却是要拥护的。未几，西山会议开除CP分子，解除鲍罗廷职务，这自然是孙文主义学会所认为满意的，接着居然便是开除汪精卫六个月，不许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服务。这时候据说萧君等在孙文主义学会确曾提出不满意于这种决议的意见，不过可惜他们在这时还不明白与反革命的西山会议决裂，结果只致电于西山会议请其暂缓执行此议；而正在这几天，上海《民国日报》中不知那一位戴季陶派，居然解说开除汪精卫的理由头头是道，说什么汪精卫学识浅、骨骼软，接着孙文主义学会亦照着这口气发表了警告汪精卫书，以表示他们与西山会议的一致。据我所知，孙文主义学会自发起以来，对人总是说有戴季陶等在中间主持，萧君等决定一切态度均曾与戴季陶商量过，但就施存统访问戴季陶的结果，戴自谓始终不知有此等事情，即报纸所发表戴季陶致孙文主义学会一书，便令无如元旦日吴铁城谈话中一样有故意改窜的地方，亦很足证明他决无主持孙文主义学会的事情。现在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诸先生的态度一天

天显明了，戴季陶亦申明不与党政了。萧君等的活动力亦似乎低减了，亦许这一场大风波不久可以有一个结束了罢！

我亦很希望与萧君等交换意见，所以我约了他在江苏省党部为两小时左右的谈话，我最初问他孙文主义学会的事情。他说，上海的孙文主义学会，本来是因广东孙文主义学会曾经派人来沪，所以由他纠合其他同志所发起的，但在他们将要宣告成立，前一天便看见孙镜亚、何世桢等的孙文主义学会宣言发表了。据他说，孙镜亚、何世桢等甚为可恶，他们自己并没有会员，却先把这个名义拿去，并放出空气，若有甚么人亦用这个名字，他们将要以法律解决。他原来是不愿与孙镜亚、何世桢等合作的，预备不管三七二十一，仍旧进行组织自己的孙文主义学会，不过孙哲生的意思希望他们总要合为一个组织，所以便合起来了(这一点我亦相信，因为久不办公的国民党青年部秘书何世桢竟会给权柄于萧君，让他主持重组青年党务委员会，以便于他们为反 CP 奔走宣传)。不过，萧君说，在合起来以后，他主张要审查内部分子，用这个法子剔除了许多人(可惜我们并不知道剔除了甚么人！)。所以现在的孙文主义学会是与孙镜亚、何世桢等没有关系的。我问他，现在在环龙路四十四号，所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事的人，还是可以代表你们的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呢？还是有些孙镜亚、何世桢派的分子在内呢？他说，还不至于有孙镜亚、何世桢的分子在内，不过只是有一个周颂西，这是叶楚伧所极力主持要安置在内部的。他对于现在在四十四号做事的人的批评，以为不免重形式而少实行的精神，据我所知，他现在四十四号所谓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事，大概不免有些郁郁不得志罢！从前为了孙文主义学会最努力奔走的葛建时、李宣誉，

现在且登报退出了呢!

我告诉他,我们十分希望大家要仔细考虑一番,这种分裂是于我们有不好的影响的。第一个坏影响,是你们虽说不是孙镜亚、何世桢这一流人,然而你们的活动,给了他们不少的帮助。你们试平心静气的想一想,拥护西山会议的,还是你们所谓戴季陶派的人多呢?还是比你们更远远不如的人多呢?在党外边,因为有我们自己间的冲突,给国家主义派、基督教徒及其他反动的教职员一个活跃的机会,大夏大学、复旦大学都受着这种恶果。第二个坏影响,便是你与一些跟着你们跑的人,中间有好些本来是可以在革命的路上走的,若长此与我们纷争,亦许有一天你们中间有些人要跑去联络国家主义派及其他反动派,走到反革命的路上去。第三个坏影响,便是在我们方面平空多许多麻烦,使我们树敌更多而更形孤立。我相信这样下去是很不利的。萧君对于我这些话,完全同意。

我问萧君你们最近对于国民党的事情有甚么意见。他说,他们现在决定不过问党内的事情,他们对于西山会议自然亦不便完全承认,但对于广州召集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亦认为不合法,若是两方面没有调和的可能,他们对于党务只有暂为置之不问。我说:你们虽说不便完全承认西山会议,事实上你们已经承认了由西山会议所产生的所谓中央执行委员会,你们现在已经把西山会议诸人的势力扶植起来了,现在你们想把自己从他们区别出来,又不肯自己翻转过来攻击他们,却想自己置身事外,专让我们与他们厮斗,这或者有些说不过去罢!萧君叹气说,这亦是没有法子的事,我们现在站在两面受敌的地方,他们已经不满意于我们,而你们共产派又攻击我们,我们若要对付你

们，便无力对付他们，所以只好两方均置之不问。我说，其实你们若肯平心静气看一看事实，你应当知道凡站在我们这边反对你们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共产派。你们将一切反对你们的人都目为共产派，于是朱季恂、柳亚子等都被你们目为共产派而开除了，这只是笑话而已。至于我们攻击你们的理由很简单，你们虽说你们反对左派亦反对右派，但在事实上看来，你们完全是与右派（反动派）合作来对付左派的。我看见你们开除了许多所谓共产派分子，却不曾看见你们开除一个反动派分子，我便不懂未必他们比我们还更有资格做一个国民党员么？萧君亦承认开除反动派分子是应当的，但在事实上确有许多困难，因为便是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分子还有一些是与这些反动派分子有密切关系的（虽然萧君曾经说过在现在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学生分子，是无所谓左右派的）。我说，倘若你们不能战胜你们自己群众中的反动势力，那便无论你们自己怎样分辩说你们不是反动分子，然而你们终要为你们团体所牵制，做出许多反动的事，你自然用不着怪我们要攻击你们了。萧君以为我们笼统的攻击他们是反动派，这是不对的；倘若能把他们与反动派分开，勉励他们去与这些反动派奋斗，他们很乐于接受。

萧君又说，他们知道与共产派这样闹下去，是有陷入反动之危险的，所以他们很希望与共产派相互停止攻击，而且在反帝国主义的工作上面，还希望有许多可以合作的地方。我说，在反帝国主义的工作上，我们希望甚至于与醒狮派合作，自然你们能决定合作的态度，是我们十分赞成的。至于停止攻击，我以为只要你们能与那些反动分子完全断绝关系，而且能努力于国民革命工作，我们自然不会攻击；若是不然，我却不相信有停止攻击的

理由。我又问他，你们现在对于国家主义派、基督教徒以及一般反动的教职员，持甚么态度呢？他说，他们主张亦不理会这些事。他们现在预备埋着头做工夫，亦不攻击共产党，亦不攻击国家主义派以至于任何人。他说，国家主义派等人并不曾妨碍他们，为甚么他们要去攻击国家主义派呢？我在这里，发现了萧君等第二个严重的错误，所以我即刻告诉他，说是倘若你们决定这样子的态度做下去，我们却又有一种不得不严重攻击你们的理由。为甚么呢？你们现在的态度，好比是在我们革命的战线上取消了一部分势力，你们本来是与我们共同攻击国家主义派、基督教徒等人的，现在你们躲在背后去，让我们一部分人独力去抵抗他们，这只当是在消极方面帮助他们一样。你们说，你们埋着头做工夫，一个革命的分子，把当前与反动势力搏斗的事避开了，你们要做甚么工夫呢？你们说，他们没有妨碍你们自然不错；他们只妨碍一切向前进的革命工作，你们现在名为埋着头做工夫，其实并不要向前进，他们自然不会妨碍你们的。你们拿孙文主义做招牌，现在你们虽说预备不再与反动派合作去做反革命的工作，却亦预备避去许多革命的工作，自然这个方法是很巧妙的。我们与国家主义派、基督教派以及其他恶势力处处短兵相接，不知道得罪许多人，要吃许多辛苦牺牲；你们却有这样巧妙的方法，口里又说革命，实际又不要得罪人，不要受一点危险艰难，自然将来有许多狡猾怯弱的人到要加入你们这种孙文主义学会的。但是老实说，我们革命的人在社会上总是少数，而反革命的人握着旧社会的统治机关，他们的势力比我们大得多；然而我们革命的人能打得倒他们的，全靠有许多民众能够表同情而跟从着我们。现在若是我们不攻击你们孙文主义学会，让你

们自由发展，将来你们可以冒中山先生革命的美名欺骗一些表同情于革命的人，使他们加入你们这种不革命的团体里。这是妨碍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永远陷我们于孤立的地位的。我们为自己的生死存亡关系，不能不尽力攻击你们。

萧君警告我，他说我们这样攻击他们，究竟是于我们不利的，因为他们有力量妨害我们，使我们甚至于没有宣传我们主张的机会，而且这样下去，亦许把他们逼成法西士蒂。为革命的前途，这亦不见是好事情。我完全承认萧君这些话是事实，便在这短的期间，我们已经感觉萧君等有妨害我们宣传的力量，自从萧君与我们分道扬镳，我们已经感觉麻烦不少了。不过，我告诉萧君，我们不能怕这些麻烦，便停止我们的攻击，我们的宣传所以能收功效，并不是因为要求人家不妨碍我们的宣传，只是因为中国今天一般青年在实际生活上需要革命，所以人家便想妨碍我们的宣传亦是妨碍不了的。学校里面教职员一年到头的反动宣传，有时敌不过我们一篇演说的力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口才好，只是因为我们说的是真话。国民党自改组以后，青年加入的甚为踊跃，这亦并不是宣言的文章好，或是因为国民党中有甚么三头六臂的人，不过只是因为国民党所揭橥的正合于一般青年之所要求。要妨碍我们宣传的岂止萧君等若干人呢？但是，只要中国革命潮流永是这样高，我们的宣传永是这样适合于革命的要求，总有一次我们的讲演或出版物可以打动在萧君等影响之下的群众的。我们当然不希望萧君等会成功法西士蒂，不过我们知道中国可以成为法西士蒂的大有人在，我们并不能怕法西士蒂之发生。我们知道法西士蒂越多，我们的工作越困难；不过若如萧君等今日所为，冒革命之美名，而实际不去革命，这正

好比欧洲之有第二国际一样，第二国际之妨害革命，实际比法西士蒂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冒革命之名还可以欺骗一部分人，不比法西士蒂倒是赤裸裸的反革命不至于令人受他的欺骗。所以我对萧君说，我本相信你们今天并不至于反动到法西士蒂那样程度，而且我亦很不希望因为攻击你们使你们陷入法西士蒂之途，不过我希望你们必须先改变不攻击反动势力的消极态度，我们不愿看见有这种又不革命又不反革命的人，因为这实际是消化一部分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势力发展的。你们若不能改变这个态度，我可断言我们必然要尽力攻击你们，我们宁愿你们早些成为法西士蒂，因为你们一天成功法西士蒂，赤裸裸的把你们的反动面孔揭开给人家看，那时你们的作用就只好等于孙境亚、何世桢等人，人家便不至于上你们的当了。你须知我们为中国的革命，只能在大处计较，不好打小算盘。亦许把你们几个人逼到完全反动的路上是一个损失，但若你们自己不肯回头，那便宁可让你们到反动的路上去，还比让你们许多人受你们的欺骗，都走到名为革命而实际不革命的孙文主义学会里去好得多。

我最后希望萧君等考虑现在究竟是不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分子分家的时候。共产党原来是主张与国民党结成联合战线，并不曾决定要许多党员加入国民党，但是孙中山先生决定要共产党员加入，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以至那时的戴季陶都主张要共产党员加入。第一次大会的时候，国民党中有些反对这种政策的人提出党员不许跨党问题，想以此为难共产分子、破坏共产分子加入国民党的局面，但是孙中山、胡汉民诸先生马上打消这个意见。去年张继、谢持因为反对共产分子闹到广州，孙中山、胡汉民诸先生又坚持容纳共产分子的意见。凡此一切，决非他们

几个人自己发昏，明明是在国民党中有不可不容纳共产分子的理由。即这一次西山会议一开，马上汪精卫、蒋介石诸先生极力反对，亦无非因为他们居于负责地位，明明知道现在决不是分家的时候。其实稍为平心静气想一想，把所有共产分子一律开除，有几个可称为戴季陶派的人来担当党务，而且若尽象你们这些戴季陶派，看见反动分子利害了，便向后退缩躲起来，又如何担当党务？若不是西山会议以后，我们努力奋斗，现在国民党恐怕完全已经落到反动派手中，亦许你们甚至于连今天这一种回头的日子都会没有，你们早已都跟了反动派跑了呢？老实说，我们的奋斗，不但是救国民党，而且亦是救你们呢？其实共产分子在国民党里面，究竟有甚么妨害国民革命的事情？无论组织党团亦好，吸收国民党分子加入共产党亦好，这于国民革命之损害在甚么地方？我们是拿国民党去革命，不是拿革命去为国民党，若是有益于革命的事，会有害于国民党，那便奇怪极了。萧君亦曾告我，他们为对付何世桢、孙镜亚等，亦曾在孙文主义学会组织党团，由此可知，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中组织党团，亦是没有甚么希奇的事。假使没有共产分子的党团，国民党这两年恐不易有如此进步，党中旧势力恐不易如此受重大的打击呢。

萧君还有一点怀疑，便是共产分子所做的事本来没有甚么不好的，为甚么这些事不一古脑拿在国民党里来做，却偏要在国民党中组织党团，把国民党一些分子放在外边呢？我告诉他，这是很简单的。共产分子自己确实是要求达到一般劳苦工农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平等、自由权利的，这种主张，本来亦可以说是最彻底的三民主义，这恰与一般诬蔑共产分子只要民族主义，不要民权、民生主义的相反。但是共产党并不敢希望每个国民党

人都能够做到这样，他亦决不想把所有的国民党员都化为共产党员，因为这在事实上决不可能，而对于中国革命运动亦是不好的。共产党希望国民党员至少都能努力于民族革命，但同时不反对关于农工阶级政治、经济上之解放奋斗。亦许在民族革命以后，国民党中还会有更多的人反对农工阶级之解放的，但若能在今天努力民族革命，而同时因为三民主义的关系，不反对农工阶级之解放，亦便尽是今天革命战线上的良友。今天想造成一个完全象共产党一样的国民党是不可能的，中国一定有许多不能完全赞助农工阶级之彻底解放，而能努力于三民主义之下从事民族革命的人，这种人若因为不合于共产党的标准，不能完全象共产分子一样做事，便不许他在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内，这不但是国民党的损失，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损失。我们为要求到中国革命的成功，一方为眼前民族革命不能不与这些进步的分子合作，使国民党成为中国各阶级联合的民族革命的党，一方为要使他们不能妨害而且有时可以帮助农工阶级的彻底解放，又无不容许共产分子另外组织党团之理由。

末了，我告诉萧君，若是你们不能显明与党内反动分子决裂，不能勇敢与党外反动势力奋斗，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不攻击你们的，倘若我们有反革命或不革命的行为，我决不要求你们不攻击我们。不过，我希望这种攻击，不至于妨害我们在有些地方的合作，应当合作的地方为甚么不合作呢？应当攻击的地方，为甚么不攻击呢？

载《中国青年》第113期

署名：代英

在欢迎省港罢工工友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

各位工友，各位同志，今天得与各位叙会，兄弟是非常欢喜的，现趁此机会表示一些意见为工友们参考。今天为什么开这个会，就是欢迎罢工工友，也可说是欢迎我们兄弟，也可说是欢迎能实行本党政策而反帝国主义的战士，欢迎你们，就是表示亲爱你们。但我们为什么反对帝国主义呢，第一点，帝国主义自侵略到了中国常常用兵力压迫我们，还要我们赔偿兵费，有一次要赔二万万五千万元，这笔巨款现在尚未还清。而这款是从何而来呢，都是吸我们人民膏血而来的。帝国主义以兵力压迫我们后，还要赔偿兵费，这种行为不啻盗贼掳人勒赎一样。我们痛苦极了，我们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第二点，帝国主义等助北洋官僚、军阀以压迫我国人民，如袁世凯及段祺瑞当国之时，则借款与他压迫残杀人民，甚至借款与袁世凯称帝，现在我国负债有十万万元之巨，这种债初是由帝国主义借款与军阀官僚来迫压我们，那要我们人民赔偿，所以我们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第三点，以兵力强占土地如九龙、广州湾等处之租借

---

* 这是恽代英在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的欢迎省港罢工工友代表大会上的演讲纪录，原题为《恽代英先生演说词》。

地，沙面、上海、汉口等处之租界，用使馆来管治中国人民，收容军阀土匪以捣乱国家，残杀人民，所以我们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第四点，帝国主义占据我们海关，强迫协定关税，洋货税率甚轻，而土货税率反重，遂至洋货价廉，商人均贩运洋货，土货因之滞消，使我国实业不能发展，而工人、农民失业日多，由游民而变为匪，国内穷乱所由而生，所以我们也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

除此外，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事实非常之多，不能于短时间所能尽述。但还有一重的，即帝国主义在我国自由开设工厂，以微资招集我们工友入厂工作，其待遇非常之苛，工友之惨痛非常，而帝国主义每年都括去了一宗宗大款，这尤要我们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工友们，我相信我的感觉与你们是一样的，我在上海的时候多，我常见早晨马路上一队队工友进去上工，夜晚一队队的下工，大多数是衣服褴褛，其生活痛苦可想而知。但马路汽车上下亦是很多，十分之八是外国人所乘，还有是那些发洋财的阔人坐的。我们一天做工很多，还是穿破衣走路，有时还受他打骂，甚至要常常遭他们辗毙在路上。这种情形，我相信香港也是如此，这是若何不平等呀！所以我们真是除了打倒帝国主义没有别的生路。我们知道，孙先生为什么创造国民党，孙先生并不是因为想做大总统，而是为要打倒帝国主义而入党。我党同志以全国计算有一百万之多，应该要一齐“反帝”。但帝国主义船坚炮利，很不容易打倒的。帝国主义在上海、天津、广州杀了许多工人、学生，他们（帝国主义）只为我们一起来反抗，便实行大屠杀，但我们决不会因此就害怕了他们。我们因为他们无理压迫、惨杀，所以反抗他们，他们实行这种惨杀，我们惟有继续奋斗与他们拚命死战。

当上海惨杀案发生后，我们遂尽力宣传于民众，所以上海工人、商人、学生一律罢市、罢课、罢工，此时我们正希望反帝空气普遍全国，而乘机打倒帝国主义。当时罢工工人有二十万及许多学生、商人，力量本来不少，为什么不能打倒帝国主义，而卒归失败，其原因有数点，我希望省港罢工工友晓的上海罢工失败情形，以供参考，得一方法以打倒帝国主义。第一点有军阀为破坏之，如张学良当惨案发生到来上海，初则扬言援助罢工“反帝”，不久他到了英领事馆要与帝国主义磋商，要助他在长江发展势力，遂不惜破坏罢工为条件，而商人亦勾结帝国主义开市了。在省港罢工则有国民政府援助罢工，所以我们知道，国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第二点有买办阶级以破坏罢工。他们不愿意罢工，因罢工对他们有损失，故与帝国主义勾结而破坏罢工。当罢工时要巨款接济，上海大商不肯拿钱接济，使罢工坐归失败。第三点知识阶级也有破坏罢工的，如职教员等他们不愿意罢课以援助罢工，老早就把学校放了假，同时要学生家长阻止学生援助罢工。还有一点我们非常痛心的，即本党里反动的分子，他们要做官，所以勾结帝国主义以谋助他升官发财，致罢工风潮发生，他们都说为过激党指使，而同时暗通帝国主义捉拿罢工活动的人。这种反对罢工的反动分子，不特在上海如是，他们还跑到北京开西山会议，反抗国民政府。以上所述，我们知道罢工失败原因，是受帝国主义走狗买办阶级、反动派之破坏所致。

然罢工同志仍然坚持，但经数月后，他们压迫愈利害，稍活动的同志，都为他们摧残。至于罢工失败结果，是非常惨痛的。当失败上工时，外国资本家要工友签字，此后不准反抗，故当时上工后，还有一部分工友，再欲罢工。但情形已不同了。从前租

界与华界划分的，外国人不能越界捕人的，及罢工失败后，则华界与租界打通了一片，无论租界华界可以随时捕人，其用心欲把革命党人一网打尽，所以不能再次罢工。但是罢工虽然失败，而反帝运动，没有一些停止，非打倒帝国主义不止。各位工友，我们罢工回粤，都是痛苦之极，而比较起来还要好一点。我们坚持数月，有党及政府极力援助，其他各界人士也能尽力援助，如现在举行各界援助罢工周；我们希望反帝战士继续奋斗，希望党及政府要继续孙总理遗嘱“反帝”到底，以达到罢工完全胜利。

载《工人之路》第236—238期
署名：恽代英

党纪与军纪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

我们为甚么要训练党军呢？因为要养成一部分能够为三民主义——为打倒一切压迫中国民众的黑暗势力，解放全中国民族，建设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而作战的军队。

所以党军必须要具备下列两个条件：

一、是要明了而服从党的主义，在党的指导之下与中国民族的仇敌作战。所以我们要政治教育，要党部组织，每个同志要服从党纪。

二、是要能够有充分作战的能力，为党的主义有切实把握能够杀敌致果。所以我们要军事教育，要作战训练，每个同志要服从军纪。

假如我们的军队，能够很有纪律，要勇敢善战，但不肯受党的指导，不肯为党的主义作战，反转跟着帝国主义军阀们指斥一切依照主义行事的为赤化、为过激，甚至于仿效杨希闵、刘震寰一般来打倒一切依照主义行事的人；这种军队可以称为党军吗？一定不可以的。这种军队是反革命的军队，因为他们完全蔑视了党纪。任何一个高级长官想引导军队走到反革命的路上去，我们军队中的同志都应当拿出党纪来裁制他。

反过来说，假如我们的军队，能够懂得若干主义，能够懂得

专重党纪，但不肯受军队的约束，不肯很认真的学习军队的功课，很敏捷切实的遵行军队的号令，反转借口党纪以遂其捣乱的行为，而逞其敷衍腐败习性，结果致军队的号令不行，全军泄沓松懈，这种军队可以称为党军吗？亦是一定不可以的！这种军队是不能作战的军队，因为他们完全蔑视了军纪，任何一个同志想引导军队走到不能作战的路上去，我们军队中的同志仍旧都应当拿出党纪裁制他。

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只应当讲党纪，不必管甚么军纪。所谓党高于一切，是说军队不能违背党的主义，所以军纪是在党纪监视之下的；同时亦是说军队是完全为党的主义工作的，只有严整的军纪可以集中革命的力量，有充分的力量可以打倒一切反革命的敌人，所以军纪亦是党所应极力注意。党纪是要保障革命的军纪，决不是来破坏这种军纪的。

忠实热心革命的党员，一定应知道为了革命运动，必须要有一个军纪很严肃的党军，自然他们同时应当很能明了党的主义。无论如何明了主义的同志，若是蔑视军纪，便证明他们不明了主义，因为他们并不急于希望主义之成功，所以不注意为主义而养成军纪很好能作战的军队，他们反转引导军队到不能作战的路上去。

在军队没有违背党的主义的时候，我们破坏军纪，便是破坏我们革命党的作战势力，便是破坏党，所以应当拿党纪裁制他。我们在军队没有违背党的时候，用党的力量帮助军纪，犹如在军队已经违背党的时候，用党的力量代替军纪一样，这都是要使党军确实能够成功“党”的力量（不是私人的力量），而且要使党军

确实能够成功党的“力量”（不是党的装饰品）。我们做一切，都是为的革命，都是为的党的主义，这便是我们说在党军中党高于一切的意思。

我们中国：一面有许多无革命觉悟，不知主义为何事的腐败分子，一方面又有许多富于无政府主义思想，不知纪律为何事的浪漫青年，再加上社会上很流行的偷惰狡猾的习气，所以无论在甚么地方都不易造出一种很集中有力革命势力。这种心理影响到我们党的军队与军事教育机关里面，于是固然有一部分根本讨厌党纪的军官，同时亦便发生一部分根本讨厌军纪的学生兵士，结果真正的党纪未曾树立起来，而军纪先败坏下去了，甚至于有些人借口党纪来做他们不守军纪的理由。这是很严重的错误，这种人是将要毁损我们革命军队的力量的；每个忠实热心革命的党员应极力纠正他，犹如应极力纠正军队中对于主义上的误解一样。

我所谓军纪的败坏，还不是专指大家疏忽了敬礼等仪节，我以为还有比疏忽敬礼等仪节更重要十倍的，便是学生士兵玩视官长的命令，临时集合很要长久的时间才集合得起来，越是老资格的学生士兵，越觉得玩视一切，这种泄沓松懈的精神有时比普通学校还厉害。这是一回甚么事情呢？这不只是军队中的问题，这是我们党的问题。我们站在党的地位，觉得有严整军纪的必要。

无政府主义思想，发生于今天大敌当前我们需要一个集中有纪律的革命势力时候，是未免太早了的。每个同志，每个学生与兵士，都要归纳到党的纪律、军队的纪律中间。偷惰腐败空气，存在于我们应当要为全国民族担当重大任务的党军中间，是

我们人人应当注意努力扑灭他的。我们纵然夙兴夜寐一息不懈的振刷精神，还恐没有这个力量担当这个大任，那里还容得有一点暮气存在于我们中间。同志们！努力罢！我们还需要更有力的党军，所以亦还需要有更有力的党纪，同时亦便要用党纪，造成更有力的军纪。

永远记着党军是要“为主义”“作战”的。不“为主义”、或者是不能“作战”，都同样是有负党军的责任，都同样是有负于党，有负于全国瞩望我们的被压迫的劳苦工农。

自然，在最近一年中，我们同志是以能作战著名的。但是不要只知以此自豪，我们不应有一点矜夸骄傲之气，应当时时考查自己的缺点，谨防暮气深入我们的军队中间，然后可以常保作战之能力。若恃胜而骄，不努力注意内部之振刷，将来或者亦可以有意外之失败，就如林虎、洪兆麟等意外之失败一样(虽然我相信我们的党军不会到林虎、洪兆麟那种反动地位)。

所以，我们应当互相警惕，努力振奋，扑灭一切暮气，亦扑灭一切骄气。我们应当合全部同志之力，建立更好的党纪，同时亦建立更好的军纪。这是眼前最重要的事情。

载《黄埔潮》半周刊第35期

署名：代英

我们应当开办小工厂小商店吗？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

我在从上海到广州的路上，清理旧信，发现吉安宋宁人同志有一封信（听说他已经死了，可惜！），中间有这样的话：他说，他们要联络城市中的劳动者，施以教育和组织，联络农、商、工界，鼓吹他们革命，一方面加以各种新组织发展经济，以谋改善生活。他们组织团体，设商业组，打算招股开一个商店，贩卖各种书籍、文具和日用品，做消费合作社的组织（非社员亦可交易，但无分红利之权利），议定以二分之一以上之红利归团体，这样一来，团体中可以有一笔很大的收入。他问他们除联络商界外，货系打算来沪邮购，不知便利否，又与上海的合作社（如复旦的）可相联络否。他们又要设工业组，俟会中经济充裕，当专员来沪学纺织术，聘技师，买机器，开一小纺织工厂，那时就可畅所欲为了。他又说："这里就要注意我们赚来的钱，是要拿做国民革命的事业的。我想我们在此穷乡僻壤做革命的工作，实宜建设与破坏并重，虽然革命未完成以前，不能有任何彻底的建设，但努力做去，至少可以改善一部分的物质生活，不能空口说白话，然否？"

我看宋宁人同志这一封信，一面回想他与一般吉安青年同

志这一年来工作的努力，城市运动的发展，特别促五卅运动中学生、工人、农民运动的进步，不能不钦佩他们的热心勇敢，一面又回想到从前自己在武昌开小工厂、小商店等行为，与我将离四川之时，四川同学亦正在讲甚么开小工厂、小商店的话，我相信宋宁人同志的这种计划，一定还会发生于许多热心青年的脑中。但是这种计划，明明是空想，一定要归于失败的，我应当在此地将我自己的经验与对于这些事情现在的见解写出来供大家讨论；——虽然可惜宋宁人同志已不及看见了！

一般热心的青年，每不愿居只知破坏不知建设之名，他们总想在革命以前自己创造出一点小小事业（一般凡俗人所承认的事业）；同时，因为经济的压迫，谋生的不易，亦容易使他们渴望造成一种工厂、商店，好使自己的生活有一个退步的保障。因为青年自己不大懂得社会经济情形，对于工商业生活没有甚么经验，每每过于容易相信工商业容易赚钱，以为只要开了工厂、商店，便自然会财源贸盛，只有赚钱没有折本的。我记得我从前痴想以为我开办了一个小商店，便可以由怎样怎样的发展以至于完全改革社会，于是做了一篇《未来之梦》，大发其狂热，居然那时亦有与我一样无识的张东荪，恭维我有甚么独到之见。但是事实上证明我这只是一个荒谬的空想，改革社会决不是象这样做下去所能有功效的。

我们要知道小工厂小商店是不容易组织成功的。要办这些事，第一需要资本，至少需要几百元资本，甚至于数千元资本。而凡是资本事业，资本愈多，则规模可以愈大，流通周转可以愈自由，便愈容易于维持。若是资本太小了，买了一批商品或原料便将钱用完了，一定要等候着这商品或制成之品卖完以后，才可

以买进第二批货，这样下去，不要一两个月便会支持不住而倒塌了下来。我们有甚么把握可以筹集这多资本呢？

有些人只计算了商品原料买进时有如何的折扣，与商品制造品卖出时可以得如何的利润，他们因此便肯定做一元钱的生意，可以赚三四角钱，若是一个月做三百元的生意，可以赚得一百元左右。但是他们不知道若是开一个工厂、商店，每日火食、人工等用费是少不了的；买进来的货十万火急的催付价资，若是所付价资不能满批发所的希望，下次要想通融付货，便难上加难；然而要卖出去的货，总有许多还囤积着不能销售出去，或者为要便于推销，免不了让客人有些赊欠，这种赊欠的款，一时亦收不进来。因为这样，自己既时时有各种必要付出之款，而自己的本金又每被压在存货或欠账中间，所以小工厂、商店每每被逼得只有折本关门。至于若是买进了一批上当的货品，不能销售出去；或是遇着大商店、大工厂有意倾轧，他们将同样的货品贱价出售，以抵制我们，使我们的货品无人过问，这些都是常常可以有的事情。小工厂、商店遇着这种事情，失败起来自然更快了。

他们以为只要他们艰难困苦的做起来，一般比较同志的营业机关，一定是要尽力帮助他们的，例如宋君希望复旦合作社帮助他们，还有许多别的人来信希望上海书店能够与以特别的通融。其实这都是痴想而已！凡是资本事业，无论你开办的目的如何高尚，在事业进行中总少不了受资本主义的支配，那便是说，他们都会要尽力催逼账款，决不敢放手帮助别人，不然则他们一定要归于失败的。无论复旦合作社（现已消灭）亦好，上海书店亦好，他们的资本都很有限，他们自顾不暇，如何说得上怎

样方便人家？

而且我还有一个理由不赞成我们开小工厂、小商店。我们要办这些事，不但要用许多钱，而且糟蹋许多人的精神才力，在这种锱铢计利的事情中间。工厂、商店是不容易办的，要熟悉市面商情，要随时精细考核计算营业状况，自己去办则有关于记帐、催帐、批发货品、招待门市等种种麻烦，请人去做则又须防被雇的人中间有甚么舞弊中饱的事。我们现在要同志努力于革命工作，若把几个有才干的人牺牲在这些麻烦的事情中间，这是如何的不经济呢？

不过有些青年要发生下列两个疑问：

一、譬如有些地方买不着《向导》、《中国青年》以及其他关于鼓吹革命的书报，我们同志想筹点款项办一个书店或书报贩卖部，以推广革命的宣传，这种事亦是不应当做的么？对于这，我可以说，非绝无他法可想，或确有资力，我终不赞成做。我以为最好是能介绍当地一家书店，使他向上海书店接洽，一切营业的事由书店自去办理，我们的同志只是帮助他们介绍买书的人便够了。若书店没有一家卖这些书，亦可以介绍非同志的同学所办贩卖部让他们做这一笔生意，我们只是要在外面为他们兜揽生意。若这样亦做不到，我以为能鼓吹十个二三十个同学或其他友人一同订购这种书报，亦比零碎卖书收款的好（至于这样办了，每因书报扣留不能寄到，遭订购人责问，这是可以函请补寄的）。若必须自己稍负贩卖之责，则我赞成只贩卖必要的书报，而且必须要找一位深沉精细的同志去负责。切不可要那些很富于活动力的同志做贩卖书报的事，这不但牺牲了他的活动力于无益的地方，而且他每因事多而不精细，结果必至将事务弄得一

塌糊涂。

二、照这样说来，是不是我们革命家在革命未完成以前，本来只应做破坏的事，不应做建设的事呢？我可以答应说，象这样将破坏建设两件事分开，是幼稚可笑的。为甚么说办小工厂、商店，便是建设的事，宣传民众使觉悟为自身利益奋斗，与组织工会、农会与各种群众运动，便是破坏的事呢？没有一件事比这种宣传组织工作更有破坏的功用，因为他使民众知道而且有能力打倒一切恶势力的统治。亦没有一件事比这种宣传组织工作更有建设的功用，因为他使民众知道而且有能建设于他们有利益的新政府新国家。我们所做的是破坏事业，亦便是建设事业，没有一件事比我们现在所做的更能建筑起新政府新国家的基础。辛亥革命是只有破坏没有建设，这并不是说同盟会诸烈士不曾办几个小工厂、商店，只是说他们不曾宣传人民组织人民，所以在革命以后，人民不知而且亦不能为自己建设起新政府新国家，革命的结果被袁世凯收获了去。现在我们应当注意民众的觉悟与组织能力，这是破坏，亦便是建设，我们是反对只知破坏不知建设的人的。但是除了这种破坏与建设的事业，想怎样改善一部分的物质生活，或想怎样为自己的生活谋一个保障，这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载《中国青年》第 114 期

署名：代英

革命之障碍*

(一九二六年四月)

我们为甚么要革命，是因为大多数民众受了种种压迫，生活感觉得不安定，所以自然起来要求革命。我们为大多数民众利益而革命，那便可知革命一定是大多数民众赞成的；大多数民众赞成革命，那便可知革命一定能够成功。我们把我们的敌人统计起来，有很多种：如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政客、买办阶级、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皆是；看起来我们的仇敌有许多种，我们怎能将他们一一都打倒呢？其实，我们若以他的数量统计起来，他们的人数究竟少得很。他们或者不过十万人，至多至多，与他们打一百万罢，那么我们还有三万九千万民众是受了他们压迫要求革命的，拿三万九千万人起来革命，那一百万人如何能抵御我们呢？不过一直到今天，中国的革命，是还未成功的。我们总理努力革命工作四十年，何以革命尚未成功呢？今天就来讲明白这革命不能成功的障碍物。

革命的障碍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分作两方面来说：（一）主观方面是革命党员自己的缺点；（二）客观方面是社会方面的妨害。现在先说客观的障碍：

---

* 这是恽代英在黄埔军校的讲演。

1. 民众方面：我们革命，是为大多数民众而革命，但大多数民众在实际生活上虽本应有革命的要求，要他们确实来参加革命，究竟是很困难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其中有四件原因：

A、民众受了反动宣传的影响很深。我们生长在中国社会中，受了不少的由封建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教育。现今社会上一切道德、风俗、习惯等，皆封建社会君主时代遗传下来的。他们要怎样安分呀，要尽忠孝之道呀，要遵守王法、服从法制呀……读书人受的教育是如此；未有机会受教育之一般民众，在这社会所受的被熏染感化亦是如此。故一般民众：(甲)羡慕官绅，以为某老爷某大人说的话总是对的；不但无智识的民众，有这种阶级的见解，就是那所谓读书人，也是一样崇拜名流有地位的人。(乙)相信命运，说人的苦痛，是天定了的，是前世做了坏事的报应，所以乐天安命，成为很好的德性。(丙)相信和平，他们说什么都要和平才好，过激总是要不得，甚至于说五卅惨案对付帝国主义者都过激了一点，但他们不敢说巡捕房任意杀人更是过激了。(丁)要讲良心，他们说这个社会之紊乱，完全是由于大家良心丧失了，大家都讲良心，便不要革命，社会自然是会好的。但大家尽管讲了良心，若是帝国主义、军阀仍旧不倒下来，我们没衣穿，没饭吃，生活感受困苦又怎样办呢？

B、民众不知现时中国情形及世界情形。中国现时有四分之一的人是没有读过书的；偌多的人没有读过书，怎样能知中国情形及世界情形呢？就是读过书的人，因受的是统治阶级的教育，要他学“八股”；“八股”废了，又要学英文、数学一类的“洋八股”。“洋八股”学得半通不通，总算天文、

地理各种学科都知道一点了；只是仍旧不知道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世界现在成了什么样子，所以他们仍是不知道中国现时情形及世界大势。由于这样，他们听着喊打倒帝国主义，还莫明其妙，不知道帝国主义是个什么东西，究竟是方的？还是圆的？再不然，他们又会以为与其说打倒帝国主义，还不如先打倒军阀或他乡里的团总急要一点。再不然，他们又会说打倒帝国主义，总是很难的。中国人素来不懂得世界情形，不知道帝国主义为什么要侵略我们，不知道现在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有多人参加，有多大的力量。他们自然不了解革命，不敢赞成革命了。

C、民众无有组织。有革命要求的民众，有明了革命意义的民众，但无有团结组织；他们都是散涣的，不能做出甚么联合有纪律的行动。所以因此他们无胆量来参加革命了！叫我一个人到街上去呼打倒帝国主义，我都觉得害羞；要是很多人一齐的呼，那便再没有胆量的人也就有胆量的呼打倒帝国主义了。呼口号都要有组织有团结，何况实际革命工作，在没有组织的民众，诚恐我不革命人家不来，自然免不了互相观望的弊病了。

D、各阶级的革命性不一致。虽然或者大家都来革命了，但他们的革命性有不一致的地方。有些人在革命战线上，因他们本身所处地位的关系，能够很勇敢上前冲锋的，有些比较怯懦只敢在后面跟着不敢上前的。工人的生活很困难，革命闹成功了，他可以得着解放，闹不成功，捉他去坐牢，他也不怕，因为他的家里与牢里本来没有两样。商人因生活较好，革命闹成了，虽然对他也有利益，但他怕闹不成

功，反转要吃亏，要捉他去坐牢，所以自然要怯弱一点。这些勇敢的常常不会领导那些比较不勇敢的，他们只知走在一块，看不起不勇敢的；那些不勇敢的又不会联合这些勇敢的，他们亦只知团结起来排斥勇敢的，与勇敢的捣乱。故革命的势力中常常有些小小冲突，以至于你惑疑我，我惑疑你起来。这亦阻碍革命进行，妨害革命运动的成功。

2.反革命方面：反革命势力妨害革命工作的方法，我们可以说有七种：

A、用武力压迫。虽然有多数民众要求革命，但若你要革命，他便将你拉到牢里去或下令拿捕你，驱逐你，或将你的饭碗打掉，使你发生生活的恐慌；因此许多人便不敢赞助革命了。

B、以利益来引诱、收买。你要革命干革命工作，他有时让个位置给你，拿一点小小的事情给你做；你得到了这个位置这点事做，便感激他，于是便不革命了。民国元年，袁世凯收买革命党员，便是用这个法子，许多党员都被收买去了。被收买的人，还不自己承认，不过看到别人待遇他好，他就说人家好，替人家宣传。只就章太炎来说：他对于什么人都骂遍了，但他对唐继尧不骂；为什么呢？就是唐继尧对他有好处。凡是那些什么学者名流，都是靠这样生存的，他们一天什么事都不做，坐在房子里得来的钱用不完。因为军阀都要收买他们，使他们自己不革命而且反对革命。再则收买不一定要拿钱的，有时拿一种可以满足虚荣心的方法，都可以收买一些人。五四运动中，有一位学生很激烈，大家派他去见省长请愿，他见省长向他笑了两笑，于是就觉

得这位省长很好，他的激烈主张也放下去了。上海有一位同志，去见了张学良，回来也大说张学良的好话。这是什么缘故？这就是反革命等利用人的虚荣心，将人骗倒了。五四运动以来，统治阶级对革命的方法，就是用压迫并收买；所以有许多领袖都堕落了。

C、欺骗。就是提倡阶级的见解，命运的迷信，和平的观念，与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道德……。孙传芳到了上海，便出告示讲什么和平、秩序，因此禁止人民集会，说集会便要扰乱治安。而他的兵在那里打仗杀人放火，这便不是扰乱治安妨害秩序么？曹锟贿选上了台，便发布命令提倡什么道德、廉耻；他都配得上讲道德廉耻么？他们说这些话本来只是欺骗民众而已。

D、豢养一般走狗。为什么要豢养走狗呢？一个人要箝制迷惑民众是不够的，他要豢养些侦探、军警代他防缉一切谋害于他的人；同时亦一定要找些有名的人替他作宣传，或是替他来提倡学术，读经尊孔，使一般青年钻到图书馆、试验室去，好不过问政治；又叫他们来办严格教育，不许觉悟的青年作种种救国运动。

E、防止革命的宣传。禁止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不许组织甚么团体，开什么会，出什么刊物，谈什么国事。邮政局检查书报，甚至于象萧耀南见有"社会"二字的书报，皆一律搜去；方本仁见有"青年"二字的书报，也一齐搜去；同时他又可利用他的力量，来作统治阶级的宣传。

F、造革命党的谣言。曲解革命的主义，诬蔑革命的

领袖，例如王揖唐也讲民生主义，他的讲法，不过是办两个工厂。但他又说总理的民生主义，仿佛就是与他自己的一样。从前又有些人说是孙总理大炮，或说他是南洋的大骗子；列宁亦曾被人说是法国的侦探。这些说法，都是要使别人不信仰革命领袖。有人看见革命党员有自由恋爱的事，便说革命党是主张共妻了。自由恋爱究竟要得要不得，他亦不知道；自由恋爱何以便是公妻，他更没有理由说明这个事情。但一定要这样说，因为他要故意破坏革命党的名誉！现在人家说广东已经共产了、赤化了，亦是这个意思。这些反革命者自己没有道理与革命党辩论，所以只有靠这种造谣，希望能够离间群众，使不与革命党发生关系。

G、分裂革命势力。无论革命党里面，有事无事，他总要想法子来挑拨离间，要使某人与某人不合，发生意见；要将某种很小不同的意见，说成绝对不能合作的派别，使革命党中自起纠纷，互相攻击，他便好从中破坏，从中利用。有时稍为有一点小小事故，他便说得不得了，他借此造出各种的传说，说出各种不同的意见与解释，以分散革命势力。本党以及国民政府，常常为他这种手段所捣乱。

除了客观方面的障碍，再说主观方面的障碍。即革命党员自身的缺陷。那些缺陷：

(1)对于革命主义没有真正明了。有许多党员彼此互相攻击，你说我没有明了主义，我说你不是真正的信徒。其实你自己不将主义弄明了，想法子使别人对主义明了，在与人家谈得不对的时候，便骂人家为反革命或是假革命，这有什么用处呢？我们要使人家明了主义，所以我们就要先由自己明了主义做起，自己

将主义弄明白，然后才能使人家对主义弄明白；自己却不能彻底明了主义，自然不能叫人家明了了。

（2）不实行主义，不为民众的利益而奋斗。许多党员只知争谈主义，谈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点该主张，那点该不主张，若是稍有成见的人，每每越谈越糊涂。因此很引起外边人误会，不知道你这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能为主义去奋斗，即便是说能实行为民众谋利益的实际工作。我们要在实际上，表现出我们的主义是为民众利益的；要使民众在我们行动上来认识我们的主义。那便无论反动的人如何造谣曲解，大家自然都知道我们的主义是个什么东西了。

（3）不注意接近群众。有些人他们自己以为他是革命者，他们无论游玩、谈笑都只与他们那几个自以为革命者一块儿，仿佛形成一种特别社会。他们看见别的人，只说这个不革命，那个反革命，这样做去，他们便是不革命的人了。为什么呢？他们要是革命的，便不应离开群众。他们果真为革命工作，便应钻到群众中间去，去与群众融洽接近起来，探知群众的生活、习惯、心理及要求。我们与群众发生了密切关系，群众才能相信我们，而且我们才能有把握的宣传群众。这样革命工作，才有基础，才能成功。

（4）不注意革命势力统一。有些人组织一个团体，只知为自己出出风头，不知我要出风头，当然容易引起人家嫉妒。革命党对于革命工作是不能包办的，革命事业要想成功，非要有很大的革命势力拥护不可。故革命党不是包办革命事业，是要领导群众一同来奋斗的。没有群众，单是几人出出风头，怎能使革命成功呢？其次就是稍为一点小小事情，便不能忍，要发生种种无

意识的意见和争端，不管对革命前途有无什么影响，这是时时刻刻使我革命前途发生动摇的。再其次就是责人太过，自己勇敢点或和平点，便不满意别人。这通通都是我们的错误，都使革命势力容易分裂。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革命成功，便要统一集中革命的势力；没有革命势力的集中，便不能革命。我们要为统一集中革命势力，便只有我们改正原来的错误。改正我们主观方面的缺点，扫除客观方面的障碍，这便是我们应努力的工作，是使革命成功的不二法门。我们要怎样去改正主观方面的缺点呢？就是：

（1）自己去将主义更弄明了，更努力的想法子使人家明了。

（2）去努力为民众利益奋斗，在我们努力的行动中，使民众认识我们主义是为他们利益的。

（3）去努力接近民众，使民众在我们国民党旗帜指导之下共同奋斗。

（4）极力注意革命势力的统一。

我们先要改去我们的错误，然后才能扫除客观方面的障碍。主观错误改正，客观障碍扫除，革命是一定很容易成功的。我们同志负责努力做去，那中国革命就有希望了。

载《黄埔潮》半周刊第46—52期
恽代英讲　李鸣柯、缪芸人笔记

耶稣、孔子与革命青年

——在岭南大学演说辞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今天承岭南大学欢迎之便，使我与岭南大学各位教员先生与各位同学有一个谈话的机会，这是很荣幸的事情。我对于岭南大学虽然以前并不知道学校中间一切详细情形，但是我可以说我实在很久便有了一个很好的映象。我并不知道史坚如烈士便是岭南大学的学生，我脑筋中有一个岭南大学是从五卅运动时候起。亦许有人疑惑岭南大学是与其他教会学校一样有帝国主义关系的，但我却很注意岭南大学，我相信在这个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中间，一定有很多反帝国主义的同志。因为在五卅运动中，就我所知道的，在这个学校不但有一个教员、一个同学为反抗帝国主义在沙基牺牲了性命，并且有许多外国教员先生为了与我们打抱不平，在香港受了英国帝国主义者的许多恶劣待遇，这表明岭南大学与其他教会学校绝对不同。不但一般中国的教员和学生与其他教会学校的中国教员和学生不同，便是外国教员先生亦是与其他教会学校不同的。在中国中部北方一般教会学校中做事的人，怕我们如怕蛇蝎一样，他们要用种种手段妨害我们，使我们进不了他们的学校，永远没有和他们学校中的同学

相互谈话的机会。但岭南大学因为与他们绝对不同，所以不但不怕我们，并且欢迎我们，给我们这样一个宣传的机会。我今天能在这样一个表同情于反帝国主义的岭南大学讲话，自然是再高兴没有的事情了。

人们彼此没有见过面谈过话，彼此之间常常不免有一些隔阂或误解。譬如我来到岭南大学的时候，我未曾听见岭南大学教职员先生们为我解释学校内部情形，我终有许多不懂的地方，我总怀疑岭南大学仍旧不免有许多普通教会学校的弊病。但自从我听见他们为我们解释的话，我便更明白你们学校的真正情形了。我们亦是常常被人误解的人，譬如人家知道我是反对基督教的，他们便以为我是如何不尊敬耶稣，不尊敬基督教徒与他们所办的教育慈善事业。其实这许多是误会。我并没有这个意思。我今天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不妨把我的真正态度说与诸位听听，以免除大家的误会，并且可以提出我的意见，请诸位加一个批评。

我的意见，决不轻看耶稣的为人，我相信耶稣是古犹太的一个“圣人”，象孔子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圣人”一样，而且我相信耶稣实在有许多超过孔子的地方。至于教会中人，我确亲眼看见有些好人，而且我要承认我自己实在受了教会中好人的若干影响。教会所办教育慈善事业，我相信有很多都出于外国先生们个人的好意思。

为甚么说耶稣是超过于孔子的圣人呢？我对于孔子的道德学问，向来便很佩服他，我相信他真是满心仁慈，要想救世界人类的圣人。他生在春秋的时候，看见各国诸侯不讲道理压制人民，各国之间又常时发生战争，伤害许多性命，扰乱得全世界都

不安宁。他因为学了一些古圣先王的道理，知道天下之乱都由于为人君的不存仁心、不行仁政之所致；于是他便奔走列国，向那些人君宣传，今天见齐景公，明天见卫灵公，一个地方没有将席坐暖，便又爬起来跑到别一个地方，可怜他一直跑到胡子头发白的时候，除了每到一个地方混得几餐饮食，临行时混得几个盘费以外，都没有甚么结果。于是他老人家又跑了回来，删诗订礼，还希望在他未死以前，做几部好书，以便后之人君或有能采取其学说以行仁政于天下的。象孔子这样诚恳勤劳，为人类做事的人，我们如何能够不推尊他为圣人呢？不过孔子有一种很大的缺点，便是他看见这些不仁之君，不知道到人民中间去宣传组织人民，只知道去找那些人君，须知那些人君没有民众的势力在背后监督督促，专想靠讲甚么道理以劝化他们，是不会有甚么功效的。孔子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一生只是钻烟囱。不过他老人家精神很好，刚刚从一个烟囱里钻了出来，又钻进别个烟囱里面去，周游列国，钻遍了列国的烟囱，到了七十岁左右跑回鲁国仍旧删订了许多书，要后世他的门徒继续他的钻烟囱的事业。这一方是他的愚笨可怜的地方，然而亦是他的精神不可及的地方。到了后世他的门徒，便更糟糕了。他的门徒读了他所删订的书，却比他聪明狡猾，知道象他那样钻烟囱，是划算不来的事情；同时他的门徒多半亦没有他的名望资格，可以随便到各国谒访人君，因此他们学了孔子的书，完全不去钻烟囱，只知道拿那书中的话做文章，考秀才、举人，为他们进身之阶，同时又拿这去说与农夫、工人听，表示他们的博学多闻，于是帮助一般君主压迫这些农夫、工人，这些农夫、工人还认为这是孔圣人的道理，不敢反对他们。所以孔子还只是钻烟囱，他的门徒却成为一

般人君的走狗了。

耶稣的仁慈想救世界人类，与孔子没有甚么两样。但他却不象孔子那样钻烟囱。孔子对于压迫人民的人只知讲劝化，所以他总是跑去见那些国君，常时与他们讲话；耶稣则不然，他并不跑去见甚么人君，他有些象我们现在的革命党一样，好接近宣传民众。他对于压迫人的人，不只是用劝化的方法，他并且骂他们。照《圣经》所说，他到神庙中间去的时候，看见有些商人在庙中做生意，他便骂他们，将他们摆的摊子丢到庙门外面去了。在《圣经》中又常常看见他骂那些犹太的祭司与收税吏，这都是直接压迫犹太人民的人。在这些地方，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很有些革命精神。他这种勇敢的行为，所以使他后来遭杀身之祸。然而这便是孔子所万万不能及他的地方了。不过耶稣亦是与孔子一样，他们讲了许多道理，两三千年收了许多门徒，但是他们通通没有能够救世界。耶稣仍旧与孔子一般，不能够救世界，为甚么我说耶稣是超过孔子的“圣人”呢？这中间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便是因为耶稣自身仍旧有一种缺点，他虽能够骂那些压迫人的人，然而那些压迫人的人是不会因为怕他骂便改悔过来的，你越是骂他们，他们越是恨你，想谋害你。我们对付这些压迫人的人，只有一个法子，便是将一切被压迫的人团结起来，来打倒他们。换一句话说，要对付这些压迫人的人，孔子的“劝”的法子是不中用的，耶稣的“骂”的法子亦是不中用的，对于这种人只有用我们革命党“打”的法子。我们革命党天天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我们天天干打倒这些东西的工作，我们与孔子、耶稣不同的地方，便是不靠“劝”，亦不靠“骂”，对于这些反动的势力直接了当的“打”倒他。孔子、耶稣虽然都是“圣人”，但是“圣人”

的法子是都失败了的，所以这便是他们都不如革命者的地方。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耶稣的门徒亦与孔子的门徒犯一样的弊病。他们看见耶稣爱骂人以后遭了杀身之祸，所以他们便不肯随便骂人了。他们学了耶稣的道理，既不去劝化那些压迫人的人，亦不敢骂那些压迫人的人，他们亦学孔子的门徒一样，只知拿这些道理去对一般农夫、工人讲，去愚弄恐骇这些可怜的人。譬如现在基督教徒对于帝国主义、军阀乃至一般土豪劣绅，谁能有耶稣那样勇敢的精神，当大众骂他们呢？岂但不敢骂他们，并且无论甚么事情还要请萧耀南、孙传芳等贼酋提倡捐助，以为荣耀。耶稣的道理，遇着这种门徒，自然亦便糟糕了。

我见到基督教徒中虽然确实有若干好人，然而这些好人对于中国做不出甚么切实的事情。教会里正在布道祈祷的时间，帝国主义与军阀同时在拘捕杀戮，或者在压迫苛待中国平民。这些教会中的好人，既不能劝止帝国主义、军阀的残暴行为，他们又怕得罪帝国主义、军阀，不敢提倡而且不愿赞助中国平民反抗帝国主义、军阀的革命行动。他们明明看见中国平民被帝国主义、军阀踏在脚下，但他们老守着和平忍让的教训，向践踏在帝国主义、军阀脚下的中国平民宣传和平忍让的道理。这样子下去，中国平民倘若完全相信了他们的宣传，不要永远被帝国主义、军阀践踏一世，没有出头的日子了么？我为不忍见我们中国同胞这样被人践踏，所以反对基督教。但是我要申明，我并不是说基督教徒中间没有许多好人，不过这些好人因为相信了基督教，自己不革命，而且亦劝人家不要闹革命的事情，天天教人家礼拜祷告，引诱许多人脱离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战线。这是我觉得可惜，亦是我所以不得不反对基督教的原故。

外国先生在中国办学校，有的人要说这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些办学校的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所以主张取缔外人设立学校的理由很简单。只是因为外国先生是爱他们本国的，他们为中国人办学校，一方固要为我们中国人谋幸福，然而一方亦决不愿他们所教育的中国学生反对他们的本国。所以英国人办的学校，一定鼓吹中英亲善；美国人办的学校，一定鼓吹中美亲善。这决不是外国先生主观上对于我们有甚么恶意，故意欺骗我们；而且他们所鼓吹的国际亲善，亦不能说是不应当的道理。为甚么中国民众与英国民众或美国民众，不应当亲善呢？不过有一层，我们要注意的：便是我们对于英国民众、美国民众虽绝对应当讲亲善，然而对于英国、美国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他们在政治、经济上加于我们的压迫，我们却必须要毫不迟疑的打倒他。外国先生劝我们中英亲善，中美亲善，是很对的。不过可惜在他们劝我们讲亲善的时候，他们本国的帝国主义的政府者同时却正在侵略压迫我们。这些外国先生因为爱国，不愿反对自己国里的人，所以亦不反对自己国里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并且他们亦知道若反对了自己国里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不但似乎非爱国之道，并且恐将来自己回不了本国去，至少以后再不容易在本国那般大人先生们面前募捐盖造学校、教会。因为这些外国先生爱国，因为他们还想有回国的一天，因为他们还想募捐盖造学校、教会，于是他们不但要我们对他们的民众亲善，而且要我们对他们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亲善，而且不愿我们对他们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不亲善。他们在中国办了学校，在学校内对于学生，只讲他们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对于我们怎样“好”，把他们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如何黑暗、惨酷压迫我们的

行为隐瞒到一字不提。若是学生在别的地方知道了他们的帝国主义者的罪恶，要起来反抗，他们还要帮着他们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来压迫我们的学生，或是开除，或是解散学校。我以为在我们中国办学校的外国先生虽然根本并不是坏人，然而我们中国青年多一个人进英国人所办的学校，便少了一个人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多一个人进美国人所办的学校，便少了一个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外国人办的学校越发达，便会使反对帝国主义的人越少，便会使我们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越受损失。有人说外国先生在他们外国捐来了许多钱，盖造了许多洋房子，亦有许多难得之处。这些话自然是很对的。不过这些钱从外国送到中国来的越多，我们中国民族精神消磨了的亦便越多，帝国主义的捐款，好比是购买我们中国民族精神的代价。我并不是说在中国办学校的外国先生都不是好人，无论他的本意是怎样的好，这种学校对于中国青年的民族精神总是有绝大妨害的。

今天很难得有一个机会，在岭南大学发表了我这一篇意见。我对于岭南大学，只是还有几个希望：第一个希望，便是还要在学校内提高反帝国主义的精神。办理岭南大学的虽然亦有几位美国先生，我就沙基惨案时的事实看来，我相信这几位美国先生一定是我们反帝国主义的同志。至于中国先生与全体同学，自然更是反帝国主义的同志，无待言了。我愿意勉励岭南大学中国外国先生与一般同学的便是，我们应当有更高的反帝国主义的热度。我们不但要预备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亦应当预备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我们相信美国的人民确实是我们的好朋友，犹如日本的人民是我们的好朋友一样；但是美国的帝国主义者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各种手段压迫我们，亦

正与英国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没有甚么两样。岭南大学一定要与别的外国人所办的学校不同。无论甚么帝国主义者,一定都要反对我们。虽然受了美国先生的教育,然而对于美国帝国主义者仍旧必须加以极严厉的反对,这并不是对不住美国先生,只有能够这样,方可以证明美国先生来办学校,完全是为我们中国人,并不是为要欺骗软化中国人,使大家不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而且我还要说,不但受美国先生教育的同学应当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我并且诚心诚意欢迎美国先生们,下一个勇敢的決心,把耶稣痛恶恶人的精神拿出来,与我们一块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只有这样才可以令我们中国人放心,知道外国先生来办学校,亦有些人并不一定是帮助他们本国的帝国主义者的。

还有一层,便是希望岭南大学能够把圣经、礼拜等功课完全取消了,不要拿这些神话迷信扰乱我们青年的脑筋,虚耗我们青年的光阴精神。我们今天在帝国主义、军阀压迫之下,需要努力宣传组织民众,进行革命运动。一天叫他们去听那些把两条鱼,五个面包散给几千人的传说,而且要他们闭着眼睛祷告上帝,这有什么用处呢?基督教徒祷告了两千多年,不看见将世界祷告好了;反祷告出这多帝国主义、军阀出来。今天还要我们青年祷告,再祷告三年五年,帝国主义、军阀就不压迫我们,老虎就不吃人了么?对于老虎只有“打”之一法,祷告上帝,上帝哪有甚么别的办法呢?我们做反对基督教的宣传之时,有些基督教徒就说,信教自由,不能干涉的。不错,我们并不干涉人家的信教自由。但是既然说信教自由,为甚么在学校里要强迫人家研究《圣经》、祷告礼拜呢?我们中国今天的青年,要去革命,要学习革命的知识技术,要学习革命的生活,所以我很痛心有许多与外国先生有

关系的学校，强迫许多不愿意的青年，要他们做那些他们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事情。所以这一个问题，我亦希望岭南大学的先生们想一想。

话说得太长了！总结起来，我只有一个意思。我们很感谢岭南大学今天的欢迎会，我们希望岭南大学的中国外国先生与一般同学，要永远做我们的反帝国主义的好朋友！

载《中国青年》第120期
署名：代英

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一、何谓文化侵略

我们说的文化侵略是指的帝国主义者一种软化驯服弱小民族的文化政策。

帝国主义者施行这种文化政策的方法，是(一)设立教会，宣传宗教；(二)设立教会学校推行宗教教育；(三)招收留学生，使受帝国主义的教育；(四)办理中西文报纸、通信社、传播谣言，或曲解事实的新闻；(五)设讲演所或露天学校使听众受他们的宣传。

这种文化政策的内容包含下列四件事情：

(一)宣传上帝耶稣天堂地狱的迷信，使弱小民族不注意眼前所受切身的痛苦，而希冀修身行道，以求将来的幸福于虚无缥渺之中。

(二)鼓吹帝国主义国家之文明，而掩藏他们实际上社会各罪恶，使弱小民族眩耀迷惑于其说，甘自暴弃，而承认帝国主义国家为文物上邦。

(三)宣传片面的和平博爱的学说，对于帝国主义压迫蹂躏弱小民族的罪恶，则不能而且不敢加以指摘反对。因此，他们的所谓和平博爱，实际只是帮助帝国主义者，使弱小民族不反抗他

们的压迫蹂躏而已。

(四)鼓吹帝国主义者对弱小民族之德意，对帝国主义者在压迫蹂躏弱小民族的事，则一语不提，却择一二件表面上比较似于弱小民族有利之事，大为宣传，使弱小民族发生感激之心，以自甘为永不反叛的臣民。

二、帝国主义何故必要实行文化侵略

帝国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经济的利益必须向国外寻觅殖民地，以推广商品销路，采买原料，移植资本，故帝国主义对于弱小民族最重要的是施行经济侵略。帝国主义要达到他们的经济侵略的目的，是不容易的。弱小民族多畏憎与外人发生各种关系，而且弱小民族中工人、农民更多为实际生计问题所逼迫，自然要起来抗拒这种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帝国主义者于是不能不以武力压迫弱小民族，而是不能不以各种政治上的势力(条约、法令……)，束缚统制弱小民族。武力压迫是很残酷的，政治势力的束缚统制是很不自然的。这种强横霸道的对付弱小民族，永远不能使弱小民族忘记反抗复仇的心理。只有文化侵略可以有软化驯服弱小民族的妙用，使弱小民族以受大国“怀”“柔”之统治为莫大的光荣，帝国主义者，因此乃能巩固他对弱小民族的统治地位。

三、中国所受文化侵略的影响

中国自鸦片战役以后，帝国主义者以武力与政治势力逐渐

推行其经济侵略，如开辟通商口岸，限制海关税则，发达入口商业，攫取路矿权利之类；他们一方面这样做，一方面便同时进行他们的文化侵略的阴谋。现在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文化方面的影响很值得我们注意！尤其是我们看见英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之成效，可以使我们了解反对文化侵略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现在传教外人在全中国约八千人，遍布于各省会都市县城。他们在各地设立教会，用种种方法招收教徒，全国耶稣教会领圣餐的三十余万人，选员六十余万人，天主教徒约二百万人。

全国各都市有基督教青年会四十处以上，会员约八千人。

教会设立大小学校共二千余所，共有学生约十万人。

以上再加各国利用庚子赔款津贴收买的留学生，及服役于外人商店、工厂、学校，及外人掌理之海关、邮局下的中国人，总共当有四百万人以上，皆受帝国主义直接间接之所豢养与蒙蔽，每不知或不敢反抗帝国主义。故此四百万以上之中国人，无异为帝国主义者的文化政策所收买，而失掉了他们的民族精神，文化侵略之结果真是可怕啊！

我们试看他们这种文化侵略的成效：

大英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他在中国政治经济上攫取的利益，比任何帝国主义者为多。然而因为有了一般教士与留学生为他们歌颂文明宣扬德泽，居然使中国人怀德畏威，不但不以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失败为耻辱，关税主权之丧失、租界领事裁判权之设立为愧恨，且公然承认大英帝国是文明先进之友邦。

美国帝国主义在近年来勾结英国挟制日本，谋在中国发展其势力。此等野心，乃顺于他本国产业发达所有的自然趋势，稍

知世事者自当了然。就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两次为自己利益牺牲中国利益以迁就日本与近年事事与英朋比压制中国观之，可知美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无异致，乃亦以有教大与留美学生如胡适之博士，与其他教育界、学术界名人为之说辞，至今尚有人认为中国唯一之友邦。

因为英美文化侵略的这种成效已经引起各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文化事业的热心，他们正尽力扩大教会事业，并利用退还庚子赔款为文化侵略之经费，但是中国民族的精神根本消灭民族运动；① 所以我们必须反对他，比反对经济、政治与武力的侵略更加倍努力才好！

四、反对文化侵略运动应注意之点

我们反对文化侵略是反对帝国主义软化驯服中国民众的文化政策。我们并不是说反对欧美的文化，我们并不是否认欧美文化之优点，而且承认中国有亟须接受欧美物质文明之必要，我们所谓反对文化侵略，决不是盲目的赞美中国的固有文明，如保存国粹论与东方文化论者之所为。我们认定欧美文化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农业封建社会的文化，欧美文化是比中国文化为进步的，这是因为欧美的经济状况是比中国的经济状况为进步的原故。但这正是说，中国经济文化因为比较落后，所以为欧美帝国主义者所宰割蹂躏，中国民族必须力求经济文化的进步，以谋完成自己之解放；决不是说，中国经济文化

① 此处疑有误。原意应为：要根本消灭中国民族的精神与民族运动。

既然比较落后，便应当甘心屈服于欧美帝国主义者的宰割蹂躏，亦不是说中国一定要保守这种比较落后的经济文化，不求经济文化的进步。——这种奴性或保守性的见解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

我们反对文化侵略，是反对帝国主义软化驯服中国民众的阴谋，我们并不是说反对那些在帝国主义软化驯服手段之下的中国民众，如一般教徒、教会学校学生、留学生等。我们相信这些人中间，除了极少数完全受帝国主义者的收买豢养的人以外，多半是受他们欺骗而不自知觉的，中间不少真诚爱国的人，不过因为他们所受反动教育的欺蔽，所以有时不知反抗帝国主义，且或误会以为反抗帝国主义即是侮辱了他们自己；我们应极力使他们知道中国民族的衰弱，军阀的扰乱，与人民生活的日益堕落贫困，他们与一般中国民众是一样受损失的。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间，他们应当认清少数被帝国主义者收买豢养的无耻，决心站在反对文化侵略的一方面。我们决不希望他们站在帝国主义者的一方面，固定的与民族解放运动作仇雠。我们最希望他们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巢穴里打出来，与外面反对文化侵略的人相呼应，只有他们能起来反对文化侵略，才能掘倒文化侵略的根基，给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一个致命的打击。

我们虽然反对宗教，认为宗教是科学的世界中间绝对不能存在的东西，但我们今天并不要将基督教的地位一概抹杀。若是基督教可以不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我们亦未尝不可看他与佛道、回教同等，用不着特别的排斥他。所以我们在反文化侵略运动中，对于有基督教信仰的人，自然最好是劝他脱教，如不能脱教，亦可劝他努力谋教会的自立。我们对于教会的自立运动，

与其说是反对，毋宁说是提倡赞助，因站在反帝国主义观点上，能使中国基督教徒脱离帝国主义的影响，亦是我们很大的成功。我们是不将反对宗教迷信，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视为一谈的。如佛、道、回教没有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决不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反对他。我们恳切希望基督教至少进步到佛、道、回教的地步，不要自安于为帝国主义的一种工具。

我们反对文化侵略，决不因此有藐视任何文化侵略政策欺骗迷惑的人的心理，我们决不谩骂教士、教会学生与一般留学生。我们要谨防帝国主义者挑拨离间，使我们不能亲近这些教士、教会学生与一般留学生；帝国主义者常常要利用我们一处态度一处言语之失当，而指我们是以教士、教会学生与留学生全部为敌人，他们因此更好鼓惑玩弄这般人，使永不加入反对文化侵略的团体。我们要特别亲近，而且专重他们，使他们了解我们，不但是为中国民族的利益，而是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反对文化侵略的。我们相信在他们了解我们以后，一定不肯上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当，他们多数人一定要站在我们的一方面，不会站在帝国主义一方面的。我们对他们宣传的时候，应当原谅他们以前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所以他们的知识思想当然要视一般人比较落后，我们决不因他们的比较落后而鄙笑歧视他们，我们正因为这样认定他们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之下的牺牲品，他们是我们的不幸的兄弟，是我们所应当特别注意帮助的人。

五、我们的口号！

一切反抗文化侵略政策的同志们联合起来！

基督教会与教会学校应当即刻脱离帝国主义的关系!

反对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经营的任何文化事业!

基督教徒、教会学生们起来,共同参加反文化侵略运动!

载《广东青年》半月刊第 4 期

署名:恽代英

廖仲恺与黄埔学校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

廖仲恺先生与蒋介石校长是共同创办黄埔学校的。他为黄埔立下了政治教育的规模，造就了许多革命的青年军人；他并且遗留了革命军人必须与农工阶级亲密合作的教训，使“农工兵大联合”成为每个黄埔学生的信条，人人都认为毫无疑义的天经地义。廖仲恺先生是为了这使人嫉忌的，他为了这死于反革命派的手中。然而廖先生的精神是不死的，他永远生存在每个黄埔学生的心中，而且永远生存在表同情于黄埔这种革命精神的人的心中。

当黄埔初开办的时候，广州尚在许多假革命名义以割据地盘、权利的军阀手中，学校的经费是很困难的，学生亦是被这些军阀所藐视的。那时候只有廖先生与蒋校长以卧薪尝胆的精神，与艰苦的环境奋斗。廖先生虽身兼政府要职，然而常定期到学校，为学生作政治讲演，又每通宵奔走，为学校筹伙食用费。黄埔便靠这样惨澹经营，立下了很稳固的根基；而且廖先生这种艰苦卓绝的精神，亦鼓励学生的革命精神不少。黄埔是中国的新生命，而黄埔的生命却是廖先生所赋予的啊！

廖先生是最诚朴最笃实的人，他是在中国国民党改组以后，最努力党务与农工运动的。所以他在黄埔所留给学生的最大的

影响，亦是为党与农工利益的奋斗精神。廖先生是不怕因他的努力会被人认为共产党人的，他亦不肯否认在国民党旗帜之下一定仍旧会有反革命派。他说："我们开口讲革命，闭口讲革命，到底是怎样革法？是革这般工农阶级的命，还是革这般普通群众的命？不是！我们革命，预先就要革自己的命；革了自己的命，才配革人家的命。"他又说："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运动，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国民党中，必然发生革命派与反革命派。""我们不独要革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命，我们并且要革反革命派的命，这才是彻底的革命工作。"廖先生这种只认得党，只认得革命，毫无其他一切拘墟① 狭隘的成见——真是每个革命党员的模范。

廖先生对于农工运动之功绩，永为广东农工所不能忘记。他领导着黄埔学生，使训练工团军与农民自卫军；他主张派遣学生去训练广宁农民，以压倒彼处地主民团土匪的凶焰。黄埔是与农工运动这样密切有关的，廖先生为此得罪了一般土豪劣绅反革命派，牺牲了他的性命；然而廖先生的流风余韵，永远成为黄埔的特殊精神。只要看黄埔学生最近对于广宁农民之被屠戮，中山农民协会代表之被惨杀，是如何关心而愤怒，这不犹如廖先生的精神吗？这不犹如廖先生今日尚生存着在领导他们为农工利益而奋斗吗！

黄埔的学生在国民党左派各领袖陶冶教育之下，养成了此明确稳定的革命精神。他们是被压迫的小资产阶级子弟，他们不但为民族感情要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为自身的经

① 拘墟：孤居一隅，见识不广。

济利害亦要联合农工阶级与反动势力奋斗。黄埔的学生大部分可以说是自觉的革命者。但是谁最先唤醒他们的呢？只有廖仲恺先生的努力，最值得我们纪念。一切政治教育及与农工亲密合作之精神，都是廖先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①的结果。黄埔的学生永远纪念廖先生，全中国要求解放的人，亦应当永远纪念廖先生。

廖仲恺先生死了！我们要爱护他的遗产——黄埔军校，要勉励每个黄埔学生永远跟着廖先生的指导做去。只要黄埔学生永远保持廖先生的精神，廖先生是不死的。

载《人民周刊》第19期

署名：代英

①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语出《左传·宣十二年》，艰苦创业的意思。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在讲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这个题之前，我们先要知道现在一般人对于国民革命是有两种的解释：一说国民革命是全民革命；一说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这两种解释，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分别，不过我们要知道说话人的意思并不是如此。他们有些人以为既然是全民革命，就不应该分出阶级来，所以国民革命是四万万同胞起来革命，没有阶级的。却是另一方面有些人则说阶级仍然是有的，只是各阶级联合起来革命就是了。实际上究竟有没有阶级？我们是不可以笼统的说一说就算了事，现在不妨详细讨论一下：

阶级的存在是一件事实。我们不能不承认国民革命；仍然不能不承认阶级的存在。谁敢说中国人当中个个都是一样平等，没有压迫的人和被压迫的人？所以阶级是有的。虽然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界限没有似外国那样明显，但到处仍然有资本家，有工人，有地主，有贫农，无论尔怎样不承认有阶级，而事实仍然是如此。有人说中国没有资本家，但是“先施”、“大新”、“永安”……这些大公司是不是中国资本家开的？至于中国有“工人”那更不用说了。不能因为中国资本家少便说没有资本家。中国的资本家仍然会压迫工人的，或者压迫得要更加厉害。

阶级在事实上明明是有，不能说他没有。总括说起来中国的确是有阶级，阶级的存在是一种事实。如果我们已承认有阶级——地主、贫农、资本家、工人，那末阶级间不免就要发生冲突，因为他们的利害是冲突的——地主要多收一点租，农民是想减少一点租，资本家想增加工作时间、减低工资，工人则想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这种冲突是没有法子避免的。若是没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争斗是不会发生的，否则尔要使他们不发生斗争也是不可能的。有人说阶级争斗是人们提倡起来的，以为是马克思发明出来的，实则阶级斗争是几千年来的事实，马克思不过将他说明罢了。过去的事实，压迫者对于被压迫者起来反抗，便说他们是造反、没良心，而不知道这便是有了阶级之后，自然发生这没法消除的阶级争斗。

阶级斗争在某一时期是不甚厉害，大概被压迫阶级愈觉悟，愈有组织，则斗争愈剧烈。现在世界上的工人、农人渐觉悟到自身的利益，渐次组织了，阶级斗争遂一天剧烈一天了。今姑以学生为喻，学生平日受了教职员的压迫，不一定知道反抗，因为有了觉悟和学生会组织之后，便起来说，那个教员不好，那个是饭桶……来做择师运动了。国民革命是要各阶级能够觉悟，为自身利益团结组织起来。——不要只是空洞的说“保种爱国”，因为只有为自身利益奋斗，最能使人勇敢而不妥协。

有些人（如国家主义者）说，国民革命是爱国保种，但我们就不是这样说。我们说国民革命是要各阶级为自身的利益团结组织起来奋斗。他们是说为国家，我们是说为民众自己。我们是反对他们那种空洞不着实的说话。若说为民众自己的利益，便比较容易唤起一般人。不然，现在许许多多有知识的人，叫他去

救国尚且靠不住，其他更不用说了。可是我们说为民众自身利益，人们便要说我们不要国家。实则我们何尝不要国家，不过“爱国家”这句话实在太空洞了，不如说为民众自己，为解放四万万人，比较容易使人勇敢去奋斗——我们告诉各阶级的人，为自身的利益，都要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国民革命一定要靠民众自己组织团结的力量，才可以压倒一切反动势力，不是靠少数英雄、侠士或义军可能成功的。

我们一方面要使民众觉悟为自身的利益去奋斗，一方面要使民众组织团结起来。我们知道少数人是不能完成革命的。以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经过四十年的奋斗尚不能使国民革命成功，他积四十年之经验，最后对我们说要“唤起民众”，这就是说革命并不是少数人可能完成的。所以国民革命一定要各阶级民众觉悟，各阶级有组织，他们都来参加革命，才做得好。以前革命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还没有得到民众的帮助。我们的责任是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但民众有了觉悟，有了组织，阶级观念遂明显起来了，这是没有法子的。

中国的国民革命，如是不要工人、农人有觉悟有组织，要使革命成功，我们知道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要说明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认清楚国民革命当中，各阶级所处的地位如何。

军阀买办阶级通常是反革命的，有时因与帝国主义者利害冲突，或为民众势力所鼓荡，亦可相当的赞助革命，但他们常易因利害关系欺卖民众。如“五卅”惨案张作霖、孙传芳、上海买办阶级也能相当的赞助革命运动，但叫他去和帝国主义奋斗，是不可能的，是靠不住的。倘使帝国主义者给了一点恩惠给他，他马上便可以反革命的。中国的革命若靠他们来干，人人都知道是

不可能。

工业资产阶级与国货商人，为自己利益是爱国的，他们是热心收回海关、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但因为人少而资本又每与军阀、帝国主义有关系，故每懦弱而妥协，国民革命他们是可以暗中帮助，而不敢明露面目以触怒帝国主义、军阀。

高等知识分子(学者、教职员)，在知识与感情方面都应该爱国的，但他们完全倚赖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为生活，实际上多是反革命或摇动不定的。所以嘴里虽然整天说爱国，叫他实际上做起来，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多是空口谈革命的国家主义者，说要多读一点书之后才来救国。他们自己不出来革命，看见人们出来领导革命又要喝起醋来。他们看见工农阶级出来领导，便说他们没有知识——而自己不出来干。他们一方面怕得罪革命的群众，一方面又怕得罪反革命的人们，这是高等知识分子之通病。

小商人受各种的压迫，他们是可以革命的，但生活比较安定而无组织，易于受大商人的欺骗，以至妥协，甚或受反革命派的利用。若是我们能够宣传使他们觉悟，把他们组织起来，仍然可以革命的。

学生是勇敢而喜做事，但浪漫而多个人欲望，尤其是领袖分子易与权势勾结，谋个人利益。因此学生每不容易团结，很难使团体组织得好，他的好处就只是勇敢而肯做事。

手工人、农民是贫困受压迫，可以毫无顾忌，以从事于革命的，但最困难的就是散漫、不容易组织起来。

产业工人贫困比手工人、农民更甚，他们除了一双劳动的手以外，什么都没有，且日常感受压迫，他们因产业发达集中城市，

俨然成为有纪律的军队。手工人或农民感受压迫痛苦是断续的，一时的，产业工人则无时不感痛苦、不受压迫，所以我们说产业工人是最革命的势力当中最有力量的，这是事实。我们革命若丢开有力量的工人、农人，而只知去宣传没力量的群众，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因此，在国民革命进程中要特别注意宣传和组织工人、农人，虽然学生、商人仍然要宣传组织，但工人、农人有了觉悟，有了组织之后，便要发生阶级斗争。有些团体是不赞成阶级斗争的，若他们不去做便已，若要去宣传组织工人、农人，则阶级斗争中自然发生出来了。

最后我们来讨论，应否反对阶级斗争？

第一，如要反对阶级斗争，便先要否认压迫阶级的存在，不然，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斗争，我们是应该赞助被压迫者的。尤其是我们国民党党员，不应该反对阶级斗争，因为我们国民党党员是要打不平的，若是反对阶级斗争，便反是帮压迫的人去压迫他人了。所以现在一般不赞成阶级斗争，实际便是帮助压迫者对被压迫者斗争。

第二，被压迫者越能阶级斗争，越易养成国民革命的觉悟与力量，而且能防上层阶级的妥协性。阶级斗争越厉害，国民革命的空气越浓厚。有人说，我们说阶级斗争是帝国主义之利，这是错的，帝国主义者见农工阶级跑上革命战线来是很害怕的，所以阶级斗争并不是破坏国民革命，实所以促成国民革命。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去反对的。

第三，我们同时要注意国民革命非农工阶级单独所能负担，必须联合各阶级去干。因为目前中国产业工人不多，而农人又很涣散，没有知识，若不联合其他阶级革命是不容易成功的。一

方面说要阶级争斗，一方面说要联合各阶级，如此岂不是矛盾吗？我们可以说完全不会的。因为各阶级为着其本身利益，仍然要联合起来对付敌人——一方面尽管讲阶级斗争，一方面仍不能不联合起来，若因为要各阶级联合，便不许人阶级斗争，这是错的。

第四，应该注意在国民革命尚未成功之前，农工阶级是不能得到完全解放的。农工阶级必须注意离间破坏。资产阶级是压迫人的，当然在消灭之列，戴季陶先生亦主张消灭阶级，但现在时候还没有到。我们若就提出“打倒资本家”的口号来，那末很容易中反动派离间破坏之计，所以工农阶级对于这点要特别注意。

总即上面的意思，简单说起来，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但阶级还是存在，仍然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愈剧烈，则国民革命愈易成功。但其间有些限制，就是在国民革命进程中，农工阶级还不好提出“打倒资本家”的口号来，虽然是阶级斗争，一方面仍要不妨害各阶级的联合战线，这样国民革命才能成功。

载《革命生活》第17期
恽代英讲　林焕源笔记

主　　义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

现在，人人都高兴讲一点主义了。虽然很有些人怕讲那种帝国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最讨厌的共产主义，而且有些人亦不愿意很具体的讲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尤其不愿意讲那种得罪地主、资本家的民生主义；但他们一定要自命为一个甚么主义者，一定要宣传一个甚么主义，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可以与共产党或左派国民党争衡。

所以现在国民党右派有他们的空空洞洞的“真正的孙文主义”，与帝国主义、军阀、名流、政客、土豪劣绅表同情于反赤反共产的有他们的“国家主义”。我听说重庆反动的教职员曾经说：“现在共产主义太利害了，我们必须有另外一种主义放到青年脑筋中去。”最近报纸载唐继尧亦要办党，所以亦要一种主义。主义二字，真是“洋洋乎盈耳哉”！

主义真是一个有力量的东西。人每每因为一种革命的主义能解决自己与社会的苦痛，不惜牺牲一切为主义奋斗。多少被压迫者集合在这种主义的旗帜之下，多少革命的志士为了主义流血啊！然而小心些！魔鬼现在亦看得眼红了！他们亦会造一种空洞的主义来抵制我们了！

被压迫的青年们应当看清自己的利益，为一种代表自己利

益——解放自己的主义而奋斗！但是，切不要只知盲目的做一个甚么主义者，被一个空空洞洞的好听的名字欺骗了，使那些魔鬼们高兴！

我们要实现革命的主义，打倒反革命的主义！

载《少年先锋》第1卷第1期
署名：代英

C. Y.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

C. Y. 便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外国文的缩写。

C. Y. 的分子，都是相信共产主义的。所谓共产主义，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说的要去混取或瓜分人家的财产（世界上没有这种荒谬的主义），他们只是反对工厂、机器等生产机关，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私有，以致大多数工人及一般民众都受了资本家的压迫，所以要为消灭大资本家，解除工人与一般民众的压迫而奋斗。

C. Y. 的分子，都是相信共产主义的青年。他们通常不过是二十岁上下的年纪。他们是学习共产主义，而且是本着共产主义的精神，在共产党的指导之下，为青年工人及一般青年解除压迫而奋斗。

C. Y. 的分子，在 C. Y. 之内，守严格的纪律，受严格的训练。他们人人要研究共产主义，尤其要本着共产主义的精神，到被压迫青年群众中去，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

C. Y. 是一个青年革命团体。他的敌人是一切压迫势力——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地主、反动的思想与反动的分子。C. Y. 的分子，是要在实际革命的工作中学习革命的经验与教训，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战士。

有人说，C. Y. 分子是捣乱的，是过激的。不错！一切压迫势力自然要讨厌 C. Y. 分子是捣乱过激的。C. Y. 分子为了被压迫青年的利益，一定要与压迫这种青年的人捣乱，而且捣乱亦许不免要过激一点的。但是被压迫青年亦应当讨厌 C. Y. 分子么？一定不应当的。

为被压迫青年的利益，我们应当高呼 C. Y. 万岁！

载《少年先锋》第 1 卷第 1 期

署名：但一

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一日）

我们不必说什么为社会国家的利益而奋斗，亦不要梦想什么人能够为我们的利益而奋斗。讲爱国家爱社会的人是很多的，然而一大半都是讲的空话。人总是特别注意自己的利益的。不要学那些心里是要为自己而口里说是为社会国家的人的虚伪；更不要上那些心里是要为自己而口里说是为社会国家的人们的当，希望他们能够保障你们的利益。你们的利益是要靠你们自己的力量奋斗的。

我上面这一段话，自然有些人听了要气死的。世界上常常有一种人专门自命是为社会国家利益做事，他们所谓是“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亦还有一种人虽然他们自己并不敢自命是为社会国家利益做事，但他们最讨厌人家说不要为社会国家利益做事的话。他们实际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做事，或者是借口为社会国家以博取一点私利或美名！或甚至本来便未曾为社会国家的利益做一点事，但他们以为人总不好太自私了，专门提倡“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以奖掖人的私心，则人类之高尚道德扫地尽矣。

其实用不着装出那种道学的鬼面孔出来，人类本来便没有那种好听的“高尚道德”，我们亦并没有将甚么“扫地以尽”。我

们是认定了人总是特别注意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利益总要靠自己的力量奋斗，所以要打破一般被压迫者倚赖人家的妄想，自己起来注意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努力奋斗！

千万不要相信一个官吏或是一个政客能够为人民利益奋斗！千万不要相信一个资本家或是一个工头能够为工人利益做事情，千万不要相信一个旧校长或是一个新校长能够为学生利益改良学校。没有我们自己起来，甚么希望都会不能实现的。

我们并不是专门提倡人类自私心。人要为自己利益奋斗，他便会知道仅仅他一个人奋斗是不够的。压迫我们的是社会的各种恶势力，我们必须将一切同样受压迫的人团结起来，大家都来为自己利益奋斗。

我们有我们的"高尚道德"，便是被压迫阶级相互间协力一致的道德，便是我们所说革命的"联合战线"。但我们决不相信此外有甚么"高尚道德"，如有，那一定是骗人的。

载《少年先锋》第1卷第2期
署名：代英

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

今天同各位讨论的问题，是“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我在未来黄埔以前，只有几年做普通民众运动的经验，并未在军队中做过政治工作。所以我应当承认我是不配讲这一个题目的。不过我自从到黄埔以后，在我四个月的工作中颇得到一些经验，我感觉我们以前军队中政治工作，有许多错误的地方，所以今天我可以提出我个人得来的见解，同各位讨论讨论。我们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的目的何在呢？军队中政治工作的目的，便是根据总理的两句话：“第一步使武力与人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成为人民之武力。”我们便是要从第一步引军队走到第二步。我们的军队名称是国民革命军，然而实际在今天还不能够得上做人民的军队，不过只是与人民结合武力而已。现在的工作便是要用好的方法，努力使他做成人民的军队。我们应当怎样做呢？

各位不论在那一军队做工作的，试回头想一想，一定觉得所在的军队，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军队里有许多毛病实在是不足怪的，姑无论在前方新结合的军队，在两月前还是与国民革命毫无关系的，即就在广东的军队而论，受了革命的训练，还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所受训练的程度亦各有不同。便令由本党一手训练的军队，因为士兵都是从旧社会来的，官长也还不免有些是

旧式的军官，要想在最短时间训练他们，使我们完全满意，亦仍是不容易。但是这些军队，却都有变成人民的军队的可能，怎样使这种可能变为事实，其责任便全在我们政治工作人员身上。有些政治工作人员，一觉到工作困难，立刻便从军队中跑走了，好象这个军队是无法训练了的，这是错了。我们的军队固然是不能使你满意，假使你把这个军队同别的军队比较一下，也便知道这些军队究竟是比较有希望的，至少有一个希望，便是他们多少让我们做一点政治工作，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容易做工作，不该丢掉这些军队。而且我们要明白，如果军队已经训练得很好，很可满意，为什么还要我们做工作呢？就因为有许多不满意，所以方要我们负起责任设法来改善他，使他渐渐达到满意，没有因不满意便跑走的道理。

我们军队中政治工作要注意的，第一点是要确定我们要引导他到那一个地方去。我们的兵士自然大多数是被饥寒已经逼上革命之路的，可是他们旧社会的思想习惯已经沾染得很深，他的满脑子还装着许多反革命的旧观念；我们要根本铲除了这些旧观念，才能使他们站稳革命的立足点，由不自觉的革命以至于自觉的很稳定的努力革命。自然有些同志说我们天天同他们说三民主义，便可以稳定他们的革命观念，但是三民主义不是一个容易懂得的东西，他是与许多旧思想习惯相冲突的，例如我们喊“打倒帝国主义”这一个口号，三岁孩子都懂得的，然而在去年五卅惨案发生时，有许多人都以为打倒帝国主义便是要打洋人，便是我们要把洋人压迫下去，为什么要发生这种错误呢？就因为旧观念太深了的缘故。再则五卅惨案发生时，梁启超、江亢虎发出许多调和的论调，有些人便盲从附和他们，以为说激烈的反

抗，是受了共产党所欺骗，这亦是旧观念作怪的结果。讲到民族自决，很多人更是不懂得，有些黄埔学生都要质问我，你为什么主张民族自决，使蒙、藏脱离中国统治呢？其实我倒要问他们，为什么不主张民族自决？本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不是明明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有自决权的么？何以见得民族自决蒙、藏便会脱离中国。苏联不是允许了许许多多他国内的弱小民族自决，而这些民族都愿联合成为一个国家么？民族自决当然是每个党员不应持异议的，然而有些人究竟因为旧的帝国主义的观念，不能完全了解这个道理，显然发出与党义相反的意见。

说到民权主义，亦不见得个个人都容易了解。总理的五权宪法，直接民权都不很易懂。尤其是要问到人民究竟有几多自由权？罢工是否应当绝对自由？这便更可以看出许多人根本不懂党义了。人民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这是规定在对内政纲中的。工人有罢工的绝对理由，这是写在工人运动决议案中间的，总理颁布的工会条例，亦明白规定工会有宣布罢工权，这并经过邵元冲先生很详细的解释清楚；人家说邵元冲先生是右派，他倒已主张罢工自由，而所谓左派时还弄不清楚，这岂不是奇怪的事么。又如说到反革命者无民权，亦是时常发生问题的，现在反动派时常放些坏空气，做些坏事情使政府时常在摇动之中，然而我们每不能以完全不妥协的精神，去镇压这些反动派，反动的人有时亦借自由为他的保障，甚至说反对中央党部也可以说自由，反对国民政府也可以说自由，这离本党民权主义真不知多少远了。

讲到民生主义更是不容易懂的事。总理说的“民生主义就

是共产主义"这句话是很少人理会的。许多人还害怕，有人要引用这句话来详细的讲解，他们说现在是不大好说这样的话的，这要留待革命成功了再讲，如果革命成功了，恐怕亦不要你讲这些话了。本党因为要实行民生主义，所以最重农工运动，而有些人一听到人家说农工运动，便说，他是共产党员，他来宣布共产主义了，难道农工便只是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么？党的宣言，国民政府的宣言，都明明说注重农工运动，保护农工利益，帮助农工组织，大家却偏偏不懂。国民政府的宣言甚至还说过，土地是用以养人的，不应该占为私有，地主不耕田而收租，这是不当之利，这些话有几人敢为党宣传呢？而且还有许多人根本不相信本党会有这些主张。各位同志你们看看，这不是很可笑的事么？我们天天讲三民主义，却是有一大批三民主义的信徒，思想上根本是与三民主义相反的，这种相反的思想，原本是社会相传下来的旧思想，我们若不能根本改变这些旧思想，是不会能为本党造出真正的基础，不会能使总理的希望——化武力为人民的武力，能够完全实现出来的。

我们必须使一切士兵对于三民主义，有很正确的认识，非此不能保证我们的军队永远站在革命的战线上，为本党的主义奋斗到底。我们平时尽管喊着团结精神、统一意志，但一遇实际问题临头，立刻便会整天闹个不清楚，成为党的重大问题；假使我们的军队，象这样不能站稳革命的立足点，我们的军队虽多有何用处呢？只要他们被外面的反革命空气来浸润，亦许还会不知不觉的跟着反动起来呢！我记得从前我在上海，平时与许多党员都很融洽的，但因未能使他们对于党的认识明了，到西山会议的问题发生了，有些同志便被反动的空气弄糊涂了；我们如果不将

党的主义策略，设法使士兵懂得清清楚楚，有了确定的观念，那么这军队跟住我们有几多时候，是没有一定的，他们亦许有时要站在我们的反面去。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人要认清，使士兵明白的认识主义，打破一切旧的反革命的观念，是最重要的责任。我现在已经搜集了许多党纲宣言及国民政府的宣言中的材料，及许多国民党领袖说过关于各种问题的话，预备印刷出来，给大家看看，省得同样一句话从跨党的或左倾分子出口，就被人家说是共产党的理论。我相信这样的理论实在是国民党应当有的理论，而且相信每个国民党员必须切实接受这些理论。我们政治工作人员无论在如何困难的环境中，必须要丝毫不妥协的将这种理论传达到士兵方面去。不过我在这里郑重的申明，我绝对不是要各位同志在军队内部故意去闹什么右派左派的纠纷，或使士兵与官长发出许多不必要的冲突，闹到一塌糊涂。我们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统一，不破坏现有的军队，然而又要有方法将党的真正主张，很正确的灌输到军队里去。

所以我们第二便要注意的，要用怎样的方法把现在的军队，引导到我们所要他去的地方去。普通做政治工作的，一定会觉得要引导军队到我所说的真正三民主义的地方去，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从前大家讲三民主义，并不象我所论的这样认真，已经在军队中做不很好，现在要这样认真宣传三民主义，一定要加几倍困难麻烦了。然而三民主义是不是救国主义呢？他既是针对中国的病而发的救国主义，除了极少数的反动分子，为甚么会有许多人不赞成，为甚么会使我们的政治工作感觉这样的困难呢？一定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所以惹起了许多不明的反动派，这是要反躬自省，不能怪任何人的。我们必须要怎样做才好

呢？就我经验觉得要切实的做到以下四点。

第一，不要夸大了政治工作的地位。政治工作占着军队中的什么地位呢？有的以为是唯一重要的，如果军队中只要注重政治工作，不必要问甚么教练、风纪，那不是将军队变成了法政学校了么？军队里还有其他很多要紧的事，如何能说政治工作是站着唯一的重要地位？我们的党因为军官不喜有政治工作，曾特别提倡政治工作的重要，而一般做政治工作的人，因为好看重自己的工作，于是格外将政治工作说得重要，但这是很不好的，自然政治工作是重要，但是绝对不是唯一的重要。我们不应该看重自己的工作，如果人人都只看自己的工作，那便你以政治工作为重要，军官以军纪风纪为重要，自然在工作上便会发生困难了。我们一定承认军队中所有的工作，各有其相当的重要地位，一定要尊重人家的工作，方不至令人发生反感。再则政治工作要与其他的工作有很好的连系，方能使人了解，这般政治工作人员是帮助他们的，不是害他们的，政治工作做好了，其他的工作都可以得些好处，这样才可以使人家亦看重政治工作，至少他们亦不会有意与政治工作人员为难的，能这样做才是党与政府所以要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的意思。

第二，要认清军队的官长是怎样的人。普通的错误观念，常以为官长不看重政治工作，便说他们是反革命的；而且因为这些官长的言论行动表现出许多反动的思想，国家主义思想，研究系的思想，甚至吴佩孚式的思想，更证明他们一定是反革命无疑的。其实心里存着这个观念，做工作更困难了。我们试研究一下，为什么一般官长会有这种的言论行动呢？他们一天只知做政治工作，没有看书听讲，他们是不懂得革命的理论的。他们有时

以为自己的旧学问怎么好，以前有什么特别的研究，但是他对于革命的主义、策略，却完全是门外汉，于是他们不负责的高谈阔论起来了；他们要说什么邪说横行啊！或是说青年的人胡闹啊！！这在他不过是发发牢骚，那里便可说他是反革命。譬如乡里老八股先生说两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这可以捉来办复辟之罪么？对于他这种人只要我们对症下药，慢慢的宣传，亦未尝不可以接受政治宣传的。有些军官说：我以前带兵亦有许多年，从来没有听到什么叫党代表、政治指导员这些名目，这只是他们不懂，决不能说他是反革命。你只看他们到东江战役，革命军靠政治工作之力以少胜多之后，他们对于政治工作，便不敢象从前那样轻视，便知道他们并不是顽固不能觉悟的。以前做政治工作的人实在做得不好，他们自以为懂得政治，无论在什么地方，把傲慢的态度摆起来，而且过分的藐视军官，使军官一见他们，亦便讨厌他们，因而亦就不愿他们去做政治工作，这是不能证明军官不要政治工作的，不过只能证明军官不要有你这种态度的人去做政治工作罢了。我们可以断言：军官有意反革命的实在很少，就使有几个曾经在陈炯明那边做过事，或不久又跑到那个反革命军队中去了，这也不见得是有意反革命，不过他们所学的是军事知识，所以总要求有一个军队中的位置罢了！他们若在革命的军队中，亦只是在这里要求一个军队中的位置，你若说他们个个是革命的，自然亦不免过誉，但若说他们是反革命亦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切不可轻易的说这个反革命，那个反革命，因为这样使人家怕得无法，他们怎样还要你在他们的军队中做工作？我们若能不伤害他们的位置，使他们不至于恐慌起来，他们亦不会怎样有意干涉你的政治宣传、农工运动，使自己得罪

本党与国民政府的。任你讲主义也好，讲策略也好，你总不要使他怀疑，使他害怕；你便自然知道，纵然官长表面上似乎思想同我格格不相入，他们亦不会怎样妨害我们的政治工作的。

第三，要谨慎应付环境。军队中作政治工作，自然一定会有许多困难的，最要紧的是要我们会应付任何环境。我说应付环境，有时亦许是要牺牲一部分工作来与军官谋相当的妥协，我们在工作上有时是免不了要妥协的，不过总要千方百计将党的正确主张传达到兵士方面去。譬如说，官长只许我们每星期讲一点钟亦不要紧的，我们若无法争得增加钟点，便是一点钟亦可以，我们只要力求这一点钟讲演的材料很好，只要能充分利用这一点钟，一定可以得着很大的效果。张作霖、孙传芳的军队，能容我们去宣传一点钟么？无论什么地方，不会没有机会做工作的，只怕我们不去找机会，或是不满意这个机会便不去做。其实便令有很满意的地方，军长、师长很欢迎我们去做工作，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不好有点大意的。你如果不留意，跑去乱说，团长、营长马上就要不高兴起来，这个时候你若还不能认清环境，还是只知仗着军长、师长的帮助，一味孤行己意，那便一定会惹起团、营长都要求撤换你，在这个时候，军长、师长便想帮助你亦会没有法子的！所以我们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中间，都要能小心谨慎应付一切，才可以扫除工作之障碍，如果不能小心谨慎、善于应付，无论遇着顺境逆境都是会做不好的。我这所说的并不是要教大家遇事顺从军官的意思，一味避免冲突、敷敷衍衍的去做，我只是说不必要的冲突要避免的。我们做一切事，总先要估量我们的力量如何，自己没有力量便令应该做的事情，都不可随便去做，象现在一般人完全不问自己力量，爱管闲事，随口批评

人家，反对人家，这是很不对的。

第四，宣传不可太着实际。宣传的材料同士兵的生活固然不可不接近，然而太接近了亦不好的。这一点亦许是我一个人的经验是如此，还要请大家研究是对或不对。我们平常做农工运动，宣传越合实际越好，不过我以为工作的方法与材料，应当是随时随地随工作的性质而不同的，军队中的宣传方法与材料，切不可拿来与农工运动相提并论。譬如农工运动可以尽力提倡为本身利益奋斗，便会因此促进了阶级争斗，亦只是地主、资本家稍有不利，于革命是有利的。然而军队的宣传，如果亦这样提倡为本身利益而争斗，那么兵士便要同军官争斗，不是要将全军队弄糟了吗？有些人以为他那里军官不好，让他做下去，有妨碍于革命工作，所以他以为士兵与这种军官发生冲突，正是好的现象。其实他所谓不好的军官未必当真是不好，假令他那里军官是不好，但是好的军官又从何处找呢？彻底的不要他所谓不好的军官，而又找不着比他们更好的军官，然则国民革命军交给谁指挥呢？日前有人对我说，军队的军官怎样坏，军队怎样不好，非解散不可；我亦不与他辩论，只是将其他的军队的情形与他讨论，一个一个的问他，这样的军队要不要解散？他说得渐渐不能说了。当真照他的意见，所有革命军都要解散了。他这样的意见，香港政府是第一个赞成的。我们在军队中做工作，是在于设法使军队进步，不是在破坏军队，这一点一定是要彻底明了的。有些工作人员看见士兵不满意军官，他便故意向士兵讨好，指斥军官每月有饷多少，他们与士兵是怎样不平等；我们本人高兴与兵士一样同甘苦是很好的，拿这来干涉别人家，并且来挑拨人家对士兵的感情，这是很危险的。做政治工作的人员要负这种责任，军队发生

纠纷时你要设法去解决，要使军队的精神团结得更坚固，决不可以不负责任的去煽动兵士，宣传太着实际是免不了有煽动之危险的。不过有人要问宣传要不十分切合实际，怎样能引士兵上革命之路呢？这不是绝对没有法子的，士兵的前身是工农，革命成功，士兵仍要归工归农的，所以将工农的穷苦情况说给他们听，将如何改良农工生活的策略解释清楚，这一定能增加士兵的觉悟程度与革命精神，坚定士兵对于革命的信仰。而且这样做可以使士兵完全站在农工方面，认清为农工利益奋斗便是为自己的利益奋斗，这比专教他们在军队中争自己的利益，要好得多。我们要认清这是我们主要的任务，将精神集中在这里。如果军队中没有发饷，怎样办法呢？要你解释不发饷的原因，由于政府财政支绌，政府财政支绌，由于反动势力未除，所以军费太大；又因为帝国主义的剥削，使人民负担租税力薄弱，这样不但可以使士兵不至完全灰心失望，且可使士兵更加明白的认识其敌人。此外我们的工作，要士兵得到革命的基本知识，亦是很要紧的。例如，革命是怎样一回事呢？中国现在的情形怎样？世界现在的情形怎样？何谓帝国主义？何以会发生帝国主义？怎样才可以打倒帝国主义？这都是士兵必须要知道的，我们要士兵有革命的迫切需要。但必须他们懂得革命的全部分的利益，才可以不使他们不因一部分的利益，而忘记了全部革命的需要，自然我们是不应帮助军官哄骗士兵的，亦不可使士兵随便反对官长，为革命的利益服从官长，同时设法改进自己的军队。

明白了上面这四点，便能谦恭接人，使军官了解我们，这样便可以进行一切工作也不会有很大障碍了。我们真能这样做，不但可以使士兵接受我们的宣传，并且可以使官长渐渐的高兴

研究，亦接受我们的宣传。我们不会有甚么重大困难的。我上面所说的话，都是由个人经验得来，自然不一定都是对的。我只是要提出来，请大家讨论讨论。

九，一五。

载《政治工作演讲集》第一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印行

署名：恽代英

政治学概论*

（一九二六年九月）

编辑大意

此系初次试验之作。作者明知自己的研究与学识是不够做这一件事的；只因现有各种政治学书籍，非理论太过陈腐，即与本党政治学说丝毫不生关系，殊不合于本党同志研究政治之用，故于授课之时，冒险为此试验。自然，错误是不可免的，缺点亦一定很多的；但是，只要能够在授课之时，使学者可以得着许多近代的政治知识，了解本党对于各种政治问题的主张，而且供给一个幼稚的草稿以便有专门研究的人改削补正，这总不是无益的事。

此书之内容分五讲，其目次如下：

---

* 本文曾作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讲义丛刊第五种印行。

第一讲 政治 国家

研究问题

一，政治在有阶级时代，与在无阶级时代，其意义相同否？

二，本党所谓全民政治，与美国、瑞士所谓全民政治有何不同？

三，本党所谓全民革命与国家主义者所谓全民革命相同否？

四，为甚么我们并不主张今天废弃国家，而又要反对国家主义？

五，本党对于无政府大同主张取何种态度？

六，何以我们要反对无政府主义者？

七，卢梭以国家起于“民约”论，于理合当否？

八，甚么是国家三大原素？何以证明缺一原素即不能称为国家？

九，何谓殖民地？何以说中国是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

十，本党要创造怎样的国家与政治？其最终目的为何？

政治学是什么？自有历史（有阶级制度）以来，政治总是统治阶级（压迫阶级）之治术（治理被压迫阶级之术）。封建政治，是封建阶级（君主、贵族）统治其他阶级之术；资本主义政治，是资产阶级统治其他阶级之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是无产阶级统治其他阶级之术。到没有阶级的时代（自由社会），政治则成为全民治理自己事务之术——所谓全民政治。在这时候的政治，实际上仅等于现在经济事业（公司、工厂等）委员会中之事务。是

以治事为目的，不是以治人（镇压反对派势力）为目的的。

目前中国的政治，乃帝国主义者与其走狗互相勾结，以统治中国被压迫各阶级之术（公使团、北京政府、军阀、买办阶级之治术）。革命政府之政治，是此等被压迫各阶级（全民）起来抵抗帝国主义，打倒与镇压一切反革命势力之术。

国家是什么？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国家机关，都是适合于用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在原始时代，没有阶级，便没有国家。中世纪的封建诸侯、军队，便是封建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近世纪的三权鼎立与军队、警察，是资产阶级压迫平民的工具，俄国的苏维埃、红军，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和反革命派的工具。

目前中国的国家，是帝国主义者与其走狗宰制国内被压迫各阶级的工具，他们用不平等条约、法令，以及各种不平等的制度来束缚中国人民。本党要建设的三民主义的国家，是要唤起此等被压迫各阶级，联合起来抵抗帝国主义，铲除反动势力，以完全实现三民主义。

国家是否永存的东西？国家在有阶级时代是必要的。到没有阶级的时候，所谓大同世界，政治机关既以治事为主，而国际间又有各种处理事务的组织，这种划分疆域统治人民的国家，当然便没有存在的必要。总理在民族主义第三讲说："要讲世界主义，要到民族能够独立自由以后。"这便明说国家在今日是必要的，在阶级消灭以后，可以不要国家。列宁说："到自由社会实现以后，没有阶级，没有压迫，即没有国家；然在此种社会没有实现以前，被压迫阶级要求解放，只有夺取国家的政权。"这亦是与总理的意见大致相同的。如在现在而主张无国家无政府，处在被

压迫阶级的地位，则有安于受统治阶级的压迫而不知反抗之弊病；处在统治阶级的地位，则有放任反动派的叛乱而不知防制的弊病。这是空想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为，不是真正革命的人所应主张的。革命的人要与各种反革命势力奋斗到底，只有完全打倒消灭了反革命势力，然后才可以实现无政府大同的主张。

国家的起源。国家不是固有的（以前游牧社会无国家），也非民众缔约结成的（历史上无此事实），更不是法律创造的，尤其不是神意的。国家是应于经济进化、阶级发生后，统治阶级的需要产生的。

普通所谓国家三大要素——土地、人民、主权，此三大要素必须同时存在（在一国内之土地与各族人民，完整的受统治）。

现在中国怎样？租界、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关税权，以及公使团之威权，都证明中国是个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所以说是半殖民地。因中国在国际帝国主义无怜惜地宰割之下，其地位比专做一国的殖民地还不如，故总理又称之为次殖民地。

第二讲 国体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研究问题

一、为甚么有些国家是单一国，有些是联邦国？

二、中国是纯粹的单一国否？

三、联省自治是否可以避免军阀间竞谋扩张地盘之害？

四、中国不允国内弱小民族自决，于汉族与各弱小民族有何利害？

五、是否因弱小民族自决可以使中国分裂？

六、本党何以反对各省间组织联邦，而赞成各民族间组织联邦？

七、中央集权之利弊如何？

八、本党是否主张在一定时期，有中央集权的必要？但本党何以能避免集权之弊病？

九、何谓均权主义？本党实行均权主义后与现状有何分别？

十、何以证明本党之政治定可代表各民族各地方民众的实际利益？

单一国　是全国成为整个的一个国家，中央政府有完全统治地方（行政区域）的权力。这种国家常由一种族或一部分人以武力侵略屈服他人的结果（总理所谓国家是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

联邦国　是在国内包含许多小的国家（邦），他们虽同意于受中央政府某种约束，然而同时有联邦政府，仍保留若干独立自决性的。这种国家常由他组成的各邦感觉共同需要而协约组织的。如德意志联邦为发展工商业之共同需要而组成，美利坚联邦为抵抗母国（英）压迫之共同需要而组成，苏维埃联邦为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白党之共同需要而组成。

中国是单一国或联邦国　是单一国；然而除了内地十八省与东三省汉人均占优势，其为单一国不成问题外，新疆虽改行省五十年，与甘肃西方均回人最多；三特别区（热河、察哈尔、绥远）亦系内蒙地方，蒙人仍在一半以上；青海、川边、西藏、外蒙，则蒙藏种族所居，以前与内蒙古等地皆分旗部定期进贡，仅等藩邦，

不能与内地各省相提并论。

中国应为单一国或联邦国　联邦论者（章士钊倡导最力，即所谓联省自治说）以为中国地域辽阔，中央不能顾及全国需要，宜分省为邦，使得自治。且现已成割据之局，欲以武力统一，徒滋祸乱，不如迳改联邦，各息争心，竞图内治。此等学说，本党绝对反对。因分省为邦，便不受中央节制，同时省仍不能顾及各县需要，所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徒为军阀增割据之口实。军阀割据，不知唤起民众以革命求统一，反为造割据之理由，以求苟安，结果军阀既多对峙存在，猜忌争竞之事仍不能免，徒滋祸乱而已。在内地十八省与东三省民众，绝无分国互相歧视之思想；所谓联省自治，完全为曲学阿世之说。

同时国家主义论者借大一统之说反对民族自决，以为满、蒙、回、藏、苗等族当同化于汉族，蒙藏等地均当夷为郡县，使受内地同等之统治。此等学说仍系旧日帝国主义之思想，本党亦绝对反对。中国内弱小民族受汉族或他族以前帝国主义的统治，被愚弄与离间，或经济势力的压迫，故有迷惑于宗教，有内部树立门户，自相戕杀，有因经济落后，以致处处居于不利之地位。故为弱小民族本身利益起见，有主张自决之必要。且现今蒙、藏本不驯服，回、苗亦仅羁縻一时，欲化其疆土成为内地郡县，事实上亦决不可能。军阀争雄长于中原，亦无人顾念此等穷荒之地。此种帝国主义之空想，徒示各民族以不诚，与帝国主义者以挑拨机会，使彼等对我猜忌疑惑，有损无益。苏俄在革命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从前俄皇以武力鞭笞之弱小民族，渐生离心之倾向。惟苏俄本列宁提携弱小民族之主义，毅然许各民族自决，建独立之苏维埃共和国，各民族建国以后，反感于苏俄之诚意，与自身

之需要，四年之间，遂以组联邦国统一全俄。此正合我国情，而可以为我之师法。

故本党主张在各民族之间，因语言、文字、经济、文化之不同，认为有允许各民族自决，然后组织各民族自由联合的国家之必要。但反对在汉族已经成为单一国之地域，顺军阀之意旨，强割国土，使成联省自治。

中央集权制　欲求统一全国政治上之指挥，使全国有整齐一致之进步，故有人以为应主张中央集权说。且在外患内忧交迫之时，欲集全国之力以资应付，更非有"强有力之政府"统一事权不可。

地方分权说　欲能顺应各地方之需要，发达人民自治的精神，故有人以为应主张地方分权说。若将权力集中于中央，减少人民练习实际政治之机会，易养成官僚腐败或专制之政治。

中国应采用集权制或分权制　中国在专制时代，有时完全用集权制，但自清末各省军政权渐重，民国以来军阀兴起，地方权更重，中央渐成虚名。本党之主张，在军政时期，完全应用集权制，集权于党治之政府，以扫荡一切反动势力。在训政时期仍应用党政府之集权训练地方（县、村）自治，以养成人民运用政权之能力。在宪政时期，则用均权制，即非集权亦非分权，但视事务之性质，应属中央则归中央，应属地方则归地方。但本党在均权时代，地方权力比现在要大得多。各地方税收至少须以一半以上归地方使用，地方土地税收，地价增益，水力矿产之利，山林川泽之息及其他公共收入，亦归地方使用。则地方事业一定比现在加倍发展。

第三讲　政体　人民参政的方式

研究问题

一，何谓迪克推多与德谟克拉西？

二，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有何异同之点？

三，为甚么苏俄亦不能实行全民政治？

四，何以证明中国非民众觉悟起来，决不能有良好的政治？

五，君主政治、贤人政治或立宪政治，在中国有实现之可能否？

六，国会制与直接民权制有何不同？与苏维埃制有何不同？

七，是否只有共产主义国家可以实行苏维埃制度？

八，何谓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

九，本党所主张之国民会议如何组织？何故容纳资产阶级或军阀军队之代表？

十，国民会议既开之后，可称为国民革命成功否？

十一，国民大会如何产生，与国会有何不同？

十二，总理主张设立五院，其名义如何？立法院即是国会否？

政体之分类　就已有之政体可分为两大类，一为专制政体，即迪克推多制，统治者超然立于法律之上，有万能权力以统驭其属下；一为立宪政体，即德谟克拉西制，国家有宪法，称为全国人民所共守，统治者亦不能自外于法律之范围。

专制政体之下，又可别为三种。（一）为君主专制，即个人独裁政治，君主视国家为私产，在国内有无上威权。（二）为寡头专制，即少数独裁政治，少数人视国家为私产，共同宰割全国人民。

（三）为贵族专制，即封建阶级独裁政治，诸侯卿大夫视国家为私产，刑罚效力只能及于庶人。

立宪政体之下，亦可别为三种。（一）为君主立宪，即君主国而有国会宪法，实际乃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妥协，以共同统治其他阶级之方法。君主立宪国有封建阶级势力较强者如日本，有资产阶级势力较强者如英国。（二）为民主立宪，即无君主而有国会宪法之国家，实际乃资产阶级独裁政治，其国会宪法乃资产阶级统治其他阶级之工具。（三）为苏维埃立宪，即无君主国会，而有由工农团体等代表所组织之苏维埃大会之国家，实际乃无产阶级独裁政治，其苏维埃宪法，乃无产阶级统治其他阶级之工具。

故可知立宪亦犹如专制，在有阶级时代，政治总是一阶级压迫别阶级之方法，决无全民政治可言。

中国应当采用何种政体　有人说，中国仍旧应行君主专制，他们以为十余年之纷争扰乱，皆以全国未能定于一尊之故。这种人只看了十余年来伪共和政体之缺点，却忘了二千余年君主专制之成绩。在君主专制国家，君主孤悬于上，自己既易专恣纵欲，耳目又易为奸佞所壅蔽，尧舜之世不过学者托古拟臆之辞，凡书籍所载，则尽系昏庸贪暴之君主，满清之倾覆即足证君主专制制度之破产。居今日而追慕君主专制之世，徒见其思想落后而已。且在此军阀割据之时，欲求纳此多数军阀于君主专制范围之下，亦为事实上不可能的事，袁世凯之倾覆，复辟之失败，与其说是人民势力，不如说是军阀不愿使天下定于一尊之结果。由此可知非打倒军阀，亦无实现君主专制之可能。然果能打倒军阀，天下亦无此痴人尚坚持要君主专制了。

有人说，中国需要贤人政治，或说需要先组织好人政府，人民非得善良政府，则一切改进计画均无从进行。然而所谓贤人或好人若脱离了民众，仍易受人壅蔽，为意气支使，做出种种坏事。如民国以来，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非各无一日之长，然卒之祸国殃民，即是其例。若果以好人孤悬于上，不受人壅蔽利用，则又易因无群众拥护而被人打倒。且贤人或好人有何公认之标准？北方反动派可以熊希龄、梁启超……① 等为好人，然而在我们则认为一般土豪劣绅，或帝国主义军阀之工具；我们可以汪、蒋诸革命领袖为好人，然而反动派则认为系赤化捣乱之徒。所谓好人标准不同如此，好人政府论不过是一篇废话而已。

有人说，中国需要民主立宪，宜实行宪法，扩张民权。然而在外国所谓宪法民权，皆由资产阶级打倒了封建阶级，或无产阶级打倒了资产阶级，然后以他们自己的实力规定宪法，并保障其实行。中国人若无打倒帝国主义军阀的实力，虽有宪法亦等于具文，有何方法禁人利用或破坏宪法？若说借宪法一纸空文，即可纳反动势力于轨物之中，徒见其空想而已。

本党的主张，最后的目的是全民政治，即是说不是一阶级压迫别阶级的政治。但这是宪政时代阶级消灭以后的事。在革命时期，主张党治，即是以党的力量施行军政（压迫反革命势力）训政（训练人民政治能力），必须这样做才能达到宪政时期。党治不是开明专制或贤人政治，因一则其目的在达到民治，并非永久想要一个人或少数人包办下去；一则党治虽由少数人领导着进行一切，然此少数领袖决非孤悬于上，任意进行，他们乃本于一

① 略有删节。

定之主义策略，而有多数同志在下面与之共同努力拥护监督之。故可无专制或贤人政治之弊。

人民参政的方式　就已有人民参政之方式可分为三种。一为国会制，即划分地方为选区，于一定的时期每选区由有选举权之公民临时集合投票，选举议员，选举以后一切议政均由议员代表，人民退处无权地位（代议制）。二为直接民权制，古代部落甚小时，一切公共的事均由全体讨论通过，此是原始的直接民权。近代的直接民权制，如瑞士及美国数省所实行，则系于国会以外，人民若有不满意于国会或议员者，得以一定人数之提议，召集公民投票，或不信任议员而撤回之（罢免），或不同意于国会之决议案而重复表决之（复决），或提出国会所不肯通过之议案而直接议决公布之（创制）。故直接民权所以救国会制之弊，即人民于选举权外，尚有创制、复决、罢免权是。三为苏维埃制，即不用地方选区为选举单位，而用生产者的职业团体为选举单位，他们随时可选举或撤回代表，或命令代表提案，或请求复议，故亦有直接民权之妙用。

中国人民参政应当采用何种方式　国会制是最不良而为本党所反对的，他是由乌合之众临时选举，选举时只有绅士政客之姓名易因为众所周知而获被选，若加以贿买运动，尤易使他们被选，被选以后可以无恶不作，而无人可以监督裁制之。民国十余年国会之丑史，久为人所唾弃，即知此制之弊害。直接民权制为本党所主张，因人民不应只有选举权，必须兼有罢免、创制、复决诸权。苏维埃制总理曾于民权主义中说及，但以所得材料不多，故未评论。（苏维埃制与共产主义不可混为一谈，犹政府用委员制不可便认为赤化。）但就所主张国民会议组织法，可知本党是主

张以职业团体为选举单位的。

本党所主张的两种民权制度 本党所主张的民权制度，一是革命时代的国民会议，即由农会、工会、商会、学生会、教育会、大学、政党、现代实业团体、军队之代表所组成(预备会议代表系派出，国民会议代表系选举)。此九种人民团体，皆系职业团体代表。或疑此中有许多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且在预备会议中允许合作革命的军队派代表，已恐有投机分子混入，国民会议更不论其为革命或反革命的军队，皆得选举代表，殊为不妥之事。不知此正总理联合各阶级革命协力之苦心。资产阶级虽每有右倾之病，但与其拒绝使不参与民众之联合，逼其走入反革命之路，不如使加入国民会议，用下层民众势力引其左倾。合作革命的军队允其派代表，所以示天下以大公，然彼等代表占民众代表中甚少数，可受训练而不易左右会场，故无取拒绝之；至将来各军由兵士选举代表，虽反革命军队，兵士群众并非反革命分子，当然有选举权，且藉此可使兵士为自身利害与民众合作。总之，国民会议开幕以后，左派自然必须努力奋斗，方可防止右倾之弊；然总理原来主张，则适合时代之可能性，无可疑议的地方。

一是革命成功以后宪政时代之国民大会。国民大会是一国最高机关，由各自治之县选举代表组织之。国民大会并非如国会以立法或监察为职责，国民大会以下，有政府之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均以考试取有能力人任之。立法院性质如法律编订委员会，可自草定法律，通过法律，但彼所不肯通过或通过未得当之法律，国民大会于必要时可实行创制权、复决权，监查院有弹劾官吏(连立法院官吏在内)权，但彼所不弹劾，国民大会于必要时可实行罢免权。国民大会之选举，纯粹按地方区

域选举；但系如国会议员选举法呢，还是由各县议会选派代表呢？又各县总理主张采行直接民权，然县中议会议员还是如现在县议会按地方区域选举呢？还是由各职业团体选举呢？总理未曾说明。不过依近代政治学理，与总理所主张国民会议选举法观之，各县选举应以职业团体为选举单位，国民大会应由各县议会举代表组织之，断无用现在国会或县议会选举法之理。

第四讲　人民的权利

研究问题

一、国权论者与民权论者之主张如何不同？

二、主张国民革命者是否应承认阶级之存在？

三、本党为何反对一切压迫，而又否认“一切压迫皆是罪恶”？

四、何谓“平头的平等”？何谓“立足点平等”？本党主张何种平等学说？何故？

五、一般资产阶级国家，对人民选举有何种限制？本党主张有何种限制？

六、为甚么无财产无学业程度之人亦应有选举权、被选举权？

七、本党是否主张人民皆可做官？

八、本党主张人民如何行使直接民权？

九、国家对于人民之生存与工作权利应如何保障？

十、工人煽动同盟罢工何以不是犯罪？是否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工人有罢工的自由权？

国权论与民权论　政治学家有以为对国家为人生最上之义务，国家有其独立之人格，为国家利益虽牺牲大多数人民之利益亦为应当之事。此为国权论。欧战前德日学者多主张之，至今国家主义者犹承袭其说。惟民权论者则以为不然。民权论者注重民众实际利益，否认在大多数人民利益以外，尚有所谓国家利益可言。民国以来，本党主张民权论，进步党主张国权论，实际所谓国权论只是帮助袁世凯与北洋军阀建设强有力的政府，压迫剥削民众的实际利益而已。本党注重代表被压迫民众实际利益而奋斗，本党的国民革命，即是被压迫各阶级联合的革命，国家主义者则欲借“全民”革命之名词，否认阶级之存在，这便是民权论与国权论最大不同之点。

本党民权主义之特点　本党民权主义与普通所说有不同之三点：(一)各资本主义国家所谓民权，每为资产阶级所专有，借以为压迫平民之工具。本党则主张由党治做到全民政治，民权为一切民众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私有。(二)“天职人权”论者以为人权由于天赋，故人人应平等自由，一切压迫皆是罪恶。本党则反对此迷信，不合现在中国革命需要之学说。以为民权乃大多数民众为自己兴利除害之工具，若与大多数民众为仇敌之反革命者，绝对须剥夺其民权。(三)普通主张民权平等，每希望一切人的生活与所受社会之待遇须平等（平头的平等），但在此社会系不可能的；勉强做到，亦多流弊。本党所主张民权平等，则只主张人民在受教育与工作等机会上平等(立足点平等)。换言之，即主张一切人在政治经济上其出发平等，至其造诣则不强其平等。因现在世界上最不平者，即在出发点不平等，故或贤智而地位低微，造就上用力多而成功尚不如庸愚，或径以贫寒之故无

造就自己的机会。故本党必须为此种平等之理想奋斗。

人民政治上的权利　可分两种述之，一为参政权，一为自由权。

人民参政权，本党主张于间接民权（选举）以外，尚须有直接民权（罢免创制复决）。关于选举方面，一切选举被选举均须取普通选举制，废除任何人为的限制。现在资产阶级国家，每规定须有一定额财产或纳税（中国县自治法须有动产或不动产五百元以上，或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始有选举权，有照此一倍之财产或纳税额的始有被选举权）。一定学业程度（中国县自治法须高等小学毕业始有选举权，中学以上毕业始有被选举权）。又须限于男子（县自治法即是一例），且非现役兵士或学生或小学教师，始有此项权利。此等剥夺穷苦失业之人，与女子与某种职业中人之选举权、被选举权，为毫无理由之事。本党主张须废除一切此等限制，除未成年之人与有神经病者以外，一切男女均有同等选举权、被选举权。惟此地须注意者，人民虽均有选举权利，此并非谓人民皆可做官，一切官吏（连立法院官吏在内）均须考试，然后任用。因人民须有任用罢免指导监督官吏之权，然官吏必须有能，然后不至偾事。权与能必须分别明白。关于罢免、创制、复决等民权，在自治之县人民可直接行之，在全国可由国民大会代表行之。

自由权　本党主张人民在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等方面，均有完全的自由权，除反革命者外不受一切限制。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皆训练人民过政治生活之最良方法，因有演说、传单、辩论、报纸等，然后能引起一般人民注意，而了解政治问题。信仰自由以无干涉之必要故。惟如基督教未脱离帝国主

义之关系，我们当站在反帝国主义观点上反对之。

人民经济上的权利　可分三种述之，一为生存权，一为工作权，一为罢工权。

生存权是说老幼残废的人，要有公共赡养的机关，疾病的人，要有公共疗治的场所，失业或工资太少的人，要有公共补助的办法。工作权是说国家要负责使每人有工作，国家负介绍工作之责任。这都是国家对于人民应有的义务。现在中国竭国家财力以事奉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对于失业或被压迫工人漠置不问，任其自生自死，老弱残疾则付之于社会慈善机关，国家不负责任。这种国家既不与人民利益发生关系，徒为统治阶级压迫之工具，凡失业或慈善机关所不能赡养之人作有越轨之事，即以法律绳之，故为被压迫者计，打倒改造这种国家实为必要。

罢工在此以劳力当商品买卖之时代，其意义等于工人不肯出卖劳力，犹如商店有时不肯卖商品于客人一样。即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亦多公认罢工非犯法之事。或疑工人煽动同盟罢工，影响国民生活甚大，不应放任其自由；然国家一天未能禁制资本家压迫工人，工人非同盟罢工，即无制胜资本家而图自己生存之道，在此情形之下，欲禁制工人罢工——剥夺工人反抗资本家之唯一工具，则是有意无意中帮助资本家，决非本党主张平等者所应有之主张。

第五讲　党

研究问题

一，为甚么中国人相信不党之说？此说果正确无弊否？

二，革命党人若能勇敢实行，而不注意研究政法，可称为良好的革命党人否？

三，本党是革命党，还是政党？

四，何故同盟会老同志在破坏工作以后，将政权交给反动派？

五，何谓“以党治国”？

六，在党治政府之下，党员有何权利义务？

七，总理的主义比孔子的学说价值如何？

八，何以说仅仅讲“孙文主义”，或知道遵守纪律，还是不够的？

九，党的主义要如何才有能号召群众一致动作的力量？

十，何谓政纲？何谓政策？

不党说之批评　中国人承袭孔子“君子群而不党”之旧说，每以为成群结党，非正人所应为。实际“不党”之说，乃封建君主借以自便，因只有民众完全如一盘散沙，他们才可以一人或少数人宰制鞭笞之。中国如汉、明党人，均一时贤俊，但以政治上恶势力锄除之惟恐不力，故国家亦日趋危亡；乃封建阶级巧为说辞，认此辈党人负亡国之责任，以证明其不党之义。这真是荒谬之极的理论了。再就事实观察之，中国人虽主张君子群而不党，遂能因此禁止小人结党吗？小人结党而君子不党，果为国家社会之幸事吗？今日在朝如直系、奉系、安福系、研究系、交通系、外交系，在野如江苏省教育会系、教会系、某大系、某高系、某学社系，无一非党，他们无一不具有相当之势力，能把持操纵中央或地方之政治。但他们却均无可以公开告人的政治主张，只以争权夺利排斥异己为能事。在他们之下，不党之君子决无力与

之抗拒，其结果非同化即归于消极。故君子不党，则使此辈小人永久鸱张，政治永无清明之望。现在中国亟需有显明政治主张之人结为大党以与此辈小人之党奋斗。非此不能集合革命之势力，以建造新中国。

政党与革命党 有人分党有政党与革命党两种。实则此系误解。政党有不革命者，如民国元年之国民党、进步党，或英之保守党、自由党、工党，美之民主党、共和党，皆系代表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之利益，欲以国会投票多少争取政权。然未有革命党应不为政党者。革命党乃系为一种政治主张而奋斗，他们要破坏一切妨害此政治主张之实现的障碍物，要自己负依照此政治主张建设国家的责任。故如本党乃至印度、埃及、土耳其之国民党，与各国之共产党，莫不有其显明完密的政纲。如革命党而不为政党，革命党党员不要求受相当的政治训练，他们自以为只做破坏的事，而不须负建设的责任，那便必会与我们同盟会一般革命老同志一样，他们破坏有相当成功以后，将建设的责任交给反动派渠魁袁世凯之手。没有政治训练的革命党员，不但自己不能负建设的责任，亦不会能懂得拥护真正建设的主张。辛亥以后，总理主张每遭同志否认，即其明例。故革命党必须是政党。不然，则革命党之所谓革命，简直是无意义的捣乱了。

以党治国 总理因为要使党员了解自己对于建设之责任，故特标“以党治国”之义。但我们须知所谓“以党治国”乃谓党员均须了解主义，拥护合于主义的政治主张，反对违背主义的政治主张，党须有充分力量操握政治之主权，而且使一切政治设施均能符合党义。

所谓“以党治国”，决不是凡在党治之下，一定要党员才许做官，或尽先用党员做官。这便成了为自己分地位权利的党了。俄国共产党执政后，除政府大权由党人掌握以外，其余职务多由非党员充任。即军队长官，亦每任用非党员，乃至白党中人，而以党员为党代表监督之。党员任官吏，薪金有最高限度，非党员则可高至四五百元以上。党员犯罪，除依普通官吏犯罪惩罚以外，尚须另加党的惩罚。如此，故党员均洁己急公，无投机腐化之弊。如党治之下，对党员事事优待，则党员成了一种特殊阶级，仿佛如古帝王从龙之士了。（关于此义总理赴桂林时亦曾讲过。）

党的两种要素——主义与纪律。

党的主义不是一个空洞的学说，他是根据被压迫群众生活上的痛苦与要求而形成的。

所以他能有号召广大群众的力量。有人比总理的主义如孔子的学说，实则孔子的学说不过得着三千门徒，而总理则有数十万党员，如何可以相比？总理的主义所以能得着这多群众，即以总理的主义系代表许多人利益的原故。若不顾许多人的实际利益，专门空洞的讲甚么“孙文主义”，自命为“孙文主义的信徒”，这不是推崇总理的主义，是使主义的真面目反不为群众所认识的。

主义的解释，必需是绝对统一一致的。主义的伟大作用即在他能根据群众本身的需要，而提出具体的主张以号召群众，共趋赴于同一之鹄的。若有人对于主义发生特殊的主张，即能纷歧党员的趋向，分裂党的群众。党员应详细研究党的宣言、训令、决议案，不要将自己党的主张，妄疑为他党的主张；不要因畏惧党的主张太激烈不合流俗，便在背地坚持自己怯懦固闭的意

见。这样，主义才能统一群众的耳目，发生大的力量。

一定要有表现主义精神的政治纲领，与如何实现主义的政策。不然，则主义成为空谈，无法得人相信而实现出来的。

一定要有严整的纪律，能部勒数万或数十万党员，在党的命令之下一致活动。一若无纪律，不能使党员一致服从党，则党虽大而力弱，不能担负革命使命的。党员要守纪律，最注意是在不愿守纪律时能守纪律。如平居无事则高谈纪律，偶有于己不合之处则破坏纪律不顾，如此，则纪律之效完全没有了。

据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出版单行本排印

署名：恽代英编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

广东青年很少怕共产党的，除了几个被人蒙蔽欺骗的人以外，亦很少人反对共产党。但是他们有时还免不了将共产党看做一件神秘的东西，有时又认为共产党员是一个好听的名词，想加入共产党。

中国能够有很多共产党员，自然是好的。不过不容易做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是不愿意有一个不合于下列标准的人来做他的党员的。

做共产党员要合于甚么标准呢？

第一，要能够确实有决心谋农工阶级的彻底解放，打倒一切寄生的压迫阶级——地主、资本家。共产党不只是讲国民革命的，亦不只是为了要农工帮助国民革命所以才帮助农工，他硬是要为农工自己的利益，彻底解决土地农有，工厂由工人管理的问题。一个国民革命的左派不一定能够做共产党员；假如他自己只知注意国民革命，他决不能为共产党最后的主张而奋斗！

第二，要能够明确了解农工阶级的解放，不是少数人理想的要求所能达到目的的，必须有大多数实际受压迫的农工觉悟组织起来，而且必须有居住与生活上最易组织的人（如产业工人）为他们的中坚与领导者，才能很有把握打倒一切压迫阶级。共

产党员决不迷信任何个人的力量，亦不迷信他自己的能力；凡相信离开了群众的力量，仍旧可以解放甚么人的，一定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

第三，要能够到各种有群众的机关中间去组织一个核心，注意本机关中群众的各种实际问题，宣传他们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起来奋斗，而且自己站在前线上面领导他们奋斗！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漠视本机关群众的利益，或畏怯不敢领导群众上前奋斗。共产党员不但要领导群众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奋斗，而且应当特别注意考察群众自己与敌人的实际力量，随时规定出进攻或退守的合当策略，而且要能用各种方法使群众接受我们的策略。这样才不是跟着群众的尾巴跑的，才能使群众不至于走入幼稚的错路上，被敌人打败。

第四，要能够很忠实的接受党的训练，严格的服从党的纪律，要能扫除一切在封建社会或买办阶级文化的社会中所养成的错误思想，养成功一个彻头彻尾的布尔塞维克的精神，切实负责将党的意见散布到各种群众中去。共产党员是党的一个细胞，共产党的每个细胞都要是很健全而富于活动力的细胞。要固执错误的思想，不受党的训练，对于党的意思怠工，不肯传布到群众中去的人，根本不合于做共产党员，应当将他们踢到共产党的门外去。

第五，要能够为了革命的利益走到任何困难危险的环境中间去，一面很谨慎的为党守严格的秘密，而一面又能很诚意的与各种可以在今天此地建立联合战线的人结成亲密合作的关系。亦许有些人在将来对于共产党是有危险的，亦许有些人在现在便可以与共产党发生许多的麻烦，但是共产党员不应当回避这

种危险与麻烦，要勇敢的上前去，迎着这种危险麻烦，在这中间得着群众，以保证我们最后的胜利。

要做共产党员的人或是已做共产党员的人，且自己想想，够得上做一个共产党员么？

载《少年先锋》第1卷第4期
署名：代英

十五年来的双十节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日）

现在是第十五个双十节了！

民国元年以前的十月十日，是有些死中求生的革命党人，拚着极大的危险与牺牲，从满清的手中，夺回来失去了二百六十余年的武昌城，而且接着恢复了全中国的领土。所以到了民国元年的十月十日，第一个双十节，全中国的民众都热烈到发狂似的庆祝他。

可是那时的革命党人与民众究竟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所以不到第二个双十节的时候，革命党人便失败了。从前由革命党人所拥戴的中国唯一的建设的领袖“袁大总统”，已经称为革命党人为“乱党”，从前由革命党人所付托以统治武昌城的“黎副总统”，亦轻轻地将武昌城让给“袁大总统”了。

从此以后，武昌城便在革命党的敌人手中，其实岂但武昌城，北京政府与全中国各地差不多亦都在革命党的敌人手中。在这种时节，双十节能够有甚么意义呢？双十节是革命党的纪念节，革命党的敌人怎样纪念他呢？

他们亦纪念双十节的。他们在这一天要张灯结彩，授勋章，晋官级，除此以外，他们还要派双岗的警察，在空场中驻扎军队，他们“有地方之责”，不能不“谨防有好乱之徒，乘机滋事”。

难得有了他们，将我们从第二个双十节一直保护到现在，都能够平平安安的过了！革命党人从民国二年失败到现在。

最近几年，似乎是革命党人翻身的日子了！革命党人渐渐与民众相接近，他们不一定要双十节才可以滋事。“五一节”亦好，“五四”亦好，“五卅”亦好，“九七”亦好，无论遇着什么日期，什么题目，他们都可以滋事的。革命党的敌人嚷着“赤化”、“赤化”，他们委实有些着慌了！

尤其是今年，革命党人得了民众的援助，居然又到了武汉！武昌已经围困了一个月，不久又要落到革命党人的手中。迟早全中国的领土总是要恢复的！我们再预备着热烈到发狂地庆祝罢！

不过，这一回我们的革命党人将要又来拥戴谁做建设的领袖呢？将要又将武昌城付托给谁呢？一般人心目中，恐怕还有他的“袁大总统”、“黎副总统”罢？

革命的民众起来！我们要拥护革命党人，我们亦要时时预防而且纠正革命党人的错误（如果是有的）。我们要拿民众的力量统治一切革命的地盘，建设平民的中国；只有有了民众的力量，才不会有“袁大总统”式的对于革命的反叛，亦不会有“黎副总统”式的出卖革命事情。

从民国元年一错错到民国十五年，不要再错了！不要再从民国十五年错到民国三十年罢！

载《少年先锋》第1卷第5期
署名：代英

工农商学联合政策*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八日）

要讲这个题目，首先就要明白国民革命的意义。国民革命是求各阶级解放和利益的，所以国民革命须要各阶级参加，可以说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

处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不论何阶级，都是受着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其中要以农工们所受的痛苦为最。据农商部调查，中国的农民三分之二每人所耕的不满十亩。农民近年受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影响，出产的销路日益减色，而必需的工业品的价值，日益昂贵；加以水道失修，往往引出天灾，肥料不足常常影响收成，所以每至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总是没有饭吃，易于流为盗匪。工人生活也是很困难的，不独工厂房子设备不全，妨碍工人卫生，而资本家常常设法想增加工作时间和减少工资，使工人生活上时时发生恐慌。农工在这等经济制度之下，一定是需要革命的。商人除买办阶级以外，其余都是很困苦的；连年兵匪为患，货物交通来往不便，商人因此破产的不知许多。一般小商人，也是需要革命。学生则大半总是没有钱交学费，没有钱买参考书，中途辍学的亦多得很！即或勉强毕业，在社会上也很难得

* 这是恽代英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别训练班的讲话。

找着饭碗，他们外面虽然爱阔绰讲究，实际上生活和工、农、商还不是一样感受痛苦。他们除革命亦是别无生路可走的。这四种人，生活上都是感受痛苦的，同时都是需要革命的。我们担任国民革命工作的人，一定要唤醒他们起来，领导他们奋斗，解除他们自己的痛苦。所以国民革命，是为各阶级利益的革命，亦是各阶级人们都有加入之必要的革命。

不过我们仔细研究起来，各阶级利益究竟是不同的，有时并且还互相冲突，农、工、商、学在理论上虽是有联合的可能，在事实上往往不然。比如工人要组织一个工会，在学生看来是漠不相关的，在商人看来却会认为对他们利益有妨害的，他们是要反对的。象这样的情形，现在我们要把他们统通联合起来，不是困难得很么？不过各阶级目前有个共同的利益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在这一点上各阶级是有联合的可能和必要的。在国民革命时期，各阶级利益尽管有些冲突，仍应同心协力去打倒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军阀！

要不失工、农、商、学联合的真正意义，最重要的我们要认清工农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因为工农人数极多，生活上又最有革命的要求，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定要得着他们的帮助，我们必须设法使农工群众越发团结，越发有力量，国民革命，才越发有成功的希望。所以为了国民革命，想完全避免错误；若使工农受了压迫，不许他们自己起来斗争，这不是不要农工群众帮助国民革命，不要农工势力得着发展的机会么？自然阶级的斗争，要注意与商、学不致发生很大的破裂，妨碍了联合政策，这是很重要的。农工群众一定要有很好的训练，要很会斗争，同时也要很会联合各阶级，这样，才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冲突，有力量去打

倒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军阀，同时又不会妨害农工本身势力的发展。总结起来，我们讲工、农、商、学联合政策，应该注意的有四点：

1. 不要轻视商学势力。

2. 不要忘记农工是革命的根本的力量。

3. 注意工农商学各阶级共同的要求。

4. 注意工农商学各阶级利益冲突的地方，不要因此妨害了各阶级的合作，同时亦不要因此妨害了农工势力的发展。

载《黄埔日刊》副刊《革命之路》

署名：恽代英

告投考黄埔军校的青年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吴稚晖先生到广州的时候，常常引述北方的青年普遍的有一个“到黄埔去”的口号。从北京来的同志亦告诉我，自从三月十八日大惨杀以后，北京青年大家都是这样说：现在只有三条路，一是读死书，二是无意义的闲耍，三是“到黄埔去”。

这是无足怪异的：中国到了今天，在北方帝国主义、军阀之下，政治与教育，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我们蓬蓬勃勃的青年，内感于自己与家庭生活的不安，外感于学校的腐败与政局的紊乱，无论为中国或是为自己都会相信是应当要改变一种生活。黄埔军校是近年来国民革命运动的重心，在南方方兴未艾的“赤化”势力之下，有一般革命的领袖正在尽心力的培养熏陶将以供给中国革命的军事与政治上的需用。黄埔的教育是有目的的，是切实认真的，他的学生在学校的时候是免除一切费用的，毕了业以后是有比较可靠之出路的。以黄埔的地位与名誉，及他所能给与一般青年的满足与便利，他自然会成为全国青年“心响往之”的地方。所以我们说，这种“到黄埔去”的呼声，是没有甚么可以怪异的。

不过若是一个人真个以为“到黄埔去”是唯一的解决中国问题或是自身问题的方法，以为达到了“到黄埔去”的目的，便可以

说是已经解决了中国问题或自身问题，这种人无论能够考入黄埔军校与否，都会发生各种失望的心理；他们不但会失望，亦许他们甚至于会发生别的错误与危险的事情。

假定一个人考入了黄埔罢！就我所知道的情形，黄埔校本部将三千人，入伍生约四千人左右，因为人数甚多，规模宏大，所以办事方面是有种种不周到地方的。所以说到生活，居处饮食的不合宜，医药疗养的不满意；说到教育，学术科官长的不能完全称职，政治工作的不能满足需要，这都是可以想得到的事情。黄埔是革命的学校，自然是不错的；黄埔的负责人员都曾经极力想将黄埔办到理想的田地，这亦是实在的情形。但是因为人才的缺乏与物质方面的限制，黄埔还是免不了有些对不住革命青年，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的地方。我的观念，以为黄埔只是一般积极革命的，或者是除了革命亦没有其他路子可走的青年的一个归宿。在这个地方，我们固然可以在可能范围内希望得着一个比较满意的生活；但最要紧的，还是要看清事实的可能性，预备忍受各种不能满意的生活，而且甚至于便在教育方面，还要预备在不能满意之中设法使自己能够得着比较满意的革命训练。一个人要是梦想黄埔是天国，他不但不会了解黄埔学校为甚么还有许多不能满意的地方，而且亦不会了解黄埔在革命运动中的真正效用。我要指出黄埔免不了有些不能满意的地方，这并不是要贬损黄埔在革命中的价值，乃是要说明黄埔之所以能在革命运动中起很大的作用，并不是因为那个学校设备的如何圆满，教育的如何美善，而是因为他能够集聚了若干革命的官长与学生，在革命的空气中互相切磋陶冶。若是一个人到黄埔里面去，他只顾对于设备与教育如何求全责备，结果他一定是得

不着满足的日子。若是一个人到黄埔里面去，能够勤求学问，严守纪律，但是不注意多接受那些革命的官长同学的影响，亦许他到毕业的时候，思想上并不能起一种左倾的变化，因而终究不能适应将来革命运动的要求。换一句话说，一个人便令“到黄埔去”了，若是他没有很合当的态度去过黄埔的生活，与很合当的方法去利用黄埔的机会，仍旧未必因为“到黄埔去”便能解决中国乃至自身的问题，这是投考黄埔的青年所必须知道的。

我从前在广州听见有些投考黄埔的青年，因为未经考取便灰心丧气以为无事可为，甚至有悬梁死的，有跳河死的。这真是很值得怜悯的事情。但是怎样办呢？黄埔已经收容了七八千青年，然而四方热心的或者是穷无所归的青年还有望门墙而不得入的多得很。革命政府财政的收入不是无限制的，黄埔规模永远的无尽期的扩大，乃是事实上不可能的事。黄埔对于投考的人一定不能完全取录（即如这次上海招该校政治科，投考七百余人，只取百三十人），若是未考取便要灰心丧气或甚至寻求短见，甚么人亦没有方法援救他们。不过我究竟要责备这一类糊涂的青年，为甚么竟是这样狭窄的见解呢？无论你是为革命，或是为你自己生计的穷窘，使你认为“到黄埔去”是你的最好的出路；你亦应当明白，假令世界上没有一个黄埔军校，你还是能够革命，或是谋一种解决生计的方法的。黄埔之所以能有益于革命，仅仅是因为有些革命的官长与学生可以互相切磋陶冶，这样的机会，只要我们能在无论甚么地方知道与革命的师友相接近，便都可以多少得着的。黄埔之所以能有益于个人的生计，固然他那种免费的教育与一定的出身，不是其他地方可以得着的，然而最要紧的还是因为他们有机会能够学习为革命运动所需要的

学识技能，关于这种学识技能，在许多方面亦是可以靠阅书，组织研究会，参加实际运动而得来的。我不反对青年投考黄埔，或者认黄埔为他们最好的一条出路，但是我反对他们把“到黄埔去”认为是唯一的出路。青年最要紧的精神，是要与运命奋斗，要在任何环境中间都能够解决自己乃至中国的问题。只认定黄埔是天国，不能考取黄埔便灰心丧气的青年，固然是值得怜悯的，然而他们那种愚昧软弱，亦只够得上人家稍一动“怜悯之念”而已。

我的责任，应当为《中国青年》的读者详细介绍黄埔军校的情形，但是因为沪上又有大批投考黄埔的青年，所以先便发表了这样的一点意思。

载《中国青年》145、146期合刊

署名：代英

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之经过*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此次联席会议，系由中央委员及二十余省区特派代表八十余人所组成。重要的提案，都预经中央提案委员会审查通过才提出大会。开会的时间，足费了十二天的工夫。此次会议意义非常重大。议案很多，都是重要的。党员对于这些议案，应当有完全的了解。兹分为两段报告：

（一）关于政府的组织及人民会议的组织

（二）决议的各项政纲

关于国民政府议案有主要的三点：1. 政府所在地，2. 政府本身组织的分子，3. 政府内部各部的组织。

关于地点问题，联席会议当日议决暂不迁动。现在虽因九江、武穴相继攻下，军事上发展得非常迅速，有主张迁往武昌之说，但彼时大家的意思以为迁往武汉，不啻给奉张以一大攻击的目标。政府现定策略，仅对吴孙。打倒吴孙以后，已算殚精竭力，若遽然又与奉张开衅，未必定操胜利。还有一层，目前最要的工作，是在巩固已有的基础。近日由军事胜利所得的湘、鄂、

* 这是恽代英作的关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情况的报告。这次会议于1926年12月15日至28日在广州召开。

赣，其基础自说不上如何稳固。即在广东，革命的基础亦还嫌薄弱。不过比较起来，广东职业的人民，早已各具组织，所以我们主张于最短期间，应当使政府仍留在广州，集中精力于渐渐地使本党完全建筑在有组织的各种民众上面，到那时再迁动政府亦不为迟。自然现在情形，以我党军神速的胜利，及渠辈彼此间倾轧、摇动，似乎向我争送秋波。因此，政府迁往武汉，亦可以表现我们力量的伟大，增加彼辈的暗斗，未尝是无利的事情。但事实究竟何如，尚无把握。所以政府现派五委员前往整理各省政务，借作实际的考察，然后再作迁动政府的计划。

关于国民政府本身的组织分子问题，国民政府一定须有能代表各省有权力者的意见的人作委员，这固然有些是迁就事实，亦所以期望能做到令出必行的地步的原故。国民政府向只设外交、财政两部，此次议加军政、司法两部，以便军事上的指挥并统一各省的司法、行政。此外各部则暂不设立，因为多留些事业让各省自由设施，比较于革命有利益些。

关于国民会议的议案，联席会议主张稍缓召集，因为现在除粤、湘两省农工，各有相当组织，能产生真正代表外，其余各省尚谈不到此。若吴、孙、张等军阀势力下之各省，更是不会有人民的真正代表推举出来。目下只宜以党的力量，唤起民众，组织民众。由组织农人、工人、学生、商人的团体，以至组织各县的各省的，乃至全国的农工商学联合会。民众都有了组织以后方能召集国民会议。不过联席会议决定仍应当宣传速开国民会议，以督促组织民众工作的进行。又议决将来会议的分子除总理主张的九种人民团体的代表以外，须加华侨及妇女团体的代表。

省政府之组织的议案，则因鉴于现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各

省号称委员制，实则各委员皆分掌一厅，彼此不能互相协商照应，流弊甚多。故由联席会议特规定添加非厅长之委员，如欧洲各国之有不管部长一样。最近广东省政府之改组，加入甘乃光及何香凝两同志即是此意。

省党部与省政府的关系，联席会议决定应分为三等：第一等省政府须听省党部的指导，如国民政府听中央党部的指导一般。但因现时各省情形不一致，或因各党部力量薄弱，或因各军事领袖并党部还不能发生很好的关系，所以第二等办法，省政府受中央党部特派员的指导。第三等省政府与省党部合作，这是因地制宜，暂时应付的方法。各有不同，所以比较让各省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自然我们都是要逐渐达到使省政府完全受省党部的指导，这是一定的。

省民会议议案，由联席会议议决，省民会议，系由全省人民团体代表组织。此会议每年一次，须立即召集，其职权现在还只能如前清咨议局一般。我们要立即召集省民会议，是要用此促进人民团体的发展，而且立起人民参政的基础。到了全省人民组织内容充实以后，我们便可以使省政府完全建筑在省民会议上面，不能有不利于全省人民的行为。

县政府之组织，联席会议议决，原有县长制，一个人专断一切，容易犯专擅，被一般土豪劣绅包围之病，所以主张改为委员制。委员由政府派委，分理教育、财政、土地、公安各局事宜。委员长由省政府于各局长中自由择任之。因各县经费有限，委员人数不能过多，所以规定至少要有三个委员，一个委员可以掌两局的事情。

县党部及县民会议问题。县联席会议，因县党部尚多无完

备的组织，所以还很难说，到了县党部有完备组织以后，自然可以提供意见，叫县政府采用。县民会议每年召集二次，乡民会议每年召集四次，这须即刻召集。总之，这些会议亦是咨询机关，用意在促进人民团体的发展，同省民会议一样。

此外关于军事者，议决于国防军外，各省须设省防军。国防军用以戡乱御侮，是行动的。省防军用以防匪，便利交通，是固定在一省以内的。

又议决军中必须党代表，并于各省增设军校。我们第一二次东征军及此次北伐军的胜利，固然是前敌将士忠勇奋斗；而其因为有政治工作，能得一般民众的同情拥护，亦是很大的一个原因。故党代表在军中的关系，非常重大。军政时期，一日不完成，军事工作，即一日不能停止。为养成党的军事人才，必须于克复各省逐渐设立军事政治学校，以便各省革命分子就近入学。各省军事领袖，亦更可就近指导，以养成合于需要的人才。于必要时将设一中央军事政治大学，以为军事最高教育机关。

关于外交方面的政策，现在依照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根本反对帝国主义。但是因为各帝国主义的内部冲突，他们现在已经不能够取国际的行动来侵略中国，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亦不能够同时一齐反对，一齐打倒。我们顶好是先打倒一两个压迫我们顶利害的帝国主义，其余的压迫我们还不十分利害的帝国主义，暂时不去打倒他。自然我们并不是永远不打倒他，不过是暂时不反对他罢了。例如现在最利害的帝国主义，就是英国，我们现在应该首先去打倒他；对于别国，暂时便可以不大反对。不反对他，虽然我们也并不是马上和他亲善。我们应当反对谁，不反对谁，不能由同志随便发表和某帝国主义者亲

善的意见。一定要由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在中央党部指导之下去决定办法。外交政策既已决定之后，凡属我们同志均不能够反对。

关于本党的政纲，从前决定对内是十五条，对外是六条，现在因为有的太简单，还有的定得太高，暂时不容易实现，所以这一次重新有一个很详细的规定。这一次的政纲，都是极切近可能实现的范围而规定的。例如关于工人作工的时间，规定每星期至少五十四小时，除星期照例休息外，其余六天，六九五十四，每天工作九点钟。从前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规定工人每日作工八小时，现在为什么每天反加了一点钟呢？便是因为每日作工八小时或更少，自然是很好的。不过就实际情形说，现在每日作工十二三小时的工人还很多，要想都做到以八小时工作为最高限度，还是不容易做到的事。不过这次政纲，虽然定得很低，然而要一一实现出来，还是不容易的。例如小学教师加薪，兵士和下级军官薪饷，不拖欠也无折扣，这点事情，自然是很低很正确的经济要求，但就实际情形说来也很难办。规定不要预征钱粮，此案在联席会议中间，已经通过；但是宋子文同志因为从前政治会议，已经通过要预征钱粮，所以提出来说，现在有许多薪饷没有款发，非预征钱粮不可。联席会议的职权，比政治会议的职权大些，是可以取消政治会议的议决案的，但是如不预征钱粮，各机关的薪饷就不能发；联席会议的代表，虽然想了许多的方法，始终不能解决这个困难问题。结果终只有将这件事交政治会议再去商议。还有一个同志，提议严禁烟赌，烟赌自然是应该禁的，尤其是在中国和世界上最有名的国民政府统治的地方河南一带，烟赌遍地皆是，真是太难看了，所以禁烟赌是没有问题的。但

如认真的禁起来，又在我们的捐税项下，减少了一部分的收入，事实上却困难得很。商量到后来，终只能定为限期严禁。联席会议决定的议案，是很好的，但是要马上实行却是不容易的。同志们或者要问既明知不能够马上实行，在纸上写着干什么呢？大家要知道这种议决案，暂时虽然不能够实行，但是写上也好，因为本党的重大责任，是要使民众团结起来，本党指导下的国民政府，就是建筑在民众上面，联席会议决定的政纲，虽然暂时不能够实现，若能用这去唤起民众，使他们团结起来，用自己力量以要求实现，这是在将来一定可以实现的。孙科同志报告我们一件事情，很有意味。当他由联席会议出来，回到省政府里的时候，就碰着许多人来请愿，那些人都是小学教师，他们因为看见联席会议议决要加他们的薪饷，所以大家来请愿，请政府早日把这条议决案实行起来，这便是政纲定下的效验了。联席会议所定下的政纲，暂时虽然不能够马上实现，但是依然应该定下，使民众起来，使民众知道与政府努力合作。有了民众的力量，国民政府的根基才能够稳固，定下的政纲，是没有不能够实行的。

有一条政纲，就是要规定要减少田租百分之二十五。这条政纲，总理在北上之前，已经定下，但因总理北上之后，有种种关系省政府里的人，把他放在箱子里锁起来，现在找了出来，依然规定下来了。大家知道，佃农对于地主，向来是纳租六成，还有的地方，要纳七成至八成的。农人的生活，是人类最苦的生活。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占中国人口全数百分之八十，他比工人还要苦，因为工人做了一天的工，至少总可以得到二毫或毫半的工资，去养活自己；农民则每年费许多本钱来买肥料，费一年的劳动，从事耕种，但因为水利不能够讲求，有没有收成，还是靠不住

的事，就是能够收得一点，却要提出六七成来送给地主，农民只得到三四成，差不多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并且还负了许多的债。因此，所以农民也不愿意种田了。据民国八年的调查，中国的荒田有九万万亩。那些不种田的人，因为生活的压迫，都要变成匪盗，如果不想法子来改良农人的生活，中国将来真是非常危险。要免掉这种危险，只有设法消灭地主制度。地主本来完全是封建社会的余孽，如果任其存在，不但农人很苦，就是中国产业也不得发达。因此，中国不但不能走上社会主义的路径，就是想造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中国如果想造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要有许多的大工厂，然而假使中国有许多大工厂制造货品，可以希望卖给谁用呢？农人因为连年水灾天旱，收成很少，工人因为工资低廉，小商人因为生意清淡，都不得不节省费用，因此有了工业品，亦会卖不出去。中国的工业，现在差不多还是在手工业时代，中国不但不能够做到社会主义，并且不能够发达资本主义。根本上解决，必须改良农民的生活，减田租百分之二十五，使农民生活优越一点，不至于流为匪盗，并且能站在本党的后面，来巩固本党的革命势力，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政纲上对于资本家，除了不允许其压迫工人以外，主张召集工业家大会，只要真正是中国的资本家，我们主张要他们组织起来，来发达中国的实业。我们的革命，资本家亦不是无利益的，只有地主是比较各阶级要吃亏一点。我们同志在生活上很多与地主制度有关系，但须注意革命全部的利益，切不可因为与自己有损害，就对于主义发生怀疑。要知道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全社会，不是为个人，我们应该极力的宣传，来解放许多终日过牛马生活的农人——而且这为资本主义之发展亦是必要

的。美国总统林肯解放黑奴，不知道他的，说他主张人道主义，其实他是打倒南美地主的工具，替北美的资本家解放了许多人做他们的工人，来发达美国的实业。中国便要讲资本主义，亦必须先解放了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实业才可以渐渐发达起来。

此外尚有零细的议案，其中各省代表最能全体一致的便是希望汪党代表①回来，同时校长②在前方也有电报回来，请汪主席销假视事。联席会议除一致电请汪党代表回粤之外，还派了代表亲自去找。汪主席现在所住的地方，外面都不知道，不过也还有人晓得。不过在迎汪潮流中，有反革命的人，想从中挑拨蒋校长和汪党代表的感情，所以联席会议特别申明，迎汪完全是因为时局的需要，非汪、蒋两同志合作不可。我们信任汪党代表与信任蒋校长一样，我们应设法打倒从中挑拨的分子，对于汪、蒋两同志，都不要有怀疑的态度。关于去年西山会议的分子，联席会议查明第二次大会后，两月无答复警告函者，如石英、张继等均一律开除党籍。王宠惠在北京吴佩孚下面做官，本党对伊曾下警告，亦未答复，所以亦开除了。此外从前办党的经费，每月是十万元，现为发展党务起见，扩充经费到三十万元。

上面所说的，都是这次中央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的大概情形。此次会议，是要使一个政党得到一种领导人民、促成人民的自觉的力量。本党同志，都要努力去宣传，去完成还没有完全成功的革命事业。

载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革命军》半月刊

署名：恽代英

---

①② 指的是汪精卫、蒋介石。

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讲演大纲）

（一九二六年）

一　革命的意义

革命是大多数被压迫民众打倒压迫者的奋斗。

革命是大多数被压迫民众自然应有的要求，不待煽动唆使亦会发生的。

革命是被压迫民众不能用寻常手段解放自己时所取的非常手段，所以是不能以法律习惯评判他的。

革命是大多数民众所热诚赞助，故此任何依恃武力者为易于成功，且非任何依恃武力者所能抵御。

革命不易成功之原因：

一由压迫阶级用种种方法欺骗恐吓民众，以妨害民众之革命化。

二由革命的民众不能了解解放自己的正当鹄的。

三由革命的民众不能了解世界、中国客观情形，运用正当的革命策略。

四由革命的势力不能统一集中。

所以我们应当注意：

引导民众，使觉悟为自身利益赞成而且参加革命。

使革命的民众接受能正确指导革命运动的理论(主义)。
使革命的民众遵循能正确指导革命运动的策略。
使革命的民众集中统一于能正确指导革命运动的党。

二　中国的革命运动

压迫中国民众的最大势力:

(一)帝国主义

甲、经济上的压迫

A、外国加华货入口税,影响华货销路,因而影响中国人民生计,如烟台因美增税发网工人失业者数万;大连因日复征进口税,八十三家油房歇业者四十家。

B、外国物产竞争,抵制华货,影响中国人民生计。如华茶受印、锡、日本茶之竞争,出口由三万万磅(光绪十二年)减到一万万五千磅(民国六年);华丝受日、意之竞争,贸易额由占全世界之半减至百分之二七·七(民国五年)。

以上犹系国际贸易倾轧之常事,不过中国积弱,更可肆意倾轧耳。

C、外国货物利用关税协定制,自由输入,破坏中国固有产业。民国十三年入口超过出口二万四千万两(米谷、麦粉一万余万两,棉布一万四千余万两,糖七千余万两,煤油五千余万两,皆夺我工农固有生路)。

D、外国银行利用条约保障,吸收中国军阀官僚存款,把持中国海关税款,因有雄厚之流通资本,操纵中国市面金融。汇丰银行以一千五百万元之资金,有一万四千余万元

之放款。前年汉口汇丰银行不肯通融放出现银，以救中秋节银根之紧，商店挤倒七八家。

E、利用中国人之愚昧贫乏急需款项，缔定条约或合同，预付若干款项，以低于成本之价收买产品。前年山东、直隶种棉之农民，曾与日资本家因此引起许多纠纷，又汉冶萍公司因按条约须以十余年前之价额付铁砂于日本，此项价额不能抵工资成本，故赔累不堪，永无翻身之日子。

F、攘取中国航行权（轮船在中国境内载货，外轮较华轮多三倍余，民国十三年英轮载货较多二千六百万吨，日轮较多五百万吨）、筑路权（铁路在外人管理下的六千余里，其余国有铁路无一不与外资有关）、开矿权（煤矿用新法开采的，外资或中外合资之矿较中国自办之矿产额多一倍以上）、开工厂权（在华之英、日纱厂机锭，较多于华厂二十余万锭），肆意夺占渔取中国经济利益，役使中国劳动者如牛马奴隶。

乙、财政上的压迫

A、用武力勒索赔款，与勾结军阀私借外债，使中国对于国外负十八万万元之债务，每年须以全国收入一半以上（二万余万两）为偿债之用。

B、借口保障债务，把持海关税款，即偿债以后之关余，中国亦无自由支配之权。

C、限制中国铁路运费，剥夺中国加增关税、一切洋货厘税之自由权。

丙、政治上的压迫

A、各帝国主义之代表组成公使团，联合压迫中国，俨然为中国太上政府。

B、占据中国海军港。

C、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D、设立租界，租借地使成为外人行政区域。

E、军舰横行内河，在京、津一带驻军队。

F、外人不服从中国法律裁判，反干涉关于华人之裁判事件。

G、中国官吏军警须特别保护外人。

丁、社会上的压迫

A、强迫保护传教，基督教俨然成中国惟一势力。

B、设报纸通信社，颠倒是非黑白。

C、愚弄收买教会学生与留学生，使忽略帝国主义之侵略，反为之歌颂功德。

(二)军阀

甲、经济上的压迫

A、自由派款加税，不顾人民负担力量。

B、铸造低质货币，滥发纸币，使物价腾贵，生活程度提高。

C、疏忽并妨碍一切经济政策，使人民颠倒于贫乏灾祸之中。

D、召募许多饥军，饷需不足，则放任使劫掠人民。

E、造成内战，断绝交通，扰乱社会生活。

乙、财政上的压迫

A、因谋私饱或扩张军队，侵蚀教育、实业经费乃至其他经费。

B、把持财政，使中国财政无统一整理之希望。

丙、政治上的压迫

A、倚赖帝国主义之借款售械，及其他之好意以生存。故与之保障利权，破坏反帝国主义运动。

B、因循私或受贿，派遣贪官污吏到处刮削人民。

C、勾结地方土豪劣绅，摧残一切拥护工农利益的运动。

D、任意生杀予夺，人民冤屈无可控诉。

丁、社会上的压逼

A、收买教育舆论，为之隐讳罪恶，鼓吹功德。

B、提倡佛教、同善社、洗心社等事业，有时施行小惠欺骗愚弄一般民众。

（三）买办阶级（指一般直接与外国资本有关系的大商人、银行家、工厂主）

A、他们的地位等于是帝国主义的经手人，所以反对一切反帝国主义运动。

B、他们与总税务司英人相勾结，借整理内政之名，朋分海关税款。

C、他们利用北京军阀急需财款，得进为财政总长，退为银行经理。惟视自己利之所在，操纵公债，扰乱民生。

D、垄断商会，冒称商界全体，进而与军阀勾结助其压逼人民。

E、因循怯懦，自高身价，且只知自己的利益，在每个爱国运动中，总不与多数人民合作，或中途卖掉多数人民，以见好于军阀、帝国主义。

F、为自己利益，反对农工组织，更反对一切改良农工生活之运动。

（四）土豪劣绅（指一般压逼人民的富绅与智识分子）

A、不问贫农生活情形，只知苛责完租纳税。

B、高利贷款，以盘剥贫农。

C、侵吞地方公益款项，不作正当之用。

D、向人民等筹款办理民团，结果只用以保护自己及少数亲友。

E、滥用团局权力，鱼肉人民。

F、与军阀官僚狼狈为奸，助其作恶，于中取利。

G、提倡陈腐学说与迷信，以愚弄民众。

H、反对一切乡村改良运动。

三　我们的革命势力

仇敌的势力

军事方面　帝国主义军阀有海陆军、航空军，买办阶级有商团，土豪劣绅有民团。

政治方面　帝国主义压逼弱小民族的协商联盟与不平等条约，军阀有压迫人民的法令、警察、牢狱，买办阶级有商会、银行公会，土豪劣绅有团局、县议会、自治机关。

经济方面　帝国主义与买办阶级有资产、商货与债权，军阀有任意征税、造币权，土豪劣绅有自由派捐、支配公款权。

文化方面　他们都有提倡有利于他们的思想言论，而禁制有害于他们的思想言论之权力。他们相互间常有利害冲突，故有时相互教唆、放任被压迫者的革命行动，但若被压迫者损害及他们一致利害，或因他们相互间利害得着暂时调协时，他们又每

互相勾结，共同压迫一般民众。

国内各阶级的革命性

一、军阀官僚与绅商阶级　通常是反革命的，然有时因压迫者对彼骄慢横暴，亦可相当的赞成革命，但彼等怯懦不敢上前，且易因自己利害关系与压迫者妥协卖掉民众。

二、工业资本家与国货商人　为自己利益赞成收回海关主权，取缔外国工厂，但反对工农运动，且因与外资、军阀买办阶级有密切关系，颇有妥协反动性。

三、俸给生活者　生计多直接间接倚赖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故对革命每摇动、怯弱或径走入反革命之一途，惟其中多数生计穷窘不安的人，善加宣传易于倾向革命。

四、小商人　为解除自己压迫应赞助革命，惟因思想多落后，而散漫无组织，常受买办阶级反动宣传，随之反对工农运动及一切革命运动。

五、学生　青年活泼勇敢，不能忍受压迫，故易趋向革命，但浪漫而摇动，且因多系地主子弟，又有智识阶级自大性，一部分人每易受政客之引诱、土豪劣绅之反动宣传，不赞成工农运动。

六、农民苦力与手工人，人数极多(占全人口十分之八)，生活极苦，故稍加宣传即易加入革命战线，惟多散漫，不易成为集中统一的革命势力。

七、产业工人　人数虽少(占全人口二百分之一)，因生活苦而所受压迫直接易见，故易加入革命战线；同时因群众集中，易于宣传煽动、约束节制，且所居生产地位重要，故成为统一而主要的革命力量。

我们的势力根基在工农身上，产业工人尤为重要，但小商

人、学生、俸给生活者之一部分，亦当使觉悟其自己的经济地位，加以革命的下层组织，使成为革命的军队。此外各势力亦当设法尽量利用，以扩大我们的力量。

仇敌的势力甚大，产业工人决不能独力奋斗，工农联合亦还不够，故我们须要随时防止各阶级中妥协反动倾向，然决不可抛弃各阶级合作之政策，同时尚须联合世界革命势力。

世界革命势力

一、殖民地革命运动　这是帝国主义向外侵略压迫殖民地民众之反动，帝国主义国家商货资本之销纳、原料之供给全靠殖民地，殖民地一失，即使帝国主义与其附带之势力根本动摇。

二、苏俄　无产阶级执政压迫资产阶级之国家，与一般资产阶级执政国家根本不能相容；苏俄之存在与发展，使全世界反帝国主义运动扩大，而逐渐集中为帝国主义与其附带势力之致命打击。

三、各帝国主义国家之共产党　各国共产党乃系各国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争夺资产阶级政权之工具，他们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努力消灭本国的帝国主义。

我们应当联合世界革命势力，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同时，并需打倒国内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使一切被压迫的中国民众都解放出来。

我们的责任

唤起民众——三万万九千五百万被压迫的民众联合起来，反抗压迫阶级五百万人。

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十二万万五千万被压迫的人类联合起来，反抗压迫阶级二万万五千万人。

中国被压迫的农民民众

农民　约三万万人，种田不到三十亩的占百分之六十四（不到十亩的占百分之三十六）。因资本不足，灾歉频仍，每亩收入减少（民国三年平均每亩产米三石六斗，民国九年只产一石六斗），租税加重（田赋制本惟贫农负担最重，近又借口漕粮改征银元，及加设各种附加税，加增贫农负担不少，厘金杂税亦间接加于贫农），生活程度提高（上海平民生活去年比前年高一半），贫农不但无使子弟受教育之希望，且多困于穷窘，或重利盘剥，弃田不耕（民国六年全国荒地九万余万亩），流为兵匪或都市工人。

工人　约一千余万，新式产业工人约二百万左右。工资少，工作时间长，待遇恶劣。且因产业受外资与军阀战争压迫，或直接在外人管理之下，寻觅工作者又众多，资本家得借以要挟箝制工人。

小商人　土货贸易完全衰败。除少数奢侈业外，余均因人民购买力薄弱，无发展之希望。且因兵匪之扰乱，大商人之操纵，与生活程度之提高，每惴惴于不能自保。

学生　因家庭经济地位堕落或动摇，与教育经费困窘，各地加征学费，每至不能完成学业。即完成学业以后，亦因百业衰败，谋业者充斥，党派排挤之风盛行，不易得相当之职业。

官吏、教员、兵士及其他俸给生活者　除少数幸运或能勾结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的人以外，多饷薪微薄，不能与生活程度相适应，而又每有折扣拖欠之事，尚有许多必要之应酬，同时又因百业衰败，排挤之风盛行，每不易保此等位置。

中国被压迫民众之革命行为

义和团是反帝国主义的农民暴动；惟迷信神权，只知以排外为号召，致为满清反动王公所利用。

辛亥革命是打倒反帝国主义障碍的，惟只说排满立宪，不知号召废除不平等条约，向帝国主义进攻，反与旧势力妥协，使袁世凯得以勾结帝国主义，造成军阀战争之局。

护国护法等役，亦是打倒反帝国主义障碍的，惟以只说国体与法统，不从人民受压迫最剧之点说起，故无民众拥护，终于无成功。

现在所需要的革命的主义

一、打倒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被压迫民族，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这便是民族主义。

二、打倒军阀与他的走狗官僚政客，建设人民的政府，使全体民众（除了反革命派以外）都有政权——这便是民权主义。

三、打倒买办阶级与土豪劣绅，拥护农民、工人利益，使中国永不发生压迫工农的大地主、资本家。

三民主义是互相关连的，所以民族主义不是国家主义，民权主义不是普通的立宪说，民生主义不是普通的发达实业说。

据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政治部出版单行本排印

署名：恽代英

组织群众与煽动群众*

（一九二六年）

今天讲的是要说明我们应怎样唤起大的群众，到了有大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之时，我们应又怎样的去继续维持他的进行。

要讲这个题目，我们先要认清群众运动的重要，群众是我们革命的基础，革命运动的成败，完全要看群众运动的基础如何。我们说某某人为伟大的领袖，就是说他是能够领导群众的领袖；比如我们说，总理是伟大的领袖，便是说他的主义能够领导几十万的群众，一切的民众都跟他所指示的道路前进。若是一个人没有群众，决不配称为领袖，为什么呢？第一，没有群众，我们便造不起很浓厚的革命空气，比方在五卅以后，全国都市的地方，甚至于穷乡僻壤，都充满了反帝国主义的空气，没有一个人敢反对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若是没有五卅运动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决不会能够这样普遍的。在群众革命空气不高的地方，就是有武力，兵士也不会有勇气为一种主张作战的。兵士虽然受过政治训练，若是他们的周围没有很浓厚的革命空气，他们是不能提起勇气的。第二，没有群众，我们便不能胜过敌人的一切压迫，只有合群众的力量去应付，方才是有把握的事。现在一般反

---

* 本文为恽代英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别训练班的讲演，曾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丛书第二十六种印行。

动份子，不但用武力来压迫我们，并且会用舆论来压迫我们，如他们所鼓吹的反赤论调。然而我们有了群众，这种压迫也是没有用的，因为群众自然可以看得清楚我们是真正为群众的利益奋斗的，自然可以有真正的舆论压倒他们。但是我们若没有群众，这种舆论的压迫便十分可怕，他们的反宣传，可以动摇我们的基础，使我们自己的人发生出怀疑或分裂等现象，到那时便令我们有武力，亦会自己崩溃下来的。我们懂得这两层道理，便懂得群众运动必须特别视为重要，有武装实力的人，亦不容有一点忽视群众运动，不然，便一定要失败的。

群众运动不是随便可以号召起来的，比较有价值的群众运动，更不是我们凭空可以希望产生出来的。要想号召群众运动，必须五个先决条件：

a、群众须有普遍要求，因为一定要群众中各方面的人有了普遍的要求，才能造成极伟大的群众运动。若为了一个人或一部分人之利益和要求，便不能得着别人或别一部分的人热烈的同情，所以便不能造成很大的群众运动。五卅运动之发生，因为一方是利用上海工人、商人、学生共同感觉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压迫，一方亦利用中国多数的人都感觉受帝国主义压迫，所以才有这次极伟大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

b、须有相当的宣传工夫，要造成群众普遍的要求，相当的宣传工夫是不可少的。比方五卅运动所以能起来而且能轰动全国，便是因为全国已经有了两三年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尤其是在上海，因为新书报购买之容易，与国民党和工会的宣传，已经深入学生、工人群众中间，所以受革命运动的影响更大，五卅运动，便从上海发生起来。

c、须使党的组织比较能深入群众，具体的说，便是要我们党的区分部在各工厂各学校中都有组织。当一个运动发生的时候，各处（或者大多数处所）都有我们同志去活动，这样，一方可以使群众运动受党的统一的指挥，以免步伐凌乱，一方可以使党的意志借各机关中党的组织的努力，使每个党员在群众中间实现出来。如五四运动的结果不好，便是由于彼时没有党的组织去指导群众运动的原故。

d、须党的纪律比较的好，若没有好的纪律，就不能使每个党员都服从党的命令去指挥群众运动。所以党的纪律要严，要使党员都能依照党的意思到群众中间去活动，才能实现党在群众运动中的功用。

e、须党员有相当的训练。群众运动起来的时候，在敌人与群众自身都是时时刻刻会发生出各种麻烦问题，须要善于应付的。党员必须是一个有战斗力的人员，而且必须有相当的战斗经验，便是说必须有实际工作的经验；若是不然，一定不能应付得合当的。

以上五个先决条件，前两件就是说，要群众有共同的要求和相当的宣传，这是很重要的。没有这两个条件，决唤不起任何群众运动。但是后三件也很重要，没有后三件，要想使群众运动能得着有价值的发展，亦是不可能的。

现在再说我们怎样去煽动群众，譬如去年五卅运动以前五月二十七、二十八等日，上海是无声无浪，空气沉寂得很的。我们怎样能引起群众都起来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呢？我们要煽动群众，必须注意下列四个条件：

1. 要了解并利用群众的普遍急切之要求　群众没有普遍与

急切的要求，是不能煽动群众的。五卅运动的起来，便是因为上海工人罢工，日本资本家不许别人帮助工人，想强硬的将工潮压迫下去！学生帮助了工人，被巡捕房拘捕起来，亦没有方法交涉解决；同时商人也因帝国主义的工部局决定六月二日通过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筑路、交易所注册等案，感觉帝国主义对于他们肆无忌惮的压迫与剥削，所以上海的工人、学生、商人那时候有个普遍急切的要求，便是怎样免除帝国主义的淫威。他们都要反对外国势力的压迫。在五月三十日左右，工人的罢工快要失败了，商人亦眼看见六月二日即刻便要来了，学生被捕的日益加多，亦束手毫无办法。这时候有人能够了解了群众普遍急切的要求，便能够唤起一个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上最有光荣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再说俄国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农民土地的问题没有解决，同时与德国战争，使一般人民妻离子散，死于战场者很多，刚刚又遇见全国饥荒，许多人没有面包吃，俄国的革命党即提出了土地、和平、面包的口号，因为他们看出这是全俄民众普遍急切的要求，所以亦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参加，俄国革命也便迅速的成功了。

2. 要有简单明了的口号　辛亥革命的口号是排满，俄国革命的口号是土地、和平、面包，这都是很简单明了的。我们说打倒帝国主义，这个口号是用以教育群众的，是平常宣传的，因为这是最正确告诉大家革命的对象；但是若到了要煽动群众时，我们有时还需要提出更能唤得起群众即刻有所行动的口号，便是说更简单明了、使民众易于了解接受的口号。如五卅运动时，我们的口号是“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中国人不能受外国人的压制。”这都是上海各界民众心里的话，所以大得着各界的同情。我

们的深挚的意思，要用极浅显的意思表明出来，才易得着人民的同情。

3.要有紧急出人意外的行动　我们要煽动群众，要做事很迅速，能迅速到出人意料之外最好，因为这样，既免得统治阶级知道了而加以防备，亦可以免得反动派从中破坏捣乱，同时顺群众热血高涨之时，激动他们，亦免得他们经过许久时间，反转犹豫不定起来，或甚至因恐惧而退缩，以减少了群众运动的力量，或至根本消灭了下去。如五卅运动是在二十八日决定，二十九一天便有许多人到各学校演讲，以鼓荡各校学生，到三十日趁一股热血高涨无论何人压迫不下去的时候，便将大家引出来了，这是何等紧急的行动。而且五卅之时，学生出来都到租界上演讲，这是八十年以来所没有的。这种行动，引起中外人都觉得非常奇怪，租界上的市民更感受了一种莫明其妙的刺激，所以这次运动便很容易扩大起来了。再北京之首都革命，开会的目的与地点时间是在开会前三小时才在各校用大字揭示出来的，这亦是紧急出人意外的行动，他很引起群众好奇的注意。凡一种群众运动，行动越迅速越可以使群众热烈的前进，越能接二连三继续不断的提高空气，鼓动群众，便越容易扩大这个运动。

我们说：中国人是五分钟的热心，其实不但中国人是五分钟的热心，人类都只有五分钟热心的。我们只要能善用这五分钟的热心，让他们这一刹那的热心去摧坚陷锐，亦便可以使无坚不摧，无锐不陷了。

4.要有党的一致动员　在我们已经决定要唤起一个大的群众运动时，党要下一个一致动员令，要能够使全体党员都活动起来，都到群众中去活动，去领导群众依照党的意思去宣传鼓吹，

把各方的人，将他们都引出来。如五卅运动时，上海各学校的党员很少，但出来演讲的学生很多，便因为那时党员能在学校里面活动，能在学校里面造出很浓厚的革命空气，所以能使每个学生都趋向而且勇于参加这一次运动。这是党员能够一致活动的好处。革命本不专靠党员，一定要靠各种群众，但必须能命令党员于紧急时间一致的到群众中间去，领导群众，以实现党的计划。

其次我们再说组织群众应注意的地方，我们的意思便是说，在群众已经起来之时，我们应如何组织之，使在我们领导之下继续去奋斗。要组织群众，有下列几点要注意的地方：

1. 党团的组织是很重要的　党团必须有各方面都负责的同志，能获得各方面的消息，到党团中报告，这样使党的负责人并各方面同志均能知道了各方面的消息，才可以根据这种材料，决定而且解释党的策略，使同志到各方面依此策略去努力。学生会中要有学生会的党团，工会中要有工会的党团，还应当有联合各方面的党团，做党对各方面搜集材料、指导进行的总机关，所以党团是很重的。没有党团，党不能容易给合当的指导于党员，而且党不能了解各方面客观的情形，党所决定的政策亦一定是空想，不合实际需要的。

2. 要同各派分子共同合作去奋斗　我们有了党团，并不是要包办群众运动。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是任何党派所不能而且亦不应当包办的，我们一定要同各种各色的人合作。各种各色的群众的智识是不一致的，他们的经济地位也各不相同，如果我们只顾自己的意思去包办，别的群众就会离开我们。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思想比较落后，是比较富于妥协性的，但若我们就不理他们，不与他们设法合作，以引进他们，不久他们就会被反

革命的势力勾引去了。自然与各种各色群众合作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们思想上、生活上，都是常常彼此冲突的，但我们总要想方法把他们拉拢，把各种工作分配得很妥当，只要他不破坏革命的前途，就是比较反动分子亦要给一点工作使他做。有些反动分子根本便没有群众理会他们的，我们亦自然可以不管他。不过我们总要能了解各派的种种情节，那一派在群众中是比较重要的，那一派是较次一点儿，我们要看得清清楚楚，更使各派分子都各得其所，才不至于惹出一些无味的麻烦来。有一般爱出风头的人，是必须审慎处置的，最好是在事先不要随便予以很重要的位置，使他尝了出风头的味道，越发增长了要出风头的欲望。我们要把一个人安放到什么地方，最好是斟酌各方情形，总以能不引起反感，而同时又能使他不致害了团体的事。若对一个人的位置安放错了，到他反动的时候，那就很要费力了。我这所说并不是我们有甚么阴谋的手段，这都是为了革命的工作是必须这样做的。而且即是诡计，我们对待这些人也是好心，我们能安置他们得好，他们幸而不致闹到反动地位，我们亦没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地方。

3.要利用机会公开的训练群众　我们在群众大会里不要争论什么小的事情，一切小的事情，都要预先由委员会讨论清楚，到大会中能迅速解决最好。我们要利用大会的机会来训练群众，在大会里多做有意义的报告。如五卅运动中有许多教会学生都出来了，这是我们宣传打倒帝国主义的好机会，我们应当随时将各方面搜集得来的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在开会时根据事实作有系统的报告，这比任何不相干的问题是容易得着群众欢迎的。在此时亦便可借此给教会学生一种好的训练。大会中的报告，

时间不要太久，要简单有条理，使群众易于明晰。

根据这种报告，提出各种意见，群众自然不期然而然的接受我们的宣传了。我们对他们说，帝国主义怎样，军阀怎样，所以我们应该怎样，若有人反对我们的话，我们应该态度和蔼的详详细细去解释，结果只望他们又给了我们一个宣传的机会，使群众更能了解我们的理由。我们的态度既和蔼，当然人家不能反对。万一还有捣乱分子从中捣乱，那末不待你骂，群众自然就会骂他了。

我们不但要注意利用学生会、工会向各校各厂代表宣传，并且要学生会发告学生的传单，利用工会发告工人的传单，要学生会派人到各校去，对学生群众作报告，要工会派人到工会中去，对工人群众做报告。我们同志现在亦知道利用学生会、工会作我们的宣传，不过我们的传单宣传品，每易陷空泛、似乎无的放矢之弊。我们要使传单宣传品发到群众中间去。学生会、工会不但注意对一般国民发传单宣传品，特别要注意在学生、工人群众中发传单宣传品，用这去训练一般学生、工人群众。

4. 注意扑灭反动派破坏的阴谋　反动派有两种，一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如五卅时出的人），一种是妥协派（如国家主义者、孤军社）。反动派他们常常宣传说，学生会被某一派某一地的学生包办了，工会被那一派操纵了。他们制造并分布谣言，这是他们常常破坏我们的手段，如果学生会做错了两件事，他们就更可以大大的宣传起来，使一般群众或不知其用意，或亦因自己认了学生会的错误，亦便随声附和。结果中了他们的计，学生会内部受他的影响，便会发生各种纠纷了。反革命派总是日日设法来分裂革命势力的联合，他们吹毛求疵，以事攻击。他们若找

到了我们一点错处，他们便宣传得十倍百倍的大。如我们交朋友不慎，自己有点浪漫，对于事情有点不认真，他们便会大吹大擂以作攻击的材料，使你减少在群众中之信仰；此时有些自命不偏不党的好人，每每也要出来说你几句空话，于是群众对于你的信仰更加动摇了。所以我们应该注意自己的党和个人，不要把甚么话给人家说，亦不要随便跟着人家说革命团体或个人的坏话，要使反动派无所施其技俩，那便我们不致中人破坏的奸计了。

6. 我们要随时注意联络群众左倾分子，要拉拢一切右倾分子，不要使他离开了我们。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群众中帮我们解释宣传，使一般人明了我们的态度，大家都比较左倾些。有些同志自己犯了过于左倾的幼稚毛病，对于比较左倾的分子，轻易为他们小小缺点，用不好的态度或冷淡的态度对付他们，使他们因而亦不愿帮助我们，甚至于有时还要反对我们，这是很重大的损失。我们要训练我们自己不要太左了，左得离开了群众。脱离了群众，就不是革命党员，并且所做的是反革命的事情，何况是脱离了左派的群众呢？我们应当不要弄出这种错误，失掉了一切可以得着的许多帮助，而且反转在工作上生出来了许多障碍。以上所说是我关于煽动群众与组织群众的意见，诸位不久要到群众中去的，能够参考对我所说的意见和方法去努力，而且能从工作中去找求经验，一定还会发现其他更好的方法，都是不消说的。

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出版单行本排印

恽代英讲演　策明、叶平笔记

国民革命与农民*

（一九二六年）

世界上生活最辛苦的是那一种人？是有钱的人吗？是收租的人吗？是做官吏做绅士的人吗？不是的？最辛苦的当然是我们满脚牛屎的耕田人，我们耕田人暑天要在火一般的太阳底下做工，冬天要在刀一般利的北风底下做工，不论是风是雨，不论是霜是雪，我们耕田人是不能够在家里偷闲的。还有遇着大旱或者遇着蝗虫水潦，我们耕田的更不知要担多少忧，捱多少苦。

我们这般的辛苦，若果得到衣食充足，安居乐业，赡养父母，养育儿女，没有缺憾，那也不算甚么。但是事实上，我们的辛苦最甚，我们的贫困、我们的痛苦也最厉害。反过来说，那些毫不出力，在家里安坐的土豪、劣绅、大地主，却很安闲逸乐的用不着一点忧虑和辛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皇孙把扇摇”，这真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事情啊！我们耕田人的痛苦要一一数出来，恐怕也数之不尽，但是以下几件大概是最普遍的，全中国的耕田人都同一样的痛苦罢。

第一，土匪、军队、民团的骚扰。土匪固然是耕田人最大的祸害，但是军队和民团（土豪劣绅所指挥的民团）也一样的时常

---

* 本文原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丛书第三种印行。

劫掠农村、勒索农民。最近河南省杞县、睢县一带给寇英杰的军队，焚毁农村七八十处，杀死农民六七千人；山东、直隶、河南等省的农民因为土匪和军队的蹂躏，整千整万的组织红枪会、黑枪会等团体起来反抗。结果无数的农村被毁了，无数的农民被杀了，土匪、军队、民团的骚扰农民真是全国一样的。

第二，内战。民国以来，国内大小战争，不知几十次，最著名的如奉直两次大战、苏浙大战，最近则奉直两军开联合进攻国民军之战，叶开鑫扰乱湖南之战，每次战争的结果都归我们耕田人受最大的损害，战线内的村庄田园固然是烧毁净尽了，战时的军费，也是从农民身上敲取的。这次张作霖发出的军用票和吴佩孚在湖北发出的“金库券”、“官票”强迫人民使用，那一件不是敲榨农民血汗来做军费的勾当。

第三，苛抽暴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向农民剥削的手段便是苛抽暴敛。陕西、河南、直隶、山东、湖北、湖南等省的钱粮，有些抽到民国十七年、十八年，最甚的抽到民国二十年了，其余苛细杂捐，如室梁捐、人头税、水利捐、自治捐、户籍捐、积谷捐、教育捐、警察捐、杂捐、牛捐、沙田捐、田亩捐等，虽不是各省都有，但是这样的苛细杂捐每省总有一二十种，不过名称有别罢了。这样的捐抽弄到许多农民卖妻鬻子，典屋田宅，穷无所归。还有许多地方禁止农民耕种粮食，勒令栽种鸦片，军阀和贪官污吏则乘机勒抽鸦片税，因此粮食出产减少，食物价格腾贵，结果做定的土豪劣绅荷包是胀满了，但是农民已经欲生不能欲死不得。

第四，土豪劣绅和大地主的剥削。我们上面说过，我们耕田人是最辛苦劳碌的，土豪劣绅和大地主是安闲不过的，但是他们为甚能够安闲享福呢，完全因为他们将我们耕田人的身上剥削

得来的，他们剥削的手段是很多的，他们的高利借债，他们的大斗入小斗出，加重租额等等，都是他们很好的剥削手段。

第五，水旱天灾。水旱或发蝗虫等等天灾，虽说是出于自然，不关人事，但因为政治不好，一些防备和补救的方法都没有，所以农民的损失特别利害。去年湖南、湖北、江苏等省的旱灾，和江苏的蝗害，许多农民因此饿死，甚至有吃"观音坭"的，这是何等悲惨的事情呢。这五种痛苦大概是现在全中国耕田的农民同样的痛苦罢，许多耕田人因为受不起这样的痛苦，以至于饿死。不甘饿死的，便变为军队，变为土匪，或者卖身给外国人做奴隶了。说起来耕田人的痛苦，真是要比其他各种人民更为利害。

我们的痛苦是这样，究竟我们的痛苦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不是听天由命坐以待毙？我们有没有救济的方法呢？有的，我们对于这些苦痛是有方法可以救济的，不过我们先要明白这些痛苦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种种的痛苦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的敌人给我们的；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的敌人有两种：一种是外国人，一种是本国人。外国人从前用战舰、大炮和种种奸计和中国订下许多不平等的条约，把中国许多地方占住了，许多铁路、矿山甚而至于关税也给他握住了，因此中国的商业和货物的价格都受他支配了。并且他们时常利用我们国内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来压迫我们的农人、工人、商人。供给枪械子弹、军费与军阀和土匪，使中国内部时时扰乱，他们却从中得到好多利益。这样的外国人我们叫他做帝国主义，这样的中国人我们叫他做帝国主义的走狗、帝国主义的工具。除了这种人之外，还有许多土豪劣绅、贪

官污吏、大地主鱼肉我们，压迫我们，这一种人我们呼他做反革命派。我们种种的痛苦便是这三种人给与的。假使没有帝国主义，则我们国内不再有这样的不太平了，一切的事业都可以发达了。假使没有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反革命派，则一切土匪、军队、民团的搔扰都可免除了，一切苛税杂捐，一切敲剥都可以免除了。所以我们要解除我们的痛苦，保持我们应得的利益，我们便不能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走狗及一切反革命派，军阀、官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大地主、买办阶级。这便是本党所提倡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便是遵守本党孙总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唤起全国民众，大家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革命成功，我们最辛苦的耕田人便同时得到解放，得到应有的利益。三民主义，第一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使我们中华民族得到自由独立，不受外国人的压迫；第二是民权主义，是使全国的人民大家享有自治的权力，不受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的压迫；第三是民生主义，是使一切的人民都得到平等的地位去谋生活。所以我们想得到幸福，得到自由，我们必定要遵守三民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与一切反革命派，换一句话说，便是要参加国民革命。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在他临终时的遗嘱上头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为甚么中国不能自由平等呢？岂不是因为外有帝国主义的压迫，内有帝国主义的走狗及一切反革命势力作怪吗。我们还有一层要明白的：国民革命的目的，既然是求中国的自由平等，那便是为全国大多数的人民求幸福，为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革命，断不是为少数或一部分的人民而革命的，因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与一切反革命派不是压逼一部分人，大多数的人民都受他压迫受

他剥削的。这便是说，国民革命的目的是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若果为少数人的利益那便不成为国民革命了。国民革命既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试问中国现在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哪一种呢？是商人吗？是学生吗？是绅士吗？不是的，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农工群众。我国人口一百人之中农工约占八十人以上，农人比工人更要多些，便是说全国人口总数四万万，其中有三万万二千余万是农工群众，其余八千万是各种人民。这三万万二千余万之中若把农工分开来说，工人大约占二三百万，其余三万万一千余万都是农民，所以现在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便是农民。因为农工群众是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所以国民革命特别注重农工群众的利益，若果忘却了农工群众便不成其为国民革命了。所以本党以扶助农工为最主要的政策，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且议决："党之政策，首须着眼于农民本身之利益，政府之行动，亦须根据于农民利益而谋其解放。"所以我们简直可以说，国民革命便是农民革命，农民得到了解放才算国民革命成功。

国民革命既然和我们耕田的农民有这样密切的关系，要怎样才能够参加革命使革命成功呢？是不是希望少数的英雄替我出力呢？是不是希望少数的革命同志替我奋斗呢？不是的，断不能这样希望。我们要国民革命成功，便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靠我们自己去奋斗。我们耕田人在全国有这样最大多数的人民，为甚么一点力量都没有，任由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大地主、贪官污吏的压迫敲榨呢？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命运不好，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风水不佳？不是的，断不是的，风水命运正是压迫阶级欺愚我们的话。我们之所以受压迫敲榨，完全因为我们

不能团结，没有组织。所以我们虽有三万万二千余万的人数，还是和一盘散沙一样，一点势力都没有，任由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的压迫敲榨，不能够反抗。若果我们是有团结，我们何至一点势力都没有呢？山东、河南、直隶的红枪会，是被压迫的农民组织的，他们的势力是何等伟大；河南的红枪会曾经打败过国民第二军，可见农民不是没有力量，只是不能团结，便没有力量了。现在我们要参加国民革命，解除我们的痛苦。我们第一步要团结起来，组织农民团体，先由每村的农民结合成小团体，再集合各村的团体成为一乡的大团体，更集合各乡的团体，成为一县的团体，以至一省的团体，农民有了团体，便有势力，团体愈大势力亦愈大，可以说话了，可以要求我们的利益了，不至随便给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的摧残压迫了。第二步，我们有了团体，不可没有指导我们去活动的主义和党，我们若果没有指导、没有主义，虽有团结也很难成功的，各省红枪会的失败，便是这个原因。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便是指导我们去活动，指导我们去革命的党和主义。所以我们应该听国民党的指导，和信仰三民主义。第三步，我们结合团体去要求我们的利益，参加国民革命，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大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一切反革命派一定是反对的，一定会利用军警民团和种种势力压迫我们摧残我们，使我们不能够团结，因为我们团结起来他们便不能再敲榨我们压迫我们了，这时候我们有甚么办法呢？一方面要团结我们的团体，一方面不能不靠革命军的帮助，革命军是信仰三民主义的，是有训练有纪律的，是为民众的利益保护农民的。这两年来，革命军在广东战败了陈炯明、邓本殷两个勾结帝国主义摧残农民的军阀，

肃清了省内一切反革命势力，协助各级人民反抗香港帝国主义，统一两广，保护农工团体。广东全省的农民因为有革命军的保护，各级农民协会成立了四千余处，有团体的农民共六十余万。所以我们现在要结合团体，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以及一切反革命势力，我们必定要欢迎这样的革命军，我们有了团体，有了国民党做我们的指导，有了革命军做我们的援助，我们的敌人，才可以有打倒的希望。广东省的农民因为处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之下，有国民党的指导和革命军的援助，所以他们能够组织农会，编练农军，去反抗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大地主及贪官污吏，剿灭蹂躏他们的土匪散兵，取销各种苛抽杂捐。海丰、普宁、广宁等处的农民奋斗的成绩是大家知得到的，他们并且能够协助政府，协助工人，去剿灭刘杨①，肃清反动势力，封锁香港，在国民革命上头建立了不少的功绩。假使全国的农民都能够和广东的农民一样团结起来，一样的拥护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以及国民革命军，那还怕没有势力吗？那还怕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不能够打倒吗？那还怕国民革命不成功吗？国民革命成功了，我耕田的农民也完全达到解放，得到自由幸福了。

现在国民革命军由湖南省出兵北伐了，北伐目的便是援助被压迫的农民阶级，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大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一切反革命派，统一全中国，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为最大多数的农工阶级谋利益。所以革命军北伐的责任和目的是完全为农工群众的利益的。这样的军队是保护农民的，是农民的好朋

---

① 指驻在广州地区的滇桂军阀刘震寰、杨希闵。

友，他们不拉伕，不勒借军饷，不强卖强买，不掳掠，不奸淫，他们在广东东江及南路打仗的时候已经表现出来了，这样的军队，我们耕田的农民，是不是应该援助，应该拥护呢？我们要解除痛苦，我们不能坐着等待的，我们要自己起来奋斗。现在是我们奋斗的机会到了。我们应该赶快组织我们的团体，容纳国民党的指导，拥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援助国民革命北伐军。我们高呼：

1、全国的农民团结起来！

2、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及一切反革命派！

3、拥护国民党！

4、拥护三民主义！

5、拥护国民政府！

6、拥护国民革命北伐军！

7、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8、全国农民解放万岁！

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出版单行本排印

署名：恽代英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

（一九二六年）

第一讲　由反清复明运动至鸦片战争

现在所讲的是八十年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历史。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并不是由今日起，也不是由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之日起，自从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跟着即有民族革命运动。若再说远些，满洲入关以后，已有了民族革命运动；不过我们现在所注意的，却只是八十余年来的民族革命运动罢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即是几十年来民族革命运动的事实，且说明民族革命运动的进化。现在的民族革命运动，和从前不同；从前的民族革命运动，是封建社会的革命运动；现在的民族革命运动，是与世界上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联合起来，以与帝国主义抗战的革命运动。从前的民族革命运动因为没有合当的策略，没有合当的方法，所以不能成功；现在呢，却渐渐改进了。所以现在的民族革命运动，实在是有成功的希望的。

---

* 本文是恽代英于一九二六年在广州所作的讲演，当年曾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教育宣传委员会印行；第七讲还曾以《五卅运动》为书名出版过小册子（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印）。这是根据一九二七年三月广州国光书店的版本排印的。

中国向来以天朝自称，对于邻近民族都指为夷狄之邦，是要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的；这种自尊自大，已成为根深蒂固的心理。我们自诩为有许多圣人，如孔夫子呵，孟夫子呵，都是了不得的人物；因此，我们时时以文化之邦自居！我们心目中，只有中国是人，那些“东胡”、“西夷”、“南蛮”、“北狄”是不能称为人的。试看“蛮”字从“虫”，“狄”字从“犬”，这便是我们不认他们为人的例子。

中国人虽把自己看得很高，然而究竟文弱了，敌不住“北狄”，从前被辽金之在北方扰乱，后来又被满清征服了。满洲人入关，以华夏自称的“中国人”垂手屈服了二百余年，这种屈服自然不是中国人所愿意的。而且满人入关后，又强汉人辫发，汉人因反抗为满人所杀的不少，这更是中国人所不能忘的耻痛。所以中国人虽无能力反抗，仍时时骂满人为夷狄，排斥之心，无时不蓄于怀；当时虽不能公开组织排满机关，而秘密的团体却不少，如洪门会呵，白莲教呵，他们都是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

满洲之入主中原，固然为多数汉人反对，而尤以读书能懂得中国固有文化的人为甚，可是后来满洲出了一位很聪明的皇帝——康熙皇帝，他以为读书人反对满洲，他们容易号召民众；这是很危险的，因此，便想出种种法子来笼络那些读书人。他用什么法子呢，即是“开科取士”！既开了科举，又特别办“博学鸿辞科”，对考取的人可给他们以大官，饵他们以爵禄；那些读书人当初亦有不少“不屑就”的，后来因利诱威迫，渐渐也驯服称臣了！但是仍不免有些人不为所动，而时发排满的言论。可是后来又有几个很利害的皇帝继起，如雍正、乾隆等，他们非常注意那些读书人所作的诗文，其中若有稍露不平之气，或涉及排满之

意，一为其查出，便有斩头之罪！他们这样一方既胁以威，一方又饵以利，所以士气便馁怯了。

大多数的智识分子，既多为满清所收买，所希冀以排满的，只有下层阶级的民众了！当时许许多多的下层阶级的人民，暗中组织反清的团体，如三合会、洪门会……这些团体，他们不许智识分子加入的。因为他们多认为读书人是靠不住的，所以拒绝他。这些团体自己造出许多奇异的暗号和礼节，苟非局中人，即莫名其妙！读书人对之，亦鄙之为“流氓”；那些“流氓”，他们也不愿和士大夫为伍。当时反清的民族观念，只有那些流氓阶级。不过可惜那时他们绝不知工农应有组织，应为本身利益的奋斗，并且也没有革命的目的、方法和策略。他们只知将明朝的流风遗韵拿来做宣传的材料，将崇祯王怎样惨死，满人入关时怎样残暴，来刺激而引起人反对满清思慕明室的观念！归结言之，他们的目的，不过在反清复明而已；但他们却无复明的办法，因为他们还不认识工农的力量。

清室的皇帝真聪明。他收买了一般“士大夫”、“读书人”，还不够，更想进一步收买一般农民。如康熙做皇帝时，便将人民钱粮减轻，人丁税完全豁免；他数次游江南，考察人民的痛苦，随处慰问，且当时的天下，的确表现出太平的景象；故人民对满清仇视之心，减去了大半。不过，康熙的初年，虽施行了一些仁政，至了中年，即不然了！至雍正时，已比不上康熙；乾隆时也想效法乃祖，可是数次下江南，便骚扰得不堪。后来一代不如一代，把人民压迫得一日甚一日，而人民怨恨之心，也日深一日了！这种人民是很容易引上革命之路的，只可惜那时一些三合会呵，洪门会呵，只知说满清怎样不好，明朝怎样好，所以应该反清复明，而

不知是站在民众利益上说话，一般人民听了之后，以为和自己利益并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并不起来和他们同一路跑！

到了道光时候，中国变化了，帝国主义的势力西侵了。中国人受西洋势力压迫，即是从这时候起。以前中国人虽也曾与外人交接，可是总看不起外国人。至道光年间，外人至中国经商日多，那时中国人还是以夷狄对之，故时称外人为红毛鬼，外人在中国通商，中国人也时时压迫他们，他们也不敢声张。外人初至广州通商时，只得与行家贸易，不准与华人直接交易。因之行家时时要占便宜，如一件东西本可值十元，行家只给他们七八元，彼如不肯，只得将原货物打回头。这种情形，自然是十分困难的。还有一种予外人以难堪的事情，即是外人不准直接与中国官厅办交涉，有什么公事，要由行家代转，有时行家置之不顾，他们即有冤无法伸。同时外人至中国，只准他们交易，交易完毕，即不准他们居留，不准他们在中国过冬，亦不准他们坐轿。还有一层，即是不准他们和洋婆同行；说男女混在一起，未免不成体统。若果他们不服这些规律，即实行驱逐出境。

后来，外国的产业，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英国资本主义已极发达，出产物品增多，想在东方找市场，而中国却紧紧闭关不纳，这是英人最感困难的。英人时时设法解决这困难，他派公使与满清政府办交涉，当时中国人并不知什么是外交，只以为英国来进贡罢了！便拿进贡旗子插在英国船上，到了北京以后，见不着皇帝；见了，又须行拜跪礼。英人虽不愿意，实在也没有办法。有一次，有一英使来粤和粤督办交涉；粤督称有什么事，可给行商转来，若不遵照此种手续，便完全置之不理。即此可见那时中国华人看不起外人的一斑了！所以英人虽欲将中国的门户打

开，而中国则紧紧将门关闭起来，英人到了无奈何的时候，便用起武力来了！因此，便发生了鸦片的战争。

鸦片战争是因为中国焚烧英国烟土发生的，可是其实是英人想要打开中国门户的法子！当时英国由印度输入烟土，年多一年，中国人便觉得这为害不浅，不久派了一位很利害的总督来粤实行禁烟了，这总督是谁？即是林则徐，他下令严禁烟土入口，已经运来之烟土，全数均令交出，以后再有运土之事，一经查出，船要没收，人即斩决。林则徐搜了英人所运来共值六百万两的烟土，付之一炬，英人不服，便下令要驱逐出境！后来因双方争持的结果，便发生了鸦片战争。

第二讲　鸦片战争及其影响

前一次我们已讲及鸦片战争，现在且说鸦片战争后的事情。鸦片战争就表面上看起来，即是英国要卖鸦片给中国，而中国人不许，所以激起战争。但实际上却不然；因为英国鸦片商人，固想和我们一战，英国国会议员却不一定都赞成开战，他们虽经了许久三天三夜的会议，若不是有些资本家要想借此以武力解决通商的困难，还是未必会能通过和中国宣战的。鸦片战事完全是英国要在中国施行其经济侵略的政策的原故。

当鸦片战争未发生之前，英国会开议了三日夜，议决时，赞成与中国宣战的，只比较多九票，英国即决意出兵了。从此看来，鸦片之役，并不是全英国人民要对中国宣战，所以并不是全英国人即是中国的仇人，即英国议员亦几乎半数不是我们的敌人；与我们为敌者只英国的资本家，及代表资产阶级的国会议员

而已。

英兵开到中国时，当然中国是敌不住的；可是他在广州，却不能得手，因为当时林则徐防守得甚坚固。在浙江、福建、江苏各地，便处处都敌不住了！于是许多地方，便被英兵占领了！

中国虽败于英，然轻视外人之心，还不稍变，并且更加气愤，始终不愿与英讲和；英人当时表示愿交还所占之地，只要求几个通商口岸，得与中国通商！中国还是不肯，后来英兵占了南京，且进迫天津，中国才恐慌起来，迫不得已而与英国讲和，于是与英人订下南京条约。这是中国与外国所订不平等条约的第一次。条约内说明，英所占地，悉归还中国，只要求割香港；当时香港不过一荒岛，为有些渔船停泊之地，谁亦料不到他人手中竟成了英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中心地。此外，他又要求五口通商，即是要求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商埠，给他们自由通商；这些地方，都是在扬子江以南沿海地方。此外，他还要规定海关抽税须有一定限制，即值百抽五的办法。这些条约，起初看不出有何损害中国的地方，然而这即英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第一步。这些侵略即经济侵略。原来英国所以和中国开仗，即由英国资本家想把洋货销流于中国，他们所以要求五口通商，即是欲在这些通商口岸，自由销流他们的货物；不如从前处处都受制于中国人。他们所以要规定海关税则，即希冀他们的货物可在中国免抽重税，这样便使货价廉而易畅销；他们的用意，他们为资本家的利益计，可谓周至无比了！

我们知道，自从南京条约订定之后，英国资本家得到许多利益；从前只可在广州通商，现在可自由到上海、宁波各地了！从前外人在中国通商，须经过行家，不能直接和中国人交易，现在

可自由做买卖了！从前外国输入货物，每值百元，要抽四十元以上，现在海关税则定了，值百只能抽五了！至于香港从前虽是一个荒岛，而此地距广州甚近，所以一落入英人之手，他便致意经营，该地适当交通要冲，船只来往，均停泊于此，货物销流，最为利便；于是广州的出入口货，皆渐受香港操纵，所以香港在经济实有控制广州之权，成为八十年来英人侵略中国之中心。

至于我们吃南京条约的亏，不但割香港或五口通商。我们因开放五口通商，于是外国货物自由畅销于国内，这么一来，中国的一般农工民众的生计，便大受影响了！洋货在中国畅流无阻，把中国固有之土货，抵制下去，所以中国的手工业者、贫农，生活上便日日受压迫，而一天一天趋于贫穷！卒之工人失业日众，农民贫穷无可谋生，于是便去当兵当匪，而中国情形更糟了！

南京条约使中国吃大亏，起初中国人是看不到的。可是自从条约定了之后，许多中国人都起来反对，尤其是广东人。他们虽然不知什么是不平等条约对于农工生活的影响，可是因为他们惯看不起洋人的缘故，总不满意中国人要和那些夷狄之邦的“红毛鬼”缔结条约；所以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总要起来反抗。这种反抗英人的团体便是平英团。

平英团在当时有许多人加入，他们常常在外殴打英人，或驱逐英人，那时粤督也很顽固，见粤人抵抗或压迫英人，暗中欢喜！英人在上海开了租界，也想在广州开租界，因粤人反对，久之不能实行。英人又想进广州城经商（照南京条约规定，英人可以自由进城的），然也因恐惧粤人而不果。当时粤督虽不敢明白拒绝英人进城，也不敢切实许可他们，曾对他们说：“可过二年方进城。”二年过了之后，英人拟实行进城了，粤人又群起反对，且召集了

许多附近乡团来城示威；英人至此，又不得不退让！即此看来，可见广东民气之盛，及英人恐惧粤人的程度如何了！

照我们现在观察，平英团这种反对英国的办法好不好呢？实在不见得大好！因为他们反对英国，其立脚点并不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尤其不是为中国农工群众的利益！他们为的是素来轻看洋人，不愿意英人在中国横行，他们为的是“顾体面”！他们不知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只知普遍的反对英人；并且他们于反英之外，凡是号称“番鬼”的各国人民，都在反对、抵制之列。至于他们所用的方法，亦不足取。他们并不知道要团结全国民众起来与英反抗，尤其不知道要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以打倒帝国主义，只知以乌合之众抵制压迫英人。那时英帝国主义者因适有印度叛乱，所以亦不能顾及中国，于是平英团继续闹了十六年，待到英人把印度的叛乱平定以后，便起来对付中国了！其时刚值洪杨事起，英人以时机已到，便想法侵略中国；他利用中国人民烧毁英法人房屋，于是英人趁惹起英法国对华的恶感，引起了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事！

当平英团进行时，广东总督为叶名琛。他这老头儿素来顽固，见了粤人抗英，很高兴；以为以前林则徐之用兵还抵御不过英人，现在他却不费一兵一卒却生生把英人压迫下去了。他与英人办外交，还是看不起英人，英人有什么来往公事，只好滑随便批了一二个字便交还他们。他老头儿因为是这样顽固，所以闹了一件大笑话，即当英兵进攻广东时，他毫不在意，不肯备战，表示得很镇定，他只知求神降乩，称神对他说，英兵不敢进来的，不久便要自行退却的，可不必忧虑。后来英兵把广州攻入，将他提获，便解去印度，将他当陈列品给人家看。这便是中国堂哉皇哉

的大官僚！

此后，英国便要求在广州开租界了！不过他们始终是害怕广东人的。他们不敢在广州区域里开租界，乃选择沙面的地方作租界，原来沙面不过是珠江里边一些沙滩，英人就将这些沙滩填筑起来，填筑后，便与沙基间凿了一条沟渠，沟上架二条桥；这条沟和这二条桥，是有用意的。即是预备了有什么事件发生时，他们可将这二条桥拆毁，以免广东人至租界去袭打他们！这也可见英人恐惧广东人的程度了！沙面开租界后，几十年来，中国人与他们都相安无事，可是到了六十年后，却有事起来了！孙中山先生所号召的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运动，引起了前年①的沙面罢工，去年②的沙基事件，沙面的铁闸，从去年关闭至现在！假使我们罢工不解决，恐怕沙面的铁闸，永无开放之期的！我希望候我们把沙面收回后，才来把这铁闸打开！

以下我们可说到太平天国运动了。太平天国运动并不是为的反对帝国主义，只是为的"排满"的运动。不过假使没有帝国主义者鸦片战争的影响，亦许不至于发生此种运动的。此事前后闹了十五年，实是中国很伟大的民族革命运动。他的发轫地点为广西，广西、广东参加的人不知其数。为什么的发生这事件要在两广？这因为帝国主义之侵入，两广适当其冲，鸦片战争后，洋货在中国南方自由输入，首先是两广人民受其压迫，穷苦得不堪，所以奋起从事革命！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中国人之反对满清，二百年来，几无时或息，然终以满清势强，很难成功，及鸦片战争后，满清为外人屈服，人民看破了满清，觉得他已毫无力

① 指一九二四年。

② 指一九二五年。

量，所以乘机起来想打倒他！

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为洪秀全，他信耶教，自办上帝会。他最先看破满清为英所败，已毫无能力，便想把他推倒。据说他有一天，忽然晕倒了，醒后，恍然大悟，说他自己是上帝儿子。上帝有二个儿子，一个为耶稣，一个即他自己。他受命于上帝来打倒满洲。这些话，本来是骗不过人的，可是当时一般被压迫太甚而希图乘机反抗的民众，竟相信他的话了！

洪秀全的兵打出湖南、湖北以后，全国的什么大刀会呵，三合会呵，都起来响应他。他们都是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后来他打到南京，便建起国都来，开国号为太平天国，自称为天王。

后来，太平天国终归失败，为满洲所压服了！他们为什么失败呢？我们可研究一下：有些人说，他们的兵太坏，到处骚扰人民，劫掠人民，许多人一听见“长发鬼”便怕。可是这些并不是真话，因为他们有些军队，军纪是很好的。如石达开、李秀成的军队，军纪非常好，有些乡下佬亲眼看见的，至今还是称赞不止！他们失败的真正原因有三，可略举如下：

（一）帝国主义帮助满清——帝国主义者起初看见洪秀全打到南京时，很高兴的，以为他是一个基督教徒，一定很容易说话。那时香港总督便跑到南京，想与洪秀全交涉。那知道洪秀全却不理他，还是以天朝自居，以为外人只应来进贡，没有什么交涉可讲。英人见洪秀全不能拉拢，便跑去帮助满清来讨伐洪秀全了。当时外人帮满清练兵打洪秀全，称为常胜军，太平天国运动之败亡，受常胜军之打击不少。

（二）无一定主义　太平天国运动无一定主义，不知为农工群众谋利益，他们只知以上帝的儿子等话，自欺欺人。所以农

工群众究竟不认识太平天国与自身之关系，不知道起来拥护太平天国。再则他们领袖结合，不是主义的结合，只是感情的结合。起初他们几个领袖，感情是好不过的，以为“有祸共当，有福共享”，好象桃园结义一样。因此，洪秀全既自称为天王，便封他的伙伴为东王、南王、西王、北王等。可是感情是靠不住的，没有主义的人，一有误会，便找不到感情这个东西了！后来北王杀了东王，内部闹个不休！满清乘机进攻，遂打破了南京城。

（三）智识分子不为己用　　反革命的智识分子，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却帮助满清来打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运动之败亡，此也为一重要原因。曾国藩那些智识分子，时时以忠君爱国自许的，然而他们却上了满清的当了！他们所忠的君是满洲的君，所爱的国也是满洲的国！他们所以为满洲效力，一半也是洪秀全的错。洪秀全太看不起读书人了，不知道拉拢读书人，所以读书人便自然相率归满清。而为满清出死力来抵抗太平天国！由此，我们可得一个教训，革命的进程当中，虽不可完全信赖智识分子，亦万不可抛弃智识分子，不使他们都去为敌人效力，这是很要紧的！

太平运动终归失败了！其失败的最大原因，即是上述三项；此外，还有琐碎的原因，便可以不必说了。

第三讲　由太平天国运动至康梁变法

今天是讲太平天国运动以后的事情，太平天国亡后，满清势力又强大起来，继续讨平了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捻子，与陕西、甘肃、新疆的回人，在这种声势之下，许多民众不敢再起来做

排满运动；因之，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潮流，便低落下来了！但是，当时帝国主义压迫满清，却是一天天厉害！光绪二年，日本把琉球并吞了；光绪十一年，法国也慢慢地把安南占领了！中国民众既不敢反抗满清，自然更不敢反抗帝国主义；因为满清虽厉害，帝国主义更要比满清厉害。

这时却有一人起来要排满，这人即是孙中山先生！当光绪十一年时，孙中山年二十岁，即立心要革命，可是当时并没有人响应他，附和他，反群起而反对他。只有几个朋友，肯跟着他一齐去干。那时中国人还有一种想法，如李鸿章等，他们亦觉得中国还是如此干下去，一定要招灭亡之患的！不过他们觉得外国所以称强，是因为有军舰和枪炮，中国想与外国抵抗，只须从事制造炮舰，所以当时便兴办了南洋与北洋海军！以为这样即是可以救亡了！至于外国一切政治，什么民主，什么立宪，都是胡说乱道，无一及得上中国的！究竟这些人的意思对不对呢？当然是不对！因为是不对，所以就有人起来打他们的嘴巴，教训教训他们了！打他们的嘴巴的是谁？即是日本。

在甲午年，中国和日本发生了争高丽的战争！高丽原来是中国的藩属。从前中国对于属国是很放任的，并不是象现在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一样，日本见了中国这样便生了觊觎朝鲜之心。中国后来渐渐不放心起来了，便派了袁世凯带兵到朝鲜驻守，暗中防御日本；经过了几次交涉，日本也借故出兵朝鲜；因之，中日互相冲突一天天厉害，甲午之战便发生了！

当时中国既有军舰，枪炮也多属新式，自以为堪与日本一战，可是中国的军队精神太不中用了，有许多还未正式开仗，便“弃甲曳兵”向后转跑了！打起仗来的时候，便发现军器亦不如

人家，这么一打，便一败涂地，陆海军俱一蹶不振了！日本便于是平平安安地把朝鲜抢去！同时，还进而把旅顺、大连及满洲南方继续占领。中国只好低首下心，派代表去议和，先前是派了二人去当代表，向日本请和，日本人不肯睬，说此二人无代表之资格！且答称中国如欲议和，非李鸿章做代表不可！于是李鸿章只得亲自出马。李鸿章到时，日本给他种种留难，既要赔偿兵费，又要割让天津，种种要求，闹得李鸿章毫无办法！后来有一日本人想暗杀李鸿章，将李鸿章打伤了；日本害怕外国人要起来干涉，才好好地与中国议和，结果，中国割让台湾与澎湖群岛，及辽东半岛于日本。后来，俄、德、法起来干涉，日本只得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

为什么俄、德、法要起来干涉中日之事呢？那时俄国并不是现在的俄国，他并不是要为中国打抱不平，他自己便是一个最厉害的帝国主义的国家。他因为欲在东方找海口的缘故，久已垂涎南满洲；此次见了日本把满洲南部占领了，心中老实不大爽快。此意为李鸿章所侦悉了，他便拉拢俄国出来说话；俄国因自己利害关系，也不客气地答应出来干涉！他自己恐怕能力不够，再去拉拢法国出来；德国因要促成俄、法向远东发展之局，以免除德国在欧洲对于俄、法之恐怖，也不待人邀请而出来与俄、法一致干涉了。听说此时李鸿章还与俄订了密约，其内容乃割辽东于俄的。日本看见了俄、德、法都起来干涉，不能不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辽东半岛归还了，俄国又想将旅顺、大连拿到他自己手中去，而苦无方法进行；这事给德国知道了，便出来向俄国献议，德国承认自己可先占胶州湾，俄国便好起来援例占旅顺、大连。于是德国便出兵强占胶州湾，要中国将胶州湾租借与他

九十九年，俄国果真按例出兵强占了旅顺、大连，英国也起来占据威海卫，都定租借期为九十九年；法国起来占领广州湾，定租借期为九十九年，英国见法国占了广州湾，又借口保卫香港，要求租借九龙。中国推诿不过，一一都应允给他们了！那时只有意大利起来要求租借三门湾，因为国家太微小，被中国拒绝了！

中国在此时，不但租借了许多海口给外国，即铁路矿山，也随时送给外国人不少。中国在此时差不多要灭亡了！当时最可恶的，尤其是德国，他常常故意的说：黄种人是最厉害不过的，试看：日本一个蕞尔小国，今竟称雄东亚！中国地大物博，现在不过一时衰弱，好比睡狮一样，将来他一醒觉，是了不得的。不若乘他睡着了的时候，结果了他！德国这些话，是想鼓吹列强把中国瓜分了的！这时期可谓是中国的千钧一发，危险不过的时期了！可是为什么中国能免了瓜分之患呢？这并不是中国自己有什么力量，能防御他们，使他们不敢瓜分，只是因为第一：中国这样好的地方，实在太难瓜分！第二：英国在中国已有了相当地位，所占权利独优，如瓜分后，山东要归德国，云南要归法国，那时英国在山东、云南等地的权利，反不如在中国手下好自由发展！所以英国却就不主张瓜分中国；第三：当时美国正从事经营南美洲，不能顾及中国，且在中国毫无位置，毫无势力，他更不主张将中国瓜分，妨害他将来在中国的发展。有此数因，中国便偷偷地免掉了那个最危险的瓜分之祸了！

于是美国根据利益均霑，"势力均等"的原则，提出"开放门户"的口号来。所谓开放门户，即是要中国把大门大大的打开，任强盗般的帝国主义者——列强，到里边来"随心所欲"的"予取予求"是了！开放门户的原则，被列强承认了，中国在这样局势

之下，虽不至于瓜分，然而全国的权利，都成为国际帝国主义者自由攫取的对象了！

中国处在这样可怜的状况之下，许多人便是要想出救亡的方法来了。造舰，练兵，是不够的，因而着想到政治上一定要有一番改变，以前只管夸称华夏的政治如何，现在亦渐渐觉得夷狄之邦的政治，实在有些是中国比不上的了。可是要想改变政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又是最迷信古代，崇拜祖先的，礼法制度，是世世相传下来的，谁敢想改变他，便是谁要毁坏圣贤祖宗的法度，这是一个很厉害的罪名。若是想将中国成法改变，去学洋鬼子的什么"民主"什么"立宪"，这更是所谓"用夷变夏"，一切遵守古训的人所绝对反对的。所以那时虽有许多人知道中国的政治非改变一下不可，然而终无人敢提出"变法"两个字出来！

在这个情况之下，有康有为出来了！他引据经典说明，以为孔子便是一个主张变法的人，孔子所谓尧舜文武之道，并不是从前真有个尧舜文武，做过什么事情，不过是孔子自己有些什么主张，便假托尧舜文武，使人家好相信他说的罢了。康有为此说一出，许多人欢喜得了不得，因为照他所说，孔子便是一个主张变法的人，中国人最相信孔子，那便变法的主张，亦可以不怕人家反对！光绪皇帝听见有康有为这个人，也高兴得很，他自己素为慈禧太后与一般旧臣所挟持，这时立刻召见康及其门徒，共谋变法。想自己树立一派势力，与那般旧臣及其背后的慈禧太后宣战。康有为与光绪，君臣相得，真是如鱼水交欢；光绪对康言听计从，康也竭忠尽智的去筹谋变法。他们很努力的一心一意想将中国改变过来。于是废科举，废八股，办学堂，一切应兴应革

的事，无不着手去做！但不久的时候，反动便来了，光绪皇帝因信任康有为之故，对那些老官僚的言论或意见，终是不理。于是那些旧官僚恨康有为到极点！总要想方法推倒他。那时不但那班老官僚不满意，还有些老秀才，或学八股的童生们，亦每每有怨言，以为皇帝实在太不行了！件件事都要学洋人，又办一些洋学堂，连祖宗传下来的八股都废了；然而那时新派却趾高气扬，得意得很，仗着光绪皇帝与康有为的声势，藐视侮辱旧派，无所不至，这种情形，正和国民党改组时，旧党员与新党员所表现出来的情形一样！许许多多反对变法的人，怎样办呢？他们只有一条路，便是到太后那里去说话！太后是一个没有知识的老太婆，被那些老官僚包围之后，便时常嘱光绪不要过于听从康某，把祖宗法则都毁弃了，光绪听了太后的话，明知这是老官僚想阻碍变法，因与康有为商议，要设法防止太后与这些老官僚接近，他们商定去请袁世凯来监守住太后，不许他人到他那里去。岂料袁世凯一方面虽答应了，一方面却将此情形告知接近太后的人，太后愤极！立刻下令逮捕康有为，康闻耗逃走了！康既遁，太后再乘机执政，把光绪皇帝幽禁于瀛台，假称他有神经病，不能治事。这便是所谓戊戌政变。

甲午战事起后，孙中山先生便已决意革命。他先想在广东起事，惟因运械失慎，为满清所发觉，孙中山先生潜逃国外，得免于难！此为孙中山先生革命第一次失败！那时，许多老顽固的人，视革命为洪水猛兽，称中山先生为叛徒，为寇贼；号称新派的，又以为满清当可以变法有为，也反对革命运动！迨变法失败以后，反对革命的人，才渐渐觉悟，对于革命，不象以前那样害怕，甚至有些倾向革命了！所以不久，中国便发生了二个伟大的民族革命

运动，一是反帝国主义的义和团，一是反抗满清的同盟会。义和团与同盟会的事情，容后再说。

第四讲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我前次讲到光绪与康梁等之变法运动，现在讲义和团的运动和辛丑条约。原来义和团是民团一种秘密组织，是要反抗满清、恢复明朝的，所以在当时为一种犯法的团体，但后来忽然一变性质为扶清灭洋了。为什么义和团会变过来扶清灭洋呢。因为中国受外国帝国主义之压迫剥削，使一般农民见得满清固然可恶，但帝国主义更加可恶，所以他们不反对满清，只反对外人，当时受外人压迫最厉害的为山东。

光绪二十四年，山东胶州湾为德国占据了。德国是当时帝国主义中最厉害的国家，他武装强占胶州湾，又武装强迫中国答应他修筑胶济铁路，在铁路三十里内的矿产归他开采，德国自得了这些权利以后，即进行修筑铁路，他硬要强买人家田地、坟墓，无论尔愿意也要，不愿意也要，而且由他自定价格，物主划算得来否，他们亦一概不管。这些办法都是中国人民所最反对的，有田者不愿意卖与德人，即愿卖又得不到相当的价钱，祖宗的坟墓更是不容随便搬移的，而德人强要人家搬移。曾有一次，山东人群集包围德人，但卒因德人向中国政府交涉，中国政府派兵弹压，终只有屈服解散。又德人为要开矿，在沿铁路三十里内，试采矿苗，随便在这里山上挖一挖，在那里山上挖一挖，中国人是最重风水的，以为山里龙脉被他破坏，不但一人一家受影响，而且是与一地方人都有影响的，因此更加讨厌德人。还有德人包庇土匪

强盗。山东土匪都在胶州湾及沿铁路藏匿，晚上出来抢劫，抢完了便跑进胶州湾去，中国官厅不敢去胶州湾捉他，因此山东人更加恨德人。犹如广东人之恨香港一样，香港也是窝藏包庇中国土匪强盗的。同时不但山东人恨外国人，即所有外国人侵占中国之海军港，如威海卫、大连湾、旅顺、广州湾各地附近中国人，亦同样受外人压迫，同样恨外国人。不过山东人为更甚。那时外人还盛倡瓜分中国的论调，争着夺取中国各种权利，更加使中国人害怕而亟思反抗。不过此时虽人人都要反抗，但都怕外国人枪炮厉害，所以终不致发动起来。

光绪皇帝变法失败以后，中国人排外的精神更增长了。本来光绪皇帝变法，便是很想反抗帝国主义的，不过有般糊涂人，不懂他的意思，反说他跟洋人跑，令他们想中举人、秀才的机会都没有了。现在他们看见学洋人的皇帝倒了，劝光绪皇帝学洋人的康有为等也杀的杀了，跑的跑了，那般秀才、举人、绅士都兴高彩烈，他们以为那个头脑顽固的皇太后，一定可以去打洋人了，但他们自己终怕洋人枪炮利害，不敢动。

很多人都想打击帝国主义，但都害怕他们枪炮的利害，于是义和团出来说：不要紧，现在不怕了，洋人命运已衰了，尔看皇帝助洋人，新人物康有为等助洋人，现在不是通通倒了吗？我们是不怕枪炮的，我们大家都去练神拳，神拳练得好，枪炮打不入的。于是他们到处去试给人家看，他们把刀在肚腹上砍，当真砍不伤，大家都信以为真，以为现在有不怕枪炮的法子，所以大家都跟着他去打洋人了。

当真他们可以不怕枪炮么？在八国联军进攻的时候，义和团被打死的不知多少，他们是学过练气的，用刀口硬砍肚皮，是

可以不伤的，但假如用刀在肚皮上一拖，便糟了。何况犀利的洋枪洋炮，那有打不伤之理。此理现在我们甚是明白，但以前的人因为要打洋人却不能了解。

从此以后，北方各地人民，都跟着山东人起来组织义和团，他们见洋人即杀，见洋人房屋教堂即烧，而且铁路、电线、电话都一律毁坏，凡信基督教谓之二毛子（洋人为毛子），与洋人一样待遇，一样屠杀。不许人家讲洋话，亦不许买洋货，因为他们要反对洋人到底，一切洋东西都不用，连洋枪也不要。他们用土枪土炮来抵抗外人的洋枪洋炮，一般顽固脑筋的人们，很崇拜义和团，他们请大师兄、二师兄到家里，设香案，象拜菩萨样子来叩头敬礼，一般腐败官僚大臣，暗中亦与义和团勾结，于是义和团的势力蔓延到直隶北京来了。

其时皇太后当权，他的头脑是很陈旧顽固的，他很恨洋人压迫，恨新人物学洋人，他虽没明白表示帮助的，但暗中是帮助的，山东、直隶、北京各地，义和团势力之蔓延，他是不干涉的。以后义和团包围北京公使馆，将德国公使、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杀了，皇太后仍是不管。有些老臣走去劝皇太后禁止攻杀外国人，皇太后反斥责之，谓义和团是义民，不应禁止，于是北京弄得乱七八糟了。

其时杀的外人着实不少，尤以山西、直隶为最多，虽无确切统计，恐怕有二百人左右。但在南方各省则没有义和团的运动。因为南方有李鸿章、张之洞等禁止义和团组织。北方各省闹得非常利害了，于是英、日、意、奥、德、法、俄、美八国因利害关系，联军向中国进攻。初时义和团也很利害，联军不能急切得着胜利，但到底他们不能敌过洋枪洋炮，北京遂被攻破了，皇帝和皇太后

都跑了，一跑跑到陕西西安。

在这次义和团的运动当中，义和团能有反抗外人压迫的精神是很好的，可惜他们不懂世界的情形，不知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如印度、安南、非洲等殖民地一致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同时又不知组织工农群众，训练革命军队，用良好的军械，来反帝国主义，只知用些骗人的迷信假话来号召一般愚民，这是他失败的原因。

义和团当时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并不知什么是帝国主义。他们割电线，挖铁路，以为这些都是洋人带来中国害人的东西，是祸害中国的东西。实在这些东西本身并不坏，坏的是帝国主义利用其来侵略，我们现在要反抗帝国主义，就要废除不平等条约，用自己的力量发展实业，以物质文明去抵制人家的物质文明，那才是打倒帝国主义的正当方法。

义和团却想完全不用这些东西，把社会拉向后退，开倒车，这是不对的。再则他们乱杀洋人也是不对的，他们受洋人压迫太甚，而生出此种排外运动；不过，我们应该分别清楚，压迫中国人的，并不是一切外国人，而是外国的资本家，打倒帝国主义是打倒外国资本家，而不是打倒一切外国人。而且为打倒外国资本家，外国无产阶级还是我们的好友呢！但义和团不明此理，所以帝国主义者可以欺骗外人，说义和团野蛮，要杀尽外国人，一切外国人反通通联合起来向我们进攻了。现在我们只打外国资本家，外国工人、农人，就不会给资本家欺骗来打我们，他们工人且会与我们合作来打倒彼此共同的敌人，这是我们应该认识的。

八国联军入京以后，抢掠宝藏东西，焚烧房屋，真是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他们这样闹，他们自己就闹出争端来了，因此迫

得他们不得不退兵，不得不和中国议和。这议和条约签字的日子，就是辛丑年九月七日，叫做辛丑条约。我国至今，每年定九月七日为国耻日去纪念他。这次条约，中国人吃的亏很大。条约内容：一，凡与义和团有关系的不论王亲大臣皆严办。二，派亲王到德国谢罪。三，赔偿兵费四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归还，计利息五万三千万两，利息比本银还要多，合计起来有九万八千万两银子，以海关税为担保。这个担子，至今还在我们肩子上，还要二十多年才能把这笔债还清。这笔债是很没道理的，外国人不是时常屠杀中国人，并没有赔偿，前年日本大地震时，日本人仇杀中国人二百余人，只赔偿几万元了结。即使当时义和团杀死几百外国人，都是因为外国压迫中国人所得的结果，即退一步，要赔偿，也决不应赔偿到九万八千万两之多。这完全是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榨取我们中国的借口而已。如果国民革命成功，我们一定否认归还这无理的赔款。

还有，条约里面规定，所有发生教案之地方，以后停止文武考试五年，以为惩戒。各地人民有反抗外国的组织和行动者斩头，地方官吏如查禁不力，该地方有反抗外国人事情发生的，长官革职，一生不准叙用。由皇帝将条约布告各府县两年。因为这样的政治压迫，所以辛丑年后，中国人无敢反抗外国人的，中国民族精神从此被压迫下去了。直至辛亥革命，人民尚不知道反抗帝国主义！

中国民族运动自经此次大打击后，不但大家不敢反对帝国主义，而且一般士大夫，甘心媚外，做帝国主义者之走狗，还在那里骂义和团为拳匪，不敢得罪帝国主义者，不敢反对满清，这种糊涂头脑，影响革命甚大，使中国人更加吃亏。义和团是一种民

族革命运动的，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辛丑条约的国耻，我们每年亦不可忘记。但我们同时不可忘记义和团运动的缺点，我们要用我们现在正当的民族革命方法，不可再走上义和团错误的路上。

第五讲　辛亥革命运动

今晚是讲八国联军以后的事实。中国自经八国联军之后，人人都以为中国要有一个大变革才好，当时孙中山先生乘八国联军之际，在广东惠州起事，谋推翻满清，同时汉口亦有保皇党康有为辈，起而谋逐皇太后，拥护光绪出来，但结果都失败了。我们在中央公园可以看见史坚如先生的纪念碑，他就是于庚子惠州起事时，在广州谋刺总督事败而死的。

在甲午以前，一般人对于中山先生干的革命，都不表同情，而且视革命为可厌恶的事情，至庚子之后，才觉悟中山先生的举动是不错，满清是不行，非打倒不可，从中山先生谈革命者于是日多，那时汪精卫先生、廖仲恺先生及一般留日学生皆跟从中山先生革命。不过当时革命潮流还不十分高涨，到日俄战争以后，中国革命潮流更高涨起来。

日俄战争的原因很远，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日本向中国夺得辽东半岛，俄人意有不甘，约法德出面干涉，迫日本将已吞下咽的一块肉——辽东半岛抢夺出来，不过几年他自己又把旅顺、大连占去，因此日本非常疾恨俄人。当时的俄国不比现在农工政府的俄国，那时是帝政时代，时常是想侵略人家，他在庚子年，并以参加八国联军名义，出兵满洲，事后不惟不肯撤兵，还想进

一步占据朝鲜。此时朝鲜已属日本势力范围，所以此时日人非打他不可，否则连朝鲜都要入了俄人之手了。至战争开始，俄人着着失败，其所以失败之原因，因为俄虽是大国，政治腐败，而日本国虽小，国人皆曾受资本主义忠君爱国的教育，全国一致勇敢，故俄非日本之敌。日本因此次胜利，一跃而为头等国，但自然除了资本家得到利益以外，一般工农是无所得的。却是中国民众的心理，因此次日俄战争，受了很大的影响，皆以为黄种人未始不可以战胜白种人，心中非常高兴。以前中国人好自高大，自鸦片战争以后，与外人战，每战辄败，因之渐次降落其自大之心，而反以外人为不可敌了。今见日本自立宪后，即可以胜俄，以为中国若立宪，亦何尝不可以战胜白人，因此心理，遂反感满清之可恶，以为中国以前之所以每次失败，皆由于满清不争气，因之渐渐倾向排满，而走上革命的道上。此时革命党有三派：一派为中山先生的兴中会。第二派为湖南黄兴、宋教仁之华兴会。第三派为江浙蔡元培、章太炎之光复会。中山先生一派，少数是智识阶级分子，多数是三合会、哥老会分子及华侨，该会的宗旨，初亦不甚明确，口号只是排满复汉，后至庚子起事失败，中山先生出游欧美，受各国社会主义的影响以后，知道革命不特要排满清，而且于满清打倒以后，须建立民国，及解决农工阶级的争斗，因是而成立了他的三民主义。黄兴等的主张与中山先生不同，他们只知排满复汉，没有所谓农工政策，当时从之者多数是学生，在湖南曾与学生组织机关，图谋起事，失败而逃亡日本，及至日本，留学生从之者亦众，较信仰中山先生者为尤多。章太炎一派更大不然了，他们是读书人，读了古书太多，援古方今，所以不满意受满清异族的统治，他们没有民生民权的主张，只不过有故

国遗民之痛，因恶满清，在上海办报痛骂之，后为清吏缉捕，亦逃亡日本。此时因赞成革命的人日众，中山先生到欧洲时，有许多留学生找他，先生与之产生一种组织，但是留学生并不欢喜加入兴中会，与更名为同盟会，及后至日本，宋教仁等以革命势力须统一，乃拉拢三派，共改组为同盟会。宗旨是排除满清，建立民国，及主张土地国有，但他们有一条主张是要要求各国帮助中国革命，这无异要帝国主义来打帝国主义，却未免是笑话。

自同盟会成立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日益发展，中国留日学生，除甘肃未派人外，其余各省均有人加入此会，入会的人或回国宣传，在各省组织支部，是年会员增至万人，以前中山先生自以为革命成功，乃身后事，至是始知革命目前可以成功了。那时同盟会由汪精卫先生等办理《民报》，很能影响一般民众，同盟会会员也的确能够切实而勇敢去做工作，如行刺满清官吏，安徽发生刺杀抚台一次，广东发生刺杀将军二次，而汪精卫先生亦于其时行刺摄政王，那时满清官吏心目中最怕的，就是革命党。例如辛亥年广东将军孚琦被刺后，满人莫敢继任，唯凤山自告奋勇，愿以身承之，结果不二日又被革命党找到，及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围攻督署，手持炸弹，血肉相搏，因此满清官吏益知革命党之不怕死，闻而胆寒，所以武昌起义，瑞澂一闻革命党枪声，即逃之夭夭，不费力而武汉克复，未始不是这种先声夺人的结果。革命党得武昌后，各省亦次第入革命党之手。武昌起事，讲起来很可笑，当时革命党因为事泄，不得不起来闹一下，其实全无准备，殊不知因此而吓走瑞澂，其余各省亦是一样，其时南部各省差不多全入革命党手，即北方亦有数省入革命党之手者。

满清末年，反革命党如保皇党梁启超等，他们曾办一《新民

丛报》，与汪精卫先生所办之《民报》相辩驳，谓革命要召瓜分，平均地权，会引起穷人把中国弄得糟糕，他主张由满清自行采用立宪制，有许多所谓老成持重的学者，很相信此说，故其势力亦不小。于是彼时有所谓立宪派，专向满清要求立宪，但满清表面上虽允立宪，其实是不赞成的，因为行了立宪，他就不能再压迫和剥削人民，所以到辛亥那年，立宪派亦觉得满清不行，而有些表同情于革命了。

可是那时革命势力虽然浩大，而其中实有许多毛病，不特同盟会的宗旨，一方主张土地国有，而一方又要求帝国主义帮助革命的事实，是矛盾可笑的，而且三派中分子亦非常复杂。在中山先生一派，虽有三民主义的精神，但其能明了三民主义者亦属少数。至黄兴一派，可说仅有二民主义，而章太炎一派更说不上，至多说他有半民主义罢了！三派虽然牵合了，主张未能一致。当时同盟会会员，是很勇敢的，但亦有一毛病，没有严密的组织，不开会讨论政策，没有训练和研究主义，又不注重宣传，一般党员，视汪精卫先生办的《民报》，为弄文墨的机关，以为是革命所不需要之物。他们的心目中只知要干，要打倒满清，所以对于主义反不屑于研究，因此不能明了自己革命的目的与意义，因此亦很难靠得住的。

革命军起，满清没有办法，乃召袁世凯督师反攻，袁氏当时有精练之兵六师，革命党以势力不敌，欲拉拢袁氏，给与大总统位，以为如此则革命可以算为成功了。其时适中山先生归自海外，许多革命党员以为中山先生对于革命有大功，应作总统，因扬言他必带有充裕的金钱回来，以耸动众听。后来人家见先生便问带了多少钱，先生只说“带了革命的精神回来”。众大失

望。然卒因有一般人还是拥护先生的，乃举之为总统，但有些党员对之却不大信仰。

那时革命党的最大弱点，就是党员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即如武昌起义时，革命党无人敢上台，乃找黎元洪出来，黎氏本非革命党，当时一闻枪声，黎氏已避于私邸，后闻革命党来找他，复匿于床下，革命党乃由床下拉他出来当个领袖。即各省亦是这样，所有都督皆请旧时满清官吏或立宪派人去做，那时党员的心理，以为革命党只堪做破坏的工作，不能做建设的工作，连孙中山先生他们都没有信仰，先生虽有许多建国计划，他们以为这都是理想！当时党员皆欲以总统奉袁氏，与他讲和，独先生反对之，先生主张革命要彻底，要打倒反革命派及土豪劣绅，一般党员视为太胡闹了！以为先生欲争此总统位。黄兴曾说："如不让步，粮饷再难维持下去，我亦不负责了。"先生看见四围空气不佳，乃舍总统而让与袁氏。

同盟会会员，不单这一回不相信中山先生，还有许多不相信的事。当中山先生让出总统后，他知这是革命党的失策，乃主张会员从此不要做官，还是都到群众中去宣传，但一般会员又以为民国由我们创造，断难一切皆牺牲，他们又舍不得丢了做官的机会。当时先生谓袁氏不可靠，会员亦多以为然，但一方面犹想靠袁氏以升官发财，不肯决然反对袁氏。及后袁氏把宋教仁刺死，把所有革命党的督军撤换，或以兵力逐去，革命成功不及二年，又完全失败于袁氏之手。结果革命党以前的势力，只为袁氏争得一个天下。

革命党在民国元年二年，不特外面的失败，即内部亦弄得一塌糊涂。当革命成功，章太炎即跳出同盟会，把中山先生大骂而

特骂，至今犹不改常态，他现在骂广东是赤化，有人说他是疯子，其实他并不是今天才是疯子，一向他便是这样一个混蛋的东西。此外革命党内部，有一部分是拥护黎元洪的，有一部分是为袁氏所收买的，而且当时宋教仁，把同盟会公开，又改为国民党，收入了许多坏的分子——贪官污吏，至使内部非常腐败，所以至民国二年，为袁氏给了一个打击，即刻就打得粉碎。

民国一二年，国民党不独内部弄得糟糕，而且宋教仁因想把国民党扩大，以收罗一般人，乃修改原来党义，将土地国有一项删去。以前民生主义的意思，还有写在白纸上的，现在连白纸上都没有写了。另一方面袁氏收买一般反革命派及立宪派，造谣说国民党的坏处，向民众宣传，帝国主义亦乘这时机，借款与袁氏，共二万五千万元，以为练兵费，所以袁氏把兵练好，把国民党打碎了，而一般人民亦不为国民党惜，反以袁氏举动为合，这就是因为国民党不做宣传工作的报应。

由今晚所讲革命党过去的事实，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教训，第一，革命虽是难事，但能努力去做必易成功。第二，革命欲达到成功，必要有好的政党去夺取政权，肃清一切反革命派，若如同盟会会员一样，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始终要被反革命派打倒的。第三，革命成功以后，还应特别注意组织民众，向民众宣传；否则失败了，一般老百姓不但不为革命党惜，反要说反革命的好处。

现在北伐军已打到武汉了，大家莫不闻而雀跃，但是以前武汉何尝不是革命党的，后来卒归于反革命派之手，所以已得的武汉会被敌人拿去的缘故，就是因为当时革命不彻底，不能将反革命派打倒，不能唤起民众和组织民众，来与反革命派奋斗到底的

缘故。我们要使革命成功，一定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非谓得到了武汉或北京，革命就算成功，要是不如此，就会蹈辛亥的故辙了。

第六讲 五四运动前后的国民党

今天说的是在民国二年，国民党被袁世凯打倒后之中国革命运动。当时国民党，分成二派！一为孙中山派，一为黄兴派。中山先生看见国民党自民国元年至二年间，做了许多错误的事情，决意丢了国民党，另组严密的中华革命党以代之，入党者须打手印立誓，服从孙先生，重新整饬纪律，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黄兴则认为国民党没有做错事，反对孙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的举动，批评他立誓打手印，是野蛮时代的举动，并谓要党员声明服从孙先生，是孙先生欲做领袖的观念太重；黄兴以为现在国民党既然被袁氏推倒，国内外又很少得着同情，不若暂行停止革命，让袁氏做十年，十年以后，袁氏要做不好，才再起来革命。黄兴这一派，是以为无须什么纪律领袖的，孙先生则主张非有严密的纪律服从领袖去继续革命不可！这二派后来有甚么结果呢？黄兴这一派因为不讲纪律，而且主张俟十年后才革命，已经失却了革命的精神，所以到袁氏推倒国民党以后，有宽处国民党，凡愿悔过者，准免治罪的通令，遂有许多党员投降过袁氏方面去，虽做过什么都督的都投降到袁氏幕下去了！孙中山这一派虽然比较的好，但亦有很大的毛病，就是只讲纪律，不讲主义，结果连纪律亦是靠不住的。当时孙先生以为说起主义，许多人不懂，因为彼时未就农工生活说起，只说了些抽象的道理，所以大家总

不易了然；孙先生因以为不如叫大家盲目的服从，我叫你怎样做就怎样做，较为简单妥当，不知照这个办法，一般党员，当面虽说服从孙先生，却没有人懂得孙先生的真意思，背后就没有人肯照着孙先生的真意做事。那时又因为没有注意农工运动，培植民众的革命势力，只图利用土匪，运动军队去打倒袁氏，不知利用土匪军队，是不中用的，光复时借军队土匪的力量来打倒满族，还有种族的关系，可以鼓舞一般人的精神，此次袁氏亦系汉人，土匪军队便不知道何必要打倒他？所以亦很少肯出力来打倒袁世凯的；自然有些土匪是可以运动到手的，然这不过是金钱的作用，他们对于打倒袁氏的根本意义，始终还不明了，若是袁氏方面有金钱，他们亦可以再转到袁氏方面去的。那时还有些不忠实的不革命的党员去欺骗孙先生，对孙先生说："我服从先生，那处有几多土匪军队，要拨几多款子，就可以起事革命。"孙先生有时信了他，就把钱交给他去运动，他跑出外方去开旅馆，吃西餐，宴宾客，委任出许多空头的团长、营长，到后来随便在某地方开几响枪，诈作谋事失败的证据，便回来向孙先生报告，"起事失败了！"孙先生是认为革命总免不了有失败的事的，所以从来不十分追究他们，因此孙先生不知受了他们几多次的欺骗了。而且因为那时只知利用土匪军队，不注意农工运动，一直到袁氏称帝之时，孙先生这一派，并不能有相当的实力去打倒他。袁世凯之倒，虽然国民党亦有一部分力量，然而多半还是袁氏部下各小军阀，及进步系起来拆他的台，所以倒袁之役，国民党并未立于重要的地位。袁氏被打倒以后，中国不但未能建立起民众政治的根基，反惹了一种大祸。怎样呢！那时国民党和进步党的人，要打倒袁氏，没有农工的势力，因而只有吃亏的事，利用军阀的势

力以倒袁，因此倒袁之后，军阀之势力日张，政治上反为军阀所利用，变成了割据的局面，不一年发生了张勋复辟的事，复辟以后军阀的势力更是变本加厉了。

在民国六七年间，国民党因反对段祺瑞，利用南方陆荣廷、唐继尧的力量，在广东开非常国会，不料陆氏赶走龙济光之后，得着两广的地盘，不愿与孙先生合作，设法反对孙先生，使孙先生不由得不跑走了！后来陈炯明，领粤军回粤，国民党人因陈系同志，又利用此时机，又拥戴孙先生回粤为大总统。孙先生主张北伐，陈氏甚不愿意，结果闹到炮击孙先生。等到杨希闵、刘震寰赶走了陈炯明之后，国民党人又拥孙先生回粤为大元帅，然刘杨仍是与孙先生貌合神离，只是要利用孙先生一个名义，以便于他们的割据罢了！计自民国元年至十三年，国民党可说是一个很混沌的状态之下，孙先生所说的三民主义，没有人去研究宣传，人民自然更不会了解相信。反对的人讥笑国民党开烟赌抽捐，是三民主义，苛税杂捐，是三民主义，兵匪骚扰，是三民主义，最好的人亦只是说孙先生的人格是好的，但三民主义是不行的，国民党是不可加入的，十三年来的国民党，其情形便是如此。

在这十三年间，国民党内容虽然腐败，然革命运动，仍有相当的进步，如民国八年之五四运动，是近年来革命运动的第一幕，值得我们注意。当欧洲大战时，列强不暇顾及东方，日本乘机于民国四年，提出二十一条件，强迫中国承认，扩张其在中国的优越势力。这一件事，不但中国人甚引为耻痛，即英美诸国在旁，亦看得眼红过不去，他们暗中帮助中国反对日本，民国八年大战告终，遂促成了五四的大运动。这次五四运动与国民党无

关系，当时的领导者为北大教授陈独秀、胡适之二人。陈独秀在彼时，尚未组织共产党，不过他眼光锐敏，主张激烈，胡适之是美国留学生，受美国反日的影响不少，他两人在北京努力鼓吹，到五月四日，遂发生了北大学生二三千人巡行示威，殴打章宗祥，焚毁曹汝霖住宅的事。各省爱国学生，纷纷罢课响应，不久便成功了全国的普遍运动。英美教会办的学校学生参加尤形踊跃，英美教师，亦极力鼓励学生，奖为爱国男儿，中国将来的希望；但是到现在反帝国主义运动，英美教师就不赞成，不许教会学生参加了，因为帝国主义的国家，英美就是坐头儿把交椅的哩！这回的五四运动，关系中国民众运动重大得很，五四的巡行示威，是中国空前未有的群众运动，后来全国学生罢课，汉口、上海、广州各处学生罢课，商民罢市，上海并有工人罢工，全国人心汹汹，北京当局吓慌了，才罢免曹、章、陆的官职，这是人民向统治阶级第一回的战胜，人民遂觉出人民自已的力量了。陈独秀、胡适之二人，又主张将文言改为白话，反对旧礼教旧风俗，把古书加以严格的批评，故五四运动，不独使民气日张，人民思想也日益发达起来了，于是白话诗文，渐渐流行了，男女的社交亦公开了，思想文化上发生了大的变动，一班老学究，虽然拚命反对，然而各地青年，都很热烈的接受陈胡二氏的主张。他们自五四运动以后，反抗的精神，格外发达，他们藐视政府，所以亦藐视一切旧社会的势力，文化运动成功了一个最伟大的运动。不过这运动，其中尚有三层缺点：第一，是这次运动没有政党在中间指导，当时参加的，都是一般乌合之众，无团体系统的组织，国民党既与之无固定的关系，共产党尚未产生出来，胡适之后来创议，设立学生联合会，想借此指挥：然学生联合会，究竟与政党不同，学生联合

会中间，若没有政党指挥，想靠学生联合会去指挥学生群众，究竟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到了民国九年，学生就散漫不堪了，群众运动的潮流，亦低落下去了！第二，是学生固然爱国，但欲求学生群众，成为有纪律，有组织，能坚持耐久的团体，是很难做到的。学生年纪轻，多浪漫性，而且大家都爱出风头，不肯服从纪律，那时不晓得组织农工群众，努力作农工运动，把一切事业，都建筑在这种学生群众身上，故在民国八年的一番热烈运动，不一年就烟消云散了。第三，是参加五四运动的人们，没有认清敌人，认定的对象太小，他们不说打倒段琪瑞，只说打倒段氏之走狗曹、章、陆，更不知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到打倒了曹、章、陆，大家以为目的就算达到了，所以再闹亦闹不起来了！

照上所说看来，五四运动本身已有此缺点，所以民国九年，便低落下去了。那时社会上就发生二种现象，一种是主张要读书的——胡适之便是一个显例。他就五四的经验，以为专事开会巡行来救国，是不行的；他不明白五四运动的失败，是上述三个缺点的结果，他以为是由于中国文化程度太低了，所以主张非提高文化程度，提倡努力研究学术不可！五四以后，胡适之身价渐高，他自然为避免得罪政府，亦是以专心读书为好，他自己因此便去研究古书，整顿古书，一天天将他自己葬埋到书里头去，不想革命了，他并且影响了许多学生跟着他走去，所以五四运动，忽一变而为读书运动！这种风气，弄得许多人离开了革命战线。另一种是不相信胡氏的读书主义的，但是他同时也不赞成开会巡行的法子，以为要救国须先改良社会，所以这般人便去办书店，设工场，设学校，组织工读互助团，实行半工半读的计划。他们以为倘全国的人都能如此，将一件一件的好事做起来，中国

便会达到好的地位，不知道这只是一些空想不可能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不论办一件什么事情，是逃不脱各种压迫，国家先不能救，却想先改良社会如何是可能的事。他们曾经用了千余元的款子，成立了一所的工读互助团，召集青年，每人每日做四小时的工，其余时间便去读书，这种无工作经验的青年四小时的工作，还不及工人二小时所做的工作，因此逐日亏本，不久即关门失败了。

五四运动以后，发生了以上二种现象，那时一般领袖，好象摸黑路一样，他们摸不着正当的路径，亦是无足怪的。到了民国十年以后，俄国革命成功，全俄统一了，俄国革命思潮逐渐输入中国，陈独秀先生，首先接受了这种思潮，开始宣传，组织共产党，并领导青年努力做工人运动。陈独秀先生，所以能够这样，不但是因为他的聪明勇敢，亦因为五四运动，及其以后之各种失败，叫他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有必须新辟一个途径之必要。工人运动兴起便收着颇大的效果，如京汉铁路工人之罢工，继续兴起，武汉津沪的工人，均跃跃欲动，后来虽不幸引起了“二七”的惨案事件，然而工人运动的重要，已为人人所公认的事了。自从“二七”失败之后，陈独秀先生等，觉得单做工人运动，实在还是不够，必须兼做农民运动，并联合各阶级，努力于国民革命，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所以他们希望国民党改良，希望国民党能与共产党共同工作，常在《向导》周报发表劝告国民党的话。这时孙先生和廖仲恺、汪精卫诸先生都是很恳切想完成中国的革命，然而正没有好的路走，从前不是受陆荣廷的压迫，就是受陈炯明的压迫，到现在杨希闵、刘震寰等的压迫，仍旧与陆陈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当时对于《向导》的提议亦很注意，后来又得着鲍罗庭

来粤与孙先生谈话，更明白俄国革命情形，孙先生决意把国民党改组，仿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改从前只注意军事政治运动，忽略民众宣传组织的缺点。但是自从改组之后，一般老党员大不满意，极力阻止孙先生的进行，孙先生意志不稍为之游移，并决定容纳共产党分子加入国民党，使其帮助努力改组的工作，开除了妨碍改组的冯自由，将从前在党中居重要地位的右派分子居正、谢持置之无足轻重的地位；后来左派领袖，更承继孙先生之志，打倒杨希闵、刘震寰，开除林森、邹鲁一般右派，老党员不敢到广州，诬广州为已经赤化，然而中国革命运动，因此得了很大的进步，农工的组织，亦日益发达了起来，国民党右派分子想造谣中伤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感情，甚至谓国民党被共产党拿过去了！自十三年改组到于今，为此闹了许多的纠纷，大家也已明白了，我可以预言，一定还有许多这一类的纠纷的，这是国民党要完成改组，不可避免的困难。我说的中国民族运动史到此结束。我希望各位注意，就是我们要懂得，中国革命运动成功，须注意这七八十年的经验。在这七八十年革命运动之经过，许多领袖摸黑路得着了许多好的教训，由于我们走了许多走不通的道路，所以到今日我们很勇敢，很有眼光的革命领袖，为我们找出一条很光明的大路来。大家不要有一点怀疑，要奋勇地一直依照我们领袖所指示的革命的策略，去应付一切的问题，革命自然可以成功的；若仍如右派或其他反动派之执迷不悟，到如今还谈七八十年前的话，还要走从前走不通的道路，革命是一定不会成功的，请各位不要怀疑罢，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了！

第七讲 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是中国一个很伟大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发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几种很复杂的原因：

第一件，是日本纱厂的风潮。去年（十四年）一月时①，日本的内外棉纱厂大罢工，这个纱厂是一个很大的日本资本事业，在上海、青岛，日本内部，都有他的工厂。他在中国原来只开了一个工厂，因为欧战发生，欧洲棉纱不能运到中国，一面中国工厂发了财，一面日本内外棉纱厂亦由一个工厂，发达到十一个工厂了，在上海一隅，便有八厂之多。日本资本家利用中国工人的穷苦，在平时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资，并且常常痛打辱骂，一般工人久已感觉得压迫太厉害；前年（十三年）九月，有人②在内外棉纱厂附近做工人运动，工人更加觉悟。日本资本家晓得这个情形，就另外养了许多男孩子和女孩子，叫做"养成工"，预备将来学习成功的时候，就可以开除成年工人，以养成工来补充。此时工人稍有组织，要反对这种办法，所以去年一月，工人与资本家冲突，曾大大的罢工一次。这次罢工，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因为当时的棉纱价值很高，生意又异常发达，资本家以为罢工是极不合算的，所以就让步，相当的答覆工人要求，承认工会组织，解决了罢工。自从内外棉纱厂罢工胜利后，许多工厂都相继罢工，工人气焰高起来了。日本资本家很不利于这种情形，到去年四

① 此处是阴历，阳历应为二月初，下同。

② 据一九二六年五月恽代英在广州所作《五卅运动》讲演纪录稿，此处"有人"原为"我们的同志"。

月纱市清淡之时，便极力想法破坏以前的条约，随意开除工人，苛待工人，引起工人的愤怒。这时，如照做工人运动有经验的主张，是不可以罢工的。因为以前资本家的让步，固然工人能一致的坚持，尤其是为了棉纱价值高涨，资本家急于要生产棉纱的缘故，现在棉纱市场不佳，罢工是不易胜利的；但一般工人以压迫太厉害了，又以为前次罢工胜利，希望这回可得同样结果，所以他们都要罢工。罢工的时候，日本资本家用手枪打死了工人领袖顾正红，于是群情更加愤激，参与罢工的有四万人，社会上的声援也很热烈，惟日本资本家态度强硬，把工厂关闭，延至一个月的时期，工人因生活关系，不能坚持下去，想找人调停让步，调停的结果，日本资本家不但不允贴偿罢工期内工资，并不承认组织工会，而且运动中国官厅与各国领事施压迫手段，要工人无条件屈服。顾正红的棺材，停在美国人所买的地皮上，美领事压迫迁移。许多工人领袖，看见这种紧张情形，决定开一追悼顾正红大会，以为示威；这个大会，日本纱厂工人全体参加，合学生与各界同情者，人数将近六万人。日本资本家运动了中国官厅派兵压迫，但兵到时，会已开始。他运动英领事帮忙，不许持小旗子在租界上成群结队的赴追悼会；于是上海大学学生拿旗子在租界上，预备到小沙渡参与追悼会，被巡捕房捉了许多人；文治大学学生为工人募捐，也被捕去了许多人。这时已是五月二十日前后，工人五六万，无捐款救济，生活很难维持，学生被捕，亦无法营救，上海的空气，非常沉寂。中国纱厂资本家虽愿意帮助工人，然并非有什么爱国思想，不过希望日本纱厂罢工，中国纱厂的生意便可以发达，可以赚钱；但又怕日本纱厂知道，不敢用钱来实地援助，只是空口说白话的鼓励工人。这样下去，万难维持生活

的工人，简直不能不因被压迫而屈服了！

第二件事是工部局三条提案。上海的租界，一是公共租界，一是法租界，租界上所有政权，均操在外人之手，中国人在租界上，就等于一个亡国奴。工部局是上海租界的行政机关，管理租界上一切事务；纳税人会是上海租界的立法机关，工部局如有提案，须经该会通过。工部局即时有三个提案，要想纳税人会通过。这三个提案，是：

（一）印刷附律。外人因为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很热烈，想要禁止各种宣传，所以限定一切印刷品，均须经过工部局的审查，才准付印。所谓印刷品，包括了报章、书籍、杂志、传单、广告等等，甚至油印品都包括在内，如果不经工部局审定，便要罚款。他用这个方法来箝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手段非常厉害。

（二）增加码头捐。码头捐这个东西，是中国人纳给外国人的捐款，现在工部局以为太少，应增加若干，加重商人的负担。

（三）交易所注册。交易所无论外国人办也好，中国人办也好，本来都应纳费到中国政府来注册立案。现在外国交易所，不但不在中国政府注册，工部局反要规定中国交易所到外国工部局去注册。

这三个案子，于商人大不利。比方印刷附律规定了，不独我们宣传上有很大的妨碍，就是商务印书馆出一本书，纵然印刷好了，如受其干涉，就不能发行，这是多么麻烦呢？至增加码头捐与交易所注册更不必说是无理的苛索。所以工部局在前年提出这三案的时候，上海商人便反对得很剧烈。当时纳税人会的到会人数不足，没有通过。去年四月间，工部局又提出来，商人在报上大登广告，极端反对，纳税人会亦有许多人不到会，案子仍

未成立。到了五月底，工部局又坚决的要在六月二日开会通过，所以亦引起了许多商人的反抗。

这两件事，可说是五卅运动的动机，在五月二十以后，有人提出只有一个暴动，才可以给凶横的帝国主义一个大的打击。那时全国的民气很高涨，山西一省，有一万多学生包围阎锡山的运动，各地农民蜂起，全国都表现不安的样子。上海虽在表面上是很沉寂的，而大部分感情上均甚激烈。由五月底至六月初的中间，是一个顶好暴动的时候，因为那时上海工人，正已走到没有路走了。上海的商人为了要在六月二日以前，给工部局一个示威，都希望发生一个暴动。学生联合会决定了要各校学生到租界上去游行演讲。租界上是不许游行演讲的，最初大家都以为学生一定不敢冒险到租界上来演讲，有些人相信至多只有三百人可以出来，要做一个大运动，是很难的。其实这种见解错了。二十九日有些学生偕同工人到各学校里去宣传，想去激动学生群众。当时有许多学校是不容易进去的，幸而有好多学校都有国民党的区分部，介绍宣传的学生工人到校内演讲。做了一天的工作，于是三十日出来的学生有了三千多个，与大家事前所揣测的，多了十倍。我们不要把革命看得大难，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

除了上述表面的原因外，五卅运动有他的根本的原因。其根本的原因，大概有四个：

第一，五卅运动，不仅为日本纱厂风潮与工部局提案而发生，帝国主义者八十多年来的压迫，实为其根本原因之一。我们知道不平等条约，是束缚中国人，剥削中国人的工具，为什么日本资本家能够杀中国工人呢？因为日本人能够在中国开纱厂，

因为有马关条约给日本人以这种权利。为甚么工部局能够压迫商人呢？因为上海租界上的政权，完全操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人的事，中国人不能说话，中国商人想到这里，便不能不感觉十分痛苦。八十多年来的压迫，积至五卅这一天，遂爆发起来。

第二，革命宣传渐普及，亦是一种根本原因。最近几年，各种宣传的出版物很多，到处都有编印分卖的。这种出版物，虽然很多很平常，很幼稚，但宣传的功效，是很大的。这里这样说，要实行国民革命，求中国人民自由平等，那里那样说，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自然许多人脑子里，都受了影响。国民党改组以后，对于宣传工作，亦特别注意，前年上半年，汪精卫、胡汉民诸先生在上海许多学校里演讲，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国民革命的主义，学生很受感动。在群众大会中，对一般反动的宣传，……①，能给他们一个详细的批驳，更有更大的影响。五卅运动所以从上海起来，而影响到各乡村和各城市的民众，尤其是青年，引起此伟大的运动，这不是偶然的事情。

第三，民众组织的发展，亦是五卅运动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在最近几年内，民众渐渐起来组织了！工人的工会，学生的学生会，都有全国统一的组织，农人的农民协会，商人的商会，亦各有组织。假使没有学生的联合会，就不能号召民众，五卅运动就无从发生，所以民众的组织，关系也非常重要。

第四，革命党的发展，更是五卅运动的一个最大的原动力。五卅运动主动活动的差不多完全是革命党的同志，这些人在工作上，因为有了党，可以彼此协调帮助。以前国民党的组织很散

① 略有删节。

漫，所以一个党的内部，各做各的，没有几个人肯一致动作。自国民党改组以后，虽不能算顶好，然组织上，纪律上，均比较的很有进步。因此，所以五卅运动能够发生。但可惜革命党的发展程度，还很有限，所以五卅运动的结果，亦只能做到这一步。

到五月三十日这一天，原定计划，要各校学生到租界上来讲演。但只说到租界上讲演，租界地面很大，没有指出集中的地方，所以虽然出来了三千多人，都是散漫的；又因定于午后一时为出发的时期，而传话的人有些错误，使一些人在上午九时便出来，没有守一定的时间，这都是没有经验，所以弄出许多缺点。先出来的人，在茶馆里空等了半天。此时，国民党的内部，有人还觉得害怕，他以为这是触犯法律的，不敢拿他们的党部为指挥机关，所以上海学生会便成了指挥机关了。午后出来的学生很多，有些聚集在最热闹的地方，如先施公司等处，扬旗高呼讲演，起初外人也不大干涉，后来闹得太利害了，外人觉得这样下去，八十多年的威信，都要扫地以尽了，遂决意要压迫这些学生。刚刚因为学生觉得不集中起来，不能威吓外人，逐渐集中于大马路一带的时候，巡捕捉了许多学生去了，一般学生说要捉大家都去，于是都跟着巡捕走；一般商店伙友见了，亦鼓噪起来，大家都闹到老闸巡捕房去了。许多人这样环集在巡捕房门口，巡捕房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将被捉学生一并放出，一是开枪轰击这些人；如果将捉了的人又放出来，帝国主义决不会这样示弱的。所以巡捕房看见环集的人太多，就开起枪来，打死打伤了许多人，这样一来，真是一不干，二不休，明天必再来，须有更大的示威才好。但有些人怀疑，学生是不是还肯出来呢？学生联合会以为让帝国主义者打死许多人，就这样了事，是最羞辱不过的，于是

决定计划，要上海所有的学生，在明天都出来，并在通告中特别声明，要群众集中在大马路宣传，如果帝国主义来干涉，就由大马路往二马路退让，但总不要解散，而且一定要仍旧回到大马路讲演；同时派许多人到商店里去宣传。五月三十日的晚间，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开会，并请学生代表报告情形，学生代表的报告是非常激烈的，商人亦决定帮助学生，但怎样帮助，还没有办法。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是一般小商人的组织，小商人比大商人的革命性——反帝国主义性要强些，但虽有反帝国主义之心，却是很害怕的；他们以为罢市的事，一定要经过总商会的通过下命令，他们希望工人先罢工，然后他们再行罢市。到了第二天，落了些小雨，学生出来的还是很多，大家集合在大马路，但究竟有些胆怯，很少人敢讲演，他们有些到商店里去宣传，店员要罢市，店主还是狐疑不决，总说要等总商会的命令。到了下午四时，学生群至总商会，要总商会命令罢市，当时谣言很多，不是说这里巡捕又捉了人，便是说那里帝国主义者又枪杀了人，群众愤激得发狂起来，总商会亦不得不答应罢市。这时国民党党部亦打了一个电报到各省，说上海发生惨案后，已经是学生大罢课，工人大罢工，商人大罢市。三十一晚，总商会的罢市通告发出来了。六月一日，上海的空气最紧张，一个警察对车夫说："你不要拖外国人哪，如果拖了外国人我就要罚你。"法租界有一外国人从黄包车里跳出来，预备上电车，因为给车夫力钱太少，车夫追索，一个中国巡捕又对车夫说：将那外国人推下来，他们是什么东西！保卫队表示亦很热烈，公共租界中国巡捕都要罢岗反抗。各地工会、学生会都组织了起来。那时印了五六十万张传单分别告工人、兵士、警察，于是全上海人都哄动起来了，这时可见宣传的效力

是很大的。那一天，上海的民众几乎暴动了起来，经学生会劝止，学生会在那时很有权威。有些学校原来是反动学生所把持，反对学生联合会的，自五卅的事件发生，学生群众都要求共同联合打倒帝国主义，自动的起来反对这些反动领袖。反动领袖说，这个事情，是国民党包办的，是共产党的阴谋，不要上他们的当，群众一点不相信，反骂他们是有意捣乱。上海国民党内部，纪律不甚严密，有些党员不肯服从党的指挥，他们因为自己想在学生联合会当会长，做主任或科长，主张要改组学生联合会，好给他们有出头的机会。学生会中真正能工作的人是很少的，学生会要派人到学校里去宣传，学生会内部，就没有人办事，学生会各方面稍为顾到了，工会又感觉没人办事了。另一方面则右倾的分子，非常捣乱，他们除了说国民党包办，共产党有阴谋以外，另外还有孤军社的人，在六月一日，发了一种传单，是一篇《告国人》的文章，印刷得很多，满街粘贴；他们的意思，是主张什么“不合作”，劝民众不要乱闹，要学印度那位甘地的办法，讲经济绝交，不买外货，不坐外国轮船等……。还有江亢虎主张就事论事，不要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只就巡捕房打死人这回事，与之交涉，要缩小范围，才能得到结果。又有陈霆锐说，这事不消乱闹，把范围弄大了，一定要依法律解决，向法庭起诉，才有结果。一般学生虽然受了一点革命的宣传，现在听了这般糊涂的论调，也觉得以前提的口号太高，恐怕不能做到，没有结果；他们至少也主张不要说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只好专对英日，不要得罪了美德及其他各国。有些国民党员不但自己不能宣传人家，纠正这些错误思想，他们反被人家宣传了，跟着人家乱讲。这时革命的宣传力甚少，反动的宣传很利害，党已不能有灵敏的

指挥，党员又不能完全守纪律，这种工作的困难与缺点，发生了许多不好的结果。幸而此时有些国民党员与反动分子究竟联合不起来。他们感觉党团会议之必要，成立了党团的组织。国民党员在学生会中虽没有很强有力的领袖，但有了党团的作用还可以领导许多学生，拉拢中立分子，与反动势力奋斗。工会方面有三十余万工人罢工，但要到工人群众去宣传，则感觉缺少人才，且没有工人运动的经验，国民党员亦不常听见政治报告，因之就不明了各方情形，不晓得怎样决定他们的工作方法，他们去演讲，亦不能动人听闻。后来外面商量好了，对帝国主义提出十七条要求，如收回会审官厅，赔偿罢工工人损失，不许外人越界筑路等等，这已得工会学生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之赞成，但总商会不表赞成，只允站在从中调停的地位。那时学生、工人、小商人是一致的，组织了工商学联合会，只有总商会不肯与他们合作。六月一日、二日、三日这几天，帝国主义者常有击杀中国人的事发生，一般人非常愤激。孙传芳亦打一个电报，大意要学生努力，他愿以武力为后盾；张学良也打一个电报，并汇洋两千元捐与学生会。过几天，张学良亲自带兵来了，租界上本是不许中国军队通过的，张作霖的兵却都通过了租界，一般学生很高兴，以为收回租界是有希望的事了！其实张学良一方对学生表示好意，一方却正和英国办交涉，以图妥协。有一次，学生会派代表见张学良，他很客气的说："你们是爱国的。我当学生时也很热烈的参加爱国运动，不过现在地位不同了，不能象你们一样了！"学生代表听了张学良的话，喜欢得了不得，我告诉他们说，张学良的话是不错的，他现在地位不同了，他现在到底站在什么地位呢？是站在帝国主义走狗的地位，所以他不但不能帮助学生爱

国，而且有一天还要压迫学生爱国运动的。他们觉得我这些话太过分了，但是没有好久，张学良的鬼面孔便揭穿了，学生会再派代表去见他，他就说："不要乱闹，我自有办法了！"这时候，岳维峻、段祺瑞、冯玉祥，通同打电报，汇捐款；但除了冯玉祥真有点民族思想以外，其余都是假的，有作用的。那时奉系压迫他们正是十分厉害，所以他们要提高对外空气，使奉系不致还在此压迫他们，决不是真正有什么爱国的意思。所以段祺瑞派了一个人到上海来调查，民众很想请他出来讲几句话，他不但不敢出来，反住在租界内，以英国巡捕守卫。那时总商会既不赞成原来的十七条，他们以为太高，恐怕做不到，而且怕伤了外国人的感情，于是自己修改做十三条，好象对外人表示减价的样子，其实原提十七条，固然做不到，你就减低一点，又能够做得到吗？学生方面也发生了不好的表现，因为学生家中的父母，非常害怕他们子弟在外面遇了危险，就纷纷来信，假说父亲母亲病重垂危，要他们赶快回去，六一、六二、六三，这几天，学生是很勇猛的，到了以后，有些亦害怕起来，于是趁此就跑回去了。在五卅运动中，帝国主义者想了一个方法，出一种《诚言》报，造许多谣言，欺骗中国人，但没有什么效果。然而到了三个礼拜以后，商人罢市既久，发生了一个开市的问题，以为长久罢市还是自己的损失，所以提出缩短战线的口号来，并且说罢工要款项来接济，才能维持，不如商人开市，收一部分利润来援助工人；这般论调，自然容易鼓动一般生性比较妥协的人。那时罢市的只是限于公共租界，本来法租界与中国界的商人，都有决定罢市的，但一些不明白的人，乃至学生会代表，以为不要得罪法国或中国官厅，劝他们不要罢市，不知法租界与中国界能罢市，尚可引起法国及中国

官厅与英国的交涉，他们自动要罢市，何必反去劝止呢？我们是主张继续罢市的，以为开市并非缩短战线，而是减少我们的势力，解散一部分我们的队伍。但事实上已有大部分商人要开市，想再延长几天，亦是事实上不可能的事，结果遂宣布开市。但开市有两个条件，一是禁止买卖英货，一是接济罢工工人，要商人登报表明，但后来虽学生查货甚严，商人因而不买卖英货，至接济罢工工人一句话，则完全是空谈。开市以后，又发生开工的问题，有一般人主张专力对英，所以说罢工要有范围，于是他们硬要日本工厂工人复工；等到日厂工人复工了，英国工厂工人亦动摇起来，也慢慢地开了工了。学校里的学生，已有一部分回家，许多教职员也劝学生回家，在他们脑子里，以为让他们在上海闹坏学风，是不好的，所以特别准假，或提前放假，于是结果，剩了少数学生会的代表，他们只可代表自己，不能代表群众了。这样一来，各项运动，既没有学生参加，商人又被煽惑退后，仅仅剩下许多工人在那里孤军奋斗！可是，工人生活困难，各方捐款不能接济，买办阶级与军阀勾结，起来压迫他们；一般反动学者，也极力宣传不利于他们的论调，应付他们是很困难的。到后来五卅运动，只剩下一件事，就是与英国经济绝交。一般学生检查仇货很勇敢，很热心，但是亦有些毛病，有些人是乱七八糟的，比方扣留水果，他们自己拿来吃了；不能久贮的货物，他们任其腐败；有些货物亦不管是否确系英货，随意扣留，并且学生会无专人办事，商人有事要来接头，感觉非常麻烦，自然很不高兴。有些学生会的职员，喜欢坐汽车，吃西餐，尤其是爱与女学生讲交际，更引起一般无聊腐败的人的评议，加之学生内部，又常常发生问题，如查账、争位置等，以后学生会力量亦成有限了，张学良既与

英国妥协了，便解散了上海总工会，开始向民众进攻。原来醒狮社、孤军社、民铎社等组织一个《公理日报》，内有国民党员参加，后来主持该报之权，归到国民党员手中，曾琦等便宁告退，为拆台之计。又有些共产党员组织了《热血日报》，有些国民党员组织了《民族报》，但因帝国主义军阀压迫日甚，都继续停了版。在全国说，开始大家都热烈的做救国运动，到后来，都渐渐的沉寂下去了！五卅运动所得的结果，有好的坏的两方面，先说好的方面可以指出两点：

（一）使反帝国主义的潮流高涨。五卅以前，中国还有好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反对帝国主义，就是一般有智识的学生，也不十分明白反帝国主义的意义，因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已有八十多年，中国人受压迫惯了。而且庚子之役，对于反抗帝国主义的人，又曾经加了无情的惩戒，所以中国人对帝国主义不独不敢反对，还要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的话，以为自己安心忍受帝国主义压迫之解嘲语。就是革命党，也是一样的懦弱心理，同盟会党纲第六条，还要说要求列强帮助中国革命这样不通的话；辛亥时亦最注意保护外国人，尊重外国人条约，简直同段琪瑞的外崇国信差不多！自国民党改组后，才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来，经过一番宣传，少数人才知道应该反对帝国主义。但经过五卅运动以后，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就普及于全国，大多数人都知道了。不过呢，仍然还有不少误解的地方，有些人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见了外国人就要反对，又如国家主义派不肯说反对帝国主义，要外抗强权，这都是不对的。但总而言之，今天再有人说要保护外国人和尊重外国条约甚么，都知道他是反动派了。

（二）使民众的力量增大。五卅以前的工人、学生、商人等，大部分都没有组织起来；五卅运动后，各地工人、学生很多都组织起来了，商人亦渐知引他们的组织来参加反抗帝国主义，且有工学联合组织，这种民众的力量影响政治方面的运动，使军阀内部分化。那时，国民军通电对英宣战，便想站在民众方面得着民众的赞助。反奉战争发生，直系孙传芳痛骂张作霖压迫民众与摧残爱国运动，亦是表面的接近民众，利用民众去打击张作霖，若是没有民众力量，他们不会这样做的。后来国民军同情反奉，郭松龄发生倒戈的事情，亦是民众力量暗示的结果，可惜郭松龄为帝国主义所败，民众的革命潮流亦渐渐低落，现在国民军也失败了！国民军失败的原因，固然由于帝国主义之联合进攻，而国民军内部不肯显然站在民众一方面，亦其实主因；比方冯玉祥不肯表明态度，二军与民众，反有恶感，当然是他们失败的结果。但五卅运动后，民众已在政治上成功了一部分的力量了。

再说坏的方面亦有一点，便是过早的促成了阶级之分化。阶级分化，是五卅运动一个最大的影响。那时学生回家了，商人软化了，只留下工人孤军奋斗，孤军社、醒狮社、民铎社讲的和平理想，与江亢虎主张的缩小范围，丁文江的主张唱低调，戴季陶主张的单独对英，影响很大。学生本来多是专于读书，不肯参加实际运动，即参加各种运动，亦是爱出风头的。他们每每因嫉妒反对作工作的革命党员的原故，跑到孤军社等一般人那边去，大商人、工人、学生、小商人各为其利益，惹起了感情的冲突，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又乘机破坏革命势力的联合，共产派和国民党左派分子也许不免有些左倾幼稚的地方，于是各阶级的分化很利害，结果，资产阶级有好些都离开了工人，附和帝国主义或买办

阶级所唱的反赤论调，造成了一个反动的潮流，直至北伐胜利，这种反动潮流始被民众革命潮流所压倒。最后我们要说，五卅运动所得的教训，我们可以分三点讲。

（一）革命不要看得太容易，也不要看得太难了，五卅运动是全国数百万人共同联合起来的一件大运动，在普通的人一定以为是一件顶难的事情，但是有了相当的宣传和组织，并得到了相当的机会，实际是很容易号召起来的。但是因为五卅以前，革命的宣传和组织，都还不见得很好，所以亦只能够唤起一个这样大的运动，并且只能做到这一步田地；如果将来能够有更进步的组织和宣传，一定收效可以更大的！国民党那时在上海学生、工人中，有区分部的组织，但上海八十几个学校，仅有二十几个学校有区分部，这可以表现组织力的薄弱；党内的宣传品，刺激性亦太少，并且只散布了一二十万份三民主义，在四万万人中，共产党对于宣传虽比较努力，亦还不能达到深入农工学生群众的目的。这可以表现宣传力的薄弱。然而这样的组织宣传的力量，居然唤起了两百万人的五卅运动，虽不久为反动势力压迫而消沉下去了，这亦很可以使我们今后注意对于宣传和组织的工作，更要加上一番特别的努力才好。

（二）在革命运动中，群众容易发生左右派的空想，这种空想，于革命运动的影响甚大，若非很好的宣传工作，随时打破这种空想，每每使到这种运动走入错误的道路，以至于失败。在五卅运动中，发生左右派的空想甚多，大略可举五项：

A，和平解决说。如果能够和平解决，固然很好的，但上海杀了人，汉口、广州等处都杀了人，帝国主义者从来不与中国人讲点公理，你尽管说和平解决，谁替你来和平解决呢？

B,法律解决说。法律是帝国主义和军阀拿来压人民的工具,比方租界上的法律,就不准去游行演讲,五卅在租界上游行演讲,便是犯法的,要靠法律解决,帝国主义者先便要办我们犯法的罢了。

C,外交手段解决说。北京派来的外交官,住在租界上,不肯出来,这已可见中国的外交程度。靠这种人办外交,能够解决什么事呢?调查的结果,没有在上海公布,后来法国调查员才拿调查结果公布出来,是说英国人不对,英国不肯承认,他们是这样不讲公理,还讲什么外交呢?

D,联络帝国主义打倒司法解决帝国主义说。这个主张,就是要联络日、美、法、意等国,专一对付英国,但是五卅的时候,美国占据了上海大学,意大利在上海亦故意杀人,他们与英国帝国主义有什么分别?我们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反可以使其他帝国主义站开,不敢与英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专说反对英国主义,则美日等国反可以大胆的压迫中国,所以他们反转帮助英国来压迫中国了。

E,经济绝交说。这是孤军社和国家主义派的主张,就是要不买英货,不要工人替英厂做工,在经济上,完全与英国脱离关系。自然经济绝交并非全无用,但这种作用总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因为关税问题不解决,中国工业不发达,当真经济绝交,不但是工人总在工厂中做工,不能维持生活,而且事实上中国已然需要许多工业品,经济绝交,迟早总是维持不住的。所以从前与日本经济绝交,完全没有结果,现在专想靠经济绝交来对付英国帝国主义,这是何等靠不住呢?

再说左的空想,也有三项:

A,暗杀外人说。他们以为外国人杀了我国的人，我们也便可以杀外国人;他们说,我们天天开会游行讲演,是没有办法的,只有用手枪炸弹去杀工部局的外国人最好。我们虽不绝对反对暗杀,但暗杀只可为两军对垒交战时一种手段,如果没有预备交战,仅仅想暗杀一二个外国人，不但是没有什么作用，而且还会发生不好的影响;因为一般商人，最怕杀了外国人，恐怕象这样便会惹出大祸，学生亦有许多不赞成这样办的，倘若当真杀了外国人，五卅运动更失败的快了！有些人因为朝鲜出了一个暗杀的烈士安重根,每每引为美谈,其实安重根虽然暗杀了日本的伊藤博文，但是朝鲜还是亡国，可想见没有组织的民众，专靠暗杀手段,是不会成功什么事情的。

B,练学生军说。他们以为要学生军是预备与外国宣战，学生军是不是能够打仗是一个问题。要说练军队打仗,中国的兵很多，为什么不可以打仗？还要练学生军呢？若是养兵不能打仗，又有什么把握可以说学生军便可以打仗呢？而且既说练学生军便是将学生关起门来训练，使许多能够做民众中宣传工作的人都关到学校里去，那么，外面的民众，反转来一点也不懂得反帝国主义的意义了！

C,对英宣战说。这种主张的人，以为我们对英国帝国主义宁可玉碎，不可瓦全，所以他们要与英国背城借一。对英宣战，如果只是为一种空气的作用,自然是可以的,若真是梦想要与英国宣战,到底叫谁去战呢？假令我们要冯玉祥去战,张作霖会在后面打冯玉祥,又怎样办呢？

以上各派的空想,都是妨碍革命,叫人家认不清正当的工作是什么的,我们的真正的工作,在于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不注意

这一点，无论是右倾或左倾，都是不好的。

（三）各阶级革命性，在五卅运动中，完全的表现出来。那时张学良在上海与英国勾结，加民众以压迫的手段；总商会修正工商学联合会提出条件，要居于调停的地位，这可见军阀与买办阶级是反革命的。不过张学良等以前他打过电报并汇了捐款，总商会也提出了自己的十三条来装饰面子，所以虽然他们是反革命的，只要有革命民众监督，亦是不敢绝对反对“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小商人比较能革命，但他们没有组织力，如革命潮流低落时，小商人就跑到大商人一边去了。学生在平时是很散漫而且要闹意见的，到了革命空气浓厚的时候，就一致起来，不管什么国民党“包办”亦好，什么共产党阴谋亦好，他们总是拥护学生会，纵然有少数反革命领袖造谣，也不会有用的；但是，学生终究喜出风头，他们这种热度也不能长久维持，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他们若没有好的组织，尤其是若没有党来领导他们，便很容易弄糟，工人是比较学生好些的，我不是说工人道德和知识比学生好，只是工人的生活困苦，所以他们自然要起来革命，虽然亦有少数工人，和学生犯同样的毛病，但大多数工人都是诚实的，直率的，很守纪律的。在五卅运动中，开始有许多学生，到后来各种游行运动，满目所见的都是工人，可见工人在革命中的力量。有人说要知识阶级领导工人革命，这亦许是对的，但是，甚么时候知识分子才出来领导工人革命呢？坐在屋里怕危险，怕困难，而且象梁启超、张季直、《申报》主笔、《时事新报》主笔，这些学者，他们做的文章，总是说学生工人胡闹，他们这些人也会来领导工人革命么！外国人很高兴中国有这些学者，谓他们是高等华人，我们也尽可让他们去当高等华人，因为普通人都不好象他们一

样，若是都象他们一样，中国真要灭种亡国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一定要特别注重工人、农人、学生、小商人，但是亦要尽力与大商人、大学者结成联合战线；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认清楚那种力量是靠得住的，那种力量是靠不住的，一方面要拉拢靠不住的力量，尽力使他们帮助革命，不要妨碍破坏革命。

上述的经验，在以后比五卅更大的运动中，是很可以作工作上的参考资料的。五卅惨案至今日尚未解决，恐怕是不能解决的，帝国主义者很想以七万五千元来解决此案，我们不肯承认的，为甚么不肯承认呢？我们要留着五卅这个纪念，靠着每年的五卅纪念，使全国民众一致的觉悟起来，才能争得我们的最后的胜利。那时候，不平等条约可以废除，租界可以收回，中国人可以得到自由平等的地位，这比七万五千元，强得多了！我们的同志，要准备第二个更大的五卅运动的工作，一直做到中国全民族解放，所以我们大家要一致努力！

据广州国光书店1927年3月初版单行本排印

署名：恽代英

思想界“反赤”运动之过去、现在与未来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

这一年，中国思想界，真是如在狂风暴雨之中；人们不站在“赤化”一方面，便几乎不得不站在“反赤”一方面，彼此相互的厮斗着。

我们是不象那些绅士学者们，会相信世界上有所谓“独立思想”这一个东西。我们相信思想都是客观环境反映而成的。去年五卅运动最热烈的时候，已经有上海工部局希图靠《诚言》制造一点“反赤”的思想；但是那时“赤”的潮流正在高涨，所以他们的计谋完全失败了。因为五卅时代“赤”的潮流高涨，产生了上海伟大的工人组织，广州伟大的罢工运动，与中国各地小资产阶级民族精神的苏醒；因此，我们巩固了广州的国民政府，提高了共产党、国民党左派的政治地位，使他们在民众中间增加了支配的力量。这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国民党右派、研究系、国家主义者恐怖而且忌妒，他们于是给帝国主义一个卷土重来的机会，大家合吹合唱起来，将《诚言》式的“反赤”运动变成最时髦的东西。“反赤”运动的成功，造成了北方的恐怖时局；已经将要失败的张作霖、吴佩孚，变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雇用的屠户。国民革命军接受了北方被压迫民众的要求，从广州打到湖北、江西，农民、

工人、学生都起来用他们自己的力量与国民革命军合作，使一切反动敌人势力都崩溃了下来。在这时，我们看见"反赤"的壁垒已经大大的动摇，他们已经受了民众势力及一般尚能与民众合作的势力的影响，"反赤"的宣传品又渐渐回复到去年《诚言》的老地位去了。

这一年思想界的"反赤运动"，最初是紧接着去年下半年一天天加紧起来的。去年下半年在五卅以后，黄色（改良派）的戴季陶主义便得着了一部分憎恶"赤"的潮流者的同情；奉系与帝国主义勾结反动，压倒了上海总工会，与天津、青岛反抗日本资本家的工潮，"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醒狮派，亦特别气旺了，这时候，甚至于并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都反对的章士钊的《甲寅》周刊，亦印行出来。反奉军起，代表最黑暗势力的奉系固然受了打击，然而南方新兴的直系势力，本来与英国帝国主义是一个旧相好，所以始终不肯站在民众的一方面；后来并且因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渐次与奉系妥协，将反奉的战事结束了，转移成为"反赤"的战争，有"赤化"嫌疑的国民军变成了他们共同的标的。在这些时候中间，国民党右派有所谓"西山会议"之举行，结果造成了北京、上海等地左右派的大破裂，反动空气得着了膨胀的机会；在北京为了陈启修一篇讨论中俄关系的文字，引起了所谓"仇友赤白"的大争论，为了"反赤"的原故，老将梁启超将他极下流的面孔都拿了出来，同时在上海亦有章太炎在国民大学的流氓式的讲演与相辉映。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南满打倒郭松龄的时候，全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强盗的行为，"反赤"的人暗暗将"反对日本出兵"的口号，硬要生拉活扯的改为"反对日俄出兵"，并且摭拾了他们自己一派人所造的谣言，说鲍罗廷如何操

纵挟制国民党领袖，冯玉祥如何与苏俄私结在蒙古修筑铁路的条约，以为他们反对苏俄的最强有力的理由(?)。

政局到今年春季，是一天天更悲观的；因此"反赤"的思想亦便一天天发扬起来。因为中东路俄员不肯为张作霖运兵，张作霖逮捕了局长、站长，苏俄忍让了事，这一点居然被"反赤"大家拿来作宣传"仇俄"的很好的论据。继则以一个不负责任的"月拉"向《晨报》投稿所说喻森得神经病之经过，与所谓旅俄华侨代表王会卿、彭昭贤的报告，说苏俄如何逮捕爱国华侨金石声、桂丹华等十八人(桂之被捕，彭说在莫斯科，王说在海参崴，已经可谓妙极的了)，在北京居然发起了一个反俄援侨大会。到了经过三月十八段祺瑞大屠杀以后，京沪"反赤"大家异口同声的说，"群众的领袖哪里去了?"这一方面表示出他们很可惜这般领袖没有被杀，一方面亦想借此切实离间群众与领袖间的关系，他们痴心妄想以为这可以使一般革命青年，从"赤"的路上走到他们的"黑"的路上去。广州三月二十的事变，喜杀了国民党右派，他们居然打电报嘉奖蒋介石，议论纷纷的大家要襆被[1]到广东做官去；但是，他们的气运亦不甚佳，遇着了一个还不愿意离开民众势力的蒋介石，他们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缩回头来说一声"晦气"。但是大概的说起来，这时候总算是"反赤"运动的鼎盛时代了！英国国家银行寄来了六十万镑的"反赤"宣传费(《字林西报》说的)，旅华外人所组织的专以"抵制过激主义"的自由保障会，引起了中国许多反赤的团体与出版物；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吴佩孚、魏邦平、陈炯明、章太炎、冯自由、林森、居正、曾琦、李璜等一干人，都站到"反赤"的一方面，不但共产党或国民

① 襆被：整理行装。

党左派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人，便是那时候的冯玉祥、唐生智、贾德耀、虞洽卿等，凡稍有对帝国主义军阀表示不驯服的人，都是他们这一干人所共同嫉恨的。在国民军退出南口，而广东政局又表现不安宁的时候，帝国主义者高兴极了，“反赤”的军阀亦高兴极了，思想界的“反赤”运动亦便发达极了。便是自命为自由主义的人，亦只敢发表不满意于“赤”的意见，不然便不敢发表意见。

在这种时候究竟还是因为民众有一部分力量，国民党领袖知道只有与民众合作，可以保持而且发展他们的事业，所以无论在广东的政局如何动摇不定，终于顺应民众的要求，北伐军出来了。北方军阀的胜利，不但并没有能消灭了国民军；他们内部的纠纷冲突，反加增了他们自己间的困难；而他们的黑暗的统治，使民众又可以细细领略所谓“反赤”的意义。在这种情形之下，“反赤”已经渐渐不大好说了！从事实上证明，“赤”的表现处处总要比“反赤”的好些。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都很热诚的帮助“赤”军，北伐的前敌将士，奋勇不顾身的杀得一般“反赤”的军阀鬼哭神号，吴佩孚的关圣帝君保佑他平平安安地退到郑州，孙传芳亦从九江一个败仗走到天津去。长江以南几乎完全成了“赤”的天下了；而西北冯玉祥在屡败之余，亦正式宣布了与帝国主义为敌，将他的国民军“赤”到与广东一样的程度。这时候，帝国主义都恐慌起来了，“反赤”运动亦不觉黯然失色，便是《论蒋介石北伐不能成功之六大原因》的曾琦，虽然到现在不肯认错，然而亦不过如吴佩孚到现在不肯承认打了一个败仗一样，只不过供给人家一点笑话材料罢了！

在最近有三件比较可喜的事情，是可以提出来谈一谈的。

第一是胡适之思想的变化。胡适之自从出国经过苏俄到欧洲去，有五封已经公开了的信给他的朋友，表明他多少是有些进步了。他确信苏俄是在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指出许多学者们对于"赤"的问题武断态度的不好，他并且讥笑徐志摩所提出用学理事实等等怀疑苏俄试验之不能成功或不经济的不成理由。这是给那些象徐志摩等一般思想落后的人的当头一棒。自然，胡适之是一个教授，他虽亦可以到"赤"的地方走走，他还要预备在"反赤"军阀势力范围内生活而且享乐的；若不是"赤"的势力已经达到可以保障他一切的安全，他的"独立思想(?)"至多只能为"赤"说这多的公道话，而且还不能不加上"乌托邦"、"慕索里尼的冒险精神"、"反赤化"等等字眼，以表示自己之并非赤化。但是我们看，前三封信在北京《晨报》发表的时候，徐志摩的按语千方百计要想抵消他这些意见在思想界的影响；后两封信最近在《文学周报》上发表，西谛的按语却表示比胡适之更进步，文学家亦受革命热潮的鼓舞，渐次对于一般参加"赤"的运动的人们，表现出他们的同情与钦佩了。

第二，是张君劢态度的改变。武汉被革命军攻下以后，为孙传芳奔走的研究系张君劢，忽然到武汉去考察了三天，回上海后发表了《武汉见闻》，并且广为印售。《武汉见闻》中所述，表示他对于党军之"倾倒"，他甚至于说："吾人空有救国之志，隐忍偷安不能攘臂而兴，乃令吾政敌之国民党独为其难，吾人于其今日之胜利，惟有同声欢呼……"，虽然他在后面表示了若干不满意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主张，然而这样的态度，总算是研究系对国民党自从辛亥革命以后少有的了。张君劢的这种宣传，对于"反赤"的同志又是一种倒戈的行为，更使民众容易了解"赤"与"反赤"

的真象。为甚么张君劢要这样做呢？在我看来，这并不只是一个虚伪的礼貌，亦不是要借此表示他们的意见与地位。这完全是研究系看见“赤”的势力一天天太大了，所以要想“赤”的方面给他们一个机会，使能在“反赤”失败以后还可以投到“赤”的主人下面来。研究系向来是以贡献意见请求人家给与机会为他获得政权条件的。他们现在已经感觉“北洋正统”的“反赤”诸帅渐渐到了穷途末路，所以修《武汉见闻》做一个归顺国民党（当然他们又决不肯接受国民党的主义，所以一定要希望国民党特别宽容他们）的降表。研究系十余年的昏梦都打醒了，这亦可见“反赤”思想界真要式微极了。

第三，是国家主义青年觉悟的表示。据《醒狮周报》自己说，现在中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国家主义团体总算共有二十七个，另外“未及调查者尚不知凡几”，这已经“调查”的二十七个团体中间，只有少年中国自强会说明了“会员已越过七十余人”，其余人数大概都有点不便于说出来。据“国家主义的叛徒”宋继武君说，他们所发起的所谓“风起云涌之国家主义团体”起舞社（便是上述的第七个团体），会员自成立时开一个会后，早已烟消云散，连那个木戳子今都不知去向，举此以例其余，他们的人数亦不难想象得之了。可是更不幸的，那“越过七十余人”的少年中国自强会偏偏又自行解散了！他们觉悟了“中国在国际方面，已经不由自主的转入了世界革命的漩涡，在国内方面，已经到了反革命派和革命派开始决战的时候。”他们感觉了国家主义“不无为帝国主义前身的先例”，而且不易为下层被压迫民众所接受，“对于他们失了号召的能力”，所以他们“认为这是革命前途的障碍”。从国家主义觉悟过来的彭十严君说，他以前完全是“误于自己的

成见，误于片面的宣传，误于不深切去研究。"他与其他脱离国家主义关系的人一样，对于联俄、联合共产党两方面，都表现其认识的清楚。"反赤"的宣传已经渐次不能蔽惑青年了。

以上三件事，很可以看出思想界变化的倾向。自然我们更用不着说洪水派与一大部分文学周报派，文学家的革命化，现代评论及独立青年派国家主义者的同情革命的倾向，处处都是表示"赤"的胜利。"反赤"运动在今天已经是走到很不幸的路上来了。

但"反赤"运动并不曾完全消灭，这是显然的。张作霖还正在努力于他们的最后的反赤壁垒，建设北方军事政治的中心力量；吴佩孚、孙传芳亦还在极力扎挣，希冀能够保持住他们的最后的命运。在另一方面亦是一样的情形。永远不睁开眼睛看看世界的醒狮派，还正在那里用各种方法败坏国民政府的信用，离间破坏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反赤大同盟、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虽已经不象从前那样起劲，然有时还是要弹一弹旧调子，表示世界上还有他们这般东西。他们的地位现在同帝国主义一样可怜，但是他们只有永远这样顽强的做上去，本来他们的知识思想，根本就不能适合于这个世界。在滑稽的意义上，我实在要说，曾琦与吴佩孚是有同等可以佩服的价值（让我着实恭维他几句，好让他拿去转载在《醒狮周报》上装门面），他最有与众不同的"眼光"，他永远在他自己的想象中间是一个象孙中山一样的首领，虽然在人家看来，不过是江亢虎、康白情之流；我有一点相信，他要象满清末年的保皇党一样，一直送我们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而且在那一天以后，他还会是一个象康有为一般的不三不四的"国宝"。是的，这种人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在封建社会还

未完全消灭净尽的遗址上面，产生出吴佩孚、曾琦这样一类绝对不随时代进步的人，自然是我们的山川灵气所锺；不过侵略我们的外国人更高兴他们，因为他们不但是远东的古董，而且对于帝国主义所恳切需要的“反赤”运动，还都是最努力能够始终“忠贞如一”的人。

然则“反赤”运动便这样一天天走向他们的坟墓中间去了么？这句话太说早了！中国民众一天不得着完全彻底的解放，“反赤”运动总还是会有他们的主顾。我们亦预备着，纵然国民革命有了相当的成功，若是被中国资产阶级得着了领导权，“反赤”这个口号，还是可以成为屠杀无产阶级战士的理由的。不过这还是比较远的事情。我们只要努力保持国民党左派所承认的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局面，保持国民革命运动的左倾，拥护国民党左派使防止一切右倾的倾向，我们还无需为太远的事情担忧。我们最不能不注意的，倒还是眼前的事情。我们知道，虽然在所谓“赤”的营垒中间，两三年普泛的革命宣传，造成了热烈的革命空气，党的权威，联俄联共的原则，拥护农工利益的政策，差不多已经成功了，毫无疑议的，便是极反动的人亦不能不相当承认的事情；但是，在几千年封建社会所培养出来的个人的英雄主义的思想，与那些专为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道理与成见，决不会因此两三年的宣传便根本扫除干净。尤其是有权力的人，在人家谗谄包围之中，他们脑筋中残留的这种观念，亦许被人家因以为利的煽动，以致在有意无意中做出为“反赤派”拊掌称快的事来。此外，再加以在北伐军发展中间，为军事政治的便利，不能不容纳的许多比较富于投机性的政客武人，他们的色彩本来离“赤”还远得很，谁亦知道如何引进或处置他们是“赤”的前途

的唯一重大问题。帝国主义现在还感觉有这一个希望，西山会议派与醒狮派现在亦感觉有这一个希望。

只有“赤”的是好的。只看这一回“赤”的北伐军差不多受中外一致的称颂，尤其是“赤”的军队中政治工作，更为所有一切的人（当然醒狮派与反赤大同盟的人在外）所倾倒，便知道我们要求要有一个“赤”的世界，比那些要求要一个“黄”的“黑”的世界是一万倍的有理由。但是，谁能给我们一个“赤”的世界呢？不是专靠仅仅站在帮助我们地位的第三国际与苏俄，不是专靠仅仅站在领导我们地位的革命领袖，我们一定要民众起来，用自己的觉悟与组织的力量，与革命运动中一切摇动右倾的倾向奋斗，贯彻“赤”的主张。只有民众起来，才能巩固“赤”的胜利，使“反赤派”永远没有扬眉吐气的日子。亲爱的青年，我们要为这努力！

倘若“反赤派”的先生们要问我，你说了这么多的“赤”啊“赤”啊！究竟你所谓“赤”是指的甚么呢？是指无产阶级专政么？是指国民革命成功么？这我可难于答复你们。我只有回头问你们一句，你们的“反赤”，反的是甚么“赤”呢？妈妈虎虎的罢！横竖你们那个工业革命以前的脑筋，永远是闹不清爽的。

载《中国青年》第148期
署名：代英

敬告从歧路自拔归来的青年

（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

我在上海看见最可喜的现象，便是最近有许多从西山会议的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觉悟过来的青年，这些青年是很值得我们钦敬的；他们的觉悟，使他们从歧路自拔归来，是中国革命前途的幸运。

在现在异说蠭起之时，青年们因为识别力的关系，一时误入歧途，本不是什么希奇事。尤其是我们与国民党左派领袖所倡导的，有阶级性世界性的国民革命运动，完全是近代生产关系下的产物，决非没有近代知识的人所能理解；青年们每每是从完全滞留在封建社会下的乡村中间出来，脑中所有的只是几篇古文或中国历史上几个“名臣”、“志士”的逸事，他们很容易感觉得西山会议派，尤其是国家主义派的话较为合他们的脾胃，因此走到歧路上去。我常回想到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所想象的只是“中流击楫”①、“揽辔澄清”② 的人格，若是那时候有一个“尊中国而攘四夷”的醒狮派，亦许我会与他表相当的同情。不过年纪大

---

① 中流击楫：东晋初，祖逖任豫州刺史，渡江北伐苻秦，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后用以比喻决心收复失地的壮烈气概。

② 《后汉书·范滂传》：“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后来封建士大夫因用“揽辔澄清”表示刷新政治，澄清天下的抱负。

了，稍稍了解一点近代实际情形了，便知道醒狮派已经是过去时代的骸骨，在现在还拿出来做一个欺骗青年的“法宝”，便是愚妄可恶的事了。现在，我们庆贺这一般觉悟的青年，你们知识的进步，使你们脱离了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领袖的欺骗。以前的误入歧途，决不足为你们一生的玷污；现在的自拔归来，却证明了你们是如何进步而革命的人。

不过为要使这些青年能够认清站稳革命的立脚点，我以为有几件事必须是要请他们注意的。

第一、要加紧研究近代的社会科学，求彻底了解近代社会的实际情形，然后能够使你们彻底了解革命的主义与政策之真正意义。你们从前所以走到歧路上去，虽然亦许有种种原因，例如褊狭、使气等，但是最大的原因，还是你们的知识不能帮助你们了解一切近代的问题。现在，你们一定应当坦白承认这一点，而且虚心努力去补足你们的缺欠。倘若你们今天已经从歧路自拔归来，然而你们始终不肯承认你们知识的缺欠，那便你们脑筋中间的前一时代的思想，一定时时又会将你们牵引到错误的路上去。我请你们想：你们是不是已经知道帝国主义是甚么东西，为甚么要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怎么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呢？你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中国民族革命的真正性质，中国民族革命与中国的以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有甚么关系呢？你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的实际主张与工作，中国共产党参加民族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容纳共产分子合作的理由呢？革命的障碍与仇敌是很多的。成心、偏见、误会、曲解、毁谤、谣诼，从落后的社会与一部分反动分子中间得传播出来，你们要是还不能赶快养成明确稳定的见解，你们不久又会摇动惶惑起来，使

你们又走到错误路上去的。

第二、要鼓舞你们的勇气，去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而且站到最前线上面去。你们从前所以走到歧路上去，懦弱亦是一个最大的原因。懦弱使一个人不敢去认识真理，而亦不愿意去认识真理，所以虽然是有一条平坦的大路，懦弱的人还是会走到错误的路上去的。尤其是一个懦弱的人，与勇敢革命的人比较起来而相形见绌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羞愧或嫉妒，要造出一个理由，掩饰自己的懦弱，更容易将他引到错误路上去。现在幸而因为全国革命潮流的高涨，使你们能够有胆量走到革命的路上来，但是只这样被动的受外面革命空气的影响，是不够的。革命运动不会是一条直线的顺利下去。只有你们能够下一个决心，去勇敢的参加战斗的生活，才能够磨练你们的心性，而且帮助你们认清革命的理论与策略，保证你们永远稳定的站在革命的战线上。而且除此以外，你们能勇敢参加战斗，亦才可以使周围的人完全了解你们的真诚态度，不至于保留若干怀疑的心理。所以我奉劝你们，在你们从歧路自拔归来以后，一定要脱尽以前软弱游移的毛病，那便我可以知道，你们永远不至于又被那些便于掩饰软弱游移毛病的理论（如国家主义与西山派理论）所迷惑了。

第三、要放开你们的胸襟，预备用实际工作证明你们自己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不要还保留一点褊狭猜疑的心理。我警告你们，虽然你们今天已经由歧路自拔归来，然而你们仍旧是容易得不着革命的同志的信任的。因为这样，你们的前途亦很值得忧虑。本来同志假如不信任你们，这种同志自己就不免褊狭猜疑之过；但是这亦不能十分怪他们。你们是刚才从错误的路上来的，便是你们一时彻底的觉悟，亦不能希望即刻得着每个人的

信任，何况你们自己在思想与表现上还未必能完全脱离从前的态度，你们如何能责备人家要带几分怀疑的心理呢？在这个时候，最要紧的是你们自己不可以有一点怪人家怀疑你们，甚至常时猜疑他人不肯相信你们。你们要努力作工给大家看。你们要承认，一个从歧路回头的人应当要忍受相当的委曲，拿实际的行动来证明自己，这才见得是你们有了一个真正深切的觉悟。倘若不然，你们今天改变过来，明天就不许有任何人不信任你们；若是有人不信任，你们便激起反感来，这样，你们不久又要回头到错路上去的。

中国需要革命的青年，我们很高兴得着这些从歧路自拔归来的同志。不过我们希望这些同志一定要注意，不要因自己的缺点，又被魔鬼引诱去了。

载《中国青年》第149期
署名：代英

什么是机会主义?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因为民众普遍而急激的革命化,一定有很多人都愿意加入革命党里面来。在这时,革命党没有理由将许多革命的民众关在党的外面,应当打开大门,欢迎革命的民众入党。但是,有些忠实的革命党员便会踟躇的说,这样滥收党员,不怕有机会主义者跟着亦混进来了么?

这种忧虑实在是有理由的。在革命运动风头顺利的时候,革命党必须谨防自身的腐化,忠实的革命党员必须随时提防党内发生机会主义的分子。这是关系革命党前途运命很重大的。

不过我尚不以为普通所谓机会主义为可忧虑。普通所谓机会主义一说是指有些人进革命党不是为来革命,而是为来谋一个升官发财机会的;一说是指有些人看见革命运动风头顺利,幻想以为革命运动从此可以不费力的成功,不预备过艰苦奋斗日子的。这两种人自然是革命党所不能容受的分子,但是这两种人的危险是人人易知易见,所以对于稍为慎重的革命党还不至于发生重大的弊害。

最可以在革命党中发生重大弊害的,是另一种机会主义;即是说,不注意民众基础的工作,希冀在民众自身的团结与奋斗以外,靠机运或某一个或某一部分人完成革命的心理。在革命潮流

高涨的时候，不但每每有具这一种心理的人混进革命党里面来，便是原来的老党员，亦每易不知不觉的发生这种心理。这是于革命前途非常危险的。

在极反动的政治局面之下，有革命要求的人，知道他们在任何方面得不着一点帮助，国内外统治阶级是压迫他们的，一般软弱游移的社会上有地位的分子是容易欺骗危害他们的。要想革命成功，只有死心塌地去走到最下层最受压迫的工人、农民中间，很慎重的宣传他们，组织他们，只有他们是推动革命运动的力量。

但是到了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情形便不同了。一部分革命势力甚至于已经占据了“在朝”的地位，从前压迫我们的统治阶级都摇动起来了，他们都有伸过手来与我们谋妥协的倾向，稍为接近权力的革命党员都可以用他们个人或朋友的力量多多少少的影响到政治上面去。于是无穷的幻想便都涌现出来了。

有人说，最好是要求国民政府，即刻实行一切革命的政纲，将全中国痛苦的工人、农民都解放了出来。

有人说，现在应当督促国民党中央党部，要他用党的权威，立刻扫荡在国民党势力下各地余剩的反动势力，将他们的三民主义的真精神发扬出来。

有人说，我们须使现在的国民革命的领袖认清他们自己的地位与责任，须使他们能够很稳定的站在革命的立脚点上，而且能够和衷共济以努力为民众的利益奋斗到底。

有人说，还是革命军队的工作重要。我们已经用军队的力量打倒了几省的军阀，我们还要继续用他的力量，打倒这几省的其他反动势力，而且要继续用他的力量，将全国统一在革命势力

之下。

有人说，能够在革命政府之下，占据一个政治上的地位，或是与政治上有地位的人好生敷衍交结起来，有时可以利用政治势力，铲除农工的仇敌，实现农工的要求，这亦是很有意义的。

有人说，各种上层阶级分子，如地主、资本家、绅士、学者，乃至于军阀、官僚、帝国主义，现在都应当分别看待。不要得罪了他们，他们有时亦是可以帮助我们的。

自然这些幻想并不是没有一点理由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与现在的革命领袖，越能够左倾，便越于革命的前途有很大的便利。革命的军队与政治，越能够注意于努力为革命工作，便越可以给民众许多帮助。对付各种上层阶级分子，越能够老练而善于应付，越能够减少民众势力发展的障碍困难。

但是只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与一般革命领袖，只注意革命的军队与政治上的工作，只敷衍交结各种上层阶级分子，这可以希望完成革命的工作吗？

若不是有伟大普遍的农工组织与力量，若不是农工群众有很明确的觉悟与坚实的团结，怎样能保证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与一般革命领袖左倾？怎样能帮助他们与右的倾向奋斗？而且在万一的时候，怎样能对于他们的右倾行为加以民众的制裁？除此以外，怎样能影响革命的军队与政治势力，使他们不能不努力为革命工作？怎样使他们的力量能够很有把握的打倒反动势力？除此以外，又怎样使各种上层阶级分子能够不有时象从前一样悍然不顾一切的反动，使他们不至于在革命潮流稍为低落的时候，中途卖掉革命的民众？

机会主义使一般青年不注意民众的基础工作，忘了只有民

众自己要求解放的力量是革命运动的根本力量。因此，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人人的眼睛都向上面瞧着，他们都想供献一部分精力给上面的机关或个人，希望上面的机关或个人好生用他的职权为农工谋解放。他们再不注意下面的农工，以为将精力消耗在农工运动中是迂阔的，费力多而成功少的，他们不要"基础"，痴心妄想在空中砌筑楼阁。这种人纵然没有为自己升官发财或不预备艰苦奋斗的心理，然而他们对于革命前途的危险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

革命潮流的高涨，确实可给我们工作上许多便利，使我们作民众的基础工作，比从前少许多困难。但是机会主义者在此时，每每将民众的基础工作反轻轻的丢掉了。所以我们必须反对机会主义，象反对一切革命的仇敌一样。

载《中国青年》第151期

署名：F.M.

广东的青年劳动军人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我还很深刻的记得，恐怕我永远不会忘记罢，我们的可敬爱的广东的青年劳动军人！

我说的是那充满了青年的生气，身上穿着蓝色的武装，左臂上有一块方的红布上面写一个“纠”字，有时还在手上拿着一根童子军式的棍棒，在马路上踱来踱去，检查英货不许入口的“省港”罢工纠察队中间的青年工人。

这是从大英帝国主义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施行沙面大屠杀以后，激起了广州沙面与香港工人对英大罢工运动中产生出来的。他永远是大英帝国主义的死对头。但是亦便是他，隔断了大英帝国主义与一般潜伏于广州的反动派右派的关系，使国民政府能够有今天这样。

省港罢工纠察队是在罢工工人中挑选精壮工人组成的，人数说是三千人。他们的职务是在九龙租借地与中国接界各地方（如深圳），及凡可以由香港到广东各属的进口港汊，检查行旅客货的来往，不使有不肖分子偷到香港上工，尤其是不许香港英货偷运到中国来。

国民政府的军队对于罢工纠察队，通常是赞助的，尤其是黄埔入伍生扎驻在深圳一带的，是他们的最好的作战伴侣。从革

命军肃清了东江南路，东至潮汕，南至高雷、琼崖，各地革命的国民党部与各地工人都起来对英取同样“封锁”的政策；这亦是罢工纠察队工作的影响。

罢工纠察队的青年，永远是精神抖擞着；他们直接与大英帝国主义的利益宣战，直接与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奋斗。大英帝国主义最忿恨的是他们，久欲出卖“省港”罢工的右派政客最厌恶的是他们，靠香港吃饭的买办商人与一切有阶级成见的人最无可奈何的是他们。

我们都知道大英帝国主义曾经如何压迫广州革命势力希图解决罢工，他曾经勾通土匪暗杀纠察队，曾经在白鹅潭任意追捕纠察队的电船，曾经使水兵上岸在长堤占据纠察队的食堂。记得省港罢工委员会报告，纠察队前后被他戕害的有三百余人，这都是为民族革命运动而牺牲的战士！

但是大英帝国主义所有一切强横卑劣的手段，都是没有用的，罢工纠察队永远是坚守着他们的战线，一直奋斗了十七个月。生活是很苦的！任务是很重的！地位是很危险的！然而为了民族革命的需要，屹立于广东各界革命民众的前面！一直到国民政府如泰山磐石一般的巩固了，广东经济界几于可以脱离香港的关系而繁荣起来了，广东一般民众都渐次革命化了，而且在沙基惨案发生的地方，“如砥”“如矢”的“六月二十三路”亦修筑完成了，才为了减少北伐军的后方顾虑，与预防英国大队战舰来华借端强硬压迫国民政府之故，宣布自行取消封锁。在今年双十节那一天，国民政府与三十万群众慰劳正从深圳一带撤回来的纠察队，同时，广东各界民众与罢工工人亦决定扩大对英经济绝交，维持罢工委员会与纠察队的组织，一直到沙基案

交涉胜利的日子。

我还记得在广州罢工委员会的劳动院讲课时，纠察队的青年常常来听讲，在罢工委员会之下，亦设有教育部，给纠察队以政治教育，我每回想到他们的蓝色武装，他们的雄纠纠的精神，与他们的求知识的欲望，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前途，真是感觉得无穷的兴奋啊！

现在，罢工委员会的"东园"旧址被奸人放火烧了；他后来暂时搬到惠州会馆与广州工人代表会一起办公，近来报载这个为革命长期奋斗的罢工委员会已经宣告结束了！蓝衣的青年劳动军人还在广东革命民众的眼中常常遇见么？他们是从反帝国主义战场上回来的兵士啊！莫要糟蹋他们，让人家说我们是忘恩负义的人！

当然，现在广州的青年劳动军人，不只有省港罢工纠察队，我们一定亦要说到广州各工会所组织的工人自卫队，那中间所包含的亦一大半是青年。

广州各工会的工人自卫队，有时亦称为各工会纠察队，他们装束大致与罢工纠察队是有些相象的。在广州的时候，我们常看见他们在街上游行，一面工会的大旗领导着，大家很整齐的跟着大鼓声开步走。有一次全广州工人自卫队举行授旗礼，他们一切俨然同军队一样。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工人自卫队最大的作用，是在罢工的时候维持秩序，最近因为对付店主的需要，在罢工时亦常被派去监视罢工之店户不使能私自营业。这自然是店主所厌恶的。"拥护农工"的呼声久已在广州与"工人嚣张"的怨言相争持，总不至象反动派所期望的要发生甚么变化罢！"嚣张"！自然是不好的事！只可惜几千年

的中国工人总是在极“嚣张”的官厅与东家的压迫之下，没有人肯理会他，反转是以为工人应当第一个受“嚣张”的制裁！

惟愿我们广东的一切青年劳动军人无恙！你们要为了民族革命的利益，帮助“能拥护农工的国民党”到底；国民党忠实革命的领袖与党员自然会决定对于你们的态度。

载《中国青年》第151期
署名：代英

怎样救治浪漫病？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

小资产阶级青年是容易犯浪漫病的。然而浪漫的生活，每使人精神松懈，生活紊乱，以至于引起烦闷与疾病。

所以浪漫青年的归宿，有才气的，便容易成为多愁多病的文人（？）；有思想的，便容易成为怪僻悲观的学者（？）。但是他们终究是苦痛无聊赖的。最不知道享受人生的乐趣的，每每反是这般人。

怎样救治浪漫病呢？

若是有些青年希望改变他们的浪漫的生活，我可以贡献下列的意见：

一、离开浪漫的朋友，以减少在精神上与生活上所受的浪漫的影响。

二、少看浪漫性的书报，不要消耗精神在许多与实际生活没有关系的问题上面去。

三、过有秩序的生活，使自己的精神常时保持着清醒的状态。

四、规定自己的工作计划，而且尽力求能照这种计划去进行工作。

五、加多自己工作的负担，使生活紧张起来，精神亦便自然

可以紧张起来了。

六、注意使自己的工作能有实际的成绩可以供考查。自己工作的成绩,可以鼓励自己继续工作的兴趣。

能实行上述六件事,浪漫病是没有不可以救治的。

我们都知道眼面前有很多很紧要的革命工作,需待我们青年们去做,我们不能容许浪漫性在我们中间支蔓起来,何况浪漫的结果对于个人的精神与生活亦是有损无益的?

我希望青年们起来,扫除他们自己的浪漫性,这是为社会以至于为他们自己都很重要的。我希望这一篇短文,可以给那些能接受我的忠告的青年以许多帮助。

载《中国青年》第7卷第3、4期合刊

署名:代英

“二七”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一九二七年二月）

“二七”是中国民众运动大受摧折的纪念。但是，我们纪念“二七”，不是仅仅为追怀往事，引为唏嘘凭吊之资，我们要说明“二七”在中国革命运动历史上的地位，证明中国的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力量。

中国的革命运动，并不是从“二七”开始的。我们都知道孙中山先生为中国革命奋斗，已经经过了四十年。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员无论比较左倾或是比较右倾，都是以中国革命之责自任的，但是“二七”以前的革命运动，不过是少数人乘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加之一部分人要因以为利，所以倒亦表示出一种前仆后继的样子，然而这于中国革命有甚么益处呢？那时候，革命的同志还看不出农民、工人的力量，还不知道国民革命的领导阶级是甚么，他们只知道以自己为中心，想利用军阀或土匪流氓，徼幸成就一点事业。因为这样，他们永远是失败的，他们以自己为中心，结果自己内部每不能团结一致，他们想利用军阀或土匪流氓，结果每反转被军阀土匪流氓利用了。“二七”以后，中国的国民革命才开了一个新局面，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而且大家承认了他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二七”虽然是失败了，但是“二七”是表示工人阶级的蹶起，

工人阶级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开始与压迫他们的人奋斗；“二七”失败以后，工人阶级觉悟为求他们自己的解放，一阶级的单独奋斗是不合算的，他们喊出来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要求与一切民治主义的革命分子在革命战线上合作。同时，因为工人阶级的忠实勇敢，使我们国民革命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第一个认识工人阶级的力量，开始注意工人运动。从“二七”失败到国民党改组，不过一年的时间，国民党的改组，是表示孙中山先生抛弃军事运动，注重工农运动的决心。这种工农运动，虽然在国民党外部，甚至于内部，惹起了许多怀疑与恐怖，为国民党博得了许多赤化、共产、亲俄、卖国等谤议，但是因为孙中山先生与许多领袖的决心，扑灭了商团，打倒了一切妨害农工运动的反动势力，使国民党博得了全国多数工农的信仰，他们都愿意在国民党指导之下，为国民革命效前驱。东江之胜利，北伐之发展，工农的帮助，至少是与将士之忠勇可以并称的。

“二七”是中国革命的曙光，能最先接受这个曙光的人便得胜了。谁能怀疑农工运动呢？谁能怀疑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呢？只有反革命的人，或者自己愿意走向黑暗、失败之路的人，会这样做。

载《“二七”四周年纪念特刊》

署名：代英

民主主义与封建势力之斗争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解放全中国被压迫民众。

谁能担负这重使命呢？

必须有完全能站在民主主义的立脚点上面，以扫除封建社会残余势力自任的革命党，才能担负这重使命。

帝国主义所以能压迫全中国人民，他不但是专靠他的军队或经济势力，他还要靠代表残余封建势力的军阀，与依附军阀的官僚土豪劣绅，为他保障不平等条约的威权，而且帮助他在都市乡村中间剥削压迫人民，张作霖的权利欲望，吴佩孚的英雄思想，乃至于城里某老爷、乡间某大爷的名分阶级观念，都可以使他们入帝国主义的彀中，成为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工具。没有完全抛弃这种欲望、这种思想、这种观念的人，他们自己便只是张作霖、吴佩孚、某老爷、某大爷之流，决不够上担负国民革命的使命，他们既有这种欲望、这种思想、这种观念，那便一定不会能看清世界革命的局势，尊重农工民众的利益与势力，所以亦便不会能有担负国民革命的力量。

中国国民党已经有四十余年革命的历史了，他有伟大的领袖，有壮烈能牺牲的党员，然而他在最近数年以前，只是被一般

借革命为名以渔取私利的军阀政客所玩弄，不能对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确实效力，这是什么原因呢？还只是因为在那些时候，国民党内还包含许多封建社会的原素。党员对于各种封建势力亦没有反对的意志，所以他们在四十余年中，虽然常时是各种暴动与军事运动的领导者，然而他们的活动，始终未能摇动封建社会的基础，那便是说始终未能摇动帝国主义、军阀在社会上之基础。这样，所以他们的努力，终于是徒劳无功。

从民国十三年因为受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国内劳动阶级势力兴起的影响，引起了国民党的改组，这一次的改组，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最重大的意义，便是国民党已经接受了近代科学的洗礼，渐次脱离了封建的色彩，所以他能够打破国界与阶级的成见，将联合世界革命势力与拥护农工的组织与利益，看做比一切都重要，这是非常勇敢的行为。国家的我见，与阶级的偏执，决不是普通的人所能打破的，但是孙中山先生与那些明达勇敢的领袖，为了革命的利益，毅然决然的这样做了。国民党这样的改组，使他们获得了国际的与国内的广大农工的帮助，从反革命势力层层包围的广州弹丸之地，逐渐发展到潮梅、琼崖、广西、湖南，乃至长江一带与西北各省，浸假而成唯一能代表中国的伟大的势力，这显然是民主主义的胜利，因为国民党能够注意站在为民众谋利的一方面，靠民众自己的势力推进中国的革命运动，所以他获得了一种从未曾有的力量。

但是国民党改组以后，在党内惹起的麻烦亦是不少的，冯自由的离叛，商团的事变，江伟藩、马素的反动，杨希闵、刘震寰的商团变乱，西山会议派的运动，三月二十事件的突发，一直到最近一般昏庸腐朽分子在党内捣乱行为，这些层出不穷的不良现

象，常使爱国民党的人扼腕太息，以为这是国民党前途无望的证据。然而我可以说这是错误的，国民党从很浓厚的封建社会影响之下渐次脱化出来，虽然，一方因为近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势力的震撼，使许多人走上了民主主义的道路，然而一方因为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势力，久已支配了一般思想上多少落后的分子，他们或早或迟总不免要怀疑到一切反封建势力的各种行动。甚么亲俄卖国啊！甚么共产党吞并啊！甚么工农过激啊！无非是那些由封建社会传统下来的国家阶级的成见在中间作祟，从冯自由到张静江，都是这种成见的牺牲品，凡不能与时代并进的人便落伍下去了，国民党在改组以后，还曾陆续发生这种落伍的分子，固然是不幸的事，然而这种事实，一定是无法避免的，国民党有了这种分子，决不足以证明国民党前途之无望，除非在国民党内没有能为民主主义挺起身子来与这种分子奋斗的人，才可证明国民党前途之无望。我们看咧！在以前许多反动事变中，广州左派每能屹然与搏斗；三月二十以后，虽为革命的利益左派都愿意退让一步，然而左派的阵线始终未曾动摇崩溃。此次为反对昏庸腐朽分子，竟然能张起恢复党权的大旗来，这正是告诉我们国民党自改组以后，永远是向民主主义的路上走的，一切要利用封建势力来抵抗这种倾向的人，一定都会失败。这正是告诉我们国民党的前途是富有很大的希望的，改组的初意，正在一步步的完全实现出来，国民党正在一天天变成为民主主义的党。国民党因为能够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当然可以有力量担负中国国民革命使命。

现在每个国民党员是应当站在民主主义一方面来，参加最近的反封建势力的斗争。个人英雄的观念，一定要打碎他，同乡

同学的团结，一定要消灭他，人人都要站在党的方面，人人都要站在世界革命运动的一条线上，为农工的利益而争斗，这才可以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不要怕眼面前有了多少纠纷，这种纠纷正是要使民主主义大踏进一步，要使封建思想再受一次重大的打击。亦许现在的昏庸腐朽分子的活动，是代表封建势力的最后挣扎罢！我们要一致拥护这一次恢复党权运动的中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封建社会残余的势力与这些昏庸腐朽分子一齐扫除干净。

载《群众》周刊 第11、12期合刊

署名：F. M.

在欢迎湖北农民代表会上的演讲*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九日）

中国四千多年，占重要地位的只有农民。整个的国家里穿衣吃饭，都是靠在农民。古昔皇帝的三宫六院，以及大官阔富的房屋田地，极小的差役胥吏，穿的吃的，那一件不是从农民身上剥削来的么？好象一座高大房子，农民就是最下的一层，受着重重的压迫，至痛苦极深的时候，不知自救解放，只是希望真命天子出世，其实真命天子登基，亦不过减少一二次钱粮，农民身上的压迫，还是有加无已！比如农民常常纪念的乾隆皇帝，何尝解放过农民！（鼓掌）农民的地位，向来是极下低而痛苦，近来加上帝国主义种种侵略，农村中很少有做房子的，除了贪官污吏劣绅是有田产的，其余好多农人，都是无田种的。现在我们要解除自己的痛苦，究竟要靠谁呢？读书人可靠吗？他们是皇帝养下来做封建势力的，他们平常是帮助帝国主义来压迫我们。但是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大变动，外国反抗资本家的工人，已在俄国建立了新的国家，法国、德国都起了革命，这个时候共产党更一天一天的扩大，快要打倒帝国主义了。如果有人说我们没有飞机大

---

* 1927年3月19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举行会议，欢迎出席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恽代英在会上发表的演讲辞。

炮，怎么能打倒帝国主义？但是我们确实是有了把握，就是有了全世界帮助我们的共产党。（鼓掌）况且是本国大多数觉悟的农民工人群众，一致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早晚一定是要实现出来了。（鼓掌）革命军在广州出发的时候，兵力器械不及吴佩孚，然而一路打胜仗，这就是得到世界的帮助与战地农工的帮助。现在我们是已经得到一部分的胜利，我们对于有力量帮助自己的农民，要怎么样来解放他呢？不是贴出几个好标语，印刷几张好议决案，便算是农民得到利益了。（鼓掌）现在我们有点怀疑了，苛税杂捐，没有减免，恐怕还要加重。军队所过地方，恐怕不少奸淫掳掠事情。农民上了当，只是不敢说。有人说我们是欺骗民众，我们应该怎样答复他呢？现在要我们的党，来替农民做事，还是要我们的党，变成为农民的党。（鼓掌）还是要我们自己起来，拿中国国民党，切切实实，为自己做事。（鼓掌）若是说靠人家——洋学生、文学家，为我们求解放，总怕是行不通的。（鼓掌）真命天子欺骗我们农民，已经好几千年，现在革命领袖蒋总司令①，也不是真命天子，大家不要错认。总而言之，还是要靠自己，不要再被人家欺骗。中国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农工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我们今天的会，是希望各位代表回到乡下去，组织起来，解放自己。（鼓掌）

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30日

署名：恽代英

① 指蒋介石，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关于中央军政分校情形报告*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

现在要将中央军政分校的情形，附带的报告一下。本校自从改为委员制以后，大见整顿。学生方面，从广东黄埔来的，一千二百名；在此地所招的政治班，一千二百名；由学生团改编的，一千三百名。这三种学生对于政治的观念，第一种差一点，第三种也差，并且到现在还有跑的，只有第二种的程度最好。以前蒋介石当校长的时候，黄埔学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现在改成了委员制，虽然没有完全铲除这种风气，但也纠正了不少。如果按规则去办，是可以办得通的。至于经费方面，力求节省，不用无事的人，不用无谓的钱，从前的预算二十七万，现在不要这些了。虽然新加入了学兵团同黄埔的第二批学生，要多一笔开支，但充其量也加不了许多。论到训练的方针，有两点应当注意：（一）纯粹国民党的左派太跑上前去了，全校尽贴的是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的标语。说话稍一不慎，就要被他们捉住关起来。这并不是好的现象，因为他们没有很稳固的立脚点，反而把中立的弄得莫明其妙。我们应当将第三国际的决议案提出

* 这是恽代英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1927年5月12日）上作的报告，全文摘自该会速记记录。中央军政分校即武汉分校，恽代英当时任该校五人委员会成员，是实际负责人。

来，使他们得着一种明确的观念。（二）因为本校是一个军事教育机关，各方面都来请求下级干部的人员。我们预备将在此地所招收的政治科改为步兵科，或加紧步兵的训练；专门培养政治工作的人材，是不敷分配了。下一期考取新生，为适应环境起见，更预备变换成分，假定招一千人，则要使学生占四百，工、农、兵各占两百，并不要怎样好的程度，只消认识字，有普通的知识就行了。

纪念孙中山先生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我们亦象国民党的一些人一样，纪念孙中山先生，因为他的革命的精神是永远不朽的。

但是象国民党那些不肖的首领，自己已经下流到徐世昌、段祺瑞那种田地，却只知捧着孙中山先生的偶像来骗人，我们可是要打倒他们！

孙中山先生在过去四十年中，曾经领导着中国的革命运动，虽然因为理论的不甚正确，策略的不甚妥当，以至限于单纯军事运动的错误，而不能成功！但是他所有的努力，始终是应当被后人所纪念。

尤其可以佩服的，是他的勇敢精进的精神，他能够随时代的潮流，大胆的吸受最进步的思想，来指导革命的路程。虽是在他最后将死的一两年中，他还做出改组国民党的伟大事业来。

可惜在改组国民党不久以后，他就死了！尤其可惜的是在改组国民党以后，虽然他吸受了不少的苏俄的新思潮，然而同时仍然在他的三民主义的中间，亦保留了不少的东方文化、阶级妥协的旧思想。这些旧思想便成了他死后戴季陶、汪精卫以至于孙镜亚之流的理论。

我们爱孙中山先生，尤其爱工农兵群众的利益与自由，所

以，虽然我们纪念孙中山先生，对于三民主义中东方文化、阶级妥协的理论，是要攻击的；对于利用孙中山先生的偶像以厉行反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是要打倒的。

载广东《红旗》半周刊第 5 期
署名：代英

冬　防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反动的军阀、地主、豪绅们，又在筹备他们的所谓“冬防”了！

到了冬天，穷苦的人们格外难得过！手上有的钱都被交租纳税搞干净了，天冷了没有钱穿衣服。借了人家的钱到年关的时候，又要准备还账。

怎样办法呢？只有发一笔横财，胆大一点的便去做窃贼与盗匪。

所以冬天的窃贼与盗匪特别多，军阀、地主、豪绅们特别要讲究“冬防”。

为什么要交租纳税呢？交了租，纳了税，使那些不种田做工的人们却可以穿皮裘向火过年，自己反转为了要穿衣服去做窃贼与盗匪！这是如何的不划算！

为什么要还债呢？那些放债的人多少都是比较有钱好过日子的。为了还债给有钱的人，叫自己去做盗贼与土匪，这恐怕亦太不近情理了罢！

何况还有所谓“冬防”！“冬防”便是要严密的防范缉捕窃贼与土匪。这些军阀、地主、豪绅们一面逼得穷人走这一条路，他们却又预备好了陷坑！

穷苦的人们起来罢！我们应当不交租，不纳税，不还债！

若是没有衣服穿，向那些平日收租收税的人家去设法罢！若是没有法子过年，向那些平日重利盘剥的债主人家设法罢！用群众的力量没收他们的财产，分配给穷苦的人民。

便是这个冬天，我们要准备大暴动，解除一切冬防军队的武装，为我们的穷苦人们打一条出路！

载广东《红旗》第6期

署名：代英

广州暴动与工会*

（一九二八年初）

广东有几百个工会。在这次暴动中，苏维埃政府没有将权力交给工会去做许多事情，所以没有能将全广州的工人、店员与一般贫民都发动起来。

苏维埃政府宣布要做许多事，但自己的精力顾不到，又没有正式布告将权力交给各工会去做，这实在是一个错误。

应当明白允许各工会有权捉拿枪毙他们所知道的反动派。那便不会仅零星捉拿一百余反动派，而且不会都送到公安局里，以至于没有处置的办法。

应当明白允许各工会对于他们所需要的房屋或粮食用品，有权自由没收征发。对于大工厂、大商店、银行、钱庄，亦有权代苏维埃政府没收保管。那便不至使许多应没收的资本家财产都轻轻放过，而工人仍旧没有钱用，没有饭吃。

应当明白允许各工会干涉商店，严厉禁止商店闭门罢市，顽梗不服干涉的，工会有权没收其店铺，枪杀其店东，那便不至在暴动中感觉一般商人消极反抗的困难。

应当明白允许各工会向苏维埃政府领取枪枝，去做上述的

---

* 恽代英在广州苏维埃政府中任秘书长。这篇文章是他在起义后写的，一九二八年初在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刊物《红旗》上发表。

工作。那是苏维埃政府所宣布要做的事，不愁不一件件的都做到。

因为不能这样做，以致广州市的工人、店员及一般贫民，虽然有两三万人参加暴动，大部分群众仍旧没有起来，反动势力能重新攻入广州，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记着这个教训，在暴动中必须将权力交给下层工会、农会，以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胜利是必然的，只要有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

载广东《红旗》，1928年初出版

署名：恽代英

关税自主与工农生活问题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国民政府已经照会了各国，将于明年二月一日实行关税自主，而且公布了新的入口税率。关税自主！这或者要算是国民党所谓革命的唯一成绩了么？

然而所谓新的入口税率，实际只是北京政府与帝国主义者“协定”的一种过渡税率。国民政府为要他的“友邦”承认这种税率，还出卖了一大批最惠利益，而且还要准备承认许多不正当的外债，以为交换条件。这样的所谓关税自主，亦就可怜得很了！

我们要关税自主，是为要能自由运用关税政策，以抵抗国外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而发达本国的生产事业。但是国民党这所谓关税自主呢？他实际是采用一种协定的税率，无所谓自主可言，而且订定了许多最惠利益的条约，完全束缚了自己，使无一点自由运用关税政策之余地。

国民党要这种关税自主有什么作用呢？很简单的理由，是在于实行了所谓新的入口税，国民政府可以增加收入八千万元，这一笔收入，虽然帝国主义者绝对不能让他们独得，已经提出整理外债问题，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要趁此整理多年无人敢于承认的段祺瑞经手所借一笔三万万元的糊涂帐（宋子文已经承认明年支付五百万元），但便是这样分赃的结果，国民政府总不愁

没有很大的好处。

这样增加收入的巨款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当然仍旧出于我们工农民众身上。洋货为了加税一定要涨价，然而假如这种洋货是必需的，我们只有多付出我们用血汗所换来的金钱去购买。亦许有国货代用品比现在的洋货价钱高，然而比起将来的洋货价钱低，但是我们购买这样的国货仍旧要比现在付出更多的金钱。中国资本家自然希望在此时提倡国货，而且他们还要利用机会提高国货价格，好在我们身上大发其财，但中国既不能自由运用关税政策，来抵抗帝国主义的压迫，结果本国的生产事业即无由发达起来，所以这种国货代用品亦不会多，事实上仍旧会使我们不能不购买很多涨价的洋货。这样，于是所谓关税自主，并无损失于帝国主义商务之丝毫，只是我们的生活程度更加提高，而国民政府大得其利。

谁亦知道所谓国民政府只是蒋、冯、阎、桂诸位大王剥削屠杀工农民众的合伙公司，谁亦知道他们要钱只是为巩固自己实力，加紧准备私人战争。我们工农民众宁忍受着自己的痛苦，为他们加增关税的收入么？我们对于这样的关税自主，应当起来做一点什么事情？

进一步说，我们应当起来宣布国民政府在关税自主名义之下实际断送关税主权的黑幕，我们应当起来打倒这种卖国的国民政府，用民众自己的力量无条件的收回关税主权，根本否认对帝国主义国家一切最惠利益的条约，根本否认对他们的一切债务，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与帝国主义作一死战。

退一步说，我们应当起来作一个大规模的增加工资，废除一

切苛捐杂税的运动。我们至少要保卫自己的利益，要增加我们的收入，减少我们其他捐税的负担。我们的生活已经过不下去了！我们不能不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我们的生活程度将一般的提高起来，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军阀与国内资本家都要大得其利，谁亦不能反对我们要求增加工资，至于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更是天经地义，无待讨论的事。国民党的所谓革命，永远是革我们老百姓的命！多谢他们！我们应当有我们的革命运动，来回答他们的盛意！

载《红旗》第 5 期
署名：代英

卖国交易中资产阶级与豪绅买办阶级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从前孙中山梦想着中国旧时“千邦进贡，万国来朝”的盛况，这自然只是一种破落户的子弟，贪恋着过去光荣的一种无聊感想。却不料他死后没有几年，在他的国民党招牌底下建立的南京政府，居然天天在嚷着与德国、美国、法国、英国、比国、意国、葡国、挪威国、丹麦国修订条约，看那些绿眼黄髯的各国公使、领事你来我往，虽然不能比做来朝进贡，却亦总算他们开国时代的一场热闹。

我们要知道，一场热闹正是资产阶级所谓外交，这是资产阶级目前第一件大事情。倘若资产阶级没有这一场热闹，不能在这一场热闹的场合中使他们的“友邦”都能够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那便他们是没有方法维持他们国民党政府的地位的。

资产阶级用什么方法招徕这一般“友邦”客人，使他们大家都满意呢？

第一是卑辞厚礼的请求谅解，例如济案①以后，派两次人到济南，派两次人到东京，欢迎矢田，欢迎床次，尽可能的礼貌，受

① 指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本寻衅开枪，打死中国军民五千人的“济南惨案”。

所有的屈辱，总可以不厌不倦的讲求所谓中日亲善之道。

第二是抱定吃亏主义，例如宁案①人家无故炮轰南京，却承认以由我们道歉赔偿了事；济案更加是人家无故屠杀军民，占据领土，却亦已经表示可以尊重人家已得权利，而且亦承认我们自己要负相当的责任。

第三是在平等的美名之下给与人家新的特权，例如条约规定两国相互征收关税，不得较高于本国或任何他国所纳关税、内地税或任何税款，实际人家税率已高，中国人并得不着好处，而人家在中国却得着完纳最低税率的权利。又如条约规定两国人民可以相互在他国领土内享有居住、营商及土地权，实际中国自己对外商业很少，更少人有钱到外国买土地，而人家在中国却借此可以自由进行经济侵略，廉价购买大批土地。

资产阶级有了上述的外交策略，自然无怪于一般绿眼黄髯的帝国主义者都愿意与他来往了！

不过这样子热闹一场以后，中国将得着如何的结果呢？

姑且不说我们的话，还是引用国民党重要人们所说的话，大概总不至于太苛刻罢！

胡汉民说，新订关税条约，使"中国势将受对手国的监视，中国实业将永无发展之望。其不平等与现行条约只五十步百步之差，徒骛关税自主之美名而欺骗国民。"

孙科说，中比、中意条约允许内地杂居经商享有土地权，将来日本援例"要求在东三省内地杂居购买地皮，倘根据原则上不能抵抗日本此种要求，则东三省问题更不易解决，而日人在三省

① 指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炮轰南京，造成死伤军民一千余人的"南京事件"。

更属根深蒂固莫可摇撼，而实行其移民政策，则三省政权恐将移入日人之手”。

张静江说，“如果照中比、中意两通商条约之规定，中国土地将被外人买尽。”

胡汉民、孙科、张静江等都是南京政府的重要角色，他们现在都出来说这样的话，亦可见资产阶级的外交，办得太不成样子了。

但是，胡汉民、孙科、张静江等又会比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王正廷等比较爱中国的主权么？他们是更落后的豪绅买办阶级的代表，根本不会有爱国的观念。现在，他们说一番话，只不过因为他们与资产阶级之间有多少利害上的冲突而已。

南京政府本来一向便是资产阶级与豪绅买办阶级合伙经营的反革命商店，他们的营业项目是屠杀工农，剥夺人民权利，出卖国家。资产阶级与豪绅买办阶级事实上都不能独立经营这一商店，他们常时是要互相利用以共同维持其政权。但他们之间仍旧有很多的冲突，尤其是资产阶级急于要希望获得帝国主义的谅解，以取得财政经济上的帮助，确定他在政治上“唯我独尊”的地位。因为这样，所以资产阶级很积极的进行他们的所谓外交，他们准备出让一大批国家的利益，以求巩固他们的政权。然而亦因为这样，豪绅买办阶级却不能不看着有点眼红发恼。

自从北伐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的野心确实是表露得很充分的了！他一面固然仍旧要利用与豪绅买办阶级的合作，来继续镇压工农的暴动，同时却已经放开手来与豪绅买办阶级为难，要在群众中打击豪绅买办阶级，使他们不能不屈服于自己的下面。资产阶级比豪绅买办阶级狡猾得多了！他们做了许多反革命的

事情，却始终不肯放下他们的革命假面具，并且对于豪绅买办阶级所做的同样的反革命行为，反大大加以攻击。这样，使豪绅买办阶级久已结怨于他们，现在胡汉民、孙科、张静江居然反过来责备资产阶级的卖国欺骗国民，总算是豪绅买办阶级的第一回反攻罢！

实际无论是陈公博、汪精卫等骂李济琛投降英帝国主义亦好，无论是胡汉民、孙科等骂蒋介石卖国欺骗国民亦好，他们大家都是一伙儿，他们的外交政策都是一样的。

豪绅买办阶级对资产阶级外交的攻击，用意在阻碍资产阶级外交顺利的进行，在暴露资产阶级卖国的罪状，使群众不会看资产阶级比他们好。豪绅买办阶级自然不希望人家会说他们爱国，但是只要消极能破坏资产阶级的外交，亦便可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所以亦因为这样，在豪绅买办阶级领导之下，发生了南京十二月十三日的反日游行、捣毁王正廷住宅的示威运动。这一示威运动会发生于蒋介石肘腋之下，当然不会没有政治的背景，只要看在这一运动过后，蒋介石之张皇与豪绅买办阶级方面之沉默，便可知其中之关系了。这一示威运动可以说是蒋介石欢迎床次的一个回答，同时亦正有如蒋介石所说破坏中央信用的作用。豪绅买办阶级虽不会比资产阶级爱国，但目前却利于破坏资产阶级的卖国外交，或者至少使帝国主义者怀疑资产阶级还不够为卖国的对手。

现在，总算可以使我们将资产阶级卖国的罪状看得很清楚，总算可以使我们将南京政府外交的实情看得很清楚。但是，能倚靠豪绅买办阶级便可以打破他们的卖国交易吗？自然不能

的！只有工农群众起来，打倒资产阶级、同时亦打倒豪绅买办阶级，根本推翻他们合伙经营的南京政府，才能消灭这些卖国的行为。

载《红旗》第6期

署名：代英

谁阻碍中国裁兵？——蒋介石

（一九二九年一月九日）

蒋介石说："俄国革命时代有四百五十万军队，成功以后，不要半年编为五十万，于半年间就能遣散四百万军队，他们革命将领都没有一个人想保全自己军队，拥兵自卫，贻祸国家与其民族，所以六年之中革命就能完全成功，是以红军亦自己以为最好的成绩。"啊！我们无产阶级死敌人蒋介石居然赞羡起我们无产阶级的国家苏俄革命的成绩了！然而这样的事，只有我们无产阶级做得到啊！

蒋介石不但举了苏俄为例，而且在今年元旦又发表了一篇洋洋大文，举日本讨幕废藩及其改革军制为例，他希望中国军阀们要学日本萨藩长藩，到中央来任集中兵力统一兵力之责，成为政府里有实权的元老，"简直与国家结成一片，共存共荣"。这总算是中国资产阶级最老实最坦白的愿望，他自己知道决不能象苏俄无产阶级政府的遣散军队，所以只有退一步祷祝那般要割据称雄的军阀们学一学日本的榜样，他明白的说出，愿意用元老的实权来作为交换的利益。但是，便是说这一个愿望，亦未必做得到罢！中国的军阀不但是一个藩主，并且是各有一派帝国主义的靠山，便是蒋介石自己背后亦有一个美国帝国主义。蒋介石使会想将国民政府拿出来分赃，但是这一块狗骨头如何能使这

么多的走狗满足呢？

中国资产阶级幸而依靠工农革命的高潮以站立起来，又依靠勾结豪绅买办屠杀工农而获得今日的地位，却梦想豪绅买办能够舍弃自己军队来服从他，这如何是可能的事！无疑的！他虽然天天闹编遣会议，结果总是一事无成。假如说是他们会有多少的成功，我想总不外是下列的两件事罢：第一是借编遣军队举办一大笔外债，第二是借口谁个不服编遣而相打起来。

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现在随时都准备用不服编遣拥兵自卫的罪名来打击别人，自然这种人一定是很多的。但是，又岂能专责备那些人，便是资产阶级一方面何曾不是一样的事！

我们不必说蒋介石第一次裁兵，将每师几千人改为一万多人的丑话，只看看何应钦统计全国的兵，请注意蒋介石现在自己"拥"的兵比人家有多少？何应钦的表是这样：

蒋氏的第一集团军——二十四万人

冯氏的第二集团军——二十万人

阎氏的第三集团军——二十三万人

李氏的第四集团军——二十三万人

蒋氏的国府直属军队——二十万人

奉天军队——十二万人

吉林黑龙江军队——四万人

云南杂色军队——三万人

四川杂色军队——十八万人

贵州省军——二万人

广东军队——十二万人

海军——八千人

以上总共是一百六十余万人，蒋介石自己便统领了四十四万，占四分之一还要多。一百六十余万比起苏俄四百五十万差不多只有三分之一的数，中国今天若是在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之下，将这种数量的军队设法编遣，可以说是毫无问题。但是到蒋介石手里便困难了！为什么呢？蒋介石自己先“拥”了四十四万军队，如何能责人家不“拥兵自卫”？他用四十四万军队巩固了自己南京政府的地位，充分表示其割据称雄的态度，如何能责人家不想保全自己军队，各霸一方，而且与他争雄呢？

何况蒋介石现在还正在新编军队，将在湖北、河南被打走的岳维峻，将在山东被打败的刘志陆等都编得他手里？何况他现在还正在为第一集团军的二三师招补缺额，而特别要招补河北(直隶)人家遣散的兵士呢？蒋介石天天闹编遣，越编遣而他的兵越是加多，人家越是遣散兵士，他越是可以大大补充他的缺额了。这样下去，中国的军队会有减少的日子么？可以断言是不会有这一天的。

若要问什么人阻碍中国裁兵，第一个便要说是蒋介石，亦可以说便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北方的豪绅买办阶级张学良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不肯将东三省十六万兵裁减下去的。南方的豪绅买办阶级桂系，是为了英国帝国主义的利益，不肯将他们三十五万兵裁减下去的。同样的理由，江浙的资产阶级蒋介石，为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决不肯将他的四十四万兵裁减下去。他们与他们的后台主人，正是需要用兵力来争夺中国的土地与压榨中国工农的权利，他们会有裁兵的日子么？苏俄的路他们是绝对不能走的，便是日本的路亦是走不通。

要裁兵，除非是我们无产阶级起来，我们才能打倒一切拥

兵自卫的反动分子,蒋介石、阎锡山、……① 等,我们才能打倒他们背后的一切帝国主义。只有我们无产阶级起来,中国才得太平。

载《红旗》第 8 期

署名:代英

① 略有删节。

卖国殃民的“关税自主”

（一九二九年一月九日）

国民党最近做了一个关税自主宣传周，派了许多说话牛头不对马嘴的宣传员到各地宣传关税自主的重要，他们的上海宣传部并且发行了一些图画，我所看见的有下列的四张：

一张说“关税自主是抵抗经济侵略的要策”，画的是一家关上大门，拒绝外面虎狼进去，门上写“关税自主”四字。

一张说“关税自主国内工业才能振兴”，画的是一人从海关将脚走出，踢走“外货”。

一张说“关税自主人民生计问题才能解决”，画的是一条蛇，表示“协定税则”，将树缠住，一人用“自主”的斧子要去砍杀他。

一张说“关税不自主的结果”，画的是一个虎口，表示“协定关税”，虎口下面是“盗贼”、“内争”、“贫穷”、“死亡”。

这些图画的意思是不是对的呢？我可以说画得都是对的。中国因为这几十年来，对于洋货进口与土货出口所完纳的关税完全失了自己规定税则的权柄，便是说，海关完税的章程（税则）一定要由各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国协同规定（协定），于是我们不必要的洋货用很低的税输运进来，将我们自己生产的同类土货的生意夺去了，我们纵然可能发展同类工业来抵制他，然而亦因

为他完税少而成本低，始终争赛不过他，因而这种工业不能发达起来。协定关税使洋货在中国畅销，使中国工业衰败不能发达起来，使工人无工做无饭吃，大家陷于贫穷、饥饿、扰乱、死亡。

实在的，我们是急迫的需要关税自主！我们要撕毁一切束缚关税主权的条约，要打倒侵犯我们关税主权的帝国主义，要推翻断送我们关税主权的卖国军阀政府。

现在国民党不但宣传关税自主，他们并且说是已经与帝国主义者订了条约，达到了关税自主，他们并且说是已经与帝国主义者订了条约，达到了关税自主的目的了！让我们看看：国民党与帝国主义者所订的条约是怎样一回事情！

不要说远的，只讲他们最近所宣布的五国条约罢！他们最近与英国、荷兰国、瑞典国、丹麦国、葡萄牙国都订了条约，其中都有说到关税问题之处，而且大体上文字是一致的。他们在条约中，特别说明以前条约限制中国关税税则的条款一律取销，适用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但是，所谓关税完全自主是怎样呢？

中英条约第二条说，两国人民在中国或本约适用的英国境内（指的是英国殖民地保护国）运入或运出货物，不得有何借口，使完税异于或较高于本国或他国人民自同一产地运货完纳之税款。

其他条约则规定此缔约国在领土内，不得有何借口，向彼缔约国人民所运进出口货物，征收较高于或异于本国人或他国人所完税项。

这是什么关税自主呢？国民党现在借了关税自主之名，与人家订了许多这一类的条约，允许这些国家洋货运来，"不得有何借口"征收较高税项，便是说，任何国的洋货完税都不得自由

规定税则，这样，还有什么自主可言呢？我们要关税自主，是要将缠绕树身的蛇砍断，是要将洋货踢走，把大门关上使虎狼不能进来，把中国人从虎口里救出来。但是要怎样才做得到呢？必须要废除以前一切协定条约，将一部分洋货的关税抬高起来，使他们成本加高，不能与中国货相比，然后洋货不能行销，中国工业才能发达。现在呢？国民党仍旧订了许多“不得有何借口”来征收洋货较高关税的条约，试想一想，洋货只许完纳与同类本国货同样的税，中国人怎样能踢走洋货，怎样能关上大门拒绝虎狼进来，怎样能逃脱虎口的余生呢？

国民党的人要说，现在的条约是与前不同的，现在是平等的条约，我们不能征收洋货较高的关税，同时在外国他们对于我们运去的中国货亦不能征收较高的关税，这不是两方面一样的吗？好不要脸的卖国奴才啊！你想骗谁？

第一，外国的生活程度本来较高，他们所收本国与其他国家货物的税项所以亦便较高，中国货去的时候至少亦要完那同样的税。但是外国货来中国的时候，中国收本国货与他国货的税本来较低，于是收他的税亦便只有较低。既然这样的情形，有什么平等的可言？

第二，中国因为工业不能发达，现在出口的不是原料便是奢侈品，例如前年出口九万万两的货物，作原料的豆、棉花、毛羽、桐油、花生、皮革、矿砂等，便占了三万万两，丝类绸缎等又占了二万万两。这些货物到了外国，假如是原料，因为是他所本来需要的，一般的完税都低，亦乐得使中国完低税。假如是奢侈品，那便一般的完税都高，中国亦仍旧要完高税。他们真是一个如意算盘，算来算去都是有益无损的。我们呢？洋货到我们这里

来，多半是日用必需品，例如前年进口十万万两的洋货，米、面、棉布、煤油等便是三万万两，其他毛制品、五金半制品等大宗输入还不计算在内。对于本国这些货物，我们能加重税吗？若是不能加重税，那便外国货物一样亦不能加重税，而且或者反要随本国货的税则减轻。这样，他们不是更可以源源的将洋货大批运入吗？

国民党的什么关税自主，简直是替帝国主义打算盘，他何曾砍断了那关税协定的毒蛇，反转是将那一条蛇缠绕得更紧了！他何曾关门拒绝虎狼，反转是大开其门欢迎虎狼进来了！他何曾使我们脱离虎口，反转是将我们更送进虎口去了！

国民党口里说革命，手上做的却是反革命。他们宣传关税自主，却实际是在断送中国的关税自主。打倒这般卖国贼！打倒这般卖了国又来宣传欺骗我们的小狗才！

载《红旗》第 8 期

署名：代英

“刻薄成家”的丝厂资本家

（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

据上海的丝厂资本家说，去年美国纽约的生丝交易所不肯将华丝列入拍板，欧美市场因人造丝之畅销，与日本、意大利丝业之争竞，都嫌华丝价格太高，不表欢迎。据他们说，若照欧美来价，每丝一担须亏本二百余两。他们的营业岌岌可危。

因为这样，丝厂资本家逢人诉苦，特别是害怕工人有什么经济争斗。他们说，“我内部劳资两方互相水火，设再不设法沟通，互相谅解，则全体休业即在目前。”他们明白反对八小时工作制，说“丝厂为国产出口贸易制造所在，现与日丝竞争时代，万不能自己减少出品。即以日本而言，虽曾列席劳动会议，终以增加生产力之故，亦未尝遵用八小时工作制，吾丝厂业工作时间，非特别规定不可。”

但是，上海的丝厂营业状况究竟是如何呢？据江海关报告，去年一月至九月出口，丝厂白丝三万九千余担，比前年出口多一万二千担；黄丝出口六百余担，比前年亦多百余担。去年上海、无锡二处新建丝厂二十余间，租价之大为从来所未有，然而尚不敷丝厂资本家的租借。从这可知，丝厂营业不但不是象那般资本家口头所说的穷窘困难，他们实际是很有利润可图的。

这般丝厂资本家所说人造丝、日丝、意丝的争夺市场，确实

是对于中国丝业前途有妨害的。但如何救济呢？希望政府帮助改良蚕种，改良蚕丝方法，则现在所谓政府没有精神、财力顾到这些事。要自己起来改进生产方式，建立直接对外贸易的机关，则自己亦没有那样大的意愿与力量。唯一的办法，只有维持而且加重他们对于工人的剥削，以增加产额，减少成本。他们便倚靠这样来撑持他们的“国产”的门面。

上海社会局调查，丝厂工人百分之七十七是女工，而其余之二十三则是童工。女工工资由二角四分至六角五分，童工工资在三角左右。每日工作十小时至十一时。这便是中国国产出口贸易所以能维持而且大获利润的理由。丝厂资本家全靠剥削抵抗力小的女工，而且在社会上散布一些不正确的消息，想造成舆论来帮助他们压迫一切工人们的经济斗争，反对一切缩短工作时间，改良工人待遇的话。“刻薄成家”是他们唯一的营业方针。

中国资本家大体都是这样的一回事情！他们在外国资本主义压迫之下，决不想什么方法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只知道保持而且加增他们对于工人的剥削，来取得一时的利益。他们现在的诉苦，只是为他们造作一些剥削工人的“理由”而已。

我们要反抗上海丝厂资本家对于工人这样无耻的剥削，尤其要揭穿他们逢人诉苦的黑幕。丝厂工人不能“谅解”忍受他们的剥削，不能因为他们的利益不起来为八小时工作制而奋斗。

或者有人说，丝厂资本家虽然反对八小时工作制，国民党政府将要颁布八小时工作制，我们工人可以等待国民党实行工厂法，那时八小时工作制终于要实现的。这样想法便完全是一个傻子。国民党总是站在资本家方面的，尤其是对于丝厂资本家，

他们去年已经两次拨款帮助。他们亦要撑持这个国产的门面。国民党所说八小时工作制，本不过说说空话罢了！若是工人不能自己起来，将来岂但丝厂资本家会要求特别规定，各业资本家都会继续起来提出这种要求呢？

载《红旗》第11期

署名：代英

什么时候中国才可以统一太平?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我们说过编遣会议以后国民党自伙子里仍旧不得太平，这句话一下子就证明了。编遣会议后李济琛第一个离开南京，到广东便说了一大篇反对裁兵的话，并且带了冯祝万、邓世增等到广西与黄绍竑去开会，他所购买的军械听说亦已经运到广西去，他暂时未必到南京来，所以他主持的国防会议亦已经延期了。第二个离开南京的是阎锡山，他一到天津便匆匆秘密回山西去布置一切，不肯到北京耽搁。第三个离开南京的是冯玉祥，他并且告病躲在百泉，说自己要出洋留学，他又将在南京他的总部人员及将校团调回河南，而且要将南京政府中他的人如薛笃弼、鹿锺麟调走。接着蒋介石亦带了他的妖姬宋美龄走到上海、浙江，并且还有要到江西去的谣言。李宗仁说是有眼病跑到上海医院，刚回到南京去，现在又跑到上海来了，然而他的军师白崇禧怪蒋介石欠他二万余万元的饷款不肯发给，坚决表示辞职的意思，蒋介石不肯给钱，又不敢准他辞职。没有人要的于右任，忽然被蒋介石约回南京，并且有做什么行政院长或监察院长的话，但蔡元培等否认这一回事，结果报纸又否认于右任已经到过南京。还有人说，汪精卫已经暗中回星加玻或香港，陈公博已经离

开上海去会汪精卫，蒋介石在各地的演说亦明说有些人在运动汪精卫回来。

谣言又蠢起了！公债价格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动摇，国府要人都忙着辟谣，特别是他们对于北方报纸登冯桂军队冲突的消息大为震怒，要罚令大字声明更正继续登报十五天。然而你说是谣言么？湖南夏威、叶祺与鲁涤平、谭道源已经实行火并起来了，鲁涤平等遁走江西，粤汉路北段因兵车拥挤已经交通断绝！

若因为这一切现象，便以为可以证明大规模的军阀战争很快便要到来，固然是神经过敏！然而至少这总不会是他们之间真有什么长期的统一和平的兆征。蒋冯之间，自然为南京政权会有他们的冲突，这一冲突现在便作成了桂系解决接近蒋的湘系势力的机会。他们之间的裂痕是非常复杂而且显然的。这种裂痕他们终究会用各种方法弥缝，但虽经他们几多次弥缝，这种裂痕终于是日益明显而扩大。

中国只有在驱逐帝国主义，扫除封建势力的革命完成之后，才会有真正的和平。但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这样做，工农群众有这样做的能力，资产阶级又生怕工农群众这样做，唯恐工农群众的力量强大了，危害到自己的政权，他们宁愿投降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以共同联合起来压迫工农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梦想不打倒帝国主义，不消灭封建势力，仍可以走德国或日本的道路，为他们自己建立一个比较长期的统一和平。然而因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强大，他们每次的努力总是归于失败。国民党中央第四次全体大会是如此，北京军事巨头会议是如此，国民党中央第五次大会是如此，现在证明：编遣会议的结果仍旧是如此。

这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之脆薄无能力，这证明资产阶级只能延长中国工农民众的痛苦，不能丝毫解决中国的问题。一切要求统一和平的人们！除非是准备起工农群众自己的力量，直接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同时亦打倒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延长寿命的资产阶级，建立起工农苏维埃政权，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之下，中国才能够真正的统一，永久的和平！

载《红旗》第 14 期

署名：代英

革命不成功中国不得太平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

象这样的世界，我们中国人总只有过着反反乱乱的日子，蒋介石那般资产阶级……①，虽然想尽力妥协延缓战争，镇压消灭革命，但战争与革命总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呢？因为在现在的情形之下，一般工、农、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是没有出路。他们中间比较落后的，便容易走到军阀门下讨生活，不由得不被军阀利用成为战争中的牺牲品，有时候他们亦唯恐不能鼓动军阀战争，以为自己谋取升官发财的机会。他们中间比较进步的，又容易走到革命的路上来，越是军阀战争时时可以发生，越是引起许多人更坚决的要求革命。

其实中国并不是永远不可以得着太平，只是要太平必须中国的工业可以获得发展，中国能够有很多而且很大的工厂，同时能够把工人的生活提高，容纳很多失业工人乃至于兵士、游民，使他们都可以有工做，这样他们便都会愿意过太平的日子，不会被人家利用去打仗。

假如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有本事使中国的工业发展，那就在他们的政权之下，仍旧会有一个短时期的表面的太平的日子。

---

① 略有删节。

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决不会有这样的本事。他们现在便想企图恢复工业，都只有倚靠更加厉害的剥削工人，所以在他们政权之下，工人生活只有更痛苦，失业的工人将要更多。

为什么中国资产阶级没有本事发展中国的工业？须知道要发展中国的工业，必须要做到工厂的出品能有很好的销路。出品越行销，工厂自然越发达。怎样能出品有很好的行销呢？

假如说要我们工厂的出品能行销到外洋去，那是不容易的事情。各国多用很高的关税加到别国进口的货品，并且可以自由加税，甚至于有时可以禁止别国货品进口。要中国工业发展，最重要还是要设法在国内找着很大的销路，这销路越大越好。

但是这有两个困难：

第一是国内已经行销了很多外国工业品，而且还有很多外国工厂在国内制造很多的出品，外国帝国主义者依靠着条约、租界、租借地、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驻军、炮舰、银行的力量，又勾结收买了一般地主官僚造成买办阶级为他们的走狗，来保护扩大他们的销路。假如我们不能把外国帝国主义的力量与他们的走狗势力打倒，中国工业品不会能有很大的销路，因而中国工业亦便不会发展起来。

第二是国内现在已经是民穷财尽，尤其是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贫农，受军阀的苛税与地主的重租等剥削，平时已经差不多连维持最低生活的钱都没有。要是象这样的情形下去，不能取消苛税重租，很多人自然是不会有钱来买工厂的出品，这样，工业如何会有发展的希望？

中国资产阶级虽然想发展中国的工业，但他们自己的力量太小了，他们不敢得罪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亦不敢侵犯军阀、地

主阶级收税收租的权利，而且中国资产阶级亦一定要依靠军阀的苛税来维持自己的政权，要依靠勾结帝国主义，与地主买办势力妥协，来压迫工农的革命运动。他想发展中国的工业，却并不能抵制外国工业品来扩大他们自己的工业品的销路，亦并不能解除农民所受的剥削，使农民都可以有钱来买他们的出品，这样，中国工业明明白白的不会有发展的日子。

要中国工业发达，必须一方面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租借地，彻底实行关税自主，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军炮舰，没收外国企业银行，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买办阶级；另一方面废除军阀制度，取消苛捐杂税，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只有这样，中国工业才会发达，只有这样，中国才会太平。

可是中国资产阶级不只不能这样做，而且不愿这样做，因为他们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还做洋行的买办或者是地主。所以要彻底实行这些事要解放中国工农劳苦群众，都只有工农革命斗争的力量才能做到。

这便是共产党所号召的工农民权革命，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群众，便是为要做到上述的事情，与一切反革命势力坚决奋斗到底。

共产党是为求中国的太平而主张工农民权革命。中国亦只有完成了工农民权革命能求得太平。中国亦只有靠工农群众自己的力量，能完成民权革命，靠革命以后工农自己建立的政权，能保证民权革命的胜利。

载《红旗》第16期

署名：代英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绩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三日）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过去了！他们在全国四万万人中，不过只有十九万党员，而且内部分成为豪绅资产阶级许多的派系，这一次三百个代表，由蒋介石等指派圈定的却占了二百多人。这样的代表大会，他们居然有脸说，这便是中国全国政治上的最高机关！

这一次代表大会主要的任务，自然是为民族资产阶级巩固卖国的政治地位，他追认了这两年来民族资产阶级所做的一切反革命的事情，并且以全场一致的决议奖慰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劳苦功高，他虽然在政治上打击了汪精卫、陈公博等所谓左派，表示对买办地主阶级仍旧有相当的让步，但同时却用全力赞助蒋介石讨伐桂系的行动，想依靠军事上的胜利，企图他们所谓“统一”。汪陈派与蒋介石本来是一丘之貉，但是蒋介石反桂系的时候，还是要打击他，因为打击他才能拉拢胡汉民、孙科等，可见中国资产阶级必须妥协封建势力，决不能肃清封建势力。

这一次，最重要的恐怕还要算原则通过的所谓经济建设案。这一案的内容，很明显是借了“造产”、“建设”等好听的名字，说

几句以全国税收一半充建设费的空话，实际却是要借此“尽量吸收外资”。并且设一种“经济设计委员会”，使帝国主义者可以直接派“经济专家”参加“为委员或顾问”，以操纵支配中国经济。从来没有再比这公开无耻的卖国企图了！他们说，以国家收入之半为中央建设经济，办理铁路、国道、其他交通事业、煤铁及基本工业，治河、灌溉、垦荒、移民等；以地方收入之半为地方建设事业，办理省道及地方交通事业、市政、治河、水利灌溉、垦荒、改良农业等。谁不知道国民党将全国的钱拿去养兵打仗还不够，时刻还要立些名目发公债库券，才可以勉强敷衍过日子，他们从什么地方可以拿出一半的收入乃至无论多少的钱出来做这些事情？他们自已亦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于是马上接着说一句，这是“建设经费原则上之规定，其实施办法，由国民政府斟酌国家地方之财政状况随时决定之”；有了这一句，自然无论他们说什么以收入一半乃至更多的充建设经费，都是不成问题的事了！但他们有了这样一句原则的话，却很可以欺骗民众，好让他们在建设的名义之下大借外债！他们仍旧说借外债要遵守“平等互惠的原则”，然而这又不过是一个“原则”，实际他们已经预备请外国“经济专家”做“经济设计委员会”的委员或顾问。人家给国民党的惠是金钱，国民党给人家的惠却是中国的主权了！

其次是他们所谓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这一案实际便是宣布剥夺全中国的“国民之权利”，使国民党可以自由压制剥削全中国人。他们规定中国人一定要服从拥护国民党，一定要讲他们的什么三民主义，一定要接受他们的什么四权使用的训练，而且一定要努力将他们所谓地方自治完成，“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自然只要有一件事做不到，便

不要梦想有什么“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可言。他们自己说，在训政时期，政权归国民党，治权归国民政府，并且说，他们可以限制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他们不要脸的自封自受，却还要将他们压制宰割我们民众的权利正式的写在他们的议案上面！

再其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在政治报告决议案中间，对于全国民众所痛恨的苛捐杂税，绝不谈到要怎样废除，他们“从数目字上以较量财政之盈绌”，很显然是收入不敷支出之数，却又对于历届军阀政府滥借以供挥霍的外债，还急于要整理筹备偿还，以求满足帝国主义者的愿望。这样，自然希望国民党废除苛捐杂税，是不会有的事情！谈到建设，这决议案中又说，地方有余之财力仍应用以从事生产力之开发与进展。他们的理由是：“以中国今日贫乏之现状，与其为人民行俭约，毋宁为人民造生产之为根本之救济”。这便是说，他们认为只要从民众身上还可以压榨得一点血汗，都宁以压榨出来从事他们的所谓“建设”为好，行废除苛捐杂税之俭约，对于中国的贫困现状，并不是根本救济。难怪国民党这样爱“建设”两个字，借建设之名，外可以自由去借债卖国，内可以自由的征收苛捐杂税，原来“建设”有这么多的好处！咳！国民党这样“建设”几年，中国与我们中国人的生命恐怕都要完了！

政治报告决议案与外交、军事报告决议案，都非常注意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统一全国的内政、外交、军事、财政，这自然显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同时，他们亦是要这样来增加他们的政治影响，这便是他们买办地主阶级爆发战争以前在政治上的一种重要准备。在他们的代表大会宣言中，更说明要保持统

一的政权，齐一国民政府的政令，“其有悍将暴民不从此旨者，本党当督责政府执法制裁”，明显表示民族资产阶级制造战争的决心。自然，从事实上说，他们在开会的第一天，便有严令制止叶琪等违法抗令的决议；第五天又决议认蒋介石免叶琪等职为处置得当，以后并要从严处置；最后又决议通过免职讨伐李宗仁、李济琛、白崇禧，并开除其党籍。这一次的代表大会实际应负此次军阀战争主要的责任。

这一次代表大会总算过去了！然而他们造的罪孽却正在扩大起来！卖国殃民的资产阶级现在更加肆无忌惮了。他们与买办地主阶级间的战争已经使湘、鄂、赣、皖数省的人民陷于困苦颠连之境，而且这一战祸的影响还不知要扩充延长到什么程度！怎样救我们自己？在国民党政权之下，我们永远是没有出头日子的！不要有一点相信他们会“建设”什么东西！我们亦不能忍受国民党无故剥夺我们的“国民之权利”！我们要我们的自由，要建立我们工、农、兵士、贫苦民众自己掌握政权的国家，打倒一切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只有这样，才可以永远灭绝国民党的毒害，灭绝军阀战争！

载《红旗》第17、18期合刊

署名：代英

国民党出卖济案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三日）

王正廷与日本芳泽解决济案的文件，已经公布了一部分。就已公布的说，第一是国民政府要以“全责”保障在华日人的生命财产，则日本于两个月内撤退山东军队。第二是两国政府声明对去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悲痛已极”，但“切望增进睦谊，故视此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第三是关于济案“中日两国”所受之损失，“双方各任命同数委员，设立中日共同委员会，实地调查决定之”。

据日本的通信社东方社说，除发表的三种文件外，其余文件双方同意不发表，此等不发表的文件内容很多，关于由国民政府禁止排日运动的协定亦在内。

蒋介石为了要发动军阀战争，不得不求助于日本帝国主义，所以不能不这样屈辱的解决济案。然而济案文件发表以后，居然还会有些人出来拍国民党的马屁，称赞王正廷怎样会办外交。特别是华侨国事讨论会发表的通电说，“此次中日交涉，能于不损权利范围内而宣告解决，在弱小国之外交中，殆属罕见。且于讨伐桂系之际，竟将震惊中外之济案和平解决，若非外交当局之敏活，何由臻此？”大概一般资产阶级的意见，便都是这样！

哼！“震惊中外之济案”原来便这样和平解决了么？

你说“震惊中外之济案”是什么？

（一）在去年五月三日，擅行开驻济南的日本军队，突然将济南商埠驻扎的中国军队包围缴械，一大部分均遭枪毙。

（二）八日至十日，日军开炮轰济南城，东、南、西三城均大火，日兵向火势猛处发炮，房屋均被炮毁，死亡人民达二千余人。

（三）日军未攻入济南城以前，飞机常掷炸弹，人民被惨杀的很多。

（四）日军驻扎胶济路一带，见中国人即枪毙，并挖去眼睛，剥肚出肠。

（五）日军不仅残杀中国士兵，即普通人民，交通人员，均用尽残酷手段，如邮局电局人员均被锢禁，绝其饮食，然后枪毙。

（六）日军于十一日将济南中国伤兵二千余人，尽数枪毙。

（七）日军对妇女小孩更是惨无人道，有一日兵对乞妇连刺三刀，并杀其小儿以为嬉戏，这样同类的事发现很多。

（八）日军将他的警备范围内所住的中国人挨家赶出，不分男女老幼，约六千人，令其排成行列，走至旷场，以五人为一组，列横队，乃以机关枪扫射之，完全杀死。

（九）日人进城后逢人便杀，并借口搜索南军①，挨家搜查，将贵重物件都搜去，家中有人便以枪指胸迫问要钱，否则枪杀，遇美女则更任意奸淫。

（十）日军对一般人民查出有刀枪、军衣、皮件，便指为南军就地处死，有某商身体肥硬，腰系皮带，日军将该商腹部用刺刀挑开，肠胃流出而死。

---

① 指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率领的所谓“北伐军”。

（十一）日军对人民操南方口音的一律格杀，每开火必抓中国人数名杀死。

（十二）被日军围攻的方振武部一团兵士几全数被日军杀死，无脱逃者。第一军第二师一团只冲出千余人，且十分之九中弹伤。第四十军千余兵士拘禁邮局，自七日起陆续枪毙。又徒手警察也遭惨杀，满街都是死尸。

以上十二件事都明明白白的记在资产阶级有名的杂志去年第九号《东方杂志》上面，无论何人亦不能说这是谣言！现在呢！蒋介石为了他便利进行军阀战争，轻轻的便“和平解决”了！“不快之感情”便“悉成过去”了！还有人说是“不损权利”，是“外交当局之敏活”的功绩呢！

双方同意不发表的文件中间，谁亦不知道那里面是说些什么，大概总有很多见不得人的话罢！只说禁止排斥日货一件事，这已经在上海市面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日纱行情飞涨，中国纱有几天生意完全绝迹，这样下去，中国纱厂将有生产过剩、减工停工的危险。这已经不知要影响几十万工人的生活！然而谁能说国民党的秘密卖国条件，不还有十倍、一百倍于这件事的呢？

至于就公布的文件说，国民党承认了负“全责”保障日人生命财产，不但对济案不敢要求日本帝国主义认罪赔偿，对于一年来日军占据山东所受的损失，亦不敢提一字，结果，不过换得日本帝国主义两个月内撤兵。至于济南民众的损失，却还要待中日两国共同调查，而调查的范围又是“中日两国”双方所受的损失，这样调查下去，究竟将来日本帝国主义要赔偿我们多少损失呢？或者还是要由我们倒转赔偿日本帝国主义的损失？

不要笑这样一件“震惊中外之济案”，会有中国倒转赔偿日

本损失的事情！须知国民党是没有什么不要脸的事做不出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在济案发生时，已经宣传日兵死伤数十人，日人遭害百余，被抢掠一百二十家，财产损失约二十万元。日政府宣布去年底止为出兵山东用军费四千一百万元，自然再加上今年几个月，军费总数一定在五千万元以上了。日本田中首相已经申明关于济案，“因正当之行动而发生之损失，当然不赔偿”。只要承认日人真是受过多少损失，那便日本因军事动作损害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一定不要希望日本帝国主义肯认一个钱的帐。那时候，便会要我们倒转赔偿日本帝国主义几千万元的损失！

只要看国民党对于南京惨案的解决，曾公然承认反转向英、美、法、义等帝国主义道歉，曾公然承认英、美帝国主义开的炮是理由正大的保护炮。他们亦是组织了一些调查损失的共同委员会，现在调查的结果，我们最亲爱的情哥哥美帝国主义，开口亦是要赔他二百万元，听说英帝国主义预备要中国赔他几千万元呢！国民党对于南京惨案已经敢这样做，现在蒋介石正要求助日本帝国主义，以便于对付桂系，他对于济南惨案又有什么不敢做的呢？

从前资产阶级还反对官僚买办的卖国外交，现在自己加入官僚买办一伙子，连这一点人气都没有了！这样“和平”的解决了济案，他们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人话了！难道我们便让他们永远这样卖国下去么？他们不做人，我们便没有一点办法了么？

载《红旗》第17、18期合刊

署名：代英

资产阶级自己供认的剥削成绩

——上海社会局发表的纺织业工资统计表

（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

缫丝业车间女工、童工，约占全部缫丝工人七成以上。工作时间每日十一小时，上午六点至十一点半，下午一点半至六点。工资只长工可每日五六角，其替工、盆工均不过三角至四角，一星期做足七天的给“礼拜赏”。丝间女工每日工作七小时半，工资六角左右，无“礼拜赏”。吐间、剥茧间女工每日工作十一小时，抄间女工每日工作上午五时半，下午无规定，可迟到六点放工，工资均较少，剥茧间最少工资有每日仅洋八分的。

棉纺业男女童工均须每日工作十一小时，日工从上午六点至下午六点，夜工从下午六点到第二天早晨六点。工资只机匠每日平均可六角，余均不过三四角，童工的工资有低到每日二角五分的。夜工加膳费洋二分。

丝织业男女工均须每日工作十时半，日工从上午六点半至下午六点，夜工从下午六点半到第二天早晨六点。工资只织工部男女工与机器原动间每日在一元以上，余均平均在五角左右。

棉织业男女工日工十小时，从上午七点到下午六点，夜工六小时，从下午七点到十二点。工资以铁机、电机的工人较高，平

均每日可六七角，余不过三角左右。

针织业男女工均每日工作十一小时，从上午六点到下午六点，惟看袜与装配男工从上午七点起，工作十小时。工资最高不过一元五角，少的只洋三角，规定两星期不停工赏三角，三星期不停工赏五角。

毛织业男女工均每日工作十一小时，从上午六点到下午六点，夜工作十小时，从下午六点到第二天早晨五点半。工资论月的不过五元，论日的都不过三四角。

从以上六点看来，可知一般的工作时间都是很长，女工、童工都要作深夜工，夜工时间工钱亦多不过与日工一样，星期日无休息，并且资本家每以"赏工"方法欺骗工人，使作工二三星期均不休息。然而所得的工钱如何呢？大约都不过十元左右，多亦不过二十余元。

这样长的工作时间，这样的深夜工，这样没有休息的工作，这样的虐待女工、童工，说起来亦应当羞愧！何况还是这样少的工钱？

国民党原来亦知道这些事，并且这样大书特书的发表出来！然而国民党还要叫我们讲什么"劳资合作"，还要反对我们为减少工作时间，加增工资的经济争斗，这不是为资产阶级说话是什么？

谢谢国民党社会局！这一回还没有把真实情形完全掩饰下去！这告诉我们，我们工人必须奋斗，必须靠自己的力量直接奋斗，我们要奋斗求得八小时工作制，求得夜工减少时间，求得废除深夜工，求得星期日休息不扣工钱，求得女工、童工的特别待遇条件，求得工资的绝对加增。

一切讲“劳资合作”的都是资产阶级的走狗，都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敌人。

载《红旗》第19期“五一”特刊

署名：稚宜

答刘三保工友*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

你们那里发生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注意的是：

一、失业工友与在业工友的关系问题：本来失业工友与在业工友，同是受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阶级，所受的痛苦是一样，根本没有什么利害的冲突。为什么会有不一致行动的事发生呢？这完全是资本家的捣鬼，从中挑拨离间，分散失业工友和在业工友的联合战线，削弱工人阶级的团结力量，以利于他们更加压迫工友们。因此失业工友和在业工友大家应有深切的觉悟，一致联合，不要上资本家的老当。

二、在业工友应该知道无产阶级战争的唯一利器，是要有严密的组织，同时在业工友有很好的组织，帮助失业的工友，才能与失业工友有密切的联合，才能使失业工友不致受资本家的欺骗利用。只有在业工友与失业工友彼此互相帮助，在一条战线上与资本家斗争，才能够得到整个的工人阶级的胜利。

---

* 江西景德镇磁窑工人刘三保给《红旗》编辑部写信说：当地有一失业工人组织，每年罢工时站在“我们工友的利益方面，很勇敢的和我们联合向压迫我们的资本家斗争，不过他们是有条件的，一定要我们供给他们的生活，我们当然是答应的。但是倘如资本家加紧压迫，斗争将失败时，同时资本家又拿钱去买动他们，那时候呵，他们马上可以反转来殴打工人，捣乱我们打派头（罢工）的组织。我们真不知怎样对付才好。”恽代英针对这一问题作了答复。

三、失业工友痛苦的来源，很明显的是受了资本家的任意开除工友所致，资本家为要使用他对工人阶级的更压迫更剥削的手段，因此他任意的无故或借故开除工人，向工人阶级进攻示威，他巴不得工人阶级驯服得如绵羊一般，一些也不起来反抗，然后他才能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失业工友们，应该大家觉悟，你们唯一的出路是与在业的工友紧紧的联合着，向资本家作复业的斗争，这样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在失业工友没有复业的时候，应当团结起来，向资本家与当地政府进行要求维持生活的斗争，在斗争中是要请在业工友的帮助。失业工友的生活，不是要在业工友去维持，因为在业工友是一样的受压迫。失业工友所应当找的是资本家及当地政府，他们应当负责维持失业工友的生活。

载《红旗》第 21 期

署名：稚宜

新的军阀混战与改组派的作用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继续不断的军阀混战，打破了群众对于国民党的一切幻想。谁亦再不会相信资产阶级有统治中国的能力，谁亦再不会相信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中国会有和平统一的日子。

这是一定的！中国只有能彻底驱逐帝国主义，扫除封建势力，才能发展工业，解放农民，拔救中国使脱离于破产扰乱的恶运。但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不但不能打倒帝国主义，扫除封建势力，反转投降妥协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加紧他们对工农群众的剥削。这自然只有使中国陷于更破产更扰乱的局面。

不打倒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建立工农自己的政权，中国是不会有出路的。

但资产阶级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要想苟且维持他们的地位，总是造作欺骗群众的各种政治口号，以企图扩大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蒋介石的所谓北伐胜利，所谓统一，所谓裁厘裁兵，都只是这种欺骗作用。

现在，蒋介石的欺骗，因为被种种事实证明，在群众中的作用已经是很有限的了。无论他再发几多狗屁宣言，群众都知道他所说的没有一句真话。他实际是卖国求荣的军阀，他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过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新工具而已。

于是资产阶级又要一种欺骗群众的新旗帜，这一新旗帜便是所谓改组派的政治主张。他们说，蒋介石是卖国的，是专制的，他们起来反对蒋介石，是要打倒卖国专制的反动政局，建立民主统一的政府。

现在一切反蒋的力量，甚至于冯玉祥及桂系，都提出改组派这一类的政治口号。这是值得注意的。这不只是一种战争的借口，这表示资产阶级一种新的欺骗群众的企图。

自然，改组派的政治口号是非常可笑的。他们反对蒋介石卖国，但单指出卖济案一件事情，对于南京政府雇用大批美国顾问，成立中美无线电借款与航空合同，则完全一字不提。他反对蒋介石专制，但说去说来不过是说蒋介石把持包办了国民党的三全大会，对于国民党怎样把持包办全国的事情，却与蒋介石一样认为是当然的事。

姑无论改组派得了胜利，连反日亦必不能彻底，国民党内部亦必然仍会与蒋介石一样，发生把持垄断的事情。纵然承认他们不会这样，他们的主张至多亦不过是，卖国只卖与美国，不卖给日本，不许蒋介石一个人专制，而要由国民党一党专制而已。

改组派为什么只能提得出这样的政治主张，很简单的说，他们亦不过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本身便是一个最无用的东西，他的代表，无论是蒋介石或改组派，总不会提得出象样子的政治主张来。

既然如此，便可知改组派亦不会比蒋介石有一丝一毫高明的地方，无论是谁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中国的问题是一样不能解决，中国永远不能脱离破产扰乱的运命。

我们要反对军阀战争，要在反对军阀战争中间揭破改组派

的欺骗作用。群众再不要陷入资产阶级欺骗的网罩，那便资产阶级无法能苟且维持他们的运命，中国才能在工农政权之下，建立真正和平统一的国家。

载《红旗》第22期

署名：代英

唐山工人阶级的力量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开滦五矿工人自提出要求六条以后，厂方一个多月不肯给以满意解决，他们便明白了工人阶级要改善本身生活待遇，只有倚靠自己斗争的力量。“五一”以后，他们每天包围各自的黄色矿工会，强迫会中执行委员宣布最后的办法。可怜这些执行委员，一面怕得罪国民党，但另一方面又没法敷衍工人，真是狼狈得很！

拖延到五月三日，黄色矿工会再拖延不下去了，只得宣布当日厂方再无圆满解决，则宣告全矿怠工。三日与厂方的谈判，一直到下午一时仍然没有结果，但黄色矿工会仍旧不肯宣告怠工。这消息被工人知道了，工人自己决定从四日起，开始怠工二小时，并准备以后每日增加怠工一小时。

黄色矿工会在这时不但不实行他们自己的允诺，反急忙制止怠工，五日以后的怠工，被他们用全力制止。国民党中央亦来电修改工人条件。一般国民党走狗在工人中尽力作反宣传，说罢工则生活费将无来源，而且恐防厂方自行捣毁机器，而以红帽子加之工友头上。工友们虽然怀疑：国民党向来说拥护工人利益，为何在此时不拿点实力来帮助工人；但他们这种反宣传，实在亦摇动了多少工人斗争的决心。

资本家于是趁此急谋解决这一工潮，结果承认了工钱每月二十四元以下的加二元四角，二十四元以上加一成，一月内请假不扣煤票，每年例假九日，这样的解决，不但将工友原来的要求减低到最小限度，并且连星期日例假都没有。

但便是这样的解决，亦并不是资本家所愿意给与的，而只是在工人阶级威力之下，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让步。

这一次充分证明，只有工人自己的力量能争得自己的胜利。黄色工会领袖与国民党，都只是资本家压迫工人的工具。

工友们现在都有驱逐黄色工会领袖，夺取工会到自己手上的决心。他们再亦不相信国民党会拥护什么工人利益。他们已经明白，国民党的反宣传，正是为资本家开一方便的解决工潮的门径。

唐山工人的斗争，现在还是正在发展。京奉路工人驱逐了国民党派来的什么整理工会委员。启新洋灰厂工人亦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的四条要求。五矿工人在这样热烈的斗争情绪之下，第二次斗争一定会走入更激烈的方式。所以现在，黄色工会领袖与一般国民党走狗，仍旧是恐慌的很。

载《红旗》第 22 期

署名：稚宜

中东路问题与一般流行的错误意见

（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七日）

自中东路问题发生，反动的国民党站在帝国主义的利益上面，拚命扩大反苏联的宣传。革命民众多多少少都知道，中东路问题实际是帝国主义的作用，但一则因为政治文化水平线低，再则因为有意无意的受了国民党以至国家主义者反动宣传的影响，仍旧有许多流行的错误观念，大家对于这一问题终不能有一种正确的认识与态度。

一、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呢？还是帝国主义者一致进攻苏联？

在中东路事件初发生时，有两种不正确的意见。一种是以为中东路事件，是国民党代表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向北满进攻，一方面固然是夺取苏俄的中东路权，一方面却是为要与日帝国主义争夺他掌握中的北满。另一种是以为中东路事件，是帝国主义者妥协后的进攻，美帝国主义获得航空权，英帝国主义获得海军权，所以日帝国主义亦便在这时夺取中东路，向北满发展。

第一种意见，过分夸张了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第二种意

见，又将帝国主义之间看得太一致了。

中东路事件，显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作用多，他极力挑拨战争，而且积极进兵满洲，野心人人可见。但这并不是日本帝国主义敢于单独的这样行动，他这一切的行为，都是因为在帝国主义者反苏联的共同目标之下，所以认定其他帝国主义一定可以表同情于这些行为。这又并不是说帝国主义者之间自己便无冲突，他们虽然攫得中国航空、海军或北满发展的利益，这些利益之间都是彼此有冲突的，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实在企图利用国民党进攻北满，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有不可避免的冲突之处。不过虽然有这些冲突，帝国主义者现在又力图自己间的协调，以造成一致反苏联的联合战线，所以若是过分夸大了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反使群众不注意于他们一致进攻苏联的企图，这在政治上会使群众忽略了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阴谋。

二、是民族的冲突呢？还是阶级的争斗？

中东路事件发生以后，有些人笼统的说国民党所为是代表中国民族的态度，因此动辄以苏联的态度与中国的态度并称，实际他们所谓中国的态度，仅是国民党少数人背叛民族利益的态度而已。这样将背叛民族利益的少数人态度混指为中国民族的态度，自然是一个大错误。

但是有些人因为要纠正这样的错误，便仅将中东路事件看成一种阶级争斗的事实，而以为其中并不包含什么民族问题，这

亦是同样的一个错误。

中东路事件，在全世界范围的意义说，自然是一个严重的阶级斗争，国际资产阶级进攻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苏联。但是，就中国本身看来，中东路事件却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重大打击，其目的在于进攻中国革命的导师与良友苏俄，与引导帝国主义者借口反俄进兵瓜分中国。所以中东路事件，就中国本身看来，毫无疑义的是一个严重的民族问题。

不但误认中东路事件是民族冲突的意见须严厉加以纠正，便是仅仅认这一事件是阶级争斗的意见亦一样要加以纠正。不但是站在全世界范围，站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观点；我们要尽力反对国民党武力夺取中东路，进攻苏联，便是站在一个平常中国人的地位，只要还知道争求解放，不愿意永远为帝国主义的牛马奴隶，我们都应当尽力反对这一类进攻苏联的行为。

我们要指出中东路事件的世界意义，要指出世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营垒斗争的形势，使中国革命每个革命的民众都知道为反对帝国主义，必须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我们必须反对那种忽略中东路事件的民族意义的态度，如以为只有站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上面，或者甚至于以为只有站在苏俄的利益上面，或是共产党的利益上面，才应当反对国民党夺取中东路。这样的观点，甚至于能得出结论说，若是只站在民族的利益上面，没有反对国民党夺取中东路的理由。这完全是不了解中东路事件对于中国本身的重大损害，正与认中东路事件为民族冲突是一样荒唐谬误的意见。

三、苏联要武力解决呢？还是要和平到底？

中东路事件发生以后，有些人很希望苏联强硬对付国民党，希望红军开入中国境内，以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使人家看得见无产阶级的威风，给倒行逆施的国民党一个打击。另一种意见则以为苏联是主张和平政策的，无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如何倒行逆施，苏联总只有逆来顺受，坚持和平政策到底。还有第三种意见，是说苏联并不是不能以武力解决，但不肯以武力解决，使如国民党再逼进几步，苏联将只出于武力解决之一途。

前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第一种意见还不懂得苏联有他的和平政策，第二种意见却对和平政策亦没有正确的了解。第三种意见，从字面说，亦许可以说是不错的，但是若不了解苏联何故有时要坚持和平政策，有时却不能不出于战争，那便这些话究竟只觉得是模棱两可，不能给人一个明了正确的了解。

苏联的一切政策，以求有利于世界革命的前途为标准，和平政策亦是因为世界革命的利益而决定的。和平政策决不是忍耐退让，而是进行世界革命的一种重要手段。苏联的红军是要帮助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自己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政府，只有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自己起来，以红军帮助他们完成革命，这是于世界革命有利的。苏联的红军并不能代替中国民族打倒国民党，苏联并不仅仅要使人家看见苏联一国无产阶级的威风，而是要帮助中国以至各国自己的无产阶级起来。假如苏联只依靠自己的红军与全世界帝国主义反动派作战，不但不一定能获得胜利，而且使各国帝国主义反动派可以利

用“爱国”、“外抗强权”等鬼话来欺骗他们各自本国的工农被压迫民众，使站在反抗苏联的地位，这显然是与世界革命有害的事。

苏联假如是使红军开入中国对付国民党，国民党一定更要利用一切无耻挑拨的鼓动驱使工农群众反对苏联，工农群众亦易受他的欺骗而走到反对苏联的路上。苏联的和平政策显然使国民党一切挑拨鼓动的手段都在群众面前失败了。所以苏联的和平政策，决不是忍耐、退让，而是在促起各国工农群众起来，为推翻自己的反动政府而革命。

苏联有时是不能不出于战争的，假如帝国主义反动派根本要破坏苏联无产阶级的政权，也不能不为保卫工农祖国而战争。苏联决不是无条件的和平到底，他的和平政策与战争，都是为世界革命的利益而决定。苏联要尽力以和平政策引进各国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到革命的路上，但是已经准备一切，要为保卫工农祖国决一死战。

载《红旗》第35、37期

署名：稚宜

打破中国的监狱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六日）

中华全国人道互济总会印行了一本《中国监狱黑幕》一书，内容叙述各地监狱黑暗虐待被拘捕的人们，自然很可以看出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成绩，他们原是吃人肉喝人血的野兽啊！

但是我们不仅要反对狱吏的苛虐，或者反对国民党滥捕有赤化嫌疑的分子，而且我们要进一步的问这些被拘捕虐待的人们，无论是政治犯或非政治犯，他们本身何以会走到成为“国民党的犯人”的地位？

犯人！哼！这便是被拘捕虐待的人的正确名称么？他们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是因为受了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压迫，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是因为受了军阀、官吏、豪绅、地主的封建式的剥削，所以为自己的生存，使统治阶级的法律没有方法可以范围他们。

但到了统治阶级法律不能范围他们的时候，便只有将他们硬关在监狱里面，自然在这时，一切苛虐待遇都是意中的事。

改良监狱运动，诚然为一切主张人道的人所应号召，但革命党人还要起来打破一切监狱。我们知道，仅使这种监狱真有改良之一日，难道便以为统治阶级便对得起“犯人”了吗？难道以为便可以让这般政治犯、非政治犯安坐在他们这种监狱里了吗？

帝国主义的法权调查委员会便说什么中国要改良监狱，但

这不过只是他们不肯撤消领事裁判权的借口。假如我们不是为要扬国民党的家丑，使帝国主义者有更多的材料说中国监狱尚待改良，而是要号召群众反对统治阶级拘捕虐刑的白色恐怖政策，打破中国的一切巴士的狱，释放政治犯，那便很显明的应当起来做打破反动统治的监狱运动。

革命群众所要的，是根本毁坏现在的监狱，根本打倒反动的统治阶级，立刻释放一切政治犯，决不仅仅是要求监狱改良——改良一点，然而仍旧保留着这种东西，好让人家来关禁他们自己。

载《红旗》第45期

署名：稚宜

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

——福建通信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二日）

列位，你们都听见过国民党张贞、刘和鼎、金汉鼎诸位大人，怎样劳师动众的去围剿闽西朱毛土共，你们都亲身领受过国民党摊派剿共公债，领受过反共军队拉夫骚扰的深仁厚泽，你们可曾知道闽西出了一件什么大了不得的事？

真的！真是一件大了不得的事，闽西农民反了：什么朱毛红军便是来帮助他们造反，什么土共便是指的那些本地造反的农民。

你真以为闽西现在亦只是一种普通的什么革命，好比蒋介石革命便打倒了张作霖、吴佩孚，自己做起国民政府主席，好比汪精卫又要革蒋介石的命，亦想来抢一个国民政府主席做做？闽西完全不是这一回事情。闽西不是什么普通的革命，他是造反，他是要闹一个天翻地覆，把全世界翻转过来。

你们说闽西做了一些什么事呢？让我来一件件事告诉你们。

---

* 一九三〇年二月，恽代英以中央代表身份到厦门指导中共福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三月十二日在《红旗》三日刊上发表了这篇通信，当时没有署名；同年五月编入《中国苏维埃》一书时署名“代英”。

(一)赶走了国民党

闽西的农民把他们那里收租的地主绅士一齐都打倒了，那些穷苦的佃户与那些田地不够养活自己的自耕农，他们都起来象发狂一样的，搜杀他们乡村的地主绅士。没有杀到手的亦被他们驱逐扫除了一个干净。他们把乡村所有的田地，都拿来重新分过，他们自己耕种便都归自己享受。

你们一定要奇怪，象这样无法无天的事，国民党官府肯答应么？自然不答应的。但闽西的农民不但是要打倒那般收租的地主绅士，他们一样是要打倒那般坐地收捐、收税、派款、派粮的国民党官府。他搜杀国民党官府正好象搜杀那般地主绅士一样。你们不听见他们将国民党旅长大人郭凤鸣，老实不客气的杀了悬首示众吗?! 你们不看见他们将国民党还有好几位大人，如卢新铭、陈国辉等，打得夹起狗尾巴向漳、泉、闽北一带乱跑吗？他们真是反了！他们何曾把国民党官府看在眼上？

(二)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你们或者奇怪，闽西农民把国民党官府赶起走了，他们怎样过日子？他们象这样下去，谁还能管谁呢？他们把地主、绅士赶了分田地，那田地各有肥瘦大小，怎样会分得均平？他们这样下去，不要自己间争得打破头吗？

说也奇怪！他们完全没有这样一回事。他们现在过得非常舒舒服服，从前争田争水的事现在一概没有了。为什么呢？因

为他们有一个新的办法。

他们在一个乡村里面，许多事都是靠着开群众大会解决。例如他们分田地，便是由群众大会自己讨论，自己定出分配的标准，自己指定调查并照料分配的人。这样分配下来，大家心满意足，没有一句话说。

其实这亦是自然的，你们晓得，从前闽西农民在地主官府下面，要交租，又要完粮，又要上捐，又要派款，他们那时候简直没有法子生活下去。有些农民一年都没有米进口，并且连红薯亦没有吃，他们只有吃红薯渣。现在造反成功，居然分了田地，而且分田地完全是他们自己作主，这正好比从地狱走上了天堂，还有什么话说呢？

而且即令他们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争端，亦是很容易办的，他们那时仍旧是开群众大会解决。群众大家怎样说，便怎样办，谁亦不能说这还不是十分公道。

他们不但一乡的事这样办，一区的事，一县的事，亦差不多是这样办的。自然一区一县的事，不能将一区一县的群众都召集在一处开大会解决事情。他们的办法，是在各乡举代表到区开会解决一区的事。各区举代表到县开会解决一县的事。同时亦由县、区以下各工厂、作坊、军队举代表参加。他们说，这样的群众大会或代表大会，便是他们的政府。他们替这种政府起一个名字，便叫做苏维埃。

真亏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好办法，怪不得他们用不着地主、绅士、国民党官府，要将这般人杀他一个干净了。

(三)土地归农民

你们说,闽西把所有田地都分配了,是不是把一些自耕农的田地,亦和地主绅士的田地一样,拿去分配去了呢?为什么打倒地主绅士,却连起自耕农民亦一样要打倒呢?

自然没有打倒自耕农的话,他们本来只是反对那些坐着吸血收租的地主绅士,这种地主绅士亦是一般农民所痛恨的,他们为什么到把所有田地都分配了呢?很简单的原因是那里自耕农民五分之四都是不够养活自己,这些人象佃户一样要求分配田地。把所有田地分配了并不是打倒自耕农,而是使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田地。不过这种办法,对于那些田地可以养活自己而有余的自耕农民是有些不利的。但这种农民在闽西一百个人中间不过只四五个,他们这点小小的不利,大家便不管他了。

闽西农民的意思,亦并不希望各地农民将来造反的时候,都象他们这样做。不过无论如何,总要将地主绅士的田地拿出来给佃户与贫农分,至于怎样分法尽可以由各乡自己解决。

(四)分土地的方法

你们问,拿什么标准分田呢?

闽西农民现在所做的,多半是拿各地人口与田地平均分配(亦有少数地方不是这样做的)。他们在大会中举了人到各家去调查田亩人口,举了老练的农民估定田地的大小肥瘦,便定出了分配的方针。削了很多木签,写上田的号数,收几石谷,及归谁

个耕种，带同群众前去插定。这便算将田地分给了谁个，以后便由他耕种。

你们想，那样调查田亩不会有少数不好的农民隐瞒不报实数，以多报少的毛病么？自然，有些地方亦有过这样的事。但分田时要宣布给全乡群众，本乡的事很难隐瞒过本乡的人。并且他们亦议了一个惩罚的办法，如少报几亩将来便少了几亩。所以这种隐瞒不报实数的事是很少看见的。

不过按人口分配田地，现在确实发现有些不好的地方，因为这样分配田地，是不问分得田地的人耕作能力如何的，这样便会使老弱残病的人都得了田地，但他们自己却不能耕种。因此，所以有些田地荒废起来，再不然便会私自租给人家耕种，成了变相的地主一样。再不然，亦会看见有些地方，许多青年儿童亦去耕田，反转将他们读书游戏的时候白送掉了。

现在闽西农民已经看出这些毛病，正在设法改良。他们已有的办法，是禁止田地私自租给人家耕种，有田地荒废的收回给有力耕种的人去耕种。并举行农产品展览会比赛，鼓励大家发达农村生产。至于青年儿童的劳动，却同时在设法减少或禁止。

在有些地方，他们还有些分不完的田地，便作为大家公共的田地，这种田地现在有两种办法，一是仍旧交给人家耕种，收三成土地税做苏维埃（代表会议）政府经费，一是农民公共为苏维埃耕种。现在这两种办法都在试验中，不过闽西农民都觉得还是公共为苏维埃政府耕种的办法好。

载《红旗》第83期

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闽西八十万工农群众从斗争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获得朱毛红军长期游击战争经验的帮助与指导，在政治上确实已表现了伟大的成绩。他们驱逐了地主豪绅、国民党军阀，分配了土地，改良了工人生活，他们的政治影响在全福建乃至东江、赣南工农群众中间都普遍的扩大。

闽西苏维埃区域实际包括龙岩、永定、上杭、长汀，及平和、武平、古城之一部分，龙岩、永定的县城现都在苏维埃统治之下。闽西苏维埃区域显然是日益发展的，虽然经过敌人几次的会剿围攻，但都不受什么重大的损失，结果反教训了农民，使他们更知道只有拚命扩大斗争才是一条生路。敌人的军队、民团动摇叛变的日益加多，金汉鼎不敢使占上杭、长汀城的部队出城，刘和鼎、张贞都乐于将军队离开闽西。东江、大浦一带的地主豪绅已经气馁，不敢得罪苏维埃来往人员，因为知道苏维埃迟早一定要发展过来的。

闽西苏维埃确实表现出来是工农的政府，经常有群众会议与代表会议，有很多工人、贫农以至妇女参加苏维埃代表会与委员会，一切权力都属于苏维埃。在苏维埃政府之下，无田地或少田地的农民都分得了田地，成年吃薯渣的贫农都改吃白米，乡村

的水沟、桥梁、道路都大加修理起来，很多地方组织了合作社来抵制商人抬高物价的剥削，并且用很低的利息借款给贫苦农民，疾病可以找得公共的免费的医生与很廉价的药品，工人实行只做工八小时，还要加增工钱，妇女解除了一切社会的与家庭的约束压迫，获得了一切的自由。

闽西工农群众靠苏维埃政权训练了自己。在分配土地的时候，他们的领袖主观上只想做到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贫农却一致坚持要平分土地，自然在这种有广大贫农的地方，只站在很少的中农以至富农利益的观点上反对平分土地，是不正确的。在分土地的时候，群众最初主张按人口平均分配，但经验证明不管老弱残废的人都一样分配土地，结果是使土地荒废，使收租制度秘密复活，使幼年不能避免强迫劳动，他们从这些经验已经懂得有转变到按劳动力分配土地的必要。

关于乡村苏维埃组织，他们亦已经从经验获得许多改进。有些地方，乡村苏维埃最初是合数乡群众选举代表组成，但马上便觉得不便，现在已经有许多改为一乡村组织一个苏维埃(除很小乡村外)，人数不多的乡村便用全体群众会议做最高政权机关，不另要代表会议。在初成立苏维埃的地方，每开会多是几个领袖发言，农民只在台下点头或鼓噪，表示赞成与否，而且多半是赞成领袖提出的意见，妇女发言多半不受人重视。但苏维埃成立稍久的地方，情形便与这完全不同。农民渐次能发表意见，他们已经实行撤回不称职的上级苏维埃代表，妇女在苏维埃中间的地位亦日益抬高。

自然不是说闽西苏维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缺点，为苏维埃的巩固与扩大，有几个严重的缺点必须要指示出来，但怎样改正

这些缺点已经在闽西唤起了群众的注意，尤其是我们在闽西的党已经认识了自己的责任，决定为改正这些缺点奋斗。

第一个重要缺点是群众的创造力还未能充分发展，苏维埃一切政治设施还表现很多自上而下的精神。例如办理合作社、俱乐部、列宁学校等，都是由县苏维埃乃至各县联席会讨论规定办法，交各乡执行。上级领袖主观上亦要求各乡工作的一致。苏维埃最高执行权力实际还是在委员会。代表会议或群众会议好象还只是一个讨论谘议机关。因为这样，群众虽然都认识苏维埃政权的好处，但仍觉得只是一部分上级领袖、委员替他们做事的好政府，还不能完全认为自己为自己做事的政权机关。闽西的党已经提出两种主张，一是以后除军事财政外，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事业，要尽可能帮助各乡群众自己创造，党的好意见一方面固然要影响上层苏维埃指导工作，另一方面尤其是要发动每个支部到群众中去发展讨论，推动群众在会议中提出意见，使各乡一切设施都可以各出心裁，互相观摩争竞。一是以后要确定代表会议或乡村群众会议是最高政权机关，重要的事必须经过他们充分讨论，而且不但是讨论，要尽量吸引参加会议的人参与各种执行的工作。党不仅是要帮助群众发展自己的意见，而且要帮助群众自己做，这样便可以使苏维埃的群众基础更为巩固。

第二个重要缺点是还不能坚决集中一切力量向外发展，农民很多武装还停留在地方性的赤卫队手中，不能自由集中调度。客观上需要筹集款项、帮助军事与群众工作的扩大发展，亦因为怕农民误会不易执行。因为向外发展还是没有把握，于是他们为要解决经济上出入口商品的困难，常不免对商人带浓厚的妥

协倾向。他们不但公布保护商人，并且完全豁免商人捐税的负担（农民还要交付百分之十五的土地税），自然更不会有派款或征税的事。他们对商人自由高抬物价亦没有取缔的办法（除办理合作社外），甚至于有时候还做出要限制店员工人经济斗争的事情。闽西的党现在已决定坚决与一切保守妥协的倾向积极奋斗，要使每个工农群众都认识向外发展是生死存亡的斗争，要集中一切武装与人力、财力，实现向外发展的计划，对商人虽然在事实上现在还不能积极的向他们进攻，但苏维埃一定要确实树立起工农政府的威权，要尽可能的限制他们对工农的剥削，要立刻征收营业税，尤其是要坚决反对一切限制店员工人斗争的机会主义倾向。

闽西苏维埃决不掩讳自己的缺点，自然这亦是绝对没有掩讳的必要。工农群众在阶级的敌人长期统治与欺骗宣传之下，现在还是第一次建立自己的政权，自然不会一件件事都做到尽善尽美的，工农群众现在已经有机会自己试验，自己批评，并且随时改正自己的缺点。只有苏维埃政权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全中国工农群众都应当起来为苏维埃政权奋斗。

载《红旗》第87期

署名：代英

在狱中给党组织的信*

（一九三〇年五月）

王作林，年三十，从前在武昌电话局做事，本年十月失业，闲住家中半年（家在武昌豹子澥）。此次偕友人林君乘太古轮来沪找事。初与林住法大马路鸿运旅馆，因太贵，搬住东新桥车夫住小客栈（三日到沪），每天所住客栈无定处。六日下午到韬明路惟兴里一〇二号王春（同乡，在铁工厂做事），找不着此号码。出外，遇抄靶子①，见王穿短衣，带眼镜，有水笔、手表及四十元，意似怀疑。又似欲取去此四十元。正争持间，有人搜得传单一包，遂说是王所带。实则王仅穿二短衣，无处收藏。因带至捕房，外国人遂由毒打，强迫承认。有人从旁怂恿说，可认是别人所交，并出五元，嘱为发散。王为所动，承认是旁人所交。但后来因身边无五元票，所以只得说交者嘱王拿了过街，即自来取。后外人②忽拿出收条二纸，钥匙一圈，说是王身上搜出；并说王曾拟销灭收条，更是全无其事。王亦始终不认这是他的东西。外人又加

---

* 1930年5月6日，恽代英在上海杨树浦被租界巡捕房逮捕，次日引渡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他在看守所化名王作林，自称工人，敌人未能辨出他的确实身份。此信大概是他在5月10日或11日写的，买通看守送出给党组织。

① 此处指在马路上遇巡捕抄身搜查。

② 外人：指外国巡捕或巡官。

毒打，更逼说地址。说是小客栈，又打。于是只是说鸿运旅馆，但不记得号数。又被强迫，于是胡说是四十号，外人又毒打，逼招共党机关。自然无法说出。遂关看守所。夜间，外人提王坐汽车去找惟兴里一〇二号及鸿运四十号，均无此号码，又遭毒打。次日，提公堂，即有司令部包探，诬王为吴淞共党领袖，要求提解。即解公安局，问过一次，王仍供如前，即解司令部。现已三天未问。王决在问时，要说明巡捕房逼供实情。王此次在捕房被打得面相都改变。此后，未受刑讯。在此无一熟识的人，但同狱颇多关照，有人送与衣被，菜饭也不成问题，外面勿须挂虑，并不要送钱物探望，以免反引起枝节。但外间有了相告之语，望于接信后至迟第三天（后天）十二点（午）与来人约定在龙华客栈交一回信来；如尚无回信，亦须派人来与他另约一时间（来人需要酒钱，可照信内给他）。

最好能将三号从武汉进口船名，开一个来；如能为找一地址、职业可查的交来。此信能在提问以前交到，更有用处（手表、水笔、钱都可以不要也）。

照此情形，大约判决不过送苏州。不过如能设法早些出狱，自然更好了。

据中国革命博物馆影印原件排印

狱 中 诗

浪迹江湖忆旧游，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摈忧患寻常事，
留得豪情作楚囚。①

载《革命烈士诗抄》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① 楚囚：本谓楚国之俘囚。春秋时，有楚国人被晋国俘虏，但他仍戴着南方样式的帽子，表现对故国的怀念。这里说虽被囚禁，还是保留着革命者的豪情壮志。

恽代英同志生平年表

（1895—1931）

一八九五年（诞生）

8月12日（光绪21年6月22日），生于武昌。字子毅，又名遽轩，祖籍江苏省武进石桥恽家村。父恽爵三，号乐夫。母陈葆云。兄弟四人，排行第二。

一九〇〇年（五岁）

初入家塾，接受封建教育。

一九〇九年（十四岁）

随母迁居鄂西老河口，时父在老河口任盐税局长。开始读《纲鉴易知录》、《战国策》、《古文观止》、《饮冰室文集》等。崇拜谭嗣同，经常吟诵其狱中遗诗以自勉。

一九一一年（十六岁）

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留下深刻的印象，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

一九一三年（十八岁）

迁回武昌，寓涵三宫街一号。

夏，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预科班学习，开始接触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并受其影响。

一九一四年（十九岁）

10月1日，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义务论》，谴责资本主义的“文明”和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九一五年（二十岁）

5月1日，在中华大学学报《光华学报》上发表《新无神论》，宣传近代唯物主义思想。并在该刊发表《怀疑论》。

同月，撰文反对袁世凯的卖国的二十一条。

6月，毕业于中华大学预科。

9月，考入中华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此时，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第一卷称《青年杂志》）开始出版，他深受该刊影响，十分仰慕陈独秀，经常与陈和《新青年》通信。

12月10日，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明与道德》，揭露帝国主义的“自卫”实为侵略的代名词。

是年，与沈云驹先生二女沈葆秀结婚。与黄负生、梁绍文、冼震等创办《道枢》杂志（油印）。

一九一六年（二十一岁）

8月，在《学生杂志》上发表《自讼语》，鞭策自己，加强修养。

一九一七年（二十二岁）

1月1日、2日，作《论女权》、《女子自立论》。

3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物质实在论》，较系统地介绍西方各派对于物质世界是否客观存在的哲学观点，阐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

7月，在《新青年》上发表《论信仰》，坚决反对把孔教定为国教。

8月下旬，与同学梁绍文应武昌青年会的邀请，赴庐山牯岭夏令会。回校后筹备成立一不含宗教性质、“修养且为社会服务的团体”。

10月8日，与梁绍文、冼震、黄负生成立了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这是当时武汉地区最早的进步社团。

10月15日，在《东方杂志》发表《经验与知识》，从各方面阐明知识与经验的关系。

一九一八年（二十三岁）

2月，爱妻沈葆秀难产殇逝。

4月，作《互助社述略》。

5月，和互助社社友，发动学生，举行演讲等活动，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向教员募款印刷《国货调查录》。

6月6日，互助社在中华大学门口成立启智图书室，后在此基础上开办书报贩卖部，销售《新青年》等进步刊物。20日，在《劳动》上发表《实现生活》，提倡工读生活。

6月，毕业于中华大学。

8月，应中华大学校长陈时聘请，留校任附中部主任(即校长)，并任国文、英文课教学。

11月，在《青年进步》上发表《力行救国论》。

12月，在《端风》上发表《向上》、《真男儿》(小说)鼓励青年兢兢业业，奋发向上。

一九一九年(二十四岁)

3月，指导附中学生林育南等创办《新声》半月刊。

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6日晚，作《四年五月七日之事》传单，和林育南连夜赶印六百份，翌日在中华大学运动会上散发。同日，看到北京大学黄晓峰"叙京校学生示威及各界骚动事"的信，将信在"揭示栏"上公布，激起全校学生爱国热情。9日，代武汉学界拟声援北京学界电，连夜作《武昌学生团宣言书》。12日，为学生团拟致督军、省长、教育总长、北京各校校长、各省议会公函。18日，全市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爱国游行。19日，学生多人分途散发代英起草的传单《呜呼青岛》。21日，发起组织"学生实行提倡国货团"。

6月7日，在武汉各界联合会上号召商界罢市以支持学生爱国行动。撰《为什么要罢市》、《罢市的目的和方法》等传单。10日，汉口开始罢市。12日，武昌罢市。18日，为武汉学生联合会作追悼李鸿儒君公启。21日，在《新申报》上发表所撰《武汉学生联合会宣言书》。

7月2日，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上发表《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言》。8日，复张复初信，批驳了张复初的错误观点，阐明了武汉学生的爱国行动的正义性和必要性。8日至12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表所撰《武汉学生联合会对于全国学生联合会意见书》。

9月9日，致书王光祈，谈国事与修养诸问题，并表示愿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10月1日，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12月中旬，与率领驱张（敬尧）代表团赴京请愿路过武昌的毛泽东等会晤并畅谈革命理想。

同月，与林育南等十二人联名在《端风》上发表《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宣言，提出要举办为社会服务的书社。同期《端风》还发表《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枕头上的感想》（小说），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解放。

一九二〇年（二十五岁）

1月，辞去中华大学附中校长职务。

2月，和林育南、廖焕星等创办的武汉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的中心——利群书社正式开业，并出版内部刊物《我们的》。

2月23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致宗白华信，谈及利群书社创办经过。

3月，应武汉学商联合会之请，和刘功辅起草湖北《平民教育社宣言书》，提出应举办平民学校，普及教育。赴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活动。

4月10日，在北京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常会，被推荐为丛书编译部专员。22日，作《致少年中国学会同人》一文，提出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编辑方针的意见，将研究马克思学说放在首要位置。15日，在《少年中国》发表《怀疑论》，鼓励人们解放思想，研究和接受新事物。

4月至8月，提倡“儿童公育”，和杨效春开展对儿童公育问题的争论。

6月19日，返回武汉。后撰写利群书社社刊《互助》发刊词。

7月1日，被推选为少年中国学会评议员。

夏季，和廖焕星访问长沙、衡阳和新城煤矿区。赴林育南家乡参观黄冈浚新小学。

7月、9月，在《少年中国》连续发表《怎样创造少年中国》，对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手段的观点，开始持否定的态度。

10月，在《互助》上发表《未来之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10日，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关“家

庭"的部分译文。

秋季，在武昌大堤口创办利群毛巾厂。

11月15日，在《少年中国》上发表《论社会主义》，提出"世界的未来，不应归于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乃应归于共存互助的社会主义"。

11月，去宣城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并兼教国文、修身课。

12月21日，复刘仁静信，讨论社会改造和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等问题。

一九二一年(二十六岁)

1月，所译考茨基著《阶级争斗》由新青年社出版。15日，在《少年中国》上发表《少年中国学会的问题》。

2月，和林育南、林育英(张浩)、唐际盛等续办浚新小学。和刘子通、黄负生等创办《武汉星期评论》。在《少年中国》上发表《我的宗教观》，对宗教迷信作了批判，并强调破除迷信思想对于人们认识真理的重要性。

4月29日，在宣城第四师范致函芜湖省立第五中学教员沈泽民、高语罕，同意教育问题有待于全部社会问题改造好了才得解决的观点。

5月4日，五四运动两周年，在宣城积谷仓主持纪念会并演讲。9日，宣城师范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学生与军阀政府作斗争，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6月初，收到在北京学习的林育南诚恳批评《未来之梦》的信。15日，于宣城致书王光祈，讨论青年的理想和工读诸问题。21日，军阀王占元部因欠饷哗变，利群书社在兵变中被毁停办。

夏季，带领学生吴化之等七八人至泾县南陵和黄山地区旅行和调查约半月。

7月1日至4日，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并发表演说。与李大钊、邓中夏等八人被选为评议员。回武昌后，在汉口志衷中学(冼震为校长)召开利群书社社员会议，谈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中分歧，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反对余家菊等的错误思想。

7月16日至21日，和林育南等召集受利群书社影响的各团体代表24人，于浚新小学开会，决定成立共存社，其宗旨为:"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

求阶级争斗，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

10月11日，离武汉赴四川泸州。30日，到达泸州，任川南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11月，致函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杨钟健云：“我私意近来并很望学会为波歇维式的团体，这是年会后思想的大改变。”

寒假，组织六名教员，二十四名学生参加的旅行讲演团，步行考察川南隆昌、内江、自流井、富顺、南溪、宜宾、江安、纳溪、合江等县，往返一月，讲演二十余次。

本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二年（二十七岁）

春季，在泸州建立青年团，最早团员有余泽鸿、张霁帆、曾润白、李元杰等数人。

4月，任川南师范校长，提出“择师运动”、“经济公开”等口号，并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5月1日，在《中华教育界》发表《去年下学期的川南师范》。9日，国耻纪念日，在泸县商会演讲，鼓吹爱国主义思想。

6月1日，在《少年中国》上发表《为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进一解》，运用唯物史观，批判改良主义，宣传依靠群众，用革命方法改造社会的思想。

暑假前夕，携款去沪为学校购置图书仪器。

7月2日至3日，少年中国学会在杭州举行年会，被选为候补评议员。

7月至9月，四川军阀混战，赖心辉部占领泸县，委任旅长张英（挺生）为永宁道尹，校长职务被撤。为此，学生发动学潮。

9月25日，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民治运动》，批判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的思想，鼓吹为民主革命而奋斗。

9月下旬，回到泸县，被张英扣押，更激起学生和各界的公愤。

11月8日，经成都高师校长吴玉章和当地社会人士保释。此时期，致书永宁道尹，请辞川南师范校长职。

一九二三年（二十八岁）

2月5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青年与偶像》，在《学

生杂志》上发表《学生的社会活动》。

3月，受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和教务长王右木之聘，到高师授课。参加王右木等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5月5日，在西南公学主持马克思诞辰纪念会，并发表演说。在《学生杂志》上发表《做人的第一步》、《学生与民权运动》。

7月15日，在《先驱》上发表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的《讨论中国社会革命及我们目前的任务》，表示坚决拥护党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重大决策，并明确指出在联合战线中"须完全注意于为无产阶级势力树根基"。

夏季，离开成都到上海。

8月20日至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出席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9月27日，中共上海地委兼区执行委员会决议，在该委员会下设国民运动委员会，与杨贤江、黄让之、阮永昭负责国民运动委员会中学生工作。29日，团中央二届一中会议，正式决定中委分工：委员长刘仁静、秘书林育南、编辑恽代英、会计邓中夏。此四人组成团中央局。

10月10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上发表《妇女解放运动的由来和其影响》。14日，出席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年会，被选为评议员。大会通过了他起草的《苏州大会宣言》，其中规定学会的方针为"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间去"。20日，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创刊，任主编。在创刊号上发表《对于有志者的三个要求》等文。以代英、英、但一、F.M.、遽轩等笔名，陆续在该刊发表一百六十多篇文章和通信，教育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

11月5日，在《学生杂志》上发表《关于学生参加政党问题》的通信，引导学生参加革命政党。20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学生加入政党问题》。主编国民党改组期间刊物《新建设》月刊，在创刊号上发表《论三民主义》等七篇文章。25日，在《东方杂志》发表《时论的误点》，指出时论所谓中国前途无望的错误。

12月8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八股?》一文。同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我们为什么反对基督教?》等文，以响应党和团发起的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非基督教运动"。

13日，致函舒新城，谈教育改革等问题。29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

《社会主义与劳工运动》，批判伪社会主义学说，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本年开始在上海大学任教。

一九二四年（二十九岁）

1月，国民党"一大"于广州举行，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合作，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月31日，国民党召开一届一中全会，决定成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指定恽代英任执行部宣传部秘书。

2月1日，在《前锋》上发表《革命政府与关税问题》。2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列宁与中国的革命》。15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纪念施伯高兄》(纪念施洋)。16日、23日，在《中国青年》发表《青年工人运动的注意事项》、《评国民党政纲》。

此时，与韩觉民共同负责上海法租界的国民党工作。

3月8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造党》，希望青年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9日，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联合各团体举行的追悼列宁大会，在该会特刊上发表《列宁与新经济政策》。23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湖北黄陂农民生活》。

4月，参加松江县各团体举行的列宁追悼会，作《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努力》的演讲；在《新建设》上发表《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对各阶级力量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指出"农工是革命的基本势力"。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自从五四运动以来"》。

4月20日，出席南洋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大会，并发表《平民教育之要点》之演讲。23日，团中央发出通告，恽代英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孙中山先生寓所（现中山故居）举行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庆祝会，和毛泽东、邓中夏、向警予、沈泽民及国民党人士二百多人出席并摄影留念。9日，到南洋大学演讲："我们要雪的耻岂独是'五九'吗?"。

5月，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农村运动》及《文学与革命》的通信。5日，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政治运动与入党问题的讨论》。

7月7日至8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年会，国家主义派左舜生、余家菊等操纵了大会，擅自修改苏州大会宣言，恽代英和沈泽民等一起与

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7月10日，团中央发出通告，恽代英任团中央局学生委员（8月因出巡长江各地，此职由邓中夏代理）。12日，在《中国青年》发表《关于政治运动的八问题》。19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乡村运动问题》的通信。发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再次评述国共合作的必要性。

7月，回武昌探亲。会晤陈养山，鼓励他在店员中继续进行进步的读书小组的活动。

8月，到南昌黎明中学（赵醒侬、曾天宇等创办）演讲，宣传革命思想。25日，在安源党和团的地委会议上作报告，谈全国革命形势。26、27日，在安源团地委的有关会议上，讨论和研究团的工作。28日，到长沙，向中共湘区委员会反映安源团员超龄退团入党手续太繁的问题，并写信给团中央提出增加对安源团地委的津贴，设立团地委专职干部等建议。

25日，团中央局决定在团中央宣传委员之下，组织编辑部，负责编辑《中国青年》，恽代英为编辑成员（三人）之一。

本月，党在上海重新组织"非基督教大同盟"，第二次掀起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非基督教运动"，积极撰文作宣传。

9月29日，出巡长江各地后回到上海。团中央局决定恽代英以学生委员兼代宣传委员。

秋季，经常去党领导的沪西工人俱乐部讲课。

10月10日，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等在天后宫召开的市民大会，并目睹国民党右派纠合流氓制造黄仁惨案。1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重要声明，沉痛悼念黄仁烈士，向国民党右派提出严重抗议。27日，上海大学召开黄仁烈士追悼大会，陈望道主持，瞿秋白、恽代英等演说，抗议国民党右派的罪行。

11月22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怎样进行革命运动》等文。

12月13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

12月，到宁波指导工作，推动建立非基督教大同盟宁波分会。

一九二五年（三十岁）

1月1日，出席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会议，并发表讲话。

1月26日至3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举行"三大"，决议拥

护党的“四大”议案，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再次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任宣传部长。31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介绍团的“三大”。

2月7日，为纪念二七运动两周年，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国劳动阶级斗争第一幕》。15日，出席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应邀讲话，指出工人须有坚强组织，才能跟资产阶级作斗争。

3月11日，在上海景平女中演讲“妇女问题”。

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

3月中，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与各界人士追悼孙中山先生的活动，任上海治丧事务所文牍员。出席上海大学、南洋公学和西门体育场各界群众的追悼大会并发表演讲。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发表《孙中山先生逝世与中国》、《孙中山先生》等文章和讲演稿。

4月3日，上海大学行政委员会成立，委员共九人，恽代英为其中之一。4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批判国家主义的谬论。13日，出席上海国民党全体党员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并发表演说。25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评醒狮派》，继续批判国家主义派。28日，主持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会议，发言指出，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宣传部应努力工作。

3、4月中，为举行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活动，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名义先后赴丹阳、镇江、扬州、南京、南通、芜湖等地进行活动，指导与推动各该地区的革命工作。

5月1日，和向警予、侯绍裘等出席上海大学平民学校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2日，和向警予等出席上海大学女同学会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7日，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会议上作《最近政治状况的报告》，阐明国内外形势。14日，主持上海执行部宣传部会议，具体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方法等。24日，出席在潭子湾召开的追悼顾正红烈士的群众大会，发表演讲号召工人群众团结一致，坚持罢工斗争，为顾正红雪耻报仇，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誓死斗争。

28日，和蔡和森、梅电龙（梅龚彬）等出席中共中央与中共上海地委联席会议，恽代英报告支援顾正红惨案的情况。他提出，发动学生到租界进行演讲，派工人代表偕同学生代表到学校中动员。这次会议决定：在五

月三十日，组织学生到租界中演讲。之后，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会议，布置和贯彻党的决定。30日，英帝国主义在南京路制造五卅惨案。当晚，出席党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汇报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中国民党人员对五卅惨案的反映。会议决定领导上海人民掀起以罢工、罢课、罢市为中心的反帝爱国运动，并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公开领导的机构。恽代英负责领导学生工作。

31日，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名义，并协助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向各地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国民党部和革命群众积极投入反帝运动。之后，又以江苏省党部名义派员赴江苏各地报告五卅惨案情况，发动群众参加反帝运动。

6月13日、15日，分别在《民族日报》上发表《评三种洋奴的论调》、《告愤激的国民》，批判五卅运动中的错误论调和错误倾向，教育群众坚持斗争。

6月26日至7月7日，在他指导下，全国学生第七届代表大会在沪召开。大会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议决案、援助工农运动议决案、学生军组织问题议决案等，并决定各地学联增设工农部。

6月28日，不再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专事负责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和青年学生工作。

7月17日至20日，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的最后一次年会，和沈泽民等一起向左舜生等国家主义派进行坚决斗争。19日，在东南大学大礼堂演讲"五卅运动"。

7月18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答〈醒狮周报〉三十二期的质难》。

8月8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批判反动的戴季陶主义。又在该刊发表《我们的战略》，批评五卅后妥协派的论调和空想派"鼓吹暴力开战的主张"，提出"决定我们切实可行的战斗方针"。22日，在该刊发表《民族革命中的共产党》。25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国民党与阶级争斗》，同时发表《悼廖仲恺先生》，高度评价廖仲恺的历史功绩，号召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派。

9月7日，在《向导》上发表《辛丑条约对于中国的影响》。16日，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提出"会员纵所见不同，仍望在要求民族独立与为人民本身利益奋斗各点可以合作"。20日，出席中国济难会第

一次筹备会，和杨贤江、郭沫若、沈雁冰等当选为委员。

21 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应该怎样开步走"？》。30 日，济难会筹备会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恽代英和杨贤江两人负责宣传工作。

10 月 3 日，中国济难会发表宣言，署名发起人有于右任、杨杏佛、沈雁冰、恽代英等。

11 月 2 日，出席全国学总、上海学联、各界妇女联合会所发起的反对关税会议的大会，并演讲。14 日，出席国民党上海第四区第十六区分部召开的庆祝东江胜利大会，并演讲。28 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五卅运动与阶级争斗》。本月，筹备国民党上海交通局，负责秘密转发宣传品和书报杂志。

12 月 18 日，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名义和张廷灏（组织部秘书）等联名在《申报》刊载启事，谴责西山会议派擅将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移设上海，是非法的。20 日，国民党伪中执委会(西山会议派)登报声明开除恽代英等国民党党籍。27 日，在《中山主义》第 2 号上发表《孙中山主义和戴季陶主义》的演讲稿，继续批判戴季陶主义。29 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怎样可以加入 C. Y.——答复一个表示愿意加入 C. Y. 的国民党员》。本月，写信给柳亚子先生，希望他能发表公正言论，与西山会议派作斗争。和沈雁冰等人奉命组织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31 日，主持召开上海大学学生骨干五十多人集会，会议决定：号召工人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军阀杀害刘华烈士，要求撤换上海戒严司令严春阳。

一九二六年（三十一岁）

1 月 1 日，作为上海代表，离沪去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4 日，出席国民党"二大"，为大会中共党团干事之一。被大会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 日，大会闭幕日，发表重要演说，愤怒谴责西山会议派和国民党右派。会后留广州工作。赴中山大学与各中学演讲，并指导中共粤区区委青运工作。

2 月 6 日，在《黄埔潮》上发表《为什么产业无产阶级最富于革命性？》。15、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先后通过恽代英起草的《训令各级党部从速扩大国民会议促成会之组织案》和《中国国民党上海交通

局办法大纲》。17日，在欢迎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演说。20日，在《黄埔潮》上发表《党纪与军纪》。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我们应当开办小工厂小商店吗?》，联系自己经历，批判小资产阶级对黑暗社会的幻想。

春季，应广州革命军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周恩来之电邀，出席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在东江逗留半月，广泛接触各界，进行社会调查，此时写了《旅行潮汕的感想》等文。

2月21日，以国民党中央委员身份出席指导潮汕海陆丰各县市党部代表大会的召开。

4月5日，广州第一届青年训育所开课，讲授中国近代史。16日，广州学生发起召开广东全省学生代表会议，为该会顾问。

5月22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在岭南大学演讲辞《耶稣、孔子与革命青年》，谴责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5月，受党的指令，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同时任军校中共党团书记。在军校期间，编著《本党重要宣言训令之研究》、《国民革命》、《中国国民党与劳动运动》、《中国国民党与农民运动》、《政治学概论》、《政治讲义大纲》、《国民革命与农民》、《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组织群众与煽动群众》等小册子。还在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李富春主持的政治讲习班任课和讲演。下旬，在政治讲习班作《五卅运动》报告。

6月30日，在《广东青年》上发表《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8月4日，在《黄埔周刊》上发表《北伐期间怎样巩固后方》，提醒人民必须预防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及其他恶势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借北伐时机摧残农工的行为，也必须预防他们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20日，在《人民周刊》上发表《廖仲恺与黄埔学校》。25日，在《革命生活》上发表《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在《少年先锋》上发表《C.Y.》、《主义》等文。

9月15日，作《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的讲话。

10月1日，在《少年先锋》上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15至28日，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会后发表其《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之经过》。

12月下旬，离广州经上海去武汉。

一九二七年(三十二岁)

1月1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思想界"反赤"运动之过去现在与未来》，对过去几次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作了总结。

1月3日，抵达武汉，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16日，与沈云驹先生的四女沈葆英(共产党员)结婚。21日，汉口特别市党部工人运动讲习所速成班开学，在讲习班兼授《国际政治经济状况》课程。同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什么是机会主义》。

1月至6月，还在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兼课，讲授《政治学》。

2月21日，和毛泽东、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团结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上提出"提高党权"、"集中党权"、"反对独裁"的口号，以打击和限制蒋介石的权力。

3月7日，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上，和董必武、吴玉章等一起，发言反对因蒋介石借故拖延不来武汉而延期召开全会。会上，被选为提案委员会委员。出席湖北全省妇女协会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发表演说。9日，在二届三中全会的提案审查会上提议：将蒋介石为部长的军人部裁撤，以后获三中全会通过。

3月10至17日，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大会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下，决定取消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位，采取主席团制，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3月10日，蒋介石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爪牙在汉口血花世界(现民众乐园)殴打拘捕工人。对肇事反动学生作了处理，并起草、发表宣言，谴责反动分子的罪行。

3月11日，在湖北省委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上发表《民主主义与封建势力之斗争》，提出国民党员应当站在民主主义方面，参加反封建势力的斗争，为农工的利益而奋斗，才能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讨论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后，主席团指定恽代英和毛泽东、邓演达、吴玉章等负责审查修改宣言，坚决支持农民运动。同日，所著《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由国光书店出版。16日，和毛泽东、沈雁冰等出席总政治部农民运动讨论委员会常会。19日，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运动

讨论委员会欢迎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农工是革命的主要力量”。25日，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任湖北省政府委员。27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武汉中央军校取消校长制，设立委员制，恽代英为三人常务委员之一，实际负责军校工作。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20日，恽代英领导武汉中央军校学生组织成立讨蒋大会筹备会。22日，在汉口《民国日报》上，与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为“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若不除蒋，“革命群众将无噍类”。

4月28日至5月10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上，和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等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5月11日，和蔡和森一起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演说。12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作武汉军分校情形的报告。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武汉中央军校学生和学兵团改编为中央独立师，任该师党代表，配合叶挺师参加讨夏战斗。22日，收复鄂南重镇咸宁。在五千人祝捷大会上发表演说，高度赞扬讨夏军队纪律严密，英勇善战。

7月3日，出席武汉三镇学生代表在武昌首义公园举行的大会并讲演，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会议通电讨蒋。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23日，恽代英离武汉抵达九江。25、26日，在九江参加讨论南昌起义计划的会议。27日，听取张国焘来九江传达中央常委关于南昌起义讨论的情况，发言反对张国焘不赞成举行南昌起义的错误意见。同日，根据党中央的命令，以周恩来为书记、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正式组成，恽代英是前委成员之一。30日晨，抵达南昌，参加前委会议。31日，前委继续开会，和周恩来等一起经过斗争，最后否决了张国焘反对起义的错误意见，决定8月1日凌晨起义。

8月1日，南昌起义取得胜利。当天在南昌《民国日报》上发表由宋庆龄、邓演达、毛泽东、恽代英等国民党中委、候补中委联合署名的《中央委员宣言》。当天成立革命委员会(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选

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七成员之一，又任宣传委员会委员、代理主席、财务委员会委员。2日，出席南昌五万军民举行的庆祝起义胜利暨革命委员会宣誓就职典礼的群众大会。3日至7日，随同起义军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发。

8月11日，中央决定成立南方局，任南方局委员。

9月末，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到失败。

10月4日，出席起义部队革命委员会和指挥部在普宁流沙召开的紧急会议，张太雷代表中央临时政治局传达"八七"紧急会议精神并研究起义部队的最后决策。随后，从海边甲子港乘船抵香港，从事地下工作。15日，在香港参加南方局与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讨论南昌起义南征部队失败的教训和今后出路。被选为省委常委之一，任宣传部长，主编省委机关刊物《红旗》半周刊。

11月14日，在《红旗》上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17日，中共中央作出举行广州起义的决定。在《红旗》上发表《冬防》，号召举行暴动。

12月初，出席省委在广州召开的紧急会议，部署起义行动。在会上宣读关于起义的政纲、宣言、告示等。11日凌晨一时，在教导团驻地"四标营"，和张太雷、叶挺等接见广州起义的主力——教导团全体官兵，并作演讲。凌晨三时三十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同日上午，广州苏维埃政府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苏维埃政府诞生，任苏维埃政府秘书长。13日，广州起义在中外反动派的镇压下失败。转移至香港，从事艰苦的白区斗争。

一九二八年（三十三岁）

1月，在广东省委《红旗》上发表《广州暴动与工会》。不久，沈葆英抵港协助工作。

广州起义失败后，被撤销广东省委常委职务。

2、3月间，周恩来到香港，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广州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恢复了恽代英和其他同志的工作。

6月，化装成风水先生，到广西贵县，以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作了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在他的指导下，会议决定将广西特委改为广西省委，选举新的省委，通过大力开展农民运动的决

定。会后，到上海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主编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和负责编写《每日宣传要点》。

9月10日，在江苏省委《多数》创刊号上发表《第三党——欺骗劳动平民的东西》。

12月18日、25日，在《红旗》上发表《关税自主与工农生活问题》等文章，揭露国民党右派祸国殃民的罪行。

下半年中，一度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

一九二九年（三十四岁）

2月，在《布尔塞维克》第2卷4、5期上发表《施存统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系统地驳斥了施对中国革命理论上的错误观点，指出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直接领导下，才能获得成功。

3月，被任命为红四军党代表（军长贺龙，后改称红二军），未到任。

一九三〇年（三十五岁）

2月15日，以中央代表身份到厦门指导中共福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强调土地革命和发展游击战争，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已开始冒头的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大会曾希望他留在福建工作。一度去闽西根据地视察。

3月12日、26日，在《红旗》上分别发表《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闽西苏维埃的过去和将来》，热情地歌颂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以及闽西根据地的伟大成就。

4月，回到上海，受到李立三的指责，旋被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调任沪中区行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又调任沪东区行委书记。

5月6日，在杨树浦老怡和纱厂（现上海第五毛纺织厂）门口等候工人代表前来联系工作时，不幸被捕。化名王作林，自称系武昌失业工人。次日，被转押到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买通看守带出致党组织的信。

6月初，被移到漕河泾监狱囚禁，不久以"煽动集会"的罪名，被判五年徒刑。

8月1日，在狱中给难友报告"八一"起义的经过及其伟大意义。27

日，被押到苏州监狱。

同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后，积极营救。

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一九三一年（三十六岁）

2月，被押到南京江东门外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在狱中编写了解释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的工人通俗读物；写狱中诗一首。

4月25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出卖恽代英。28日，蒋介石令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到狱中劝降，遭严厉拒绝。蒋介石亲下手令，立即处决。29日中午，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英勇就义。

任武雄、田子渝、李良明编写

张注洪校订

封面设计：马少展

恽 代 英 文 集

Yun Daiying Wenji

下 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25印张 322,000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1,700

书号 3001·1900 定价 2.20 元

